

Karl Kautsky 著
岑 紀 譯

中山文庫
土地問題
上卷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者序

本書之作乃造因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土地政綱的爭論。這一政綱曾向佛蘭克佛爾特黨大會提出，但爲布勒斯拉夫大會上所否決。無論對於這些爭論的意見怎樣，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在這些爭論中無論德國社會民主黨或國際社會民主黨對於近代農村經濟發展之趨勢都缺乏一致的意見，因此也就缺乏一種無可爭論的原則，足以作爲一定的土地政綱的基礎。

因此在布勒斯拉夫黨大會上，一致承認有徹底研究土地關係的必要。

自然，引起我對農業問題的興趣的，并不一定是這個原因。在我的黨的活動開始時我已經很熱烈的研究這個問題了。一八七八年，當我還是用假名“Symmachos”寫作的時候，我在維也納雜誌社會主義者上發表了好幾篇論文題爲農民與社會主義。我原擬將其中某幾篇印成煽動的小冊出版，但是所有的版本都被沒收了。一八七九年我完成了我的著作“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在這本書內，生活資料生產的問題，佔一明顯的地位；一八八〇年呂赫特年鑑發表了我論農民中的鼓勵的論文；一八八一年在“Statistwirthschaftliche Abhandlungen”內我研究了在生活資料生產方面的海外競爭問

題。除此以外，我在那時曾編輯了許多讀物如“Der Onkel aus Amerika”之類，專為農民閱讀。

因此在這十年（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中農業問題已引起了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注意，而在我這不過，是回復到舊相識——我向來完全不會間斷過的舊相識而已。

時間纔是給這一問題以很大實際及理論的意義。我黨之發展及農業的恐慌，使這一問題和社會民主黨所接觸的最重要的實際問題，立於同等地位。雖然馬克思主義已到處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資本論第三卷及其對地租問題的完善研究，亦已出版；但是同時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已形成某些現象，似乎與馬克思底學說不相符合。於是這就給農業問題以非常的理論的興趣。我在研究早已熟知的問題的時候，可望無特殊的困難，我願意儘可能迅速地將我的著作問世，因為這並不是學院式的問題，而是急切的實際問題。但是本書的出版，畢竟是經過了三年之久。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於我的職業的羈累，我不得不研究一些最迫切的問題，而恩格斯之死以及馬克思遺著之出版，又常常使我不得不擱置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利用關於農村經濟狀況的最近材料作為我研究的根據，如最近英國國會農村委員會的調查，一八九〇年美洲農業調查錄第三卷，法國農業調查（一八九二年）以及一八九五年德國農業經營的統計；所有這些材料在一八九七年甚至到一八九八年纔公布出來。

但是工作繼續下去，就表現出我所規劃的小冊子的範圍，對於本書是太狹隘了。我以為問題不是要用我這

一著作以增加現有關於農業問題之不少專著及調查的數目。這一類的著作可供參考，且不缺乏統治階級的政府、科學、以及政論家每年大批發表這一類的著作。我們所實際需要的研究，是要能在全部混亂的事實中發現其間的連繫，闡明隱藏在現象裏面及決定現象的性質的諸根本傾向。直到現在，一般農業問題之部分的問題，如大生產與小生產間之關係、債務承繼權、勞動者的缺乏、海外競爭之類都是當作獨立的現象，孤離地加以研究；現在就得將牠們當作單一與一般過程的局部現象來觀察。

這個任務很困難，題目也很廣泛；除此以外，在現有的文獻中我就不看見有一本從近代社會主義的立場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巨著。自然，社會民主黨的先進理論家都是從事於工業發展的研究。我們在恩格斯著作中，尤其在馬克思著作中雖然可以找到關於農業方面的問題的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但大都為一些偶爾的筆記及短篇論文。資本論第三卷中地租篇可說是例外，但是牠仍然是未完成的。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全部著作就死了。

即使馬克思完成了他全部著作，他還是沒有解決在現時使我們發生興趣的一切問題。照他的工作計劃他祇是研究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現時我們主要是注意資本主義社會內資本主義前期及非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形態之作用。

然而資本論對於我們研究農村經濟關係，卻是最可寶貴的，這不僅就他的結果而言，他的方法論，也足以使我們在這一個域內順利地繼續這一已經開始的工作。如果在這本書內我能夠發展一些新的有益思想，那首先

便應歸功於我這兩位偉大的先生。我特別願意聲明這點，因為從某個時候起，甚至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已有一種議論，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是陳舊了；他們說：固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是創造了一些完全值得注意的東西，固然，在現時他們的著作還能推動思想，但是誰不願意拘守教義，他就不必完全屈服於他們的影響之下；他們祇可作為達到較高點的過渡階段。他們說：這是從馬克思辯證法觀點中得出的結論，馬克思辯證法說：永久的真理是沒有的，一切的發展是經過現實的否定來完成的。

這似乎是很哲學的看法。但是這種看法同時產生出很有趣味的結論：即馬克思之不正確就是因為他的正確，辯證法之不可靠，就是因為辯證法的可靠。在這個結論中無可爭論的祇有一點：即辯證法的虛妄，但不是馬克思辯證法的虛妄。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一書中（第三版一三三頁）曾指出，把消滅的否定當作辯證過程底份子是何等的妄謬。發展之經過否定無論如何并不是說否定一切的存在，牠是以那發展中的事物的繼續存在為前提。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否定，但不是人類社會的毀滅，而祇是他的某一發展狀態中某幾方面的毀滅而已。但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別於前期社會形態底各方面并不加以毀滅。如果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之否定，那末社會主義的制度就是「否定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重新恢復個人的財產但這種財產是以「資本主義時代之收穫為根據的。」（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第二版，七九三頁。）如果發展不是簡單地否定、消滅，而且還是保存。如果在現有的應當毀滅的東西以內，牠發現出值得保存

的東西，這時發展纔是一種進步。進步就是以前諸發展時代底收穫之積疊。有機體之發展不僅由於適應，而且由於遺傳，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階級鬭爭不僅在於毀滅和重新創造，而且在於征服，也就是說在於現存的保存；科學之成功，若不承襲原先的收穫，又不對原先的收穫取批評的態度，就沒有可能；藝術之進步並不是單單基於一種不承認有任何遺傳的天才之稟賦上面，而且也基於對前輩底典型的著作之理解上面。

祇有實際底研究纔使我們能夠判斷什麼應該毀滅，什麼應該保存；辯證法在這裏就絕對地不相宜，她不能作為代替此種研究的尺度。她祇是幫助研究系統化及磨鍊研究者之見解的一種手段。她的最高的價值就在此。然而她并不直接提供現成的結果。

從馬克思學說本身中推論出牠必須為較高的學說所代替，這種意見是由於對馬克思的辯證法有了錯誤的了解所致。在這一學說中何者是錯誤的，何者為 *notion en soi* 科學之永久的收穫，這個問題之解決不是引用辯證法，而是要研究各種事實。但是從我的觀點看來，這種研究直到現在無論如何都不會達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地步。我祇看見一些猶豫和懷疑，但沒有看見一種能夠超越馬克思學說的新真理。

但是單單猶豫和懷疑，在辯證法意義上還不算是否定，還不算超越現有智識界限的繼續發展，也不算是勝過現有的理論。懷疑的原因，照我的意見，如其說是由於被懷疑的學說，勿寧說是由於懷疑者的本身。我想這不僅根據研究這些懷疑底結果是如此，就是根據個人的經驗也是如此。

在我研究社會主義的初期，我極不同情馬克思的理論。我對於馬克思理論曾採取批評的和不信任的態度，正如現在那些蔑視我盲目拘守教義的人一樣。但是我反而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了。那時，以及後來每當我在基本問題上有了任何懷疑，最後我總是看出，其罪在我，而不是在我的先生；對問題加深研究就使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樣看來，每一次新的研究，每一次再考察的企圖都使我更加信服，更加承認那種學說，這學說底應用及推廣成了我學生的責任。

農村經濟發展底現象引起了極嚴重的對「馬克思教義」的懷疑。本書就是要指出，這些懷疑究竟有什麼根據。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於柏林

554.2
210
2:1



目錄

上卷 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經濟之發展……………一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二章 農民與工業……………七

第三章 封建時代之農村經濟……………一七

第四章 近代的農村經濟……………三八

第五章 現代農村經濟之資本主義的性質……………七五

第六章 大生產與小生產……………一三一

第七章 資本主義農村經濟之界限……………一八四

第八章 農民之無產階級化……………二三五

第九章 商品的農業所遇困難之激增……………二七七

第十章 海外食糧生產的競爭及農業工業化……………三三二

第十一章 前途的展望……………四二三

目錄

一

土地問題

上卷 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經濟之發展

第一章 緒論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統治着近代社會。資產階級與僱傭工人間的矛盾是近代底動力，對於近代，實具影響。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是存在於近代社會內的唯一的生產形態。除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外還可遇到保存到現代的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法之殘餘，另一方面，在國家及公社經濟的某些形態與協同組合內已經發見新的較高的生產方法的萌芽。資本階級與僱傭工人間的矛盾還不是現代的唯一社會矛盾。除這兩個階級以外及在這兩個階級之間還存在着許多其他的階級——在他們之間，有社會的上層與社會的「渣屑」一方面有君主和他的貴族，另一方面有各種游民。他們一部份為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形態的產物，一部份為資本主義本身



底需要所產生，或最低限度，爲資本主義在其成長中所保留下來。這些一部份在發展着，一部份在垂死中的階級，他們的極複雜與不斷變化的利益雖是在極複雜的形式下，一方面和資本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交錯，但并不與任何一方面完全相結合。這些中間階級給現代政治鬭爭以她的動搖的，充滿各種奇怪的意外的性質。

研究近代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律的理論家，不應當因爲這類現象的叢雜而驚惶。他應當在純粹的形態與典型的形態中，完全不顧那些圍繞着資本主義的其他生產形態的殘餘與萌芽去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反之，如果實際政治家以爲資本家及無產者是近代社會中的唯一的因子，而不注意所有其他的階級，那就會陷於極大的錯誤。

馬克思底資本論僅論述資本家及無產者。但在同一作者底布魯米爾第十八及德國革命與反革命（註）兩書中，就與此相反，除了資本家及無產者外，君主與游民，農民與小資產者，官僚與兵士，教授與學生同樣起着作用。在所有中間階級中，不久以前尚佔我國人口大部份的農民，經常引起本世紀德謨克拉西及革命政黨的特殊注意。城市的政黨以爲農民是神祕的，不可思議的，甚至時時充滿着恐怖的東西。以前和教會、王侯、貴族進行過頑強的鬭爭的農民在現在卻很緊固地依靠這些制度。他常常用像其他階級爲自己的解放而鬭爭的那樣力量替自己的剝削者盡力。德謨克拉西所給予他的武器，他卻往往用來反對他自己。

社會民主黨起初不大注意農民。社會民主黨——並不是資產階級字義上的民主主義人民黨，不是想做那種滿足人民各階級的利益（不管他們的利益是如何的矛盾）的善人，而是階級鬥爭底政黨。社會民主黨在其生存的最初幾年中完全致力於城市無產階級之組織。社會民主黨曾期待着，經濟的發展會替她清洗農村中的地盤，有如在城市中一樣，期待着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鬥爭，將使後者從牠們之中排擠出去，於是，純粹無產者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到後來就很容易征取農民羣衆。

現時社會民主黨已如此健全地成長了，城市對於她已經不是十分廣大的活動場所了；但是社會民主黨一走進農村去，她立刻就碰到那種曾經使以前的民主革命黨驚惶失措的神祕力量。社會民主黨看見，在農村經濟中小生產之消滅絕不是馬上可以實現的。較大的農村經濟的企業祇是緩慢地征取那種不得不讓出的地位。社會民主黨所依據的全部經濟理論在應用到農村經濟方面的時候好像是不正確似的。但是如果在事實上這種理論在對農村經濟的關係上是不合實際的，那末這當然不僅應該完全改變原有的策略，而且要完全改變社會民主黨底一切原則。這個問題，宗巴特在其最近著作中很尖銳地提出來了：「如果在經濟生活中，尚有未曾經過社會化底過程的諸領域，其原因，即在於小生產在某些場合中比大生產有更大的意義，更能生產；那怎麼辦呢？這裏便包含整個問題，牠是以農業問題的形式提出在社會民主黨之前。農民是不是在原則上要強迫改變社會經濟底觀念以及從這種觀念產生出的政綱呢？我們假定，實際上得出的結論是，在農業的發展中並沒有走向大生

產的傾向，而恰恰相反，在農業發展底範圍以內，大生產並不常是較高的生產形式。於是我們就提出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應不應做那種意義的民主黨人，爲了包括小生產者，而相當地改造我們的政綱，並放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目的；抑或我們應當仍爲無產階級的政黨，保持這種社會經濟的觀念及目的，因而將其他份子從我們的運動中排斥出去？

「我之所以說『如果』、『假定』等等，這是因爲就我所知道的，尙無把握可以確定，何種發展的傾向存在於農村經濟之內，何種生產形式在農村經濟中是較高的，以及一般地講來，某種生產形式在這一領域內是不是較高的。可是我可以斷定，馬克思體系的主要點在此地是不適用的；我可以斷定，馬克思底推斷若不加以繼續研究就搬到農村經濟底領域內是不行的。他關於農業問題曾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但是他關於發展的理論，是以大生產之發展，羣衆之無產階級化爲根據的，他的理論，係從這種發展中得出社會主義之必然性的結論，對於工業的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但對於農業的發展就不然。我覺得，祇有科學的研究纔能補充馬克思理論的這種缺陷」（見宗巴特著的十九世紀之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一頁，德文版。）

我們祇怕，在這一方面我們得長時期地等待着。關於何種經營更能生產：大生產抑小生產這一爭論問題一世紀來許多經濟學者都想法來解決，並且這一爭論的結局還不能判然分明。可是這並不妨礙，在理論家不斷爭論關於農業中小經營及大經營之優勢的時候，農村經濟已沿着發展底道路很健全地大踏步向前進。這種發展

是無可爭論的而且是可以很明顯地被描畫出來的。但是要研究這種發展，無須特別注意於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鬭爭，而離開社會生產底全進程單獨觀察農村經濟本身。

無疑地——而且我們以為老早就證明了的——農村經濟并不是沿着像工業一樣的模式發展起來的。農村經濟遵循着自己的規律，但這絕不是說農村經濟之發展與工業之發展相對立，并與工業之發展不相容，恰恰相反，我們要指出，牠們兩者是向着一個目的進行的。不應當把牠們彼此孤立起來，而是必須視為一個同一過程之不可離分的分子，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理論，不祇是將這一生產方法之發展過程歸納於下述的公式：「小生產為大生產所排擠。」也并不是以為記住了這一公式就已經能把握着了解全部近代經濟的關鍵。

要以馬克思理論之精神來研究農業問題，祇是回答小生產在農業中是否有前途的問題，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農村經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所起的一切變化。我們必須研究，資本是否把握住農村經濟，假如把握住，那末是怎樣把掘地資本在農村經濟中是否產生一種變革，是否搗壞舊的生產形態，是否引出新的生產形態。

祇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纔能決定，馬克思底理論是否適用於農村經濟，生產工具私有制消滅過程是否一定不能達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土地，

我們的任務很明顯地是要說明所有這些問題。

(註一)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著者不是馬克思，而是恩格斯。考茨基在一八九八年時還不知道這件事——譯者。

第二章 農民與工業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往往（某些殖民地除外）首先在城市內，首先在工業內發展起來。農村經濟大部份長期地仍為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可是農村經濟的生產在工業發展底影響之下已帶有別的特質。

中世紀的農家族本身就完全是，或幾乎完全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公社，她不僅生產自己消費的食料，而且自己建築自己的住宅，自己製造家具及家用器具，自己做大部份自己的粗糙的工具，鞣製皮革，加工製造亞麻及毛，自己縫自己的衣服等等。農民自然去到市場上，但是他在市場上僅僅出賣他生產出的剩餘品，而僅僅購買（除鐵以外）足以存儲的奢侈品，他的生活之愉快及奢侈可以依靠市場的狀況，但不是他的生存要依靠市場的狀況。

此種自給自足的公社是不易破壞的。對於公社具有最壞影響的，祇有天災、火災、敵軍的侵襲。但是甚至這些命運的打擊還祇是暫時的災難；牠們并未毀滅生存的來源。事先收藏在倉庫內的大量儲蓄往往是足以補救天災的結果；牲畜供給乳與肉；森林及水供給生活資料。在森林中就有建築用的木料，以便在已焚毀的家宅的地基上建起新的房屋。農民為避免敵人起見常和牲畜及其他可以攜帶的家產躲到森林裏，等到敵人退去以後又再

轉回來，敵人的侵入無論怎樣蹂躪，但總不能毀滅田園、牧場、森林，這一些農民生存的根源。祇要有必要的勞動力，祇要人與牲畜仍舊無恙，那末損失馬上就會恢復了。

在我們這一世紀——十九世紀內，保守的經濟學者西斯蒙德就描畫了此種獨立農民的豐裕生活，此種獨立農民的地位便是他的理想，「農村的幸福——意大利及希臘光榮時代的歷史已將農村幸福描畫給我們——並非現代所不知道的。在一切農土地上私有權存在的地方，那種幸福，那種安全，那種信賴將來，那種同時保障幸福及美德的獨立性，到處都可同樣地遇到。和自己的兒女一道在一小塊祖遺的土地上盡力勞作的農民既不付租金給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又不付工錢給地位比他低的人。他使自己的生產適合於自己的消費，吃自己的麵包，喝自己的酒，穿家內做的毛衣及他自己培植的亞麻製的衣服。這樣的農民不大關心市場的價格，因為他很少做買賣，而且向來就不受商業恐慌的破壞。他絕不畏懼將來，他把將來想像為美景；但是他為自己的兒女底利益着想，甚至可以說為來世着想，總要利用他日常勞作空閒的每一瞬間。他需要一些時間，以便將種子撒在地裏，經過一百年後就長成碩大的樹林，他開掘溝渠，永遠使他的田地乾爽，引導泉水，不倦地往復勞作，縮小他休息的時間以改善一切圍繞着他的各種牲畜及植物。他的小的遺產——便是真正的儲蓄銀行，常常準備接收他的全部小儲蓄，把他休息的片刻時間都變為價值。自然界的永久活動力使他的土地肥沃而且百倍地報償他的勞動。農民很敏活地感覺到和他的私有財產相關聯的幸福」（見西斯蒙德 T. C. L. Simon de Simondi 著

的政治經濟學之研究，第一卷，一七〇，一七一頁。）

六十年前一個最著名的經濟學者在他那個時候還可以這樣鮮明的彩色描畫小農的幸福。自然，人們可以承認，這種情形描寫得太漂亮，這其實不是農民底一般狀況之描寫。西斯蒙德主要是看到瑞士及上意大利的某幾區域——但是總而言之他所描畫的情景不是想出來的，而是銳敏的觀察者從實際生活中觀察得來的。

近代農民的狀況和牠比較起來，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全歐洲，包括瑞士，在過去這個時期內，曾經發生了極巨大的經濟的變革。

農民手工業主要為城市工商業所排擠就是此種經濟變革的第一步。

農民家族內部祇能有不甚顯著的分工，此種分工甚至并未達到男女間的分工。無足怪地，城市工業迅速地勝過農民手工業，並且替農民製造其所不能完全製造的，甚至往往完全不能製造的家具及工具。但是工商業之發展在城市中產生了新的需要，這些新的需要，如像新的改善了的工具一樣，假若城市與鄉村間的交通愈靈活，則其侵入鄉村亦愈迅速，愈難阻遏；——農民的工業已不能滿足這些需要。羅紗的衣服代替了麻布的短衣及羊皮短外套，草鞋被皮鞋所排擠等等。軍國主義把農民的子弟吸引到城市去使他們認識城市的需要亦異常有力地促進這一過程。煙草及白酒消費的普遍主要為軍國主義所造成。城市工業最後在某幾部門內已達到這樣卓越的地步，將農民工業底生產物轉化為奢侈品，省吃儉用的農民不讓自己消費這些東西，於是就停止了這些東

西的生產。例如，紡織工業的發展，使布價低廉，這在各方面很限制了，並且在許多地方完全消滅了農民爲自己的消費而種植的亞麻。

爲了滿足本身消費而生產的農民工業的衰落，開始於中世紀城市手工業發生的時代。但是後者祇慢慢地侵入農村，牠的勢力限於城市近郊而且并不明顯地接觸到農民的生活條件。就在西斯蒙德頌揚農民幸福的那個時期，伊麥曼（在其“Münchhausen”中）就描寫了西凡尼亞一個大農家長的神情，這個家長說：「誰要是向鐵匠定做自己能做的東西，他便是一個蠢才，」並且作者敘述這個家長，說他「親自動手修理家內一切門窗戶壁，修理抽屜及箱籠，或者在方便的時候，就重新去做這些東西。我想，如果他願意，他會成爲一個精巧的木匠並且會做真正的櫥櫃。」在埃斯蘭（Iceland）就在今日也沒有一種當得起這種名稱的特殊的手工業。那裏的農民在現在還是牠自家的手工業者。

祇有資本主義的工業纔有力量，迅速地排擠爲自己消費的農民家庭工業，而且祇有資本主義的交通制度，用她的鐵路、郵政、報紙纔將城市的觀念及生產品帶到極偏僻的地方並且不僅將城市近郊的人口，而且將全體農村人口都帶進資本主義發展底過程以內。

此種過程愈前進，則原始的農民家庭工業亦愈分解，農民感覺貨幣缺乏的痛苦亦愈厲害；他現在需要貨幣不僅是爲了購買那些不必要的或奢侈品，而且爲了購買必要的，他不能不用的東西。沒有貨幣他就不能再進行

他的經營，他就不能再生存下去。

但是那些剝削農民的領主們，那些封建貴族，王侯及其他佔據國家政權的人們，他們對貨幣的需要也同時發展了而且增加了。大家都知道，這種情形使農民的物品義務轉化為貨幣義務，同時，提高這些義務的傾向，更使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增加。

農民用以獲得貨幣的唯一的方法就在於把他的生產品轉化為商品，拿到市場上并在市場上出賣。不言而喻的，他能迅速找到買主的生產品，並不是他的落後工業的製造品，而是城市工業所不製造的那些生產品。這樣看來，農民最後必然成為純粹的農業生產者，但他起初絕不是純粹的農業生產者。但是他愈是成為純粹的農業生產者，工業愈是與農村經濟分離，則西·斯·蒙·德在有自由農民的地方所遇到的農民生存中的獨立性，安全性及愉快亦愈加消失了。

農民已陷於依靠市場的地位，市場是比天氣還更易變化和更不可靠。農民最低限度對於天時之不測還能夠預防到某種程度。因排水渠之助他可以減殺過於潮濕的夏季的影響，用灌溉的建設可以抵抗過分的乾旱，用柴火的煙可以保存他的葡萄園不受春天降霜的影響等等。但是他在價格漲落的前面就完全無能為力，他沒有絲毫的辦法出賣，找不到主顧的麵包。而且那種他所額手稱慶的——好年成——現在反成了可咀咒的了。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初期特別顯著地表現於西歐，尤其是在農村經濟一般地已帶有商品生產性質，而交通工具仍

然還是不完備及不能以別一地方之剩餘來彌補這一地方之不足的地方，荒年迅速地提高了穀物價格就和豐年降低了穀物價格一樣。在法國小麥收穫的收入如下：

年	代	一海克塔爾之平均收穫(單位海克托利脫耳)	一海克托利脫耳之價格(單位佛郎)
一八二二	六	九·七三	二八·三一
一八一七	七	—	三六·一六
一八二一	一	一二·二五	一七·七九
一八二二	二	—	一五·四九

法國農業經營者在一八二一——二二三年有三倍多收成的時候，一海克塔爾所得收入約為二百馬克，還不及一八一六——一七年的三分之一。無足奇怪的，那時法王在議院中對於任何法律均不足以「豫防由於過度的豐收所招致的損失」表示浩嘆。

農業生產愈是成爲商品生產，則牠（農業生產）愈加不能停止在生產者直接出賣商品於消費者的這一原始階段上。市場——農業生產者爲牠而生產——相隔愈遠，擴張愈大，則直接賣給消費者愈益不可能，生產者亦愈益需要仲介人。商人就是介於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他比較生產者更能了解市場情況，他能在某種程度上指揮農民并且利用這點來剝削農民。

高利貸者很快和穀物及牲畜商人結合。然而，這常常是一個人。農民在貨幣收入不好的年成，無法彌補他對貨幣的需要；他不得不用借貸，抵押自己的土地。他陷於新的依賴，他所受到的新剝削，最壞的是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就開始了，他要避免高利貸的剝削，確是很困難的。這種情形不是常常做到的；新的負擔往往為他所不能承當，結果，他便不得不拍賣他的祖遺的土地，以所得貨價滿足高利貸者及收稅吏。在從前，荒年、火災及敵人的侵襲不能使他淪落到這個地步，現在穀物及牲畜市場上的恐慌卻可以使他淪落到這個地步。市場上的恐慌不僅帶來暫時的窮乏，而且能夠從農民手中奪去他的生存來源——土地，最後完全使農民和土地分離，使農民變為無產者。在農民的自給的家庭工業已消滅的地方及在貨幣義務的負擔加在農民身上的地方，自由農民之幸福、獨立及安全就這樣完結了。

但是，城市工業之發展同樣亦為原始農家家族的崩潰置下一個基礎。以前農戶所有的土地，足夠維持家庭的生活，而且在有租稅的地方，亦足夠支付這種租稅，

但是由於農民對於市場的倚賴性的加強，由於他對貨幣的需要的增加——即是說由於他必須為出賣而生產的生活資料的剩餘之增加，比種均衡就逐漸被破壞了。在生產關係不變的時候，農民為了滿足整個家庭的需要的土地就覺太少了。可是，他不能隨意變更已經確定了的生產方法和擴大其土地使用底面積。自然，他可以任意縮小他的家庭，如果他的家庭太大的話，讓過多的勞動力離開自己的家族去做農業勞動者，去當兵，或去做

城市的無產者，或移住於美洲，在那裏他們找到了新的故鄉，農民家庭曾經盡可能的縮減牠的人數。

另一情形亦會有同樣的影響，農村經濟並不是需要經常同樣數量的人類勞動力的一種事業。有時，在農忙的時候，尤其是在收穫時候，牠需要很多的勞動力，在別的時候又差不多完全不需要勞動力，夏季農村經濟中勞動力之需要比冬季多兩倍、三倍，甚至常常多四倍。

當農民手工工業存在的時候，農村經濟中對勞動力的需要的這種差別並不顯著，如果沒有田作或田作不關重要，農民的家族就可分大部分時間在家內勞作。這種情形因農民手工業之消滅而終止了。這便是農民把他的家庭人數減縮到最小限度的第二種原因，因為這樣，在冬季他便可以不養一個閒人了。

我們在這裏祇說及農民家庭工業消滅底影響。農村經濟生產中的變化也可以使這種影響加強，例如從牧畜經濟過渡到需要更多勞動的強度的牧畜業；但是其他的變化則能夠使這種影響加強。例如，打穀是在冬天進行的一種最重要的農業勞作。打穀機之採用就使這種勞動完結，而且對於農民家族之繼續減少是一種強有力

的動力。

家庭中未曾離開的人在夏天自然必須更加努力工作。可是他們的力量雖極度緊張，卻不能完全代替已離去的勞動力。他們不得不藉助外人僱傭勞動者的勞動力，但祇是在收穫期纔僱用他們，而在不再需要他們的時

候就可以解僱。付給他們的工資無論怎樣多，但這總比在週年之中養活他們所代替的家族成員的費用要便宜

得多，這樣的僱傭勞動者是由無產階級化的農民，而同樣由有副業的農民以及那些在自己家內，多餘的農民子女供給的。

這一個同一的過程，一方面已創造了對於僱傭勞動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則促成他們的出現。這一過程使有些農民無產化，這一過程，像我們看見的，減縮農民的土地并使那些對於農民是多餘的的農民子女投到勞動市場上。最後在最小農方面這一過程使他們除了自家的經營以外尚須尋找副業。他們祇有很少的土地，其生產品除滿足家庭需要以外再無剩餘；他們沒有農業生產品可以拿到市場上出賣。他們可以出賣的唯一商品就是他們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祇能斷續的全部用於自己的經營。在最大的農業經營者方面去做僱工，便是把勞動力轉化為貨幣的一種手段。

十七世紀前我們祇在很少的地方看到農民僱日工，苦役及女工。祇是從這時候起僱用農民纔成爲普遍的現象，但是家庭人員之爲僱傭勞動者所代替，對於那仍舊留在自己家庭中的勞動力的地位，是有相當影響的。他們同樣更加貶降到替家長服役的僱傭勞動者底地位，在那個時候，如家族的遺產，農民的田宅同時更加成爲家庭代表者所專有的財產。

從前的農民家庭協作組合，係專用自家的勞力在自己土地上經營，現時較大的農民經營，則僱用一羣僱傭勞動者，他們在土地所有者監視之下耕種他的土地，飼養他的牲畜，收穫他的穀物。

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階級對立侵入農村，甚至侵入農民的家庭內并且破壞了舊的利益之和諧及共同性。

我們已經說過，這個過程還在中世紀時就開始了，但是祇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纔加速這一過程，使其到處對於農村人口之生活條件表示出決定的影響，可是這個過程還沒有完結而且現在還繼續發展，牠要征取一切新的地方，牠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更加把自給的農民生產之不同部門轉化為商品生產部門，加強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用僱傭勞動來代替家庭勞動。這樣看來，城市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就已經能夠使從前農民生存底基礎發生完全的變革，即使資本還未侵入農村經濟內，即使大生產與小生產間之對立還未表現出來。

資本并不是把牠的勢力限於城市工業。資本一旦充分地加強起來，牠便使農村經濟屈服於自己。

第二章 封建時代之農村經濟

一 三田制的經營

這裏不是研究農民私有財產之發生條件的地方。我們的目的是要充分地說明農民私有財產之狀況和那些在日耳曼人所佔有的國家內人民急劇遷徙時代以後發展起來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在那裏除少數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還保存到十八世紀末葉，而有些地方還保存到現代。這些關係是農民的牧畜經濟所需要的公社土地佔有制，與適應農民的農業需要的土地私有制之間的一種調和。

像每一個農民的家庭爲自足自給的家族組合體一樣，每一個村落在經濟關係上，都是閉塞的獨立地滿足一切自己的需要的公社組合。

我們在這裏并不是把移民的形式視爲零亂的個別的田莊，而是把他視爲閉塞的農村；前一種形式長期地被認爲是原始的，但在實際上，像現在所確定的，這種形式祇是一種例外而且是由於歷史的及地形的特徵發生的，農村是移民之正規的及典型的制度，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就要說到。

已轉變爲私有財產的田宅是農民經濟之出發點。除居住的家屋及必要的經濟建築物以外，在他們周圍用籬笆圍起來的土地都屬於他們。這種籬笆圍着菜園，在菜園裏種植宜於飲食之用的植物，蔬菜，亞麻及果樹之類。農村就是由多數或少數這樣的田宅構成的。在村莊後面有分爲許多塊的公田、耕地。在三田制支配的地方（而三田制是在多數地方都存在過）這些土地被分爲三塊地或三塊田。每一塊地又被分爲不同的長形或三角形的地，即是說分爲若干塊耕地，按照土地之地勢及性質而彼此不同。每個田宅在每一耕地中都有他的一份。在耕地後面有不加劃分的公用的土地，（阿爾門德（註一）公地，）即森林與牧場。

在未分配的公社土地上面進行共同的經營。在耕地上每個家族專爲自己而耕種自己的土地，但不能隨自己的意志去經營。在田地上種植穀物以養活人，但是牧畜業——牧場經營——在整個農村經濟生產中還有主要的意義。如果農業成爲各個家族底私事，那末牧畜經濟還仍舊在全公社共同管理之下。這種經濟形式對於財產關係是有影響的。耕地，是私有財產，牧場則是公衆的事實上，每一塊田地，在收穫以後就作爲牧場，土地使用權於是就轉到公社手裏，農村公社將全部田地用作公共的牧場。收穫後的田地及閑田都變爲全農村公社的公共牧場。如果農村公社底每個份子都照適合他自己的願望的制度去經營他的土地，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的講來是強制的播種法，在支配着；在每塊土地內或在每一塊田畝上，分地之所有者必須以同一的方法經營。每年之中，三塊田中有一塊是空閑着另一塊田種植冬麥，第三塊田種春穀。土地的耕種每年都要輪換。牲畜的飼

料。除利用收穫後的田及閑田之外，則由草地，經常的牧場及森林供給；此種牲畜之勞動力、糞料、乳及肉對於農民的經濟都是同樣的重要。

日耳曼民族移殖的地方到處都是此種農村經濟的生產制度支配着。至於農民是否能夠保證自己完全的自由抑或他們遷居在大地主底土地上而納給租稅，他們是否因為要獲得強有力的統治者之保護而放棄了自己的獨立的抑或因暴力而失去獨立性，——這些問題，都是沒有關係的。

此種保守的與防衛的（在好的意義上）生產制度的特徵，就在於牠具有極大的力量及穩固性。農民的幸福及安全基礎，並不亞於手工業者，這種基礎，便是公社制度。有森林及牧場的三田制不需要任何外來的東西。她自己生產了土地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及保存地質所必要的肥料。除此以外，牧場及耕地之公用造成了農村公社社員間的堅固結合。這便是保障他不受外力方面的過分剝削。

但是這種經濟制度無論怎樣堅固，城市工業及貨幣經濟之發展已給牠以致命的打擊，就和給農民手工業以致命打擊一樣。

二 三田制為大地主經濟所束縛

我們已經看到，城市工業同樣增加了封建貴族及發展中的國家對於貨幣的需要。我們同樣看見了，在這種

影響之下的農民不得不生產糧食來出賣，他們的市場便是日益發達的城市。這一事實的結果，使農村公社中之均衡搖動起來，因為公社的整個經濟制度是要自己滿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從外邊得到絲毫的東西而且也不拿絲毫的（最少，不拿大批的）東西到外面去。

起初差不多在所有農村公社內，假若不得到公社負責人的允許要把各種消費品如：乾柴、乾草、稻稈、糞料之類從公社運出去或拋棄在公社的邊境，那是嚴格禁止的。種植在公社以內的穀物必須儘可能在公社內加以製造和消費。這種情形也適用於在公社內飼養的動物；在公社內飼養的豬不許賣到外邊去。同樣并完全規定，在公社底土地上生長的穀物要在公社內打廩、燒坊、及食用，葡萄酒之榨取，葡萄酒之飲用同樣不許拿出公社以外；在多農村公社內，封建的法律就是從這種習慣中發展出來的。不運出絲毫東西而且全部消費在自己的農村內，這種傾向在封建剝削時代往往採取了異乎尋常的形態。

馮·毛萊爾(G. L. Fon-Maurer)在其農村公社史(“Geschichte der Dorferfassung” 第一卷，三三六頁)中敘述一個埃爾薩斯的地主，在一五四〇年為要空出酒甕以裝製新收的上等葡萄酒，曾強迫他的農民當作一種勞役去飲乾甕中所有已經酸化的葡萄酒，「他們必須——根據毛萊爾的報告，是在一本舊的紀錄中曾這樣說——在一星期內飲葡萄酒三次，方可用麵包及乳酪代替租稅。農民喝得酩酊大醉以後，他們彼此間起了爭鬧，地主就科罰他們的無禮而且就這樣地得到比他出賣葡萄酒時還要更多的酒資。」我國釀酒的貴族地主

應當豎立紀念碑紀念這位果敢的基督教的德國的英雄，他在很早時期就敢於以這樣的毅力堅持與基督教社會相適合的酗酒之風，自己的利益及秩序。

當農民已不能不為市場而生產的時候，封建法律所制定的諸限制已難實行或已變為無益的障礙了。但是那種不復歸於土地的食品之不斷的輸出於城市是和土地之逐漸的枯竭及貧瘠并行的。

同時公社底經濟均衡的破壞，還有另一過程。由於土地生產物之變為商品與獲得市場的價值，土地本身也隨之變為一種具有價值的商品。當農村經濟的商品生產採取了更廣大的範圍（即在新時代的開始），土地過剩消滅了。此種土地過剩，在日耳曼人已成為土著的居民，以三田制經濟代替游牧人的牧畜經濟（此種經濟同時還經營廣泛的狩獵及不甚重要的原始農業）時，還可看到。現在我們再說三田制問題。

一定的領土所能養活的一定的最大限度的人口是要與每一種生產方法相適應。日耳曼人到移民時代是否達到了這個最大限度，人口之過剩或人口之無保障是否迫使他們侵入羅馬帝國，這仍舊是待爭論的問題。我們所知道的祇是過渡到最高的農村經濟的制度，（這是由於他們之得與羅馬文化接觸，）異常地擴大了日耳曼民族在移民後一時期所佔有的領土內的食物容積。極少的人口不足以滿足新生產方法之需要。然而這種生產方法很有益於許多後代人的生存。所以急劇的遷徙及其結果一停止在歐洲和平及安全就固定到了某種程度，人口就迅速地增加了。人口之增加很容易在廣大而無人居住的地面上找到自己必要的土地。由於農村居民

人數之增加，耕地面積或者將共同使用的土地之一部分和牠結合而增大起來，或者將共同使用的土地之某幾部分分出而增大起來，並且新農村公社之領土——這種新公社就是發生在舊公社鄰近的新農村——就是這樣得到的。另一方面，諸侯賜給寺院及其武士團中之貴族以極大的且幾乎完全未耕種過的地面，這些土地所有者又將土地授與移民使他們繳納些許的租稅。因為斯拉夫人不斷地被逐到東方去，日耳曼的拓殖者便獲得許多新的領域了。

在十五世紀初期捷克的古希特戰爭以及波蘭條頓族的政權之傾覆就完結了日耳曼東方拓殖之繼續擴張。同時中歐的人口，雖然還未達到當時經營方法可能的最大限度，可是已大大繁殖了，已不再感到人口的缺乏，勞動力的缺乏了，土地已經不像先前不給價的土地那樣豐富了。於是，壟斷一切生產工具中最重要生產工具就有可能，同時也表現為一種傾向了。從此發生了農民與封建貴族間的最殘酷和頑強鬭爭，一直延續到最近的時期，而且從來沒有中斷過，雖然在德國這兩個階級間堅決的爭鬭還是在十六世紀纔發生。他們鬭爭結局差不多到處都是有利於封建貴族，牠（封建貴族）服從強固的國家政府，因此在反農民的鬭爭中得了國家政府的幫助。

勝利的貴族開始自己製造商品，在這種情形之下的生產方法乃是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之奇怪的混合物。勝利的貴族在自己的大經營內生產出剩餘價值，但通常不是在僱傭勞動的幫助之下，而是在封建強制的幫助

之下在經營森林業，牧畜業及農業的特種方法的幫助之下貴族減少了農民土地的面積并掘壞了三田制的基礎。

森林業更易適合封建資本主義剝削的目的，適合大地產中商品生產的目的。一旦城市的發達使木材成爲暢銷的商品，而在木材還沒有爲石炭或鐵所代替的時候，牠作爲燃料及建築材料之用，其數量比現在多得多，——地主們就想方設法去霸佔森林；他們或者將森林從農村公社手裏——森林是屬於農村公社所有的——奪過來，或者在森林從前就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的地方，就儘可能限制屬諸公社的柴薪及森林刈草場的使用權，也限制了森林內的牧畜權。

還在一五二五年的時候，暴動農民在其所提出的十二條中的第五條，宣告：「第五，我們在砍伐柴薪時很受壓迫，因爲我們的領主霸佔了全部森林專供自己之用，窮人要是需要他就得出雙倍價錢去買。我們的意見是這樣，僧俗界的全部森林，如果一向是屬於他們，而不是購買來的，就應當成爲全體公社底財產，而且公社的每一份子爲了自己家庭的需要應當有權無阻礙地和無代價地使用牠們，同樣，公社每一份子若是需要，他可以無代價地去取木材來做木工，不過，爲要保護森林使不致爲人竊用起見，就要讓公社所選舉的人知道。」

農民之喪失森林使用權，同樣是爲狩獵之發展所造成。

最初狩獵所用的武器同戰爭時所用的一樣，狩獵本身祇是戰爭的豫備學校，狩獵與戰爭是緊密地聯繫着。

當狩獵對於滿足各種自由人底需要成爲必要的時候，牠（狩獵）同時就是一種戰爭。當狩獵在獲得食物上的主要作用已爲農業所代替的時候，「獲取生活資料的階級」與「保衛的階級」間之分工就成爲必要的了，這種分工自然還有別的原因。反過來說，戰爭愈成爲貴族底專職，則狩獵亦愈變爲貴族專有的娛樂。

當貴族成爲不必要，現代國家從貴族手中奪去他在中世紀所執行的機能，戰爭，施行裁判及警察職務等等作用的時候，貴族就成了宮廷貴族；貴族爲了要過愉快的生活和要索政府，而聚集在王宮內，如果貴族偶爾去巡視他的產業，那他就不知道在那裏有比狩獵更好的愉樂。

可是，實質的狩獵和繁榮的農業是彼此不相容的。無數的野禽只能棲息於濃密而廣大的森林內；除此以外，野禽是爲害和損傷農民之經常的源泉。

貴族愈是無用愈是妄自尊大，則在農業與狩獵利益衝突的時候，他愈益堅決地站在後一方面。農業的進步使野禽減少——其發展遂受到限制，森林地之焚毀概被禁止，在大筆賠款底威脅之下農民不能從事狩獵，甚至不能殺害那些傷害他們田地的野禽。

一五二五年農民所提的十二條款證明這種情形；其中第四條說：「第四，以前有過這樣的慣例，窮人沒有打野獸，飛禽及在河流中捕魚的權利；這我們覺得是恥辱的，非人的和違反神意的。有些地方領主飼養野禽傷害我們，對於我們有很大的害處，上帝爲人類的需要而創造的，全部穀物及青草，無益地爲無理智的動物所食盡，我們

都得忍受，我們還得靜默地忍受這種違反神意及其同胞的罪惡。」

在往後幾世紀內的農民狀況還更不幸。在法國，祇有大革命纔算完結了這種不幸。但在德國經過一百年後，普魯士地主貴族們還在帝國議會內大膽要求，農民應當用自己的捲心菜餵他們的小兔，然而這種情形並沒有遇到大多數代表的有力反對。

在有銷售木料的市場的地方，把森林變為私有財產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簡單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的經營雖然還是在封建的形式之下，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在牧畜業的生產品（尤其是對於獸毛）有了很廣大的市場的地方及在土地與氣候優良的地方，尤其是像森林業一樣，牧畜業既不需要大量的僱傭勞動者，又不需要耗費很多的資本，而牠的技術方面，也很簡單——在這樣的地方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牧畜業是更

要容易，更要簡單。像資本主義的森林業一樣，廣泛的資本主義的牧畜經濟也差不多祇是需要使廣大的牧場成為私有制度，祇是需要地主能夠在上述情形存在的地方，盡力創造這種制度——十五——十六世紀的英國與西班牙及往後的德國北部一帶都是具有牧羊經濟的優良條件的。此種私有制之最柔和的形式就是地主壟斷牧羊權，即壟斷牧羊於公共牧場之權。對此的怨憤在德國農民戰爭完結後復開始增熾起來。但是牧羊業之收益往往激動地主將公共牧場轉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有時甚至侵佔農民的士地并將耕地變為牧場。

在已開闢了農產品生產的市場的地方，封建主就設法在自己的經營內生產這些生產品。這自然不像森林

業及牧畜業那樣簡單。農業需要很少額外的土地，但，反之，牠卻需要很多額外的勞動力及資本之相當的耗費。

中世紀每個地主通常祇在自己土地底某幾部分上親自或經過管理者去進行自己的經營。他把自己土地的其餘部分給予農奴，農奴應當一部分以自然物繳納給他，一部分在他的經營內，在他的家內執行勞役。我們已經看見糧食市場在 cities 中出現，一方面怎樣形成了一種可能，另一方面，怎樣發展了，將這些義務轉變為貨幣義務的一種趨勢。但是在地主經濟開始為出賣而生產的地方，這種傾向就和另一傾向衝突；僱傭勞動還不怎樣普遍，地主土地上的經營要靠農奴底強制勞動。地主土地應當生產的生活資料之剩餘愈多，則他對勞動力之需要亦愈大，所需的土地亦愈多。這一方面，造成一種趨勢：犧牲公社土地之不可分的部分，特別是牧場，或者直接驅逐農民，以擴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造成增加勞役的傾向，相當限制農民的遷徙，因為農村中農民愈少，則地主經濟中之勞動力亦愈少；農民之遷徙本來就強有力地激起勞役之增加，因為地產中勞動者愈少，則加在每個勞動者身上的勞動亦愈多。

所以，我們便看見，商品生產之發展在農村經濟中產生了極其不同的傾向，一切傾向最終都這樣地發生影響：即在真正的人口過剩尚未到來以前，即是說，在人口還沒有達到那樣的密度（在這種密度之下農民在農村經濟中佔統治的生產制度之下已不能自給）的時候，農民即已缺乏耕地，尤其缺乏草地及森林。

農民生活之全部結構已澈底地為這些傾向所動搖。農民生存的條件內所發生的深刻的改變在農民的食

物中表現出來了。

三 農民開始過半飽生活

我們在這裏要稍微離開本文，以研究一個題目：這個題目雖然和我們的主要問題祇有很疏遠的關係，可是我們覺得，牠對於我們的主要問題多少能有些幫助。

現時許多人對於康德及斯賓塞的學派雖不作深遠研究，而愛把自然界底規律應用於社會史方面。自然科學的許多成就就在我們這一世紀是這樣光輝，牠們（自然科學之成就）很容易使自然科學家相信，似乎現在在他們錦囊裏有了妙計足以解決那些甚至離他們很遠的領域中的一切的謎。另一方面簡單地把正確地確定了的自然規律推廣到社會生活方面而不作複雜的研究以發見社會生活中特殊的固有的規律，這對於某些社會學家倒是很方便的。

其中承認氣候與食物間有緊密的聯繫即屬此種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原理。一卽令——黎比赫說——我們在寒帶及溫帶地方同樣消費同一重量與數量的食物，然而天道以其無窮的聰明造成必使這種食物本身含有完全不同量的炭素。南方人吃的水果，在新鮮的時候含有的炭素不到百分之十二，而北極地帶的居民所消費的食物，脂肪及鯨油，則含有百分之六〇——八〇的炭素」（見“*Chemische Briefe V.*” 248）。

波克爾由此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印度之奴隸制就是此種民族之「自然」狀態，他把這種狀態「奉為不可超越的自然律」（文化史，德文譯本，魯格譯，第一卷，一七一頁）似乎因為氣候使他們成為菜食者，植物在熱帶生長得很豐富，而這就促成人口之繁殖及「勞動市場」之充斥。

自然我們并不想否認大家公認的生理學證據：即人類在寒冷氣候中較之溫帶地方需要多量的炭素物，即是說，需要多量的肉食物。

但是這種差別并不像普通所想像的那樣大。人類在北極圈內也以植物為食物。「除魚和肉以外——勞爾金希爾德敘述說——突厥人消費極大數量的菜蔬及其他可食的植物……有些作家，他們把突厥人說成這樣一種民族，只以動物類為可食之物，他們就陷於極大的錯誤。恰恰相反，在一年中有些時候突厥人，在我覺得是「草食者」較之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民族更甚」（乘「維格」號大船環遊歐亞記第二卷一〇八頁。）另一方面，在熱帶地方普通食物并不是像波克爾所想的完全是水果，米及其他植物（見五四頁）完全菜食在那裏是例外。——「在非洲肉的需要較少，這直然是一種謊話，」布赫勒這樣說（見 *Isberth* 一五三頁及一一六頁）并且許多事實都證實他的觀察。在全非洲肉的消費很普遍。斯文佛爾特敘述黑人波果族的食物是特殊的嗜好，他們除狗及人之外，并不厭惡任何動物，他們把鼠、蛇、土狼、蠍子、螞蟻、毛蟲之類當作食物。關於居住在赤道的英屬圭阿那的印第安人也有同樣報告：「野禽及魚成爲他們的主要食品，可是他們并不厭棄鼠、猴、鱒魚、

青蛙、腸蟲、毛蟲、蠅、幼蟲及甲蟲之類」（見人種學一六三頁）。

熱帶的許多種族絕不肯只吃一種果實，他們甚至把人肉當作他們的食品。而吃人這回事好像是熱帶民族所特有的風氣。

祇有在很高的文化階段上，人們纔能支配自然，纔能自由選擇適合於自己需要的食物。文化愈低，則人類亦愈以其所能找到的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愈加不能以食物來適應自己，而是使自己去適應所能得到的食物。如果埃斯麥謨斯人主要是吃肉及鯨油，那末這不是因為氣候需要這樣的食物，而是因為他找不到別的食物。他能吃水果是因為在格陵蘭水果沒有增到充分的數量。他對於他所能得到的少數可食的植物的珍貴就表明，他專吃肉，並不是因為生理的緣故。南方的埃斯麥謨斯人在夏天採集少數果實；住在北方的人就不大知道有什麼植物，除了他們在鹿胃裏找到那些半生不熟的植物以外，但是他們把這些植物當作佳妙的食品。

自然，這是特殊的現象；地面之極大部分都富於各種動植物的食品；人類在食物的選擇中並不是到處都像南北極一樣受限制。但是無論什麼地方他在食物選擇方面總不能隨意去選擇他想要的那種食物。在極大多數場合內人類只能找到有限數量的食物而且不是沒有困難，也不是在每個時候都能找到的。何種食物能夠保證他有充分的和經常的營養這既不是依賴於牠們所含的炭素量，也不依賴於人類對牠們的需要，而首先是依賴於人類的技術智識之性質及程度，依賴於人類使自然屈服於自己的技巧，一言以蔽之，依賴於他的生產方法。

候，上層建築以及其他物理條件之影響和這些比較起來簡直是無足輕重。如果我們舉出幾個站在同一文化程度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各個野蠻民族爲例，那末我們就看見，就一般及整個而言，他們無論在大平原或在多岩的山上，在亞馬孫河或在密士斯比差不多以同一比例把魚、野禽及植物作爲食物而消費；顯著的差別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以氣候之影響來說明，而祇能以地方條件，如河中魚產或豐富或不豐富等等來說明。

一民族的食物隨着他的生產方法的改變而改變，雖然氣候仍舊完全不變。如果近代的賴坡尼塔的拉薩羅林人以管狀鱈、鱈魚及蒜頭來滿足，那末他之以此爲滿足並不是因爲他生活在優良的氣候內。在同樣的氣候內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像我們從依里亞德及奧吉塞（註三）中所知道的，他們得到享樂是在於他們不備耗盡大量的肉，而且耗盡「光溜溜的」脂肪——即滿足了埃斯麥謨斯人的那種食物。

印度人同樣並不永遠是菜食者。在他們侵入恆河流域，成爲那裏的土著以前，他們已是牧人——遊牧民，主要是以他們的那一大羣動物的乳和肉爲食。祇是在他們的生產方法改變（因爲恆河流域對於農業而不是對於廣泛的牧畜業表現了有利的條件）以後，在廣泛的牧畜業爲農業所排擠以後，拖犁及供給乳的有角獸之殺害，纔漸漸地被認爲是一種犯罪的浪費行爲。

在農民飲食中像這一類的革命的改變在我國開始於十五世紀。還在十四世紀時森林、牧場、水以及鳥戶供給了豐富的食物。肉在當時是全德國每個平民的日常食品。一天兩三盤肉在日工看來一點不稀奇。

克賴登斯底計算指出，在當時肉的消費是怎樣的普遍。根據他的計算一三〇八年在佛蘭克佛爾特(Frankfurt)阿得河(Oder)肉的消費最低限度達到了每人二百五十磅，而在現時肉的消費在柏林每人在一三〇——一五〇磅之間。在布勒斯勞(Breslau)於一八八〇——一八九年間每個居民總共消費八十六磅。

在十六世紀各種情況綜合起來均不利於農民。森林及水利在農民是享受不到的；野禽不是供農民作食物而是毀滅農民的生活資料的。牧場受了限制；如果農民還飼養牲畜及家禽，那末，除了有角獸以外，他必須將所有這些在城市中出賣，以便獲得必要的貨幣。德國農民的飲食很快變為貧乏，農民自身成為菜食者，像印度人一樣。一五五〇年時瑞典比亞人(*Scythian*) 格呂赫姆賴爾(*Geirich Muller*)已經很悲傷地訴說：「回想起我的父親，他是一個農民，農民所吃的飲食絕不像現在一樣。那時每天都有肉及各種食物，在祭神日及議會日，棹上擺得滿滿的；他們喝酒像喝水一樣，他們吃得很飽而且要多少還可拿多少去，因為各種東西都很充足。現在這種情形改變了。不幸的時代來臨已經有好多年了，一切都很昂貴，甚至富農底食物也比從前苦工和日工底食物壞得多。」

牧畜業之衰落很快地就引起穀物生產之衰落，因為牲畜愈少，則糞料亦愈少。在牧畜業之衰落引起耕牛減少少的地方，土地的耕種就更加惡劣。個人勞動或馬所負擔的封建勞役之增加亦使土地的耕種，更加惡劣。勞役使地主經濟奪去了農民底勞動力，正是在勞動力在農民自己經營內特別需要的那個時候。

由於銷售在城市內的農業生產品的數量的增加，就必須以特別施肥及土地深耕來彌補，因此種增加所形成的生產品缺乏，但是恰恰從這個時候起，肥料更加減少，而耕種更加惡劣。其結果就是農民經濟底衰落，土地枯竭，收成銳減。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有好年成，農民也難於出入相抵；爲了要使農民完全破產，只消一個荒年或一次敵人的侵入（在從前只是造成暫時的窮困）就夠了。

我們看見了，農民在十六世紀時已是菜食者；在十七及十八世紀農民在某些國家內一般講來已不能飽食了。大家都知道，拉布魯爾敘述革命前一百年間法國農民的情況，他寫道：「有一種人形的動物，雄的、雌的、污穢不潔的，黃皮寡瘦的，被陽光蒸曬的；他們住在農村內並且株守在他們所堅忍耐勞地挖掘和耕種着的土地上。他們具有一種斷續的語言，在他們直立起來的時候，纔現出人的面孔。實際上，這就是一些人：他們在晚間爬進自己的洞裏，在洞裏吃黑麵包，菜根及水。」在某些農村內農民只吃青草及野生果實。克乃爾姆·菲拉（Kerthoum-Phila）的主教馬西傑在一七四〇年寫信給弗賴爾道：「我國的農民，生活於極度的貧困之中……大多數在半年期間甚至缺乏，爲他們的唯一的食品，大麥及燕麥製的麵包。」

在往往因爲土地貧瘠的增大而重複出現的荒年內，情況尤爲悲慘。從一六九八年至一七一五年法國的人口因爲窮困增加，從一千九百萬減至一千六百萬。

魯道維克第十五的統治較之魯道維克第十四的統治更爲和平，軍事的負擔在魯道維克第十五統治之下

也比較小，但是封建義務的壓迫仍舊一樣。這些壓迫令人難以忍受；許多農民任意拋棄了自己的不能使他們免於貧困的土地，他們覺得做一個僱傭勞動者甚至做一個窮人或強盜還要好些。在一七五〇年時凱賴就已經說過，宜於耕種的土地之第四部份仍舊不耕種；阿爾屠爾；永格直接在法國革命之前宣告，全部耕地三分之一（九百萬海克塔爾以上）都空閑着！根據萊茵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報告看來，布里塔三分之二的土地都空閑着。

境況並不是到處都像法國一樣的惡劣，在法國，政府無限制地統治了農民，而政府的權力又完全操於十分傲慢的、粗野的、貪婪的和近視的宮廷貴族之手。在德國，農民已處於可憐的境地，且從自己的土地逃亡已成了常有的現象。

四 三田制成爲農村經濟所難忍受的鎖鍊

甚至在那些地方並沒有一個傲慢的地主貴族強暴地縮小領土之食物的容積（在農業中佔統治的經濟制度之下可能的容積）可是在這些地方此種制度（三田制）在十八世紀期間更加變爲煩重的鎖鍊。有些地方人口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密度，必須竭力過渡到更高的經濟制度以擴大領土的容積。這樣的制度已經在英國發展了，英國因爲特種關係，封建的農村經濟底基礎已爲許多革命——從海里赫第八世的改革起至一六八八年的「光榮的革命」止——所破壞，並且英國已經替資本主義的、強度的農村經濟底發展洗清了一條道路，資

本主義的強度的農村經濟使牲畜飼養於廐內，種植飼料以代替牧場上牲畜之飼養，並且除穀物外還種植果樹。但是在歐洲大陸上要想在各處不經過革命就在現存的土地私有制關係內採用這種制度，那是不可能的。地畝劃分和強制耕作使任何革新在昔日的三田制內都成爲不可能。至於各個農業經營者雖種植新植物，如馬鈴薯之類，但他們都是在強制播種法所不能遍及的菜園內，或由公社土地中所劃分出的大塊土地上種植。

除了需要擴大糧食的生產以外又需要使生產適應市場的要求，而傳統的生產方法要做到這一步，最低限度，對於最大的經營者——他們爲市場而生產了大量的剩餘生產品——是不可能的。

中世紀的生產方法很能適合平等的人們底協同組合之需要，他們都過着同樣的生活方式並且都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那時公社的田地及其春麥，冬麥及閑田等不變的換種制，都是很與這種情形相適合的。一旦市場發生，於是在公社社會之間，便發展了不平等。他們中一部分很難從自己土地中獲得他們自己所必需的東西，而別一部分則生產了剩餘。一部分最窮的人，照舊祇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他們牢牢地信賴公社。而對於別的人，公社就成爲一種鎖鍊，因爲市場無論需要什麼，他們卻不能在自己土地上生產公社秩序規定以外的東西。

在公共牧場之殘餘方面，利益之矛盾也完全發展了。小農需要這種牧場，他無法過渡到更高的生產形式，公共牧場之分割差不多使他失掉飼養牲畜的可能。爲了土地的肥料他必需儘可能有更多的糞料，公共牧場之分割雖多少增加了他的土地的面積，但卻減少了肥料的數量，因爲這種分割迫使他飼養較少的牲畜。反之，大農認

爲把他們因自己的工具可以更實際地開墾的這種土地用作牧場是一種罪惡和浪費。許多理論家，即擁護在英國已發展了的更高生產方法的人們，都站在他們方面說話。

爲了要過渡到最高生產方法就必須消滅介乎公社的土地與土地私有制之間的中間物，中世紀的生產制度本身就是這種中間物；就必須確定完全的私有制，分配公共牧場，毀滅公用土地及強制播種法，取消散佈在各地的田畝的劃界，把牠們連結起來并且使土地所有者成爲他自己的土地（連結爲一整塊的土地）之私有者，他可以在牠上面進行經營，使之完全適合於競爭及市場之需要。

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方面此種變革無論怎樣必要，經濟的發展在農村人口當中並沒有創造出這樣一個階級，牠能夠傾向這種革命并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完成這個革命。

農村經濟在現時并不是社會生活內的一種孤立的現象；牠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繫。農村經濟不能從自身中產生的那種革命的發端，那種力量乃是從城市帶到農村中來的。城市經濟的發展完全改變了農村中的經濟關係并使私有財產方面的改變成爲必要。此種發展在城市中創造了那些革命的階級，他們自己暴動起來反對封建國家而把政治的及法律的變革帶進農村去，在農村中他們往往在大多數農村居民的歡欣鼓舞之下，而有時甚至不顧他的反抗去實現了那些關係的變革。

城市的官僚在開明專制時代最先企圖完成這種改革，但做得并不常常成功，往往照老套頭去做，在大多數

場合內，且不管他的高調唱得如何，總是做得很不堅決而且很可憐。祇是在一七八九年時在政治上為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巴黎革命的各階級暴動起來了，巴士的獄之佔領對於被奴役的農民是一個信號，使他把封建的羈絆從自己身上擺脫，祇有那時和土地私有制有關的諸關係內之變革起初在法國本國內，隨後在她的影響之下，在隣國內纔進行得異常迅速異常堅決。

在法國，變革乃是用違法的，暴力的方法完成的，這就是說，農民不僅免掉了他的義務，而且還從教堂及亡命者沒收過來的地產中獲得了土地，因為資產階級并未霸佔了這種土地。

普魯士由於在熱那（Genoa）的失敗不得不作這樣的改革。此種改革在那裏，——在德國一般講來都是如此，——是用和平的及合法的方法完成的，就是說官僚很遲緩很不堅決地執行了早已成為必要的改革，還耗費了大量勞動和金錢，官僚們經常害怕激起地主貴族的不滿，而拖延到一八四八年的一切訴訟手續終究是有利於地主貴族。農民為了償付這種和平的，合法的方法，曾在長期之內用現金用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以及用新的稅款付給地主貴族。

「農民為要免除非法課加的義務所付給貴族和國庫的總額，最低限度計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台勒（Taler）也可以說有十億馬克之多。

「十億馬克祇是使四百年前貴族所霸佔的土地之極小一部分解除義務，只是極小一部分，因為貴族和國

家仍舊以家長相續及其他騎士地產和邸宅的形態保留了極大一部分」（見恩格斯在其對維蓋爾曼瓦爾弗的「西列細亞的幾十億」這篇極卓越的論文所作的序言中，這篇論文最初於一八四九年登載於「新萊茵報」上，後於一八八六年在蘇黎克（Zürich）出單行本。）後來的研究祇是證實了瓦爾弗底敘述。

農村經濟在俄國是在克里姆戰爭以後纔被改革成近代的形式。農民不僅從農奴的從屬地位解放出來而且解放出自己的較好的一部分土地。

但是在革命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方法進行的地方，這種革命的完成無論怎樣悲慘，她的最終的結果總是一樣：一方面，封建義務的取消，另一方面，原始的土地共產制的殘餘之廢除，即是土地私有制之完全確立。她替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開闢了一條道路。

（註一）阿爾門德爲中世紀日耳曼及瑞士的農民公社。

（註二）依里亞德爲古代希臘的詩，奧古塞爲古代希臘史詩，相傳爲荷馬所作——譯者。

第四章 近代的農村經濟

一 肉之消費及生產

一方面，增加肥料，即是說，在種植飼草的面積縮小之下飼養大量的牲畜，另一方面，對於市場底需要之較大的適應，這就是站在新的農村經濟面前的兩種主要要求，資產階級革命爲了牠（新的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合法的地位是在對於這種發展的技術的及社會的先決條件已經存在以後。

但是牲畜數量之增加不僅適應農業的需要而且適應市場底需要。自然，從十六世紀起，肉的消費在城市中減少了，可是和城市人口的數量比較起來，這種減少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反之，城市人口異常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中肉的消費之相對的減少都不像農村中那樣大。我們且置一切窮困不講，城市中生活程度畢竟還是很高，一部分是受了城市中靠剝削勞苦大眾的果實爲生的資本家及貴族之較高生活程度的影響，一部分是因爲僱傭勞動者之集中容易使他們爲要求增加工資而鬭爭；然而，除此以外，還因爲城市中生活方式及勞動條件是與健康的損害有關係的，因而城市中勞動力之再生產在這種影響之下就比在農村中需要更高的生活程度。市

民，在關閉着的地方勞作，其神經比肌肉更爲緊張，如果他要想仍舊能夠勞作的話，他就得比農作者需要更易消化的肉食物。鐵道的敷設就使牲畜成爲那些農產品之一，牠們（活的農產品）容易運輸到遠方去，這種情形也促進了肉的消費較之農村更爲普遍；住在離市場很遠的農民也可以很迅速地供給牲畜到市場上去。

根據柴特干斯特所說的，鐵路運費在現時對商品價值的百分比，以一生特勒及一英里計爲：稻稈爲百分之
一五，馬鈴薯爲百分之二〇，乾草爲百分之七·五〇，牛乳及新鮮果品爲百分之三·七五，裸麥、大麥、燕麥爲百分之二，小麥及有莢植物爲百分之一·五〇，活的牲畜爲〇·二五。在活的牲畜及其他生產品，甚至小麥底供給上其用費之差別是很大的。

在法國城市與鄉村在肉的消費中的差異都有數字統計。根據一八八二年調查的材料看來，在這一年內法國每一個人消費的肉爲：

巴黎.....	七九·三一啓羅格蘭姆
其他城市.....	五八·八七啓羅格蘭姆
農村中.....	二一·八九啓羅格蘭姆
全法國.....	三三·〇五啓羅格蘭姆

可是，從一八八二年起在法國城市與鄉村在肉的消費上表現出差異減少的趨勢。城市中此種消費被減少，

農村中則增加了。根據一八九二年調查的材料城市居民所消費的肉和一八八二年比較起來已從六四·六〇降至五八·一二啓羅格蘭姆，即是每人減少了六·四八啓羅格蘭姆，而當時在農村居民當中此種消費從二一八九增至二六·二五啓羅格蘭姆，即增了四·三六啓羅格蘭姆。

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及交通工具愈迅速地發展起來，城市愈發達，則肉的消費亦必然迅速地增加起來，即使城市與農村人口之幸福並未提高。肉的消費甚至在城市或在農村內，或同時在城市與農村內幸福降低的時候也可以增加起來，祇要城市十分迅速發達的話。現存制度之辯護者的經濟學家很高興指出的，肉的消費的增加，并不能作為國民幸福增加之正確的說明。肉的消費之增加倒是農村人口之相對，乃至絕對減少與城市人口之絕對和相對增加的說明。生殖率之降低，即是說食肉的成年人的百分數的增加及很少食肉或完全不食肉的人口，即兒童人數之減少，也必然促成肉的消費的增加。

在政治學辭典 (*Handwörterbuch der Statswissenschaften*) 內海爾拉赫 (*Gerlach*) 論「肉之消費及其價格」一文中引了許多城市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十九世紀前半期，肉的消費一般地講來並未增加，而是減少了。在慕尼黑 (*Munich*) 每年消費的牛肉，小牛肉，羊肉及豬肉每人為：

一八〇九——一九年·····	一一一啓羅格蘭姆
一八一九——二九年·····	一〇四啓羅格蘭姆

一八二九——三九年	九三啓羅格蘭姆
一八三九——四九年	八六啓羅格蘭姆
一八四九——五九年	七五啓羅格蘭姆

從這個時候起消費稍稍增加了。

在漢堡 (Hamburg) 每年一家所消費的, 平均爲:

一八二一——二五年	五三八磅
一八二六——三〇年	五二三磅
一八三一——三五年	四五二磅
一八三六——四〇年	四四八磅
一八四一——四五年	四二九磅
一八四六——五〇年	三三九磅
一八五一——年	三七九磅
一八五二——年	三七二磅

最近期間肉消費減少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巴黎, 巴黎的人口從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六年增加了三十

萬人，而這時每年肉的消費在同一期間則從一八五百萬降至一七三百萬。實言之，肉的消費的減少在此地不僅是相對的而且甚至是絕對的。可是，這是特殊的現象。平常大城市的發展來得很迅速，因而在城市中及全國內肉的消費絕對地增加了，即使在城市中肉的消費相對地減少。

肉的消費之絕對增加乃因牲畜數量之繁殖（這是十九世紀前半期之特徵）在普魯士八個舊時的省份內羊的頭數為：

	細毛的上等羊種	細毛的下等羊種	本地種	總計
一八二六年	七一九、三〇九	二、三六七、〇一〇	五、一七四、一八六	八、二六〇、四〇五
一八四九年	四、四五二、九一三	七、九四二、七一八	三、九〇一、二九七	一六、二九六、九二八

在六十年代初期，牧羊業已達到了牠的高度的發展。在一八六四年，在上述的幾個地方，總計有一九、三一四、六六七頭羊，在一八八三年已經祇有一二、三六二、九三六頭。這種縮減，主要用海外競爭——這一現象來說明，關於海外競爭情形，我們在下面還要說到。農村經濟的新時代正是從此開始的。雖然我們在各種傾向仍舊未變，並且關於更早時期並沒有充分材料的地方，爲了說明我們的敘述而利用最近的材料，可是我們一般地祇注意七十年代初期即已存在的事物的狀況。這裏我們爲避免誤解起見只回憶這種狀況。

除牧羊業的發展外，其餘牲畜的數量也增加了。在普魯士八個舊時省份內計有：

	一八一六年	一八四〇年	一八六四年
馬	一、二四三、二六一	一、五一二、四二九	一、八六三、〇〇九
有角獸(小中除外)	四、〇一三、九一四	四、九七五、七二七	六、一一一、九九四
豬	一、四九四、三六九	二、二三八、七四九	三、二五七、五三一
牝羊	一四三、四三三	三五九、八二〇	八七一、二五九

可是，肉的生產增加得比這些數字所指示的還多，因為在這一世紀期間同時發生了每頭牲畜的平均比重之大大增加。泰爾(Tal)計算活牛的平均重量為四百五十磅；約在二十五年之後（即在一八三四年）斯維柴爾(Sveicher)認為牛的平均比重為五〇〇——六〇〇磅。現時在許多經營肉牛的平均重量為一、〇〇〇甚至為一、二〇〇磅。

根據一八九二年法國農村經濟調查的材料看來，肉食用的死畜之平均比重等於：

	一八六二年	一八九二年
牡牛牝牛黃牛	二二五啓羅格爾姆	二六二啓羅格爾姆
犏牛	三九啓羅格爾姆	五〇啓羅格爾姆
羊	一八啓羅格爾姆	二〇啓羅格爾姆
豬	八八啓羅 爾姆	九四啓羅格爾姆

穀物的生產隨着肉的生產之增加而同時增加了。此種現象可以在法國，從一七八九年革命起，極其明顯地觀察出來。在下述的表中我們引證所生產的生產品之數量，以百萬海克托利脫耳為單位：

	一七八九年	一八一五年	一八四八年
小麥	三四	四四	七〇
裸麥及其他穀物	四六	四四	四〇
馬鈴薯	二	二〇	一〇〇

二 換種經營·分工

這些顯著的結果從何而來呢？牠們是整個農村經濟生產中變革之產物，此種產物在英國是隨着十七世紀革命之後而來的，而在歐洲大陸上則是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及其反響之後。

自土地成爲完全私有財產以後，強制的播種，像收穫後及閑田作爲牲畜之公共牧場一樣，已被廢除，而公社的土地已被分割，土地所有者已經不免強將牲畜放在牧場上了。技術的條件對於更高形態的牧畜業已經存在了，同時亦已採行了各種飼草的種植，此種種植可以從同一地面得到比牧場更多的飼料。把牧場轉變爲耕地并拿她來種植飼草以後，就可以將牲畜飼養在廄內，在夏天也無須將牲畜放在草地上，因此同在一土地上可以飼

養更多的牲畜，絲毫不會減削種植穀物的地面。反之，種植飼草及腐養牲畜之結果反而很好。無須將從牧場轉變為耕地的全部土地用來種植飼草。種植飼草祇需土地（轉化為耕地的土地）底一部分，而且又可增加牲畜底數。這樣節省下來的其餘一部分土地就可用來種植穀物。

爲了種植穀物而用這樣的方法解放出來的土地面積是很大的。根據羅賽爾（Roesler）的意見，在三田制經營之下可以種植穀類植物的中等土地約爲公社土地的百分之二十，而當時屠能以爲，在換種經營及腐養牲畜情形之下可以將同一數量的土地的百分之五五——六〇用來種植穀物。

同時牲畜之增殖對於耕地卻提供了更多的糞料而且增加了牲畜的勞動力的數量。單單這一結果就使土地更好耕作。由於此種變革不僅增加了種植穀物的面積，而且提高了土地底生產力。在法國根據上述的農村經濟調查的材料看來從海克塔爾所得的小麥的平均收成如下：

年 代	海克托利脫耳
一八一六——一八二〇	一〇、三二
一八二一——一八三〇	一一、九〇
一八三一——一八四〇	一二、七七
一八四一——一八五〇	一三、六八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	一三、九九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	一四、二八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一四、六〇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一五、六五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一五、八三

但是變革之影響於生產方法者，則不限於此。

自從土地所有者獲得了他自己的土地的完全私有財產權的那時候起，他并不一定要在不用於飼養牲畜的那部分土地上種植穀物。他可以種植市場上所需要的別的植物，而市場底需要就更加成爲農業的決定因素。他出產了在舊時三田制之下平常或完全不能種植或祇能在自己菜園內培植的植物；這種植物或者是作爲食物用的植物，例如馬鈴薯和有莢植物，或者是工藝植物（油質類如油菜、罌粟及其他，纖維類，如亞麻、或苧麻，顏料如茜草、莖藍之類，香料酵母花，茴香或其他工藝植物如煙草）。

在各種植物連續種植及以穀物和飼草輪換牠們的時候就發見了，牠們并不完全同樣地使土地枯竭，而在種植之合理的連續之下，生產力反能夠大大地提高。有一些植物，穀物，油質植物及纖維植物主要是從土地之表皮層吸取液汁，牠們就會使土地枯竭。其他的植物則節省地力，甚至在某幾方面使地質改善，由於濃密的陰蔭，不

使雜草叢生，以自己深埋的根吸取地下層的液汁並使土地輕鬆；最後，另外一些植物（金花菜及有莢植物）由於積累從空氣中吸取的氮素對於地質更有良好的影響。

換種之良效，古代羅馬人就已經知道。但是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在英國纔第一次大規模地着手有系統的採用牠，換種經營從英國轉移到德國及法國。祇是到了十九世紀牠纔成了普遍的現象。

換種經營使極多數的各種植物去適應耕種及市場之變動的條件；這些植物之數目隨着有力的配合及科學的研究介紹歐洲農村經濟以新種植的植物的比例而增加，根據海克的推斷，中歐的農村經濟從牠存在的那時候起，就有了百十種栽培的植物。

然而各個農村經濟的企業間極其發達的分工是和換種經營之發展攜手並進的。三田制經濟是在於滿足農民及地主之私有的需要，因此在全部中歐，牠到處都有同一的特點。每個農村，每個農民通常不依賴於地質條件而祇生產一種同一的（農產物）。現時為市場，同時為競爭而生產已發生了。這意義，就是每個農業經營者當然只生產那些場市上所需要的生產物，他靠地質、地勢、及其地產之範圍、交通工具、資本之限度等而能更廉價生產牠們。在不同的地產內發展了個別的農業部門；在一些部門內農業佔優勢，在別的部門內，牧畜業佔優勢，而在第三種部門內則園藝或釀酒業佔優勢。農作人與牧畜者又再分為許多小部分。即如，一部分牧畜者經營乳酪業，別一部分從事飼養屠宰的牲畜，第三部分則飼養幼畜等等。

在英國及美國分工特別完善。「英國每一種家畜動物加以不斷的劃分；例如，在乳酪經營內用以出賣的乳之生產使之與用以製造牛奶的乳之生產及用以製造乾酪的乳之生產分開。爲着每一個別的目的去利用特種的牲畜并用特別的方法照料牠們……北美洲應當算爲農村經濟中細密分工的典型的國家」（巴克霍慈著，農村經濟中之分工，Conradache Jahrbücher，一八九四年，三一四頁。）

在優良的環境之下（有適當的氣候及土地、高度的工資、良好的銷路）此種分工可以引起畜牧經濟之復興，不過這種復興是在更高的、更強度的、資本主義的形態上，牠需要對堅固的設備補助的肥料、農業勞作以及優種牲畜之飼養作大量的耗費。例如，英國南部我們就看見同樣的近代資本主義的畜牧經濟。可是，牠和三田制絕對沒有共通之點。除了各個經濟之間的分工外，在同一經濟內部的分工，最低限度，在最大的企業內也發展起來了。在封建的農村經濟內大企業在這一方面本質上和小企業沒有什麼區別。勞動力（人與獸的勞動力）之大部分由農奴的農民供給地主經濟，農奴以私有的家產、工具、荷車、犁之類去盡自己的義務。

大經營與小經營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有較好的設備及極細密的分工，而是在於服勞役的農民，在別人的經營內儘可能怠慢而且懶惰地去執行強制的勞動，可是在他自己的小經營內以同樣的工具他卻是很賣力和很勤苦地勞作，儘可能祇爲自己和自己家庭勞作。

祇有在近代農村經濟內無論在大企業內或在小企業內農業主都是用自家的工具，自家的牲畜，自家的勞

動者來生產，所以祇有近代的經濟纔能在大企業內發展分工，較之農民經濟內的分工更多。

無論是在一經濟內部或在各個經濟之間，分工，各種耕作以及耕種方法一定會引起勞動者之改良，工具及用是種子及畜類之改善。但牠同時異常地加強了農業經營者對仲介人——商人——之依賴。

現時農民不僅像工業家，而且像農業經營者一樣自己并不生產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他不僅要購買比以前貴的大量工具，而且要購買一部分生活資料，這些東西（工具及一部分生活資料）不是他的特殊經濟內所能生產或者即令生產也為數不足。由於分工之發達，農業經營者，尤其是最小的農業經營者（他們幾乎停止了穀物之種植因而必須購買穀物及麵粉）的數目也隨之增加了。有時他們在私有的經營內并不生產種子也不飼養牲畜，至少不飼養大牲畜；特種的經營專門從事於種子之種植及改良或家畜改良種之飼養，農業經營者向他們購買的正是那種在某一時期極適合於他的經營之需要的東西。另一方面，他自己出賣一部分於他無用的牲畜，——例如乳酪經營出賣已不能充分供給乳汁的牝牛，或者出賣已達成年的，適於特種經營目的的牲畜，例如在飼養幼畜的經營內，當牲畜已宜於勞作或宜於乳酪經營的時候，就將牠出賣。經營愈專門化，愈是祇需要這一種或那一種牲畜，則交換的發展亦愈迅速。商人的仲介作用亦愈發展，他特別使那些不能追蹤市場及處境困難的小農依靠他。

農民對市場的依賴性隨着貿易及交通（一般地講來，由於資本之積累在交通方法中發生變革）之發展

而增加。

此種改革，爲城市資本所造成，牠加強農業經營者對市場的依賴，但同時也不斷地爲他改變着市場底條件。直到現在有利的生產部門，當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備由陸路連結起來的時候就成爲無出息而且必須代以別的生產品，如果在這些地方有鐵道通行，可用鐵道來運輸最廉價的穀物，因而穀物的生產就不佔便宜了，但同時卻替乳酪生產品開發了銷售底可能。由於交換的發展在國內新的或改良栽培的植物出現了，純種的耕牛從極遠的地方輸入也便當了。純種的牲畜在現時從英國輸出到世界各地。屠宰牲畜在遠距離的運輸到什麼樣的範圍，這由對牲畜所課的關稅及地主階級對關稅之必然提高所發的牢騷，就很好地顯示給我們了，雖然牲畜之輸入不僅供屠宰之用，且供農村經濟的目的之用如瘦的牲畜養肥、擠乳的牲畜、馬匹等。

近代農村經濟改革過程之特別加強，是在城市內在近代自然科學、機械學、化學、動植物生理學諸領域中的許多發明的結果被移置到農村以後。

三 農村經濟中之機器

在這種情形（農村經濟的改革）之下首先應指出機器制。工業中應用機器所達到的光輝的結果一定會令人聯想到採用機器於農村經濟內，而況近代大生產已替這事創造了諸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第一，就是分工

——一方面勞動者分爲粗工與熟練工人，另一方面，工具及器械之專門化，適於執行個別的機能，——其次，就是大量的生產到市場上。

但是機器的生產在農業內就得克服比工業中更大的障礙，首先就是技術方面的障礙。在工業內工作的地方，工廠建造得很合式，而且宜於機器的裝置。在農村經濟內，大部分機器都在露天中工作，因此機器一定要適合地方性。但這不是常常辦得到的，有時是完全不可能的。土地耕種之較高階段大半要以農村經濟中機器之採用爲前提。

可是農村經濟中機器之採用不僅碰到技術上的困難，而且碰到經濟上的困難。大多數機器在農村經濟中一年祇有一個短時期被使用，而在工業方面一年到頭都可使用。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由於應用機器，勞動力之節省在工業內當然很大。假如兩架機器每一架在一日內代替十個勞動力，但是其中有一架機器只做十天，而別的一架做三百天，那末每年勞動的積蓄有一架機器爲一百個勞動日，而其他一架爲三千個勞動日。如果每架機器可用五年，那末農業機器中全部節省的勞動達五〇〇〇個勞動日，而工業機器達一五、〇〇〇個勞動日，這就是說，假如每架機器之價值等於一、〇〇〇個勞動日，工業機器之採用可節省一四、〇〇〇個勞動日，而農業機器則相反，牠要多費五〇〇個勞動日。

此種關係對於農村經濟之所以惡劣，是因爲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機器的目的不是在節省勞動力，而

是在節省勞動工資。工資愈低，則採用機器亦愈困難。但通常農村中的工資因許多原因比城市中要低得多，因而，用機器代替人的勞動力，這種興奮在農村中也比較弱。

此外在工業與農村經濟之間還有其他的差異。機器工業通常并不比手工業或作坊需要更有智識更熟練的工人。被組織在以大工業為前提的生產方法之下的那些勞動力就可以完全滿足她（機器工業）同樣整年在一個同一的機器上勞作的工人很快地在管理機器上獲得特殊的技能。

農業機器則另是一回事。牠們往往很複雜而且要管理牠們就需要相當的智識。但是恰恰在農村中對於民衆教育及智力發展的條件在最近一世紀殊為不利。機器在農村中往往找不到牠所需要的勞動力。

此外，農村勞動者并不是整年在一架同一的機器上勞作，因此他不能像製造工業中的勞動者那樣容易慣熟牠（機器）。

最後，農業企業和大工廠相反往往離鐵道及機械工廠很遠；因此笨重的機器之運輸，尤其是複雜的機械之修理對於農業企業就很困難而且所費很貴。

雖然有這些困難，可是農村經濟中機器之採用卻迅速地增加着，——這就是牠們達到了那種完美境地的證明。

對於法國，我們有一些關於三十年來機器生產發展的比較數字。在法國農村經濟內計有：

種 類	一八六二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二年
蒸汽機及牽引機關車	二、八四九	九、二八八	一三、〇三七
打穀機	一〇〇、七三三	二二一、〇四五	二三四、一八〇
播種機	一〇、八五三	二九、三九一	四七、一九三
刈割機及捆束機	一八、三四九	三五、一七二	六二、一八五

在德意志帝國內農業企業所採用的機器計有：

種 類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汽 車	八三六	一、六九六
播種機	六三、八四二	二〇、六七三
刈割機	一九、六三四	三五、〇八四
汽力打穀機	七五、六九〇	二五九、〇六九
其他的打穀機	二九八、三六七	五九六、八六九

這樣看來，各種機器的數目，尤其是打穀機的數目有很大的增加；祇有播種機是例外，牠為條播機所排擠；條播機，在一八八二年時完全不需要；在一八九五年就有一四〇、七九二個經營採用了條播機。

英國是農村經濟中機器生產的祖國。工業中機器制度在英國比在其他國家更早就發展了；在英國對於採

用機器於農業生產有了極優良的條件。根據培雷爾斯(Peale)的意見，這些條件如下：國內文化狀況差不多到處都很高；農業經營者大半都是資本家；國內有許多機械工廠，甚至在小城市內最低限度都有一個機械工廠，因而機器的修理不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由於農業勞動者之缺乏以及他們在工資方面的苛求，激成美國和英國一同發展了農村經濟中機器的採用。機器之應用因美國工人有較高的智力的發展，尚覺容易，但是因土地之不良耕種及大多數農場遠離機械工廠而大感困難。因此美國的農業機器，比起英國來，就有另外一種形態；美國農業機器很簡單，構造極堅實，但是牠們的工作並不常常像英國一樣的完滿。

在德國農業的機器生產之發展條件并不好。在西部及南部土地過於分碎；在東部雖然大生產佔優勢，但是那裏農村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及文化程度太低，機械工廠離得很遠。薩克森省的條件最好，在那裏我們看到大經營，有智識的勞動者及許多機械工廠。在巴爾登(Baldern)全省祇有一個汽犁，在溫敦堡(Wittenburg)連一個都沒有；反之在薩克森省有四百二十八個經營使用汽犁。但是在德國其餘部分內機器很勝利地克服着阻撓她的障礙，證明——除上面所引的統計表外——農業機器生產之迅速發達。除了仍舊在英國精製的汽犁及大部分從美國輸入的刈割機以外，德國本國也製造出為現時農村經濟所需要的無數的機器。

採用機器的唯一目的并不是節省勞動力。在農村經濟中節省勞動力有時在其他目的之前反退居次要的

地位。在採用打穀機的時候，她（節省勞動力）纔佔優勢。許多農業學家，例如馮·德·郭爾慈，把使農村荒蕪的堅決的影響歸咎於打穀機之採用。「打穀機對於農業生產無論怎樣有益和必要，但是她的推廣對於農村勞動者的地位表現了有害的影響。用打禾棒打穀是早先農村勞動者在冬季的主要工作。機器打穀就需要很少的勞動者；爲了要很迅速地獲得大量穀物以之出賣，於是打穀大部分已於秋季開始，尤其是在應用汽力打穀機的地方。」

爲了要解救這種不幸，馮·德·郭爾慈，就提議「限制打穀機，尤其是汽力打穀機的使用，」很顯然地，在勞動者的利益上，實際是在地主的利益上，在他們看來，像他自己說的，「爲這些限制所招致的損失，即使不是在目前，那末也會在將來，因他們在夏季所支配的勞動力之增加，而得到額外的補償」（“Die C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 I 244、I 245頁。）

幸而，這種對勞動者的保守主義的善意祇是一種反動的烏托邦。地主不肯爲着「將來的」利益甘心情願放棄打穀機的應用，因爲打穀機「在目前」太有利了。因此打穀機底革命的行動將會繼續下去；她將驅逐農業勞動者到城市去；她，一方面，會成爲提高農村中工資的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她會促進農村經濟中機器生產之繼續發展。

像上面所引的引證已經表明，打穀機之重要不僅因爲牠節省勞動力，而且也因爲牠工作得比人更迅速。工

作之速度自從爲市場而生產代替了爲自家的消費而生產的那時候起就有了不少的意義。現在重要的是迅速地利利用市場底機會，而穀物生產者當他的穀物爲出賣而準備愈迅速，即是說他打磨穀物愈迅速，則他亦愈易利用市場底機會。如果打穀一向是農民在冬季和家庭工業一同從事的工作，那末現在因採用汽力打穀機，打穀更可直接在收穫後在露天的田場上進行，因而節省運輸的時間并可減少穀物之散佈的損失，這種損失在某些生產品，如油菜之類的裝運及卸下時是經常會發生的。培雷爾斯在其著作論機器對於農村經濟之意義中指出這樣的情形，「當時購買汽力打穀機的大筆費用是用第一次很迅速地爲市場而準備的商品之出賣所得的來償付。」

刈割機比起打穀機除了節省勞動以外，還更能加速工作。全年生產底結果要看收穫如何進行。穀物一定要在幾天之內趕快收穫。每次時間遲延可以發生很大損失。縮短收穫時間的機器便得到很高的價值；勞動及時間之節省又可使農業經營者更不依賴他的工人，他們一到收穫時期成就爲異常必要，因而在這時期要求更高工資而且動輒實行罷工。很明顯地，甚至收穫仍舊用手來進行的那些經營有時也得到幾架刈割機，但這不是爲着使用牠們，而是爲着藉牠們作護符來反對同盟罷工。卽如，凱爾格爾（Kerger）在其論農業的季候工作一書中敘述，在薩克森省所有種植甜菜的地產內都用刈割機，但是牠們主要是當作一種手段使工人的罷工感到困難。在工人很多而且他們很聽話的時候，就用手收穫，因爲穀物多量施肥的結果常常僵臥下去，應用機器就成爲不

可能。可是，從凱爾格爾寫這本書的時候（一八九〇年）起，就發明了許多機器，——可以刈割極柔軟的穀物。

但是機器不單是代替人，機器完成了這樣的作業，此種作業不是人所能完成的，或者即令完成也絕沒有這樣圓滿。機器達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她有極大的正確性，或者就是因為她有極大的力量。

播種機，撒播肥料的機器及洗滌種子的機器則屬於前一種。（即有極大的正確性。）

用機器播種比用手播種好得多。因此用機器播種就排擠了用手播種，甚至在後者（用手播種）比較廉價的地方也是如此。

條播機及完善的簸穀機首先便使在較大面積上的條播成為可能；由於這些機器就達到了在用手撒種時所不能達到的結果。「最高的收成只有在仔細地進行條播的時候纔能得到」（柴特于斯特說的。）

作穀子之清洗及分類用的機器（牠們除去一切雜草的種子及其他不相干的混雜物，除去麥角病，按照大小，比重及形式而分類穀子并供給市場以良好的穀子及同質的純粹的商品）代替了用鐵簸穀法，「別的信奉正教的農民現在還保持着這用鐵簸穀法，以為牠能提供上好的穀子。」

機器中（其重要性主要是決定於牠們能發揮較大力量）汽犁應佔在第一位。

深耕對於穀物之良好收成，並不是絕對地必要。所以在三田制支配的時候耕耘并不很深。「埃卡爾特在其實驗經濟學（一七五四年）一書中把溝深二又二分之一——三吋叫做最好的耕地，最深的為四吋，這還要看

地質如何而定，至於因土地之特質容許溝深爲五——六吋，這祇是例外的形態。他頑固地警告最深的耕耘。甚至在西凱 (G.G. Ciken) 的普通經濟學辭典 (一七八〇年，第五版) 內也有這樣的說法見 (馮·德·郭爾茲的農業載在政治學辭典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第一卷，二八頁。) 但是由於換種經營之發生很快地發見了，有些重新採用的植物——金花菜、馬鈴薯、甜菜——在最深的耕種時生長得很好。爲了深耕，發明了新犁，加強了聯畜，並且發見這種情形很有利地反映到穀物的耕種上。深耕減少過度潮濕及連續乾旱之影響。除此以外，凡深耕的土地比淺耕的土地較易變暖，而且不易使雜草叢生。

但是深耕的目的主要是予植物底根以比前更多量的輕鬆的土地，植物在鬆軟的土地內纔能很好地生長起來。

在每一種合理的經營內現在都比十九世紀初期耕得更深。如果在那時溝的普通深度爲四吋，則現在溝之深度增了兩倍，而在特別深耕的時候，溝深竟達一二——一五吋。

「我國農業之前途全賴深耕……但是爲了要使深耕得到廣大的推廣，生產力就必須比獸力更經常而有力的動作」(培雷爾斯語。) 汽力機器供給了這樣的生產力。

我們已不只一次引證培雷爾斯，他是極力提倡在德國汽犁之普遍使用的，關於這一點他寫道：

「汽力耕種和藉聯畜之幫助的耕種比較起來，其優劣可在下述的情形中看出：

「一、汽犁的工作較之聯畜的工作無比地好，這是用不着懷疑也。用不着爭論的。」

「汽犁之良好的工作，在最高的收成及其較大的安全性之內表現出來。在汽犁於幾年之內已被應用於經營之內的地方，到處都證實了這種情形。」

「再則，汽犁之優點在於，土地之耕種可以及時開始而於晚秋到來之前完結，且有可能直接在收割後開始耕作，即是說，在這一個時期，大多數經營對於耕作既不具備勞動者，又不具備牲畜……在晚秋當工作通常已經停頓起來的時候，汽犁還可工作着而無特殊困難，因而土地之耕耘可以在冬天到來之前完結。有些地方，冬季開始得很早，汽犁底此種優點當然會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農村經濟中汽犁之應用，三〇七——三〇九頁。）

我們且置這些優點不講，如果汽犁在許多地方未曾得到普遍的應用，那末其原因是，在於上述的障礙對於機器在農村經濟中之應用在汽犁方面比對於其他各種機器有更大的意義。在地方性對於汽犁之應用有很大困難的地方，在土地內遇到許多大塊石頭的地方，在泥濘的耕地上以及在極其分碎的土地內，汽犁都不適用。教勞動者去運用汽犁就不大容易，因此必須常常補救牠。但是採用汽犁最主要的障礙乃是牠的大的價值。有兩個發動機的一架汽犁值四〇、〇〇〇馬克，而且也較為合理，有一個發動機的汽犁就不大合理，但也值三〇、〇〇〇馬克以上。利用汽犁的確像利用汽力打穀機一樣，要能租用牠，纔會容易普遍。

在汽犁出產地——英國，汽犁使用得最多。最初在五十年代開始就發明了汽犁，牠宜於實際的使用。一八六

七年汽力耕作，根據 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皇家農業學會）的報告，祇被應用於一三五個地產內。一八七一年在瓦爾費爾哈普頓博覽會上所公佈的正式數字，則與此相反，這些數字證明，到這個時期，在英國已經應用了兩千多架汽力。反之，在德國，汽力在當時只有二十四架；但在一八八二年道裏總計已有八三六個採用汽力的經營，而在一八九五年則有一、六九六個經營。在薩克森省的大經營內汽力亦已普遍地使用。

在奧匈最大地產內，汽力也同樣得到廣大的應用。

但是農村經濟之需要汽力機器不僅為耕耘之用，而且為剷平耕地，耙鬆土地等等之用。在打穀的時候就表現出蒸汽機遠勝於用馬曳的機器——至於手工捲揚機更說不上了。在薩克森的甜菜業（強度耕作之真正的模範）內，全部穀物，除麥（麥稈可作捆束之用）以外，常常用機器（以汽力使之運轉）來打磨。甚至農民的捲揚機在使用打穀機的時候幾乎完全為蒸汽機所排擠（凱爾格爾，一三頁）。

蒸汽機在灌溉及排水工作時用為唧筒，是很能盡職的，最後她可用來準備牲畜的飼料并用來壓榨飼料，她（汽機）被用於磨粉廠，鋸木廠，切莖機及其他方面。

在郭爾慈的農業辭典內（*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第二卷，七二一頁）弗斯特中述：「我們且不管溫度之不良的利用蒸汽機對於農村經濟總是最廉價而又差不多到處都可應用的力。」

農村經濟中蒸汽機之數量迅速地增加。在普魯士不移動的與移動的蒸汽機計有：

應用機器的地方	一八七九年		一八九七年		增加的百分數	
	機器數	馬力	機器數	馬力	機器數	馬力
在農村經濟中	二、七三一	二四、三一〇	一一、八五六	一三二、八〇五	四七〇	五四六
在冶金製造及運輸工業中（鐵道及汽船除外）	三二、六〇六	九一〇、五四七	六八、二〇四	二、七四八、九九四	二〇九	三二〇

快。
從這裏很明顯地看到，蒸汽機數量之增加在農村經濟中不僅絕對地大，而且比其餘的工業部門增加得更快。

但是在這一領域內電氣一定比蒸汽還要得到更大的勝利；一方面，從電氣已據有了的那幾種工作中排擠了蒸汽，另一方面，在牠現所不能達到的那些勞動範圍內代替了人和獸的勞動力。在蒸汽機及經過無限的皮帶以傳導力均不能適用的地方，電力都容易買入。此外，電力極易分割，其活動且不一定需要煤。有些地方，藉助於汽力的工作，因為供給煤的地方相隔太遠，以致得不償失，但是在該處，水方便宜，電氣就能使機械之應用成爲有利。此外，電氣比汽氣更容易，在適當的工作狀態中有五十四馬力的大汽氣即是說牠所用的水和煤，約費二十二噸，較小的氣至少也要用一四——一六噸。二十四馬力的電氣費八噸，五十四馬力（的電氣）費十二噸。「電氣」之主要優點和汽氣比較起來就在於前者之比重甚小，因為比重甚小，有時在山丘地和有柔壤土質的地方，用機

器的方法耕種最先就成爲可能；除此以外，在同一比重之下電犁比汽犁有更大的生產力。柯特金（C. Köttgen, 'Ist die Elektrotechnik nach dem heutigen Stande ihrer Entwicklung schon befähigt, mit begründeter Aussicht in den Dienst der Landwirtschaft Zur Erhöhung des wirtschaftlichen Reinertrags zu treten?' Thiels Landwirtschaftliche Jahrbücher, XXVI, Heft 4 bis 5. 「電氣技術在其發展之近代狀態之下能不能有根據的希望，在提高經營之純收入底目的上爲農村經濟服務」 Thiels Landwirtschaftliche Jahrbücher. XXVI, Heft 4 bis 5)

電氣現在已經常實際地應用於農村經濟之內。有一個我們私交很好的專門家告訴我們在塔爾省（法國）有一位勃蘭先生（E. Pra）的地產內應用電氣的情形。

發揮三十四馬力能力的瀑布可以旋轉和發動機相聯的臥輪水車。使用於這種場合內的發動機能夠供給四十安培與三七五弗打的電流。在全部地產上普通的方法是在電桿上敷設電線。從這些電線上分取電流於需要的地方。

直到現時電力差不多專用於耕耘方面，用有十八匹馬力的聯合發動機幫助。

電力之應用除其他的優點外還有一種好處，就是整個地產可以用電氣照耀。這種情形使人能夠在特別場合內，例如，在收割時期，甚至夜間都可進行田作；自然，這裏的利益對於地主比對於他的勞動者要大得多。

甚至在德國也已經有應用電氣的產業。柯貝爾格通信甚至說到有人企圖從一個中央電站供給六十個地產，以電力其目的在使農業生產改善及廉價。可是關於這一企圖之結果，我們卻什麼也沒有聽到。

輕便鐵道可以和機器一同歸併到節省勞力之耗費的機械方面。運費在農村經濟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那裏要把價值相當小的大量生產品：肥料、稻稈、乾草、甜菜、馬鈴薯之類運到遠的地方去。敷設較好的道路則所費很貴，同時又要佔許多地方。

但是即使在較好的田道上爲了要克服磨擦力也得費許多力量。因此輕便鐵道就很有用處。一對曳重的聯畜沿田道路線走比牠在碎石道上走能多運四倍的貨物。況且輕便鐵道無須特別準備和困難就能安置在敷設普通道路不可能的地方，在泥濘的地方，在耕種過的田地上，在卑溼的草地上以及諸如此類的地方。輕便鐵道不僅節省曳重獸底勞動，——而且常常因爲有輕便鐵道遂使大批貨物底運輸成爲可能，沒有牠，有些農業改良就不能實現。

農業改良中最主要的改良——灌溉及排水——也有賴於農村經濟中機械的補助工具。這和我們剛纔說過的一切不同，因爲牠們（灌溉及排水）是很早就發生了的。在東方，我們找到這類的建設是在有史以前的時期就有了的。但是在歐洲，從阿爾卑斯山到北部，在三田制經濟之下農業改良就可憐得很。氣候並未引起灌溉的設備之必要；卑溼的土地被委棄爲草地；當時還有許多宜於耕種而未曾接觸的土地、森林、牧場，對於農業改良

(就字的狹義而言)並不是一種刺激而且也未曾供給了勞動力。但是在人口之密度增加了的時候,封建的義務就壓迫了農民并從農民身上奪去作農業改良之用的力量及工具,農業改良之必要的前提條件祇有革命纔能創造出來。

近代農業改良中尤為重要的是排水法,即排出地上的水是經過焦土製成的地下水管,此種改良,由於煉瓦術之進步,最先即已成爲可能。排水法使土地更乾燥,柔和而鬆軟并且使土地的耕作更容易;土地容易保暖且長期保持着溫度「故所以排水的結果等於氣候的改變」(哈姆)。在蘇格蘭(Scotland),經驗證明,在排過水的土地上,收割普通比在沒有排過水的土地上早十天或十五天。

在英國排水法提高了已往耕種過的土地之總收入,平均爲百分之二〇——三〇,而在某些場合收入的增高達到了百分之一〇〇——二〇〇。許多田地,就因爲有排水法,遂宜於種植穀物及飼草。

四 肥料·細菌

化學家及生理學家(後者在顯微鏡幫助之下),尤其是工程師促進了農村經濟之改造。

在三田制經濟之下,全部牲畜絕無例外地必須以草地及牧場所供給的那些飼料來滿足。在現時,由於交通發達,農業經營者就可備辦各種飼料,他有他自己所生產的飼料,他購買工業生產品或廢料作爲飼料而且價格

都很便宜。因此在他看來，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別種植物而不種植飼物是更爲有利。同時動物生理學指示他各種飼料之價值，教他適當地準備和使用牠們以適應牲畜之繁殖、性別、及種類，在這樣情形之下，像我們已經看見的，機器就起着很大的作用；由於這種情形，牲畜便長期地保持着工作能力并且更能生產地工作着。

另一方面，爲了穀類能提供豐富的經常的收成而不致過度耗費材料時間及力，植物生理學就使農業經營者認識那些對於穀類所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再加上土地之機械的耕作，在這些地方，像我們所知道的，機器起着極大的作用，施肥就佔重要的地位，即是說，要使土地以適當的比例將那些可溶解的物質（植物爲自身的生長所需要的溶解物）包含在自身之內。化學不僅使農業經營者認識這些溶解物，她甚至人爲地製造那些爲土地所缺乏的和農業經營者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充分製造的溶解物而不致過度的耗費。

在爲市場而生產以及爲這樣的市場（牠不復將牠所獲得的極大部份營養物回復到土地去）而生產的，近代農村經濟中，要維持地質之均衡，單單廐內的糞料是不夠的。

土地因此會更加缺乏那些栽培植物所賴以營養的礦物組成部份。改善耕作方法、種植根深的飼草、深耕等等固然增加了土地的生產力，但這祇是更加強度的和迅速的剝削土地，使土地更加枯竭而已。「土地肥沃的增加，自然可以因強度的施肥、機械的使土地輕鬆、含石灰質的肥料等等，不斷的改善土地之天然的性質，使土地含有多量的營養物。可是，此種方法之繼續應用不僅引起土地之貧瘠，而且終於會減少土地的肥沃」——維爾勒

(Werner) 說的。]

黎比赫 (Liebig) 不朽功績之一就在於，他指出了這個事實并且堅決地起來反對強度的掠奪式的農業，這是十九世紀前半期土地的改良耕作本身所表現的。他堅持着那種見解，認為我國土地的肥沃，要繼續下去并經常地增加，只有在那種場合內，即市場以農業生產品的形態從土地中取去的組成部份又重新回復到土地中去。城市的廢物應當供給農村經濟。在他的應用於農業的化學與生理學（第一編，植物營養之化學過程）一書中他寫道：「偶然的聚合（金花菜的輸入，海馬糞的發見，介紹種植馬鈴薯及石膏粉肥料）增加了不適用於現有生產力的歐洲各國的居民人數；人口之繁殖大得極不自然而且已達到這樣的高度，使其在近代經濟制度之下，祇有在兩種假定之下，纔能維持下去：

- 「1. 假如因為某種神的奇蹟，土地重新獲得她原有的（為愚昧和無知所奪去的）豐饒性。
 - 「2. 假如發見藏有糞料，或海馬糞的地層，大約等於英國的石炭層。
- 「很顯然地，沒有一個聰明人會把這些假定當作真實的或可能的……
- 「在英國大多數城市內採用廁所的結果，每年無可挽回地喪失了促進三百萬人的食物之再生產的肥料。
- 「每年輸入英國的大批肥料大部分重新經過河流被沖到海內，而賴此種肥料來生產的生產品，不足以

供應人口的繁殖的需要。

「一切不幸在於，這一毀滅過程在歐洲各國都發生着雖然不像英國那樣大規模的發生。在大陸的大城市內政府每年要耗費大筆款子使農村經濟沒有恢復與保持地肥的條件。

「國家財富及幸福之保持，文化及文明之進步，全靠將不潔之物移出城市這一問題的解決」（一二五，一二八，一二九，一五三頁。）

這些見解在五十年以前就已經被黎比赫（Leibnitz）吐露過了。人類的排泄物的較高價值，當作肥料，以及把牠們回復到農村經濟方面的必要性從那時候起就得到了一般的承認。但是現時衛生問題離黎比赫所要求的這一問題的解決為期尚遠。直到現在還不會發明出將人類排泄物從大城市移出去底辦法，此種辦法要不過度耗費，就可滿足衛生的要求又可滿足農村經濟的利益。柏林所採用的土地灌溉法，從衛生學的觀點說來，我們覺得是直到現在所應用的一切方法中最適當的一種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可免除河流為經過溝渠排出去的不潔之物所傳染。

自然，灌溉一兩塊田，在每個城市附近是可能的，可是不能視為這便補償了從農村經濟中取去的東西。在近代的技術條件之下這個問題很簡單，無須過多的耗費，甚至還很有利地只要用灌溉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假如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已被廢除，假如人口十分均勻地按照全國去分配。但是在目前的生產方法之下關於這一層

連想都不會想到。

農村經濟愈是不能利用城市中人們的排泄物，同時因為上述的強度經營的方法及為市場而生產的增加，土地愈是貧瘦，則科學與實踐為了要把從土地中取出的營養物回復到土地去就愈加要謀得辦法努力尋求并製造補助的肥料，此種肥料供給土地以牠對各種植物之生長所缺乏的營養物，以便植物容易攝取這些營養物。從國外輸入或由工廠製造的這類肥料——為數很多（磷酸鹽、鉀、硝酸鉀以及氮氣肥料）而且牠們的數量還在增加着；對於每一類土地，每一種耕種方法，每一種植物，用混合法製造出特種肥料；由於這種情形，不僅可以保持土地的豐饒而且使牠高度地增加；此外，人造肥料在某種情形之下使農村經營者不用換種制不用廄中的糞料就可以經營，使自己的種植專門適合於市場的需要并將自己的全部耕地用於為市場而生產。在這樣自由的農村經濟內，近代的農業在技術上及經濟上達到了牠的最高點。在農村經濟中不僅機械工廠及化學實驗室，就是精巧的光學都發生一種變化。我們在此不再詳細敘述對於發見某幾種物質的分光鏡的分析，對於製糖工業的有極性的器械以及對於辨別種類及一般地對於牧畜業的照相術的意義；我們只說明對於農村經濟最重要的光學器械——顯微鏡。

「經過好多時間——哈姆 (Hamn) 說——人們就會使此種在現時必要的器具有益於實際；現時牠的重要性已為大家所公認，尤其農村經濟，要是沒有牠就不能經營。在近代情況之下土地組成部分之分析已在顯

微鏡幫助之下開始。植物內部的組織，細胞的實質及其內在物，澱粉粒及其他組織底形式和區別只有藉助顯微鏡纔使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應當把那種隱花植物如何增殖，那些無數的細菌（牠們以霉菌或黴菌，以馬鈴薯或葡萄細菌等等形式去腐蝕植物及傷害牠們往往使收成完全毀滅）是些什麼，這一切知識歸功於顯微鏡。祇有藉助於顯微鏡纔能確定各種纖維底區別，毛髮底構造發見農村經濟底無數的活敵，如細菌，小麥的微生物，甜菜的蛙蟲等等這一類的生物。在檢查種子方面，顯微鏡也表現出特殊的功用。在有經驗的人底手裏顯微鏡在分別真的和假的，分別種子和混雜物時就表現出很大的功用（*Die Naturkräfte in der Landwirtschaft*, 一四二——一四五頁）。

從哈姆(Hamm)寫這本書（一八七六年）的時候起，由於細菌學底研究之發展，顯微鏡更大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之進步。

由於此種進步，農業經營者或者可以完全使動植物免掉某幾種流行病的危險：急性傳染病，丹毒症，結核病，黑死病，或者治療牠們，或者，最低限度，可以識別牠們。

在過去十年（八十年代）的下半期，發見一樁事實，就是豆類植物（有莢植物及車軸草植物）和其他栽培的植物不同，牠們差不多不從土地中而從空氣中取得全部對於牠們所必要的氮素，因此豆類植物不僅不使土地因氮素物而更加貧瘠，反而使土地因這類氮素物而豐饒。但是牠們要有這些特質祇有在那種場合之內，即

在土地內有一些微生物棲息在這些植物的根上，在沒有微生物的地方，可以用適當的移殖法將牠們分佈在土地內，然後拿豆類植物種植在土地上，這樣就可以使缺乏氮素物的土地，變為富於氮素物的土地，這等於用這種方法替別種植物施肥土地一樣。豆類植物，平常和適當的礦物肥料（磷酸礦物及磷酸鉀肥料）結合，在長時期內不用施以糞料可以獲得較高的生產力。祇有由於此種發見，自由經營纔獲得十分穩固的基礎。

五 農村經濟是一門科學

封建時代的三田制與十九世紀末葉獨立的農村經濟之間的差違是何等的尖銳！此種變革其大部分是完成於最近幾十年之內。黎比赫提出的新的研究法公佈於一八四〇年，可是牠們在五十年代纔得到了一般的承認，在那時蒸汽機已開始侵入農村經濟而細菌學在農村經濟內已達到了牠的初步的實際的成功（一八三七年發現了霍底斑點病及醱酵菌之桿狀細菌，到一八四九年發現了急性傳染病之桿狀細菌。）

農村經濟，在從前是一切生產中最保守的，幾千年來差不多就沒有什麼進步，幾世紀來其地位絕對沒有變動，可是牠在幾十年之內卻變成近代生產中一種最革命的生產。農村經濟和這些由父傳子的習以為常的手工業中的變革同時，變成了一門科學，迅速地變成各科學（牠們按照牠們所把握的諸現象之範圍并按照理論的了解之深度而迅速發展起來）底集合體。不認識這些科學的農業經營者，純粹的「實際家」就會孤立無援地

站在一切革新之前，同時他又不能停滯在舊的，即依照已嘗試過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方法去經營。

農村經濟之變為一門科學已在農業教育發展史上，尤其是在高級學校內強有力地反映出來了。不僅教材的範圍及內容，就是國外農業學院底歷史也指示出科學的農業底進步。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已改進的英國農村經濟（十八世紀末葉及十九世紀初期）以後，企圖給農業以科學的根據并以之介紹於德國來，他第一個承認農業專門學院的必要。一七九八年在他的著作“*Einleitung Zur Kenntniss der englischen Landwirtschaft*”中，他宣傳「創立農業學院的思想」。過了幾年之後就成立了第一個這一類的學院（一八〇二年在柴爾（Chelmsford））。一八〇四年在美格林（Melton），隨後在最近十年之內又開辦了其他的學校，其中霍亨蓋姆於一八一八年在維爾登堡所開辦的則是前一種。這些高等學院中每一個都與模範的農業經營發生連繫，因為這樣牠們（這些學院）都設立在城外。祇有這樣辦法纔能除「灰色的理論」以外給學生以必要的應用實例，因為合理的經營在當時為數還很少。

但是這一類情形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就改變了，上述的學院在此種改變中也盡了不少的作用。大多數較的產業已轉變到合理的，基於科學的耕種方法，年青的農業經營者為了研究理論應用於實際也不需要學院底模範經營了。

農業學校的教材在上述的變革（在機械學，化學，生理學及一般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內）底影響之下隨

着合理的經營數之增加而擴大而加深。高等農業學校需要更多的科學的補助科目；需要更高精神環境而散處在農村內的，孤立的學院已不大適合擺在牠們面前的任務了。

黎比赫在這一領域內開闢出新的道路；他以巴瓦尼亞科學院院長的資格於一八六一年在莫尼赫（Munich）巴瓦尼亞的省會講了一篇鄭重的演詞，在這篇演說詞內他鄭重地發揮在農村內設立農業學院底許多缺點，他要求把牠們移到城市的大學內。他的這個要求碰到了同樣熱烈的爭論，像黎比赫底地肥與地瘠的理論所引起的爭論一樣。但是在這一場合內偉大的學者從爭論中得到了，像前一場合內一樣的勝利，而且他的要求到處都得到了滿足。除霍亨蓋姆的農業學校以外，所有高等農業學校現時都附設在城市的大學內，不僅在德國，就是在奧大利、法國、意大利，都是如此。在這些國家內牠們（農業學校）或者成爲大學的一科或者爲獨立的高等學院（如在柏林、維也納、巴黎）。

農村經濟在大城市內都被研究這自然可作那種事實之最明顯的解釋，即是農村經濟在一切關係內已表示完全依賴城市，農業本身的進步也全靠城市。

自然，農業經營者不能僅以自己的大學知識爲滿足。現時把這種成語：經驗高於科學，應用於農村經濟，是多麼可笑，但以爲科學就是一切，這也是很可笑地想法。在農村經濟中科學與經驗結合較之在工業內更爲重要，因爲諸實際條件（理論被應用於這些條件之內）在這裏比在工業方面還要更異樣而複雜。這裏必須進行研究，

搜集觀察，但首先關於這一異常廣泛的領域之每一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概念，而這種情形又只有在精密的和合理的簿記學底幫助之下纔可能。

在三田制經濟（主要是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之下，農業經營者並不需要簿記學。那時對於某一地方的全部經濟條件，一般講來，都是一樣的，自古以來就是同樣簡單而且明瞭的。近代農村經濟的情形就完全不同。牠有極複雜的，各種各樣的而且經常變化的生產與交換，購買與販賣的條件。牠要是沒有精密的和正確的簿記就會陷於無望的混亂。後者（精密的和正確的簿記）在近代生產方法之下在每一種大經營的企業內是必要的，但是在農業方面比工業方面尤其必要。近代的工業企業只生產一種生產品，而每一種農村經濟本身就是各種各樣的個別生產底總和：如牧畜業、農業、園藝、蔬菜業、飼禽之類，其中每一種提供不同的生產品。工業企業平常要購買牠的全部生產工具，而出賣牠的全部生產品。在農村經濟中，自然，向來就不會有這種情形。牠只購買一部分生產工具，其他一部牠自己製造：牲畜、牲畜的飼料、肥料、種子。一部分是購買來的，一部分是在自己經營內生產出來的；工資一部分用貨幣支付，一部分用物品支付。爲適應這種情形，只要一部分生產品輸出到市場上出賣，而某幾部分生產品則被消費於自己的經營內。最後，在農村經濟中不像在工業中那樣容易考查這一種或那一種生產工具或生產方法底應用的結果。有時在牠們（應用生產方法所得之結果）在各方面明顯地表現出來以前總要經過好幾年。這就使巨細不遺的精密而正確的簿記對於農村經濟成爲不可少的；簿記不僅從商業的，就是

從科學的觀點說來也一定要採用，因為農業經營者不僅牽涉到資本及資本的利潤，而且也要牽涉到土地及地租；租後者（地租）因為她是級差地租，要靠土地底豐饒；要完整地保全土地的豐饒，甚至要儘可能增加土地的豐饒——這正如像作最有利的投資一樣，同是優良的近代農業經營者的任務。

我們可以說，要指示近代農村經濟的特徵，沒有比簿記再好的了，簿記是以科學的商業的記載為根據的。科學與商業之緊密的聯繫乃是整個近代生產方法所固有的特徵，這種聯結，也沒有一個地方像在農村經濟內那樣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是唯一的工業部門，牠的簿記在各大學內都有專門的研究。

第五章 現代農村經濟之資本主義的性質

一 價值

爲了要使農村經濟從封建時代的那個階段提高到牠的近代的高度，並且使牠繼續不斷地隨着技術的及經濟的進步而發展，則在過去和現在都需要貨幣，需要很多的貨幣。道用不着證明也用不着解釋。例如在英國單單在排水設備上從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四二年就耗費了一萬萬以上，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五五年又耗費了五千萬以上馬克。這五千萬馬克祇使一、三六五、〇〇〇英畝土地有排水設備，但是需要排水設備的土地還有二一、五二五、〇〇〇英畝。

近代的農業企業要是沒有貨幣，或者可以說，要是沒有資本，就無法經營，因爲在近代生產方法之下，每一筆款子，祇要不是作爲個人消費之用，都可以變爲，而且往往會變爲資本，變爲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

因此近代的農村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牠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一切特徵，不過在農村經濟內這些特徵則具有特殊的形式。爲了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在這裏必須稍稍涉及抽象的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并簡略地

敘述一下我們的理論的觀點，即馬克思的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利潤及地租的理論。自然，我們在這裏祇限於最主要的部份，並且使那些還不認識資本論的讀者去研究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如果他們願意更周密地鑽研本章的主要對象的話。

考察了近代的農村經濟以後，我們發現出兩個主要的事實：土地私有制及農業生產品之商品的性質。這兩個事實中前者我們在牠的發生中已經研究過；後者及其一切結果——這就是我們在這裏所要研究的。商品是人類勞動的生產品，牠不是為生產者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也不是為無報酬的供給別人，家庭的人員，地主等等而生產的，牠對於生產者自己是不需要的，因而要讓給別人以交換生產者所需要的生產品。

拿一定量的一種商品去交換一定量的另一種商品的這種交換關係在起初完全是偶然的。但是隨着商品生產之發展，隨着交換成為正常的重複的現象，在交換關係中就愈加消失其偶然性，在牠裏面就愈加表現出某種規律性；每一種商品在某種條件之下就得到某種的交換價值。交換愈往前發展就變成買賣，就是說某一種特殊的商品變成貨幣商品，這樣的商品，每個人都是要用的，每個人都願意拿自己的生產品去和牠交換並且用牠來測量一切別的商品底價值。因某種商品而獲得的某種數量的貨幣商品——金或銀，——就叫作某種商品的價格。

商品的價值祇是表現為一種傾向，一種有規律的傾向，交換或買賣的過程要受牠的支配。真正的交換關係，

真正在某一時期獲得的價格就是此種過程之結果。規律及其結果，自然是兩件不同的東西。研究完成於自然界或社會中的諸過程的人，應當把這兩件事分別開來，如果他要發見規律使牠們（諸過程）都受牠的支配的話；他應當單就每一過程的純粹形式來觀察，而撇開足以破壞牠的正確性的一切附帶的事實。祇有這樣他纔能了解作爲一切現象的基礎的規律；知道了這些規律以後，就不難明瞭現象的本身。否則，兩者都不能明瞭。這是像白日經天一樣的明顯，這種情形已不知說過了多少次，可是這常常被人忽略，尤其是在研究價值論的時候。

交換價值，兩種商品之某種有規律的交換關係是用甚麼來決定的？交換發生於分工。商品生產是這樣的一種生產形式，在這種生產形式之下各種不同的勞動部門彼此獨立的勞動者都是爲別人生產。在社會主義社會內，他們可以直接相互勞作；但是既爲各自獨立的生產者，他們便祇有經過互相交換自己的勞動生產品纔能相互生產。他們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祇有在這樣的生產者之間，真正的商品交換纔有可能。在他們的一部分依賴別一部分的地方，祇能說是強奪或搶劫，而說不上是交換。一個自由的人不願白白地替別人勞作，他不願把多於自己所得的勞動給予別人。於是，我們就看見發生這樣一種傾向：需要同等勞動的耗費的生產品在交換時彼此對立起來，商品的價值由生產這種商品所耗費的平均必需勞動量來決定。但是生產者是否在市場上實現商品的價值，是否真正得到牠的價格，最低限度，得到他的勞動的代價，這一定要依靠各種條件，即依靠結合在需要與供給標題之下的各種條件。

商品之價值決定於商品生產所耗費的社會必需勞動量，這一理論，引起了近代大學的科學上很大的爭論。但是這一理論的一切反駁，如果把牠們仔細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牠（反駁的意見）是把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或者與商品價格弄混淆了。一切學院派的價值論都可歸結到這一點，就是他們認為價值底因素除了勞動的耗費以外，還有生產品底效用以及對牠的需要。

不言而喻的，每種生產品要使牠成爲商品，獲得價值，就一定是有用的生產品，一定適合某種（真實的或想像的）需要。使用價值就是商品價值的先決條件，但是商品價值的大小并不由她來決定。每一種交換以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爲前提，否則交換就失掉了意義。但是在不同性質的使用價值之間不能像交換價值一樣作純粹數量上的比較。如果我說一尺布比一磅鐵貴十倍，有人要是以爲一尺布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比一磅鐵大十倍之故，或者比一磅鐵多十倍的效用，那簡直是荒謬之談。因爲這一種商品的效用和別一種商品的效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不能相互較量的概念。

對於同類的各種商品自然可以決定其使用價值之大小；一雙較半實的鞋子比一雙不甚半實的鞋子有較大的使用價值，一杯路德斯蓋姆（Rutesheimer）地方製的酒比一杯格龍堡（Grundberg）地方製的酒含有較大的使用價值。人們對於使用價值較大的商品總願意比對於使用價值較小的商品付價貴些；因此，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一種因素。話固然可以這樣說，但是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較大的使用價值可以造成較

大的商品價值，那末爲什麼某種商品的每個生產者不單單製造品質較好的生產品呢？爲什麼每個鞋匠不單單縫製很牢實的鞋子呢？爲什麼每個釀酒者不單單釀造上等的酒呢？答案很簡單。如果我們不去注意製造者個人的特長，原料上，工具上以及諸如此類對討論的結果不發生影響的條件的差別，那末一雙質量較好的鞋子就是一種比較切實的工作的結果，即是說費了較多勞動的結果。決定質量較好的生產品之商品價值的，是此種費了較多的勞動，而不是較大的使用價值。俗話說：最貴的商品就是最廉價的，即是說牠們（質量較好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超過質量較壞的商品之使用價值的程度，比起牠們的商品價值上的差異還要大得多。值十二馬克的一雙鞋子可以說比一雙十馬克的鞋子耐穿一倍。

但是約翰尼斯堡 (Johannisberger) 或是路德斯蓋姆地方的酒有較大的價格，就是由於這一類的酒并不是到處都能釀造。在這樣的場合內價值的規律一般講來就失掉牠的意義，因爲在這裏有一種壟斷的關係，而價值的規律則以自由競爭爲前提。

在同一類的商品因品質上的差異而形成價格上的差異的地方，牠們往往可用所費勞動的多寡及壟斷關係來解釋。在不受這兩種因素影響的地方若以爲每個具有中等能力——同樣是假定的——的人不單單生產品質較好的商品，這種想法是很愚蠢的。

商品需要的多寡問題是同商品效用的大小問題一樣的。同一類的商品底價格——不是價值——爲什麼

今天高而明天低，這種情形，自然可以用需要與供給的變化來解釋；但是不能用牠們（供求的變化）來說明爲什麼在一個長時期內某一類商品的價格比別一類商品的價格高過一定的倍數，例如，爲什麼一磅金子——價格雖時有漲落——在幾世紀期間比一磅銀子平均差不多貴十三倍呢？這種情形只能這樣來解釋，就是這兩種金屬底生產條件在幾世紀期間仍舊是一樣。若以爲金子的需要不變地超過銀子的需要十三倍，這是很可笑的。

在這裏一再重複所有這些解釋似乎不必要，可是在說到價值論時，這些解釋又往往是必要的，因爲價值論的反對者每每不辭辛苦地以同樣 *qui pro quo* 來反對價值論。例如路易·勃萊塔諾 (Lui-Brenano) 教授在他的最近著作土地政策（第一編，土地政策的理論）中討論到地租問題，并引述價值論爲他的前提。我們在他的書中讀到：「李嘉圖及其學派曾說過自然價值并且把自然價值理解爲耗費在製造某種貨物上的成本費底總額。社會民主黨將這一學說繼續發展下去就把製造某種貨物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時間之總額稱爲自然價值。」我們不知道勃萊塔諾把「社會勞動時間」理解成什麼。「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勃萊塔諾繼續說：「兩種價值論——李嘉圖及馬克思的——現時在科學上可算是已被推翻了的。黑爾曼 (Hermann) 已經指示這兩種價值論的不能成立，他證明，成本費只是決定價格的許多條件中的一種，除了成本費以外，需要之迫切，消費品之便利，支付的能力，供給別處的可能性，賣者出售之必要，支付手段之交換價值，購買者所佔的各種便宜，以及在別處銷售的可能性在價格的規定上都起着作用」（見土地政策八四頁）。

因此，馬克思的價值論在科學上被推翻了，「因為價格不單由勞動的耗費來決定。

李嘉圖，甚至還有亞丹斯密都說過「自然價格」。物萊塔諾卻將「自然價值」這一術語推到他們身上，甚至推到馬克思身上！在這寥寥數行的文字內價格和價值就被混亂到如此地步！

如果除去引起價格漲落的諸因素，那末在物萊塔諾的論據中祇剩下一個決定的條件——即勞動的耗費，或者像物萊塔諾「修正的」說是生產成本費。可是這種修正還包含着極大的可疑性。

生產成本費首先即須假定其所應說明的價值的存在。那末用什麼來決定生產成本費呢？生產成本費的總額就是被耗費了的價值底總數。因此，一開始就用生產成本費來說明價值，然後再用價值來說明生產成本費這樣看來，就等於沒有解釋！

可是，商品的價值用牠的生產成本費來決定，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是從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方面我們可就不知道在何種條件之下這種說法纔有意義。要說明這些條件我們應當說明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之間的差異。

二 剩餘價值與利潤

簡單的商品生產就是此種生產方法底原始形態。牠的特徵就是生產者彼此不僅以自由的和平等的地位

而對立，而且都是自己的生產工具之所有者。

像一切其他經濟發展的大階段一樣，簡單商品生產從來就不會成爲完全統治的生產，不會有純粹的形式，牠往往和別的經濟形式，和自然的，封建的，行會的，壟斷的經濟形式相混合。因此價值律在這種商品經濟中祇是部分地表現出來，因爲在這一範圍內正常的生產是在生產者彼此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發展起來的。

在發展底某種階段上簡單的商品生產就爲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所代替，即是說勞動者已不是自己生產工具底所有者。資本家現在出來和已成爲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對立而成爲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勞動者不能直接爲消費者勞作，他必須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勞作，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企業家，他成爲工銀勞動者。

祇有在這種生產方法之下商品生產纔成爲普遍的，或最低限度，成爲統治的生產形式，自然經濟很快地消滅，封建的剝削和行會的壟斷，成爲不可能，生產者底自由和平等成爲普遍的原則。

但是正是這種生產方法（最先創造出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價值律獲得普遍的意義，）引起價值與市場價格間的中間份子底出現，這中間份子隱藏着價值律的作用發生變態。這中間份子——就是生產成本費，即是說，爲製造某種商品所需的貨幣耗費的總數。

在簡單商品生產之下，用商品生產底成本費來決定已製成的商品之價格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且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兼做農民的原始的紡織者，他自己替自己生產原料并且自己替自己製造紡織機。他的這種生產一

點貨幣都不必耗費；他的生產品除了勞動以外，簡直甚麼都不要化費。

在生產者由於分工的結果，要購買生產工具的地方，用生產成本費來決定價格好像是不錯的。像原始的紡織者一樣，手工業者的麻布之價值是用勞動時間，即對於麻布的製造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但是這種事實現在是不會這樣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因為紡織的手工業者并不自己生產麻紗并且也不是自己替自己製造紡織機，——這些都是他買來的。這些東西的價值就構成他的生產成本費，這些生產成本費就加入到生產品的價值中：即全部改製的麻紗底價值，和紡織機在製造麻布時所耗損的價值。但是這些生產成本費不是構成麻布的全部價值；要獲得全部價值，必須將紡織者底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加到生產成本費上。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之下事情就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形態。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和勞動者已成為兩種不同的人。如果資本家要想開始生產，他不僅要購買原料和工具，如前例所舉的麻布紡織者一樣，而且要購買勞動者本人的勞動力。因此，對於資本家，生產的一切要素就變為貨幣的費用，但這祇是對於他纔是如此。他對商品的生產所化的不是勞動，而是貨幣，在他（資本家）看來，決定價格的是生產成本費，是貨幣的耗費，而不是勞動。然而祇有盲目的人纔不會區別簡單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把用生產成本費決定價格認為是商品生產底普遍的規律并且就這樣地「修正」勞動價值的理論。

可是，資本家用來決定價格的生產成本費并不和實際的生產成本費相符合。如果商品的價格等於資本家

在製造這種商品時所耗費的貨幣總額，那末他在出賣商品時就得不到絲毫的利益。可是利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如果資本家把自己的貨幣投到某種企業內而從這種企業內得不到一點利益，那末他把這些貨幣用在私人的消費上在他看來是更爲有利些。正是這種利益，即利潤，把貨幣變爲資本。因此不論多少貨幣只要如此用來產生利潤的，就是資本。

因此，資本家在他的生產費用的總數上必須添加些東西；如果他最低限度連國內通行的利潤都得不到，他就認爲是虧本了。他的生產費用的總數加上國內通行的利潤，這纔是他的生產成本費；他爲了取償成本費，而決定他應獲得的價格，要與牠們（生產費用的總數加上國內通行的利潤）相符合。

這是資本主義的實際中很明顯的事實，而且也是早已爲大家所知道的事實。

亞丹斯密已經區別了簡單商品生產下爲市場價格漲落之唯一基礎的勞動價值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因生產成本費的影響而產生之價值的變態，生產成本費構成自然價格，而不構成價值（如勃萊塔諾所說）即構成馬克思所謂生產價格。近代學院式的政治經濟學之優於這些「陳舊的」經濟學家就在於她（近代學院式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把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弄混淆，而且把價值、自然價格及市場價格攪作一團并且說明古典的價值論已被推翻，因爲「自然價值」不能說明價格之漲落。

亞丹斯密在他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第一卷第六章中說：「在原始社會內在土地尚未變爲私

有財產和資本尚未形成以前，爲製造各種不同的生產品所必需的勞動數量間的關係，很顯然地是用以調節此等生產品的交換之唯一的尺度……」。

「但是一旦資本積聚在各個人手裏，他們當中有少數的人自然要將資本使用於僱用手藝方面最有經驗的人，他們（有資本在手的人）就供給他們（被僱用的人）以工作的原料及生活資料，其目的在出賣他們的生產品或價值（他們的勞動所加於原料的）以獲得利潤。」

這裏就可以看出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之間的嚴格的區別。後來，在第七章，斯密又指出，在每個社會內及在每個國家內都存在着一種工資、利潤及地租之平均水準，——關於後者（地租）我們很快就要詳細地說到，因此在這裏我們不去考察她。這一平均水準可以稱之爲自然率。斯密說：「如果商品的價格不多不少恰等於爲補償地租、工資，及在商品的生產上，商品的最後完工及供給到市場上所耗的資本的利潤底自然率所必需的貨幣總額，那就可以說，商品是按照牠的自然價格出賣的。」

利潤之「自然」率，和價值相似，祇是作爲一種傾向而存在；像價格傾向於價值一樣，利潤傾向於「自然的」或平均的利潤。

此種「自然的」或是說「通行國內的」利潤之高度是用什麼來決定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亞丹斯密和李嘉圖以及一切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方面很少見到說明；他們在這方面所指示的一切，如成大或小的買

險，或高或低的工資等等，祇說明實際利潤和平均利潤的偏差，正如需要與供給祇說明市場價格與價值或與生產價格的偏差一樣，但絕不是說明平均利潤本身的高度；固然可以用這些來說明，為什麼利潤有時是百分之十九，有時是百分之二十一，而不是平均百分之二十，但這不能說明為什麼平均利潤恰等於百分之二〇，而不是百分之二〇〇或二〇〇〇。祇有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纔給以說明。

自然，馬克思發見的并不是剩餘價值的事實，而且他也絕沒有必要從湯姆生 (Thompson) 那裏去抄襲這種事實，因為這種事實早已由亞丹斯密指示出來了，亞丹斯密在他的國富論（第一卷）第六章中說：「因此，勞動者給勞動的對象所加上去的價值在這種場合內（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下）被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工資，另一部分構成企業家在購買原料及僱傭勞動者時所耗的全部資本的利潤。」

剩餘價值在這裏已經很明瞭而且確實地被規定了。湯姆生對於這一理解并未加上絲毫新的東西，他只是從經濟的事實中對於這一可疑的現象提出法律上的要求而已。他也像亞丹斯密及馬克思前期的任何經濟學者一樣不大知道用剩餘價值來說明經濟的現象。剩餘價值在湯姆生看來祇是用來攻擊利潤，而不是用來說明利潤。祇有馬克思纔精密而有系統地指出，剩餘價值如何發生和如何起作用，而安東邁格爾輩對於這一理論并未添加上絲毫的東西。

剩餘價值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即當人類勞動力在技術發展到某種高度時生產出為人類生存及繁殖所必

需以外的剩餘生產物。人類勞動力從遠古時候就能產出這樣的多餘，即剩餘生產品，而且全部文化的進步，由於技術之趨於完善，即建立在此種剩餘之逐漸增長的基礎之上。

在簡單的商品生產之下剩餘生產物採取着商品的形式，獲得一種價值，可是還不能將此種價值稱為剩餘價值，因為勞動力在這個階段上固然創造出價值，但勞動力本身，不是一種商品，還沒有任何的價值。

從剩餘生產品中所得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歸諸勞動者；他可以使用她以提高他的家庭底幸福，增加各種大小的娛樂，可以節省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以財寶（如金銀之類）的形式聚積起來，或者用來改良自己的生產工具。但是除此之外他還得將剩餘生產物中所得的利益之大部分成小部分以賦稅的形式繳給國家、公社、地主，當他處境困難的時候，還得付一部分利息給高利貸者。甚至他的剩餘生產物的價值部分地或全部地直接被剝奪，也是常有的事。

自由勞動者一時的貧困不僅為高利貸者所利用，而且在某種市場的情況之下也會為商人所利用，這種商人往往同時就是高利貸者。商人底利潤在簡單商品生產之下不僅可以從他出賣商品（高於商品的價值出賣）中獲得，而且可以從他購買低於商品價值的商品中獲得。在商品市場上競爭愈烈生產者的處境愈窘迫，則第二種利潤的來源（即購買低於價值的商品）也就愈加有很大的意義。在此種生產的階段內祇須再往前進一步，我們就踏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領域。

很顯然的，商人不能自由生產者身上榨取低於價值的生產物，他寧願利用勞動者窘迫的境況，使他（勞動者）成爲替資本家服務的生產者，即變成工錢勞動者。工錢勞動者不是在自己的企業內而是在資本家的企業內去生產商品，並且不是靠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而是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爲生。

勞動力現在成爲一種商品而且獲得一種價值，與生活資料（爲勞動力的維持及再生產所必需的）底價值相等。勞動者所生產的在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以上的多餘的價值，在現在就成爲剩餘價值。

工業資本家將他的工錢勞動者所生產的全部生產品據爲己有。此種生產品底價值等於所使用的生產工具，——原料，機器及建築物上耗損的部分等等——底價值加上勞動者底勞動力之價值，簡而言之，他的工資加上剩餘價值。後者（剩餘價值）就構成利潤。但是剩餘價值之變爲利潤，并不比價值之變爲價格簡單。

資本家加進生產過程中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勞動，而是他的資本。利潤在資本家看來并不是他的勞動者底剩餘勞動之產物，而是他的資本之產物。他計算他的利潤率并不是按照他所消耗的勞動量而是按照他所投的資本之大小。由此言之，如果許多企業得出同一的剩餘價值率，那末假如在這些企業中所投的資本數量不同就一定要得出不同的利潤率。

我們且舉一個最簡單的例來說明這種情形。假定有三個企業，不僅有同一的剩餘價值率，即是說對勞動者的剝削相同，而且資本的周轉亦相同。資本家根據他的企業在一年內所產生的利潤量與在同一時期所耗費的

資本的大小兩者的關係來計算利潤率。如果在兩個企業內在相同的剩餘價值率及同一的資本量的條件之下，資本周轉的時期不同，那末牠們的利潤率也隨之不同。

如果一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資本在每一次周轉中得出一〇、〇〇〇馬克的剩餘價值，又如果資本在一年以內周轉一次，那末這一年的剩餘價值與資本之間的關係，是一與一〇之比；如果資本周轉十次，那末此種關係，將爲一〇與一〇之比；在前一種場合內，利潤率就等於百分之十，在後一種場合內，則等於百分之百。

這裏我們且把這種差異丟開一邊不講，因爲這種差異會將問題弄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假定三個企業具有同一的剩餘價值率，同一的資本周轉期及同一的勞動者人數。在這三種企業內所不同的祇是爲容納同一人數的勞動者所必需的資本的數量。在這裏還得要指出，馬克思將資本劃分爲兩種——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可變資本是化費在工錢上的，牠就是在耗費後創造出剩餘價值的資本。這一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增長着，牠不是不變的，而是可變的。反之，投入建築物、機器、原料及其他東西以內，也就是說，投入生產工具中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并未改變其價值的大小，牠的價值毫無變化地在從牠製成的生產品中所表現出來，因而牠是不變的。在我們所舉的例中我們就從這個假定出發，即是在這三個企業內投下同一數量的可變資本；而所投的不變資本的數量是不相同的。其中有一個企業，牠的不變資本非常少；假定這是一個木作業，在那裏沒有什麼建築物和機器祇是用簡單的工具在製造廉價的木材。在第二個企業內投下很多的不

變資本；假定這是一個化學工廠，有非常寬大的，堅固的房屋及很多的機器，但祇有比較少數的勞動者。最後，第三個企業假定是製造家具的工廠，在這裏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是取平均的關係。

我們還必須再做一個假定以便儘可能使我們的例子弄得更單簡些——我們假定全部不變資本在一年內全被消費了并在生產品的價值中重新表現出來。很顯然地，實際上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碰到的。建築物及機器不會耗損得這樣快；如果某一架機器可以用十年，那末在一年之內她轉移於因她之助而生產出的生產品上去的，只是她的價值的十分之一。可是如果我們不做這樣假定，那末，我們只是不必要的把我們的例子弄得複雜，而在最後的結果上并不起絲毫的變化。這三個企業中每個企業都用一百個工人，每個工人一年所得的工資為一千馬克。剩餘價值率在每個企業內達到百分之百，則剩餘價值量就為十萬馬克。但是不變資本在木作企業A內為十萬馬克，在家具製造廠B內為三十萬馬克，在化學工廠C內為五十萬馬克。在每個企業內資本一年周轉一次。於是我們便可列出如下的表：

企 業	資 本			剩餘價值 與資本總 額的比例
	可變的 馬克	不變的 馬克	總額 馬克	
A	100,000	100,000	200,000	100,000
				一與二之比

B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與四之比
C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與六之比

如果商品是按照牠們的價值出賣的，那末A就得到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B——百分之二十五，C——百分之二六·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主要的戒條——不是人的平等，而是利潤的不等，就會極猛烈地被破壞了。資本家就會把C項企業當作黑死病一樣避開牠，反而羣趨於A項企業。在C項企業中生產品之供給就迅速降落了，因而價格就被提高到價值水準之上；在A項企業中則發生了相反的情形；最後在A與C兩項企業中，就達到這樣的水準，在這水準下牠們都提供了像資本平均構成的B項一樣的利潤率。此種利潤率就是平均利潤率，她決定生產價格。

於是我們又可列出如下的表：

企 業	全部資本		剩餘價值		一年內生產品 的全部價值		利潤率		利 潤		一年中生產品之 全部生產價格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百 分 數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A	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二五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B	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總計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三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五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所以爲「生產成本費」所決定的生產價格與生產品的價值多少總有點偏差，但是價值律并不因此而破壞，而祇是變了形而已。價值律仍舊是調劑生產價格并在牠們背後發生作用的因素，牠對於全部商品及剩餘價值的總額保持着絕對的意義，其結果牠還是成爲價格及利潤率的堅固的基礎，價格及利潤率要是沒有牠就遭受了無法阻止的動搖。

學院派的政治經濟學很藐視早已爲「科學」所推翻的馬克思的價值論；但是這自然並沒有阻礙那些經濟學家還以爲必須一年復一年的製造出大批厚重的書籍和論文再來反駁早已推翻了的理論，這些著作的價值倒不一定能比得上在牠們的製造上所化的勞動；但是他們爲說明平均利潤率的高度，除了「國內通行的」一句空話以外還能提出別的什麼來呢？

三 級差地租

在說明了「國內通行的」、「規定的」利潤以後，我們就進而研究地租。

地租的來源之一就是那種場合底結果，即資·本·家·除·「·通·行·的·」·「·規·定·的·」·利·潤·以·外·還·能·獲·得·額·外·的·利·

額外利潤的各種不同的形式中我們所要注意的祇是一種：牠在生產範圍以內的發生，是由於工業企業家所獨有的特別優良的生產手段能夠以低於一般生產條件下所必需的成本去生產。

有些例子可以說明此種額外利潤的性質。我們在這裏可以做出像上面所引的例子一樣的簡單說明。

我們假定在一個城市內有兩個製鞋工廠。一個工廠——穆勒廠(Müller)是用通常的機器來工作；第二個工廠——蘇爾茲廠(Schulze)得到了異常精良的機器。穆勒廠所化的資本為三二〇、〇〇〇馬克，每年製造四〇、〇〇〇雙鞋子。平均利潤率為25%。因此，穆勒廠在牠的值三二〇、〇〇〇馬克的四〇、〇〇〇雙鞋子上應當定出這樣的價格，使牠能夠得到八〇、〇〇〇馬克的利潤。祇有得到了這個數額以後，就資本主義的觀念說來，他纔算不虧本。這樣看來，穆勒廠的四〇、〇〇〇雙鞋子的生產價格為四〇〇、〇〇〇馬克，每一雙鞋子的價格為十馬克。

反之，蘇爾茲廠化了三二〇、〇〇〇馬克的資本，由於他的優良的機器，他製造出四五、〇〇〇雙鞋子。他的每一雙鞋子底個別的真實的生產價格不是十馬克，而祇是八·八八馬克。可是他可以照一般的生產價格把牠們出賣，像他的競爭者一樣，每雙賣十馬克。因此他出賣他的鞋子時可以得到四五〇、〇〇〇馬克；除了八〇、〇〇〇馬克為一般規定的利潤以外，他還將整整五〇、〇〇〇馬克的額外利潤放進自己的荷包裏。

現在我們將這種場合移用到農村經濟方面。我們試舉兩塊肥瘠不同的土地（例如每塊為二〇海克塔爾）

來代替兩個工廠，資本主義企業家就在這兩塊土地上進行他們的經營。一塊地化費三、二〇〇馬克資本得到四〇〇生特勒麥子；另一塊地化了同樣的資本得到四五〇生特勒麥子。假定一生特勒麥子的生產成本費爲八馬克又假定平均利潤率爲25%，第一塊地的所有者，如果他要想得到通常的利潤，他就得加上二馬克，於是生產價格就定爲十馬克，而農業經營者的利潤就爲八〇〇馬克。第二個農業經營者也是照一生特勒十馬克的價格出賣他的麥子，他就得到四、五〇〇馬克，因此除掉平均利潤以外他還得到五〇〇馬克的額外利潤。

很顯然地，這完全和我們在工業範圍內所舉的例子一樣；可是在他們之間有着極深刻的差別。這裏所觀察的農村經濟內額外利潤的形式要受完全特殊的規律的支配因此就構成特殊的經濟範疇：地租。

土地——必須將「屬於土地底不可分離的」（馬克思所講的）一切生產力加到土地上去，例如瀑布及水力——其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生產手段。不能任意將土地增大，土地絕不是到處都具有同一的性質；某塊特殊土地之許多特殊的性質都和土地相連而不能隨意移動。反之，機器和工具之數目卻可以隨便增加，可以移動而且可以有同一的質量。

如果工業資本家，由於異常有利的生產條件而得到額外利潤，那末他應歸功於他個人的特長或異常順利的機會，特殊的經驗，智識或能力，或者握有極多的資本。但是他的額外利潤立刻使別的資本家眼紅也想得到同樣的利潤，他們都爭先恐後地竭力利用同樣的生產條件來經營企業，這樣一來特別有利的生產條件遲早就會

成爲普遍的條件，在市場上拚命的供給此項商品就使價格低落，而首先改善生產條件的資本家之額外利潤也就因之消失。

由於特別優良的生產條件所獲得的額外利潤在製造工業中往往祇是一種例外的和暫時的現象。

在農村經濟中由於各種地質的生產力之不一樣而獲得的額外利潤就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情形。此種不相同的生產力是自然條件底結果而且在一定的技術狀況之下有一定的大小。就即使假定其他一切生產條件對於各個農業經營者完全一樣，而地質的差異總是不能消滅。因此地租并不是暫時的現象，像製造工業中的額外利潤那樣，而是經常的現象。

此外，像我們知道的，工業生產品之生產價格是由通行於國內的利潤及在某種條件之下平均必需的生產成本費所決定的，即是說由爲製造生產品所必需的資本之耗費所決定的。有一種企業其個別的生產成本費少於「社會必需」的生產成本費，牠就產生額外利潤；如果生產所費過多，該項企業所得的利潤就少於國內通行的利潤，在某些條件之下甚至還要虧本。

反之，在農村經濟中生產成本費不是由中等質地的土地所需要的費用來決定的。如果除了好的土地外還耕種很大面積的壞的土地，那末，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這不應歸咎於農業經營者之特殊境況或個人的特性。這是由於一種好的土地不夠生產爲人民底營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資本家——此地我們只談資本主義的農

村經濟——要想從自己的企業中得到償還他的生產成本費之外，還想得到通常的利潤。因此資本家祇有在供給的缺乏能使生活資料的價格提高，使耕種壞的土地也是有益的場合內，纔會在壞的土地上經營農業。這就是說在農村經濟中生產價格不是由中等質量的土地上的生產成本費來決定，而是由壞的耕地上平常所需的生產成本費來決定。

在地租與工業利潤間除了這兩種差別外還有第三種差別，牠是前兩種差別的結果。在工業發展的地方人口特別增多，同時對於生活資料的需要亦隨之增加。這些又引起新地耕種底必要。其結果各塊耕地底生產力之差異便隨着經濟發展的進程而增大起來，地租亦隨之增加。

爲了要明顯指出這種情形，我們只須繼續上面所引的例子。爲了更加明瞭起見我們就用表式來敘述牠，並且我們假定從第一例中所述的劣等的土地——即化了三、二〇〇馬克的資本生產出四〇〇〇生特勒的麥子——過渡到耕種更劣的土地，此種土地在同等的地面上化了同量的資本而只產生出三二〇生特勒的麥子。

第一表

土地 的種 類	生產品： 麥子		所消耗的 資本	利潤率	個別的生產價格			地 租
	馬克	百分數			全部生產品的 每生特勒的	一般的生產價格	全部生產品的 每生特勒的	
生特勒	馬克	百分數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A	四五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八、八八	四、五〇〇	一〇	五〇〇
B	四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	—

第二表

A	四五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八、八八	五、六五〇	一二、五〇	一、六五〇
B	四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二、五〇	一、〇〇〇
O	三二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一二、五〇	四、〇〇〇	一二、五〇	—

我們可以看出，因為生產擴大及過渡到劣等土地的結果，A種土地的地租便從五〇〇增到一、六〇〇馬克（此處應作一、六二五，原文有誤——譯者）B種土地先前沒有得到絲毫地租，現在卻產生一、〇〇〇馬克的地租。

*五、六五〇應改為五、六二五；一、六五〇應改為一、六二五，原文有誤。——譯者附註。

利潤率隨着經濟發展的進程有向下降低的趨勢。我們在這裏不去說此種現象的原因，可是這一現象的本身是無容爭辯的。反之，地租卻有上升的趨勢。可是這並不是說，某塊土地的地租在一切場合之內都應當增高。在舊文明國家中，農業，實際上往往因從膏腴的土地過渡到劣等的土地而擴大起來的。在新興國家中常常發生相反的情形，因為在那裏首先開始耕種的不是最好的土地，而是最挨近的土地。如果假定，由於農業擴大的結果，隨

後耕種的不是較壞的土地而是較好的土地，那麼我們的表就變為如下的形式。

第三表

土地 的種 類	生產品： 麥子		所消耗的 資本		利潤率		個別的生產價格			地 租
	生特勒	馬克	馬克	百分數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X	五〇〇	三、二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八、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	一、〇〇〇	—
A	四五〇	三、二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八、八八	四、五〇〇	一〇	—	五〇〇
B	四〇〇	三、二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	—	—

在這個場合內，A種土地的地租並沒有增加，但是X種土地，先前並不產生地租，現在卻產生一、〇〇〇馬克的地租。地租的總額，歸於土地所有者的，和第一表中所引的比較起來，而且就其對所消耗的資本總額的比例講來，是絕對地增加了。

在某種條件之下可耕種的土地有這樣多而且地質有這樣好，至使糧食的價格跌落，在耕地中最壞的土地上的農業經營就成為毫無利益而必須停止。在這種場合內，某些土地的地租就會降落，但是地租的總額仍然可以絕對地增加，就是就其對投入農村經濟中的資本總數的比例而言，也是如此。這點可以用下表來說明：

第四表

土地 的種 類	生特勃	馬克	百分數	個別的生產品價格			地 租		
				全部生產品的每一生特勃的全部生產品的每一生特勃的	一般的生產品價格	所消耗的資本			
Y	六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馬克	六·六六	五、三二八	八·八八	一、三二八
X	五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馬克	八·〇〇	四、四四〇	八·八八	四〇〇
A	四五〇	三、二〇〇	二五	四、〇〇〇	馬克	八·八八	四、〇〇〇	八·八八	—

生產價格降低了，在B種土地上經營完全停止了，A種土地已不能產生地租，在X種土地上地租從一、〇

〇〇馬克降至四四〇馬克，可是地租總額仍然從一、五〇〇馬克（第三表）增至一、七六八馬克（第四表）。

在我們所舉的例子內即使拿任何一個國家或甚至全世界經營底各種土地來代替個別的土地，也不會有什麼變化。這祇是拿幾百個或幾千個百萬來代替幾百幾千而已。

但是構成地租的不僅是土地肥沃上的差異，而且是土地的位置及離市場的遠近的差異。那些為食料市場的地方其人口愈增加，對於食料的需要亦隨之而增加，必需供給市場的食料，其距離亦愈遠。但是遠距離的土地，要在糧食價格提高到使牠除償付生產成本費之外，還能償付運輸費用，并能產出資本的平均利潤的時候，纔

為市場而耕種。這種情形同時就替在市場附近的土地創造出一種地租。

假定有三塊土地，其離市場的距離各不相同，但為簡單起見，我們假定這三塊土地其肥沃的程度相同。生產品，例如麥子，的運輸費每一生特勒每一啓羅米突為一蒲菲林（德國幣名為百分之一馬克。）在這樣的場合之內，我們便有：

第四表(a)

各塊土地	離市場的遠近		當地個別的 生產價格	運 費	市場的價格 400生特勒	地 租
	啓羅米突	生特勒				
A	五	400	4,000	200	4,400	380
B	五〇	400	4,000	200	4,400	200
C	一〇〇	400	4,000	400	4,400	—

此種形式的地租隨着人口底增加而有增高的趨勢。但是交通道路底改善，使糧食的運費減低，在相反的方向內也發生作用。

最後，地租的第三種形式還是可能的，牠是舊文明國家內最重要的形式。糧食底生產之可以擴大，不僅因為新土地的開墾，而且因為舊的已經耕種過的土地之耕作上的改善，因為對這些土地化了更多的勞動，簡言之，因

爲資本之更多的耗費（工錢、牲畜、肥料、工具等等的費用。）如果投入較好土地中的此種額外資本，和從那些還需要開始耕種的最壞的土地之耕種所得的收入比較起來，能產更高的收入，那末收入這樣的增高就形成新的額外利潤，新的地租。

要說明這種場合，我們就回到第一表去看一看。在第一表中我們列舉着兩塊大小相等的土地A與B。B屬於最壞的土地，牠的生產價格（一生特勒麥爲十馬克）就是市場上固定的生產價格。我們假定，A塊土地上耗了額外的資本，即是使原有的資本增加一倍；就即使新投下的資本不像第一次那麼樣能生產，但總比投在壞的土地上的更能生產些。這時我們便可得如下的表：

第五表

B	總計	A ²	A ¹	所投的資本		市場價格		地租
				生特勒麥子	馬克	生產品	全部生產品的	
四〇〇	八七〇	四二〇	四五〇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三、二〇〇	六、四〇〇	三、二〇〇	三、二〇〇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四、〇〇〇	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四、〇〇〇	八、七〇〇	四、二〇〇	四、五〇〇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	七〇〇	二〇〇	五〇〇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這樣看來，從A塊土地所得的地租總額，因為耗了額外資本，^{A'}就增加了。

此地所觀察的地租的形式無論怎樣不同，牠們卻有一個共同點：牠們都是從各塊土地之肥沃或位置上的差異中發生的，牠們就是級差地租。

牠們（級差地租）究竟為誰所得的呢？

工業中的額外利潤，（是超過勞動底平均生產力的結果，）是歸資本家所有，雖然資本家所賴以制勝他的競爭者的精良的機器不是他發明的，而祇是將這種精良的機器據為己有，雖然表現出較大的勞動生產力不是他的功績，而是發生於他有巨額的資本因而可以在廣大的範圍內進行他的經營。由於土地之較大的肥沃或位置較為優越所獲得的額外利潤在資本家看來就不會有這樣好。

如果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農業經營者，那末，自然，他要把額外利潤放進自己荷包裏。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與土地所有者是兩個不同的人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祇是別人的土地之租佃者。土地不能任意增大或轉移。農業經營者，如果他自已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不得到土地所有者的許可就不能經營農業，他必須讓出他的額外利潤，即地租，來購買這種允許。超過這種額外利潤以上，土地所有者平常就不能再向租佃者要求什麼，（最低限度是在那裏場合內，即在此地所假定的租佃者進行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的時候。）如果資本家希望不到通常的利潤，那他就停止經營，土地所有者也就找不到租佃者了。反之，如果租

金少於地租，那末所得的額外利潤的一部分就留在租佃者的手裏，他就得到比平均利潤更多的利潤；這種情形就會使競爭加劇，而競爭又引起租金之增高。

四 絕對地租

土地所有者的壟斷（沒有他的允許便不能進行農業經營）還可以由另一方面感覺到。我們說過最壞的土地不能產生額外利潤，可是如果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其市場價格是直接由牠們的價值決定，而不是由生產價格決定，那時在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內額外利潤就在最壞的土地上也可以得到。

為說明這點起見，我們再引用指示在三個不同的企業中剩餘價值對資本總額的比例的那個表：

企 業	資 本			剩餘價值 馬克	剩餘價值與資 本總額之比例
	可變的 馬克	不變的 馬克	總額 馬克		
A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比二
B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比四
C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比六

我們看到A、B、C三個企業具有像馬克思說的「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馬克思所以稱牠爲「資本的構成」，因爲資本的構成是「由技術的構成所決定而且反映出這種技術的構成的」（見資本論第三卷，一二四頁）。不變資本的部分比可變資本的部分愈少，則資本構成愈低。我們且假定在這三個企業中對工人的剝削，也就是說，剩餘價值率，是一樣的。

如果商品是按照牠們的價值出賣，即是說如果剩餘價值的總額在每個個別の場合內等於利潤的總額，那末A項企業在B項企業有着平均的資本構成的條件之下就得到了超過平均利潤率的額外利潤。A項企業的利潤等於50%，B項企業的利潤等於25%。因此A項企業就得到了25%的額外利潤。

如果A項企業是在自由競爭條件內生產，那末他就不能保持這種額外利潤，此種額外利潤就只有暫時的性質。如果A項企業佔有特殊的地位，如果牠能夠避免競爭到某種程度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情形在農業中是常有的。在任何國家內土地所有都成了一種壟斷，土地所有者可以將他的土地不拿去耕種，如果他的土地得不到租金的話。在人們都迷醉於愛情的地方卡爾洛斯就不能憎惡，在每個土地所有者都能取得租金的地方，不能產生級差地租的最壞土地之所有者也。想把租金放進荷包裏。在糧食價格并未高過生產價格因而在他不能得到額外利潤以前，他就不允許耕種他的土地。

可是對於此種額外利潤之產生并不需要將穀物生產價格提高到牠的價值以上。因爲農村經濟乃是屬於

那些工業部門，牠們差不多不再加工製造牠們所生產出的原料，因而最低限度在沒有達到某種程度的技術發展時，他們祇需要低度的資本構成。羅伯爾塔斯（Roberts）的功績就在於他第一個指出了從低度資本構成所產生出的農村經濟額外利潤，乃是地租的泉源，——但他以為低度的農業資本的構成為事物的本質所形成而且在任何場合都是必然的，他的想法就錯了。如果農村經濟消費原料比其他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少，那末，在另一方面，耗費於機器及建築物上——倉庫，牲畜的廄舍灌溉工作等等之上——的資本隨着技術之進步而不斷地增加。若說強度的農村經濟在現時其資本有機構成還是在平均的水準以下，那是很可懷疑的。

可是，在計算利潤的時候，必須注意到資本周轉的時期，關於這一點我們到現在還不曾說過，為的是使我們的研究不致弄得很複雜，但是現在我們卻不能不來研究一下。資本家計算他的利潤率，是按照他在某一時期中（一年）所得到的利潤量與所消費的資本之總額的比例計算的。在同一的有機構成及同一的生產範圍之下，資本的周轉愈慢則資本的總額亦愈大。在農村經濟中資本的周轉特別慢，因此，如果周轉的速率低於平均的速率，則從其他泉源中得出的額外利潤，就會消失。

我們且假定，在上面我們所引的表中A B C三個企業各有不同的資本周轉期。爲了要獲得一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剩餘價值，第一個企業要耗費二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資本，第二個企業耗費四〇〇、〇〇〇馬克，第三個企業耗費六〇〇、〇〇〇馬克。假定資本周轉期第一個企業爲一年（我們在這裏且把固定資本與流通

資本之間的差異擱置不講，第二個企業的周轉期為六個月，第三個企業的周轉期為三個月。對於投資在四〇〇、〇〇〇馬克的B企業現在祇需二〇〇、〇〇〇馬克，而C企業在一年周轉一次的時候需要六〇〇、〇〇〇馬克，現在祇要有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就可以經營。

於是我們就可列出如下的表：

企 業	資 本 總 額		剩 餘 價 值	剩餘價值與資本總額的 比例 (百分數)
	馬 克	馬 克		
A	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	
B	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	
C	一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六六・六	

資本極迅速的周轉，就可使上表中C企業因其高度的資本構成所受的損失得到補償，且有盈餘。

這樣看來，羅伯爾屠斯斷定，因為農業資本之低度構成，祇要農業生產品按照牠們的價值出賣，就自然而然地會得到額外利潤，那就錯誤了。一方面，此種低度構成不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牠的影響容易為農村經濟中資本周轉的緩慢所打破。

可是如果羅伯爾屠斯證明因為農業資本之低度構成一定發生特種形式的地租，雖不正確，可是他總算是

指出了此種地租如何纔能發生的一條道路。馬克思仍然研究着這一特種地租的規律，他把這種地租叫做絕對地租。

△ 像各種壟斷的價格一樣，爲土地所有底壟斷所造成的糧食價格可以提高到牠們的價值以上。此種提高的程度要看壟斷範圍中競爭的規律還能起多少作用而定。牠（此種提高的程度）是由土地所有者彼此之間及與國外土地所有者的競爭來決定。牠更依賴於受了價格提高的影響而使附加的資本投入較好的土地的範圍及因此而引起的生產增大的那種範圍來決定；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由人民的購買力來決定。糧食的價格愈高，則消費者的範圍亦愈縮小，而不能支付這樣的價格因此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消費的人數亦愈多；這一定會提高代用物的需要以及使代用物的生產擴大起來。如果這樣還不能供給人民以充分的食料，那末結果就會發生劇烈的移民及死亡率增高，即是人口的減少。這樣看來，土地所有者的這些先生們就不能任意增加絕對地租，但是祇要可以擷取的，他們就擷取。

祇要從最壞的土地中都可得到絕對地租，那末從其他一切土地中也一定可得到此項地租。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試回憶上述的第二表，那裏最壞的土地C在一生特勒麥的價格爲一二·五〇馬克的條件之下不能產出地租。我們且來觀察，如果C土地在麥子價格未提高到一二·五〇馬克以上的時候不用來耕種，那末這個表將如何變化。我們假定麥子的價格提高到這樣的高度，甚至重新耕種C土地而且因此而對市場的供給亦同時

增加，都不能將價格降到一五馬克以下。那末我們就可得出如下的表：

土地 的種 類	生產品： 麥子		每一生特勒之生產價格		市場價格 馬克	地級 租 馬克	地稅 租對 馬克	地租總額 馬克
	生特勒	馬克	個別的	一般的				
A	四五〇	八·八八	一一·五〇	一一·五〇	一五	一、六五〇	一、一二五	二、七五〇
B	四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一·五〇	一一·五〇	一五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C	三二〇	一二·五〇	一一·五〇	一一·五〇	一五	—	八〇〇	八〇〇

• 此處應為一、六二九原文有誤。

• 此處應為二、七五四原文有誤。

C 土地的所有者或所有者們，是一些很實際的基督教徒，他們用提高麥子價格的辦法不僅替自己創造了地租，而且將自己同伴地租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他們賴以達到此種目的的手段，即通常的各種卡特爾手段，——縮小生產來提高價格。牠和工業的卡特爾，不同的，祇是在於土地所有者先生們底自然的壟斷，在提高價格上，比他們的必須人為地替自己創造壟斷的工商業的同伴更容易些。

自然這并不阻止土地所有者去威脅穀物的高利貸者及販買麥子的人底卡特爾，同時他們也禁止「猶太

人」的節制性的買賣，因為牠妨礙穀物價格的提高。地租之所以放進土地所有者的荷包裏完全靠了他的土地所有權。如果土地所有者將他的土地租給租佃者，他就可坐享他的地租。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雖不參加生產，但爲了要實現利潤（他的工人替他生產出的）最低限度，他就得在商品流通範圍內，在買賣上表現他的活動，或最低限度，在股份公司及在這範圍內使他的活動不致枉費，他也應當做這樣的活動。要使地租不僅源源而來，而且還不斷增加，土地所有者祇要掌握着自己的土地就夠了。

我們不應當將資本主義的地租和先前封建地主加在農民身上的義務弄混淆了。地主所執行的那些重要的機能，在整個中世紀期間本來或多或少與這些義務相適應，這些機能後來就由國家取而代之。因此現在農民就必須納稅給國家。地主在當時必須注意裁判的組織，供養警察，代表他的農奴對外的利益，用武力來保護他們，替他們在軍事上服務。

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所有者卻不關心這一類的事。地租若是級差地租，牠是由競爭產生的，若是絕對地租，牠是由壟斷造成的。地租歸於土地所有者這一事實無論是在第一種和第二種場合內都不是任何社會機能底結果，而唯一的是土地私有權的結果。

實際上地租的表現是不能劃分的；我們看不出牠的那些部分是級差地租，那些部分是絕對地租。地租平常都和土地所有者所進行的那些改良上所耗費的資本之利息混合着。在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農業經營者的地

方，地租是當作農業利潤的組成部分而出現的。然而在這兩種地租形態中之差別卻有很大的意義。

級差地租發生於生產之資本主義性，而不是發生於土地私有權；即使土地被宣布爲國有財產——這是土地改良底主張者所願望的，——而在農村經濟中仍保存着資本主義性的生產的時候，此種級差地租是不會消滅的；不過在那時級差地租已不流入個別的私人手裏而是流到社會的手裏。

絕對地租是從土地私有權中發生的，是從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處於相反地位中發生的。土地國有可以使絕對地租消滅并因之可以降低農業生產品的價格。

級差地租——地和絕對地租的第二種區別也就在此，——不影響於農業生產品的價格之決定，絕對地租對於決定農產品的價格卻有影響。前者（級差地租）發生於生產成本費，後者發生於市場價格之增加超過生產成本費。前者由於盈餘，由於額外利潤而構成，這些額外利潤是較大的勞動生產力在良好的地質及優良的位置的土地上生產的。後者，則相反，不是發生於農業勞動在個別場合內的額外收益中，牠之能夠構成只是由於土地所有者從剩餘價值的總額中所得的折扣，即是說由於降低利潤，或縮小工資而構成的。如果工資和糧食價格一同增高，則資本的利潤就要降落。如果糧食價格增高了而工資沒有隨之相當的增高則工人就要遭受窘迫。

最後，還可以遇到——在實際上也是常常遇到的，——這樣現象，工人和資本家因爲絕對地租的關係而共同遭受損失。

幸而，絕對地租之增長有一定的限度。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土地所有者不能任意規定絕對地租的大小。誠然，直到最近時期，——絕對地租，像級差地租一樣，由於人口的增加，使土地所有的壟斷性益加銳利，遂不斷地在歐洲增長了。可是海外的競爭給這一壟斷以強有力的打擊。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去肯定級差地租在歐洲，除英國某幾部分外，在海外競爭影響之下也遭受了打擊。一般的講來，我們從沒有見到土地任其荒蕪而不加耕種的地方；最壞的土地還是有人經營，所變更的至多祇是經營的方法而決不是土地經營的程度。

絕對地租降落了，這首先蒙其利益的是勞動階級。如果他們的生活在英國從七十年代起已有很大的改善，那末這樣的結果主要應歸功於絕對地租之低落，其次，自然就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權力之加強，不讓資產階級單獨利用這種有利的情形。

可是不利的情形也隨着有利的情形而來。地租之降落引起農村經濟中的一種恐慌，這種恐慌不像工商業那樣祇有暫時的性質，而是有長期的性質，這種恐慌恰恰發生在那些地方，——在大多數國家內都是如此——即土地所有者與農業經營者同是一個人的地方，因此前者的每次損失就是後者的損失，並且還發生在地租固定在土地價格以內的地方。

土地私有權，在海外競爭沒有發生以前，因為地租的增加，就成為勞動階級貧困的最大的泉源，從海外競爭出現以後就變為土地所有者及農業經營者貧困的泉源。要想阻遏其中的一個泉源就一定會迫使別的一個泉源更

滯急地流動。

五 地價

在土地私有權的統治之下及商品的農業生產之下，每塊土地本身就變成商品。生產工具既變為資本，人們就容易將土地也視為資本。可是土地決不是資本。我們無論怎樣稱土地為資本，土地所有者并不因此就富起來。固然他的土地已成為有一定價格及市場價值的一種商品。但是此種價值要受完全不同的規律的支配與普通的商品價值不同。土地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因此牠的價格既不能用牠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來決定，也不能用生產成本費來決定。土地價格祇能由地租來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土地的價值與資本（產生和地租分量相等的利息的資本）底價值相等。此種資本的分量就是土地之市場價值。

這樣看來，土地底市場價值，一方面是由地租的大小來決定，另一方面是由「通行於國內的」資本的利息之高度來決定。

資本的利息就是資本主義企業家為利用資本所有者底資本而付給他（資本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潤；換言之，就是資本家單靠他的資本所有權這一赤裸裸的事實（他雖沒有積極地在工商業中做一個獨立的企業家，）就能分取的那部分利潤。這不僅指借貸資本而言，而且也指股份資本而言。原始的借貸資本之諸形式及

生產範圍以外的借貸資本在目前對於我們都沒有多大意義。

資本的利息率也像利潤率一樣有趨於相互均衡的傾向。在利息高於平均率的地方，新的資本就流到那裏去，而在所得的利息低於平均率的地方，資本就從那裏流出去——自然這要在其他條件相等，機會相等以及諸如此類條件之下纔行。可是，「利息的分量，不論是平均的利息或每次為市場所決定的利息，決不是平均的，一定的和明顯的分量，像一般的利潤率那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三四九頁。）利息率的均衡比利潤率的均衡來得更迅速。利潤率的均衡是由一國全生產過程的變化，由生產在這一部門擴大，在另一部門縮小而達到的。貨幣資本要達到利息之均衡卻非常便當，要使利息均衡實現不需很多的時間。

在貨幣證券買賣的市場上，其中產生利息高於平均率的那些證券估價就相當地高，反之，提供較低利息的那些證券其估價也就低。如果我以二百馬克購買的股票提供百分之十的股息，而在國內通行的利息等於百分之五，那末我就能夠以四百馬克出賣我的股票，而完全不依賴於牠所代表的生產手段之價值。

土地也可以看做這樣一種貨幣證券，牠是按照給土地所有者產生的地租底分量來估價的。

但是如果許多經濟學者根據這一點就把土地當做資本，那麼他們就完全忽視了這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投入工業企業中的貨幣資本所產生的極高的利息率——在自由競爭條件之下，也可以說在鐵道礦山等

等事業中存在的壟斷關係不計的條件之下，——像極高的利潤率一樣，不能常久繼續下去。因此貨幣證券底估價高於生產價格可以說只是一時的現象。

在規定土地價格的時候這些就完全談不到，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土地是一種沒有生產價格的東西。利息一般的低落，決不會牽動貨幣資本的市場價值，而對於土地之市場價值卻有影響。產生六、〇〇〇馬克地租的一塊土地在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六的時候，就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四的時候，就值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反之，若希望目前產生百分之六的利息的借貸資本或股分資本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利息一般的降落到百分之四的時候，能夠得到一五〇、〇〇〇馬克的價值，那就可笑極了。因為資本之變更或加緊流入適當的生產範圍內，馬上，這項資本所產生的利息就不是百分之六，而祇是百分之四，這樣牠（資本）纔保持着牠原有的價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利息率一般的低落就提高土地的市場價值，但不是提高貨幣資本的市場價值。自然在土地中還投有資本，這是可能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大部分也的確是如此。可是，這種情形祇把問題弄得複雜，卻絲毫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土地所有者所得的農業剩餘價值不僅包括地租而且包括資本的利息，而土地的價格，除包括資本化的地租以外，還包括資本底資本化的利息，在通常的條件下亦即資本的本身。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單拿資本的利息來說明土地價格，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充分發展的時候，甚至沒

有投過資本的土地，完全沒有耕種過的土地，都能得到價格。這裏我們就看出土地與資本之間的第二種區別。貨幣資本的價格在貨幣市場上是按照他真正生產出的利息來計算；土地的價格是按照牠能夠生產出的地租來計算。這裏還有第三種區別：人類勞動所創造的生產手段，逐漸被消磨（物質上及精神上；而後者（即精神上）是各種新發明底結果）並且遲早總要停止牠的存在。牠們必須不斷地重新製造。反之，土地不會被毀滅，最抵限度，從人類社會的觀點看來，土地是永久的。

後兩種場合就證明，如果工業企業的所有者不將牠（工業企業）應用於實際，那就是無意識的舉動。在土地所有者看來，這種舉動，在地租增高的時候（尤其是在城市內）決不是無意義的。把土地荒廢不耕種對於他們往往是很有利的。

把土地稱為資本的時候，這一切的差別就被消滅了。然而直到現在許多經濟學者還堅持着這種同一（即把土地與資本視為同一的東西）——例如勃萊塔諾（Bretano）在其屢次為我們所引證的土地政策一書中就是如此主張。照他的意見，資本投入土地中，以及羅伯爾屠斯將城市建築物視為資本這一類事實就可作為這一觀點的證明，「雖然在其上面建有房屋的地面是一種自然之壟斷的賜物……這樣看來，土地在現時就是資本。但是，當然，土地之別於其他的資本，就因為牠是自然之壟斷的賜物。可是，不僅作為農業用的土地是資本，就是作為建築房屋用的土地，或作為工業用的土地也都是資本，此外還有瀑布，礦山，鐵道等等」（見土地政策一三

頁。)很顯然地,這證明的并不是土地是資本,而是證明,城市的土地及瀑布以及礦山能產生出地租。至於說到鐵道,那就得要太富於幻想的人纔會把牠們當作「自然的賜物。」這好像多格貝爾(Dogberry)說的:「美貌是命運的賜物,而能寫能讀則是自然之賜物」一樣。

無論怎樣稱土地爲資本,可是土地所有者并不因此成爲資本家。

在決定地產價格的時候,除地租之外,自然,還要注意到其他的因素,除「土地資本」外,即是說除資本化的地租以外還必須計算到真正投入農業生產中的資本:建築物,技術上的設備,活的和死的用具。此種資本之市場價值,是照生產價格(減去已經消耗的部分)來計算的。

可是在地產內也能夠有以滿足奢侈爲目的的各種設備,這在大地產內尤爲常見。和生產沒有絲毫關係的這些設備,當然會增加地產的價格,但不是增加地租。那些奢侈的設備其價格愈高,則「土地資本」的利息必愈低,如果把前者也歸併到後者(「土地資本」)去的話。如果,仍用前例,假定一塊土地能提供六、〇〇〇馬克的地租,那末在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三的時候,牠的價格就是二〇〇、〇〇〇馬克。如果土地所有者在牠上面建築一座別墅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那末地產的市場價值就增加到三〇〇、〇〇〇馬克;但是這祇是說「土地資本」祇能提供百分之二的利息,比普通資本的利息要少得多。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論斷,說土地資本具有一種顯著的特性,牠能提供非任何別的資本所能產生的特別低

的利息。這種論斷是完全不對的。

我們知道，土地資本是不存在的，這不過是一種虛構而已；在實際上存在的是地租，「土地資本」所得的收入只有按照地租來計算。固然，在這種計算下地租的資本化往往高於平均利息的資本化的程度，但這不是因為「土地資本」具有奧妙的特性能給出較少的利息，而是因為資本家具有很顯明的特性把土地——生產地租的場所——視為具有特別利益的投資場所。這種場所，大部分是很穩固的。物質的以及不反應到地租上去的非物質的利益如擁有田舍及別墅以及如我們指出過的為自家消費的日常生產品之生產、行獵、政治影響都往往與土地財產相連繫；直到最近期間在歐洲地租與資本的利息相反，曾經有過——而在城市及城市的附近，直到現在還有上升的傾向。為着這些希望，資本家在購買土地時，一定特別多花些金錢。

可是，這一切辦法都沒有使土地所有者變為資本家。自然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土地所有者又是資本家，可是我們在這裏所談的並不是這回事。買和賣祇使土地所有成為投資的場所，但不是使牠成為資本；十八世紀法官的位置雖是花了資本纔獲得這位置，但牠（位置）並不成為資本。固然，土地所有者可以出賣他的土地并因此而成為資本家；但是當他成為資本家的時候，他已不是土地所有着了。反之，用自己的全部資本購買地產的資本家，在他成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個時候起，他已不是資本家了。

土地所有者不是資本家，這首先在英國的地主中可以看出，英國地主比大陸上的地主更早對他的農奴取

消了封建的義務而且不得不更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經營。不過他們的企圖仍舊祇是一種嘗試，因為當時信用事業還沒有發展。他們不得不（在十五世紀已經就是如此）將自己的土地分為大塊小塊的土地而把這些土地租給農業經營者，這些農業經營者手裏有耕種土地所必需的活的及死的農具。土地租給資本主義的租佃者——這就開闢了他們把必要的資本投到農村經濟方面去的一條道路。

在歐洲大陸上，尤其是在阿爾伯斯山迤北，近代資本主義的租佃制都不如英國那樣的發展。

一八九五年時在英國全部耕地面積中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的只有四、六四〇、〇〇〇英畝，佃戶經營的則有二七、九四〇、〇〇〇英畝。在自己土地上經營的農戶計有六一、〇一四，而在租地上經營的則有五九、〇九二。

我們在德國和法國看見的又是另一種情形。但是此地租佃制還是在發展着。在德意志帝國內租地經營底數目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從二、三二二、八九九增至二、六〇七、二一〇，即是增加了二八四、三一，可是在自己土地上的經營之數目則從二、九五三、四四五降至二、九五二、一〇七。在法國農業經營者計有：

年	代	在自己土地上經營	在租地上經營
一八八二		三、五二五、三四二	一、三〇九、九〇四

一八九二	三、三八七、二四五	一、四〇五、五六九
減(一)或增(十)	(一) 一三八、〇九七	(十) 九五、六六五

甚至在合衆國租佃制也在發展着。那裏的經營計有：

年	代	在自己土地上的	在租地上的
一八八〇		二、九八四、〇三六 75%	一、〇二四、六〇一 25%
一八九〇		三、二六九、七二八 72%	一、二九四、九一三 28%

在合衆國的東北聯邦中我們看到土地所有者自己的農業經營之數目，不僅是相對的減少而且像昔日的歐洲一樣是絕對的減少。那裏的經營數如下：

年	代	在自己土地上的	在租地上的
一八八〇		五八四、八四七	一一一、二九二
一八九〇		五三七、三七六	一二一、一九三
增(十)或減(一)	(一)	四七、四七一	(十) 九、九〇一

可是在所有這些國家內在私有土地上的經營還是佔極大優勢。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祇有城市資本及隨之而起的信用制度大大地發展起來的那時候起纔能成爲有意義的。這就替農村經濟開闢了走向資本的第二

條道路——利用信用制度的道路。信用一部分是個人的，一部分是物品的或抵押的信用。我們在這裏所要注意的祇是這種抵押信用。土地所有者爲了進行必要的改良，購置牲畜機器，肥料等等必要的花費，不得不出於典質之一途，即是說，把自己的地租抵押出去以獲得金錢。

在資本主義租佃制之下資本主義社會之收入底三個主要的集團是嚴格地劃分開來的。土地所有者與其餘的生產手段所有者，即資本家，是兩種不同的人，而被資本家剝削的僱傭勞動者和他們又是對立的。僱傭勞動者得到工資，資本家得到企業利潤，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土地所有者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是完全無用的人物；他既沒有商業上的作用，又沒有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執行的那種組織上的作用。他除了從資本家那裏儘可能榨取更高的租金并且和他的寄生蟲共同吞食這項租金之外，他就無所事事了。

在抵押制之下事情便沒有這樣明顯和簡單，但是根本上仍可如此歸納。在這裏我們仍可看見土地所有者與企業者之劃然分開，誠然，這種分割是隱藏在各種特殊的法律形式之下的。在租佃制之下土地所有者據爲己有的地租，在抵押制之下就落到抵押債權人手裏。後者（抵押債權人）就是地租底所有者，因此也就是事實上的土地所有者。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他同時獲得企業利潤及地租，而再把這種地租交給抵押債權人作爲利息。如果他的企業失敗了，他無力償付地租，那麼他就失掉他的表面上的所有權，就如不能按時交付租金的租佃者失掉他所租的土地一樣；抵押債權人往往可以取消抵押甚至有權把一個不合

意的經營者從地產中趕出去，正如土地所有者可以取消租約一樣。租佃制與抵押制間的區別祇在於，在抵押制下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稱為資本家，實際上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稱為土地所有者。實際上執行資本主義機能的農業經營者往往利用這些 *de facto* 誤解而憤恨「流動資本」對他們的剝削，憤恨抵押債權人；這些抵押的債權人實際上負起在租佃制下土地所有者所負着的那種作用。

在一切經營農業的國家中我們看到抵押債務之迅速的增加。在普魯士投到農村土地上的新的債務之總額超過清償的總額。

在一八八六——八七年.....	為一三三百萬馬克
一八八七——八八年.....	八八
一八八八——八九年.....	一一一
一八八九——九〇年.....	一七九
一八九〇——九一年.....	一五六
一八九一——九二年.....	二〇七
一八九二——九三年.....	二〇九
一八九三——九四年.....	二二八

一八九四——九五……………二五五

在這不多的幾年中，債款竟增加了十五萬萬馬克！

債款之迅速的增長，其意義就是說到處（雖然是在另一形式之下）都完成了在英國早已經過了的同一過程——農業經營者失去土地財產的過程。但是農業經營者并不因此就成爲無產者正如英國的農戶并不就是無產者一樣。他們像英國的佃農一樣除了土地以外還有一切生產手段（這裏我們只說及抵押的債務，而不涉及私人的債務。）

同樣，抵押債務之增加並不一定就表示農村經濟之窘迫的狀況。抵押債務可以從這種狀況中發生，因爲改良和提高生產的要求並不是抵押債款之唯一原因。我們在下面還可看到別的原因。但是農村經濟之進步及繁榮也可以在抵押債務之增加中表現出來，第一是因爲對資本的要求增加，這是爲農村經濟之改進所引起的，其次是因爲地租的增加，使農業信用有擴大的可能。

在奧大利亞，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好的統計，其記載抵押債款之增加（加里西亞（Galizien）布柯維恩（Bukowina）以及沿海區域不算在內）如下：

一八七一年……………四六、七四〇、六一七古爾特

一八七二年……………一〇七、六二一、六六五

一八七三年	二〇二、四五八、六九二
一八七四年	一五六、一二七、〇一六
一八七五年	一三六、六九二、五六五
一八七六年	九九、二七六、四四〇
一八七七年	二四、六九四、八一二
一八七八年	四四、一六〇、二六三
一八七九年	二二、七六五、〇三七
一八八〇年	一八、四〇四、五八五
一八八一年	一〇、〇三四、六七一
一八八二年	二二、九二六、〇八〇
一八八三年	三四、二八九、二一〇
一八八四年	五七、二四一、二四〇
一八八五年	五五、八七一、二六四
一八八六年	五二、七〇八、二三七

一八八七年	五六、三三〇、六二三
一八八八年	五六、九五四、二五〇
一八八九年	五二、七三八、七四九

正正在農村經濟（以及城市的土地所有）最興旺的時代，即在七十年代的初期，抵押債款增加得最多。

擁有土地的農業經營者之分爲土地所有者與企業者，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土地私有權底自然而然的結果。但是這種劃分使土地私有權有消滅的可能，即令消滅農村經濟中其餘的生產手段的條件尙未具備。在租佃制統治着的區域內這可以由土地財產之國有化及社會化的方法來完成，在抵押制統治着的區域內可以用抵押的國有化的方法來完成。

土地所有權（在租佃制之下）底集中或抵押（在自足經濟之下）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愈厲害，則消滅土地私有權的條件亦愈順利。可惜，我們很難用統計來證明許多國家在長時期內這種集中的情形。即令我們還有些比較可用的農業統計，可是抵押方面的統計直到現在還是不合用的，就是土地財產底統計也不能根據牠來作各個時代的比較和研究各處個別的土地所有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的過程。

在普魯士各省内土地所有權集中的例子，我們在下面說到別的問題時再講。

一般講來，在租佃數量及租地面積增加的地方，土地所有就被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因爲祇有那些不需要經

營自己的土地和擁有多餘的土地的人，纔會想到把土地全部地或部分地出租。租佃制極發達的國家同時也就是大土地所有佔優勢的國家。

在德國抵押制比租佃制更爲重要。在這裏土地所有集中的過程，或者更正確些說，地租集中的過程表現得很明顯。我們還可看到許多小的農村高利貸者日益被排擠，而讓位於壟斷抵押信用的大規模集中的資本主義的機關和協作社。

根據黑希特 (F. Hocht) 在其德國國家及各省的土地信用機關一書中所載的數字看來，德國土地信用機關所發行的抵押票據的總數到一八八八年末已超過四十七萬五千萬馬克了。其中屬於協作社的有一、九〇〇百萬馬克，屬於國家的或省立機關的有四二〇百萬馬克，屬於抵押的股份銀行的則有二十五萬萬馬克。

固然，股份銀行之抵押信用主要是盛行於城市中的土地財產方面。但是後來促進抵押信用之集中的還有其他大規模的機關：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各種機關及合作社。三十五個德國的人壽保險公司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基金放在抵押中，普魯士的儲蓄銀行放在抵押中的基金也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普魯士儲蓄銀行底農村抵押財產在一八九二年估計總數有十萬萬馬克；屬於普魯士皇族的十七個土地信用組合在一八八七年發行了

一、六五〇百萬馬克的抵押票據，同時在普魯士有十一個私人的土地信用機關在一八八六年接收了七三五百萬馬克的抵押債務。

這些數字已經指示出地租大量的集中在少數中心的機關中，而且這種集中迅速地繼續往前發展。在一八七五年時德國的抵押銀行發行了九〇〇百萬馬克的抵押票據，在一八八八年發行了二十五萬萬馬克；到一九二二年時集中在三十一個銀行（在一八七五年為二十七個）手裏的這種抵押票據總額竟增至三、四〇〇百萬馬克了。

海爾邁斯 (Hermes) 在他的 “Landeschaften” 這篇論文中（見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政治學字典續編第二卷）他列舉了幾個例子，說明普魯士的大土地所有者底抵押債款如何迅速地集中在土地信用底組合中。庫爾曼和尼馬爾貴族的信用機關發行了抵押票據（扣去已清償的）其總額為：

一八〇五.....	一一、五二七、〇〇〇馬克
一八五五.....	三八、二九五、〇〇〇
一八七五.....	八二、二〇四、〇〇〇
一八九四.....	一八九、六二一、〇〇〇

在一八六九年創立的新勃蘭金優信用機關所發行的抵押票據（扣去已清償的）其總額為：

一八七〇.....	四八、〇〇〇馬克
-----------	----------

一八八〇	三、六九五、〇〇〇
一八九〇	七四、二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五	一〇一、四三四、〇〇〇

這些數目十分明顯地表示出「馬克思的教義」對於土地財產所具的意義並不亞於對於資本所具的意義。其實在這一方面牠（「馬克思的教義」）的意義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可是有人說馬克思的教義也許不適用於農業生產方面。這倒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還得要詳細地來考察這一問題。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土地財產及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表現的兩種形式。

我們看見，租佃制和抵押制彼此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是牠們間卻有很大的差別。

最重要的差別就在於租金的漲落是隨着地租的漲落而來的。反之，抵押的利息就不是如此。固然，抵押利息之大小也有變化，雖然比租金的變動更困難，但是牠的變動並不依賴於地租之變動，而是依賴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的資本利息之變動。地租與利息可以同時在直接相反的方向內變動。資本的利息可以降低，地租反而可以增加。直到最近時期這兩者底經常的變動在舊有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內還是如此。

從這裏得出的利益在租佃制之下是歸於土地所有者。反之，在抵押制之下實際上的農業企業家與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將增加的地租放進自己荷包裏或者用牠（地租之增高）再去獲得新的抵押資本。

抵押債權人很少能夠得到土地財產中這種利益，正如他們很少能夠得到上述增加土地財產的市場價值及減低「土地資本」的利息中所得的其他利益一樣。因此抵押債權人至少在地租增高時就要求其資本的利息要比「土地資本」所產生的利息更高；這就是說以利息的形式吸取全部地租的抵押資本其總數要少於負債的土地底市場價值。

我們再用上述的那個能夠提供六千馬克地租的地產的例子來說明。假定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四，那時資本化的地租便等於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可是，我們已經講過，擁有地產就附帶的有許多利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地租增高。因此土地所有者就要求其地產的地租多於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假定是二〇〇、〇〇〇馬克。這就是說，「土地資本」祇是提供百分之三的利息。抵押債權人則要求百分之四的平均利息率，可是農業經營者付給他的抵押利息總共祇是六、〇〇〇馬克。這樣看來，抵押債款不能超過一五〇、〇〇〇馬克以上，祇能等於土地價值的四分之三，但牠仍然可以吞取全部地租。

在我們這裏所假定的地租增高的前提之下抵押制對於農業經營者比租佃制更為有利。可是有實必有虧，而這種虧在地租低落的時候就會表現出來。

那時租佃者，至少是資本主義的租佃者便把自己所受的損失轉嫁於土地所有者身上，固然，土地所有者不是不爭鬥，但在長期反抗以後也就不得不同意租金的減低。反之，自己經營的土地所有者就必須自己承受因地

租降落所受的一切損失；他不能簡單地把這一切損失轉嫁於抵押債權人身上。

如果在租佃制下地租的低落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後纔使土地所有者受到不幸的結果，那麼在抵押制下地租的低落往往引起農業企業家，或說是「農村經濟」底貧困。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抵押債權人并不受到地租低落的影響。固然，抵押利息率可以隨着地租之低落而同時降低，但是這種降低并非農村經濟貧困狀態的結果，而是一般資本利息降低的結果，亦是全部借貸資本受了打擊的結果。這一點我們現在且不去說牠。抵押利息率是為資本的一般利息率所決定，任何農村經濟的窘迫都不能強使牠降低到一般水準以下。反之，農業經營者愈貧乏，則他不得不費的冒險的代價亦愈大，他不得不適應的利息率（至少在借新債的時候）亦愈高，而地產的價格亦愈低，一直低到他能負擔抵押他的地產為限。

在抵押制下農村經濟應付地租之低落與在租佃制下完全不同，牠不是用降低利息的方法，而是用企業家之破產及抵押債權人的資本之損失來應付的；可是無論如何這種行為雖不是完全非病態的，但也不是很合理的。

除租佃制和抵押制以外，還有第三種場合，在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資本家的時候，即是說，在他除了土地以外，還有充分的金錢，靠他自己的金錢來經營完全近代式的農業，這樣，除了企業利潤外，他還將全部地租放進自己的荷包裏。

可是，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合而爲一人，在歷史上所遇到的祇是一種例外；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往前發展牠仍舊是一種例外。要找出牠的原由，第一，就在於大生產優越於小生產，第二，在於土地私有制。

第六章 大生產與小生產

一 大經營在技術上的優越

農村經濟愈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則牠愈發展着大生產與小生產間技術之實的差異。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農村經濟內此種差異并未明顯地表現出來，如果不算農場制及別的像這一類的生產形式的話，關於這種農場制及這一類生產形式，我們在這裏不加以考察。地主靠自己的農奴的勞動，牲畜及工具來耕種自己的土地。地主自己所供給的在數量上很微而在質量上也并不優於農民的生產手段。大多數僕役首先是用來滿足他的家庭經濟底最大需要而對於土地的耕種不生什麼影響。地主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就土地的散漫而言，也沒有什麼區別。地主的許多小塊土地，像農民的土地一樣，散布在農村的田野間，而且同等地受強制換種法的支配。農民經濟與地主經濟間唯一的差別，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就在地主經濟要靠不自由的農奴的勞動者來經營，這些不自由的奴隸勞動者則竭力使自己的牲畜和自己不過度操勞。地主經濟的特點就是在勞動時間及勞動工具方面異常的浪費。

當封建勞役已被取消後，土地所有者已成爲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儘可能圍圍自己的土地并以自己的生產工具，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僱傭勞動者，按照自己的計劃去耕種土地，這一切的情形也就改變了。這時大生產的形式就和小生產完全不同，小生產現在已是不生產地浪費了勞動時間和生產工具。

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差異首先一定是表現於家內、戶內、家庭經濟內；家庭經濟自從用私有的牲畜私有的生產工具以及自己的僱傭勞動者來生產的時候對於大生產已有特殊的意義。

工業與農村經濟間一個最重要的差異就在於，在農村經濟內往往私有的生產與家庭經濟彼此間有緊密的聯繫，構成不可分離的整體，而在工業內除了某些殘餘以外牠們彼此是完全不相依靠的。沒有一個農業企業會可以沒有和牠相聯繫的家庭經濟。反過來說：在農村中沒有一個獨立的家庭經濟不是同時從事於農業的。

大的家庭經濟在節省勞動力及物料方面優於小的家庭經濟，這個論據是不需要證明的。拿一個大的地產和五十個小的農民經濟（假定大地產的土地和五十個小農經濟的土地一樣多）作比較，我們就可看到大地產只消一個廚房和一個竈，小的農民經濟就要五十個廚房五十個竈。這裏需要五個庖人，在那裏則需要五十個，這裏在冬季有五間住屋生火取暖，點五盞燈，在那裏則須五十間住屋生火取暖，點五十盞燈。這裏煤油，蒿苳，牛脂都可蒐購，而在那裏則要零買等等。

如果我們從家內轉到戶外，那末在大經營中我們便看到，一個廐舍可容五〇——一〇〇頭牛，而在小經營

內就要五十個廐舍，每個廐舍祇容一兩頭牛；在大經營內有一個積穀倉，有一眼井，而在小經營內就要有五十個積穀倉五十眼井。甚至我們還可看到從戶外到田間的道路——田野鐵道一般講來在農民是辦不到的——也比較的短，籬笆和圍牆也少，田界也少。

土地愈小，則其界岸（阡陌）的長度對於面積的比例亦愈大。一塊方形的土地，界岸之長短因面積之大小而不同，以一亞爾（ Ar ）公畝，法國面積單位名）為單位可列如下表：

一〇海克 塔爾	五海克 塔爾	一海克 塔爾	五〇亞爾	二五亞爾	一〇亞爾	五亞爾	一亞爾
一・二六米邊	一・七九米邊	四米邊	五・六六米邊	八米邊	一・二・六五米邊	一七・八九米邊	四〇米邊

要用籬笆圍五十塊地每塊地各為二十亞爾，則所需材料及勞動比圍一塊一〇海克塔爾的土地要多七倍。

如果邊界之寬度為二〇生的米邊，則一塊方形的土地所浪費的土地，其面積為：

〇海克 塔爾	五海克 塔爾	一海克 塔爾	五〇亞爾	二五亞爾	一〇亞爾	五亞爾	一亞爾
〇・二五米邊	〇・三六米邊	〇・八〇米邊	一・二一三米邊	一・六〇米邊	二・五三米邊	三・五八米邊	八・〇〇米邊

一〇海克塔爾一塊地的分界祇耗費二又二分之一亞爾而五〇塊地（每塊各爲二〇亞爾）的分界則空費十八亞爾。

地界愈長則種子的損失（在用手播種時必不可免地要撒落在田邊）亦愈多，耕種土地時所費的勞動亦愈多。克雷邁爾 (Kremer) 在 *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 (郭爾慈編的，一九八頁) 中說：在同一的面積上「用犁、除草器、耙、鋤、鐮、耨之類耕種土地與用機器播種，則土地愈小，所費愈多。在小塊土地上此種耗費的增加乃由於在耕種這一類土地時的時間上的浪費。在田的終端每次犁的迴轉，根據耕具之長度而橫耕在土地的窄邊所剩的寬度不同的地帶，以及在犁所不能達到的終端用手耕作等等條件之下，時間就通常都受損失。」

但是五十家農戶同樣需要五十把犁，五十個耙，五十輛貨車等等，而在這時候大經營所需要的在數量上可以少十倍。在同一的生產方法之下大經營因此就大大地節省了農具。這種情形同樣爲農業機器的統計所證實。有些機器，小生產和大生產差不多一樣備辦得到的就是打穀機。在一八八三年每一、〇〇〇海克塔爾耕地上經營中的面積計有：

從二——一〇〇海克塔爾二·八四汽力打穀機，一二·九三別種打穀機

一〇〇〇海克塔爾以上一·〇八汽力打穀機，一·九三別種打穀機

自然，誰都不會從這裏做出結論說，在小經營內汽力打穀機比在大經營的更爲普遍。

在同一的生產方法之下大生產雖然在工具的使用上比較經濟，但是在生產用具的費用上可以說不僅是絕對的，而且是相對地高於小生產，因為生產方法在大生產內不是不變的。有許多生產工具，尤其是機器，祇能應用於大生產內。農民就不能適當地利用牠們。根據克爾佛特（Kerffort）關於農業生產的學說，機器的完全利用祇有在應用下列農具下纔有可能：

- 馬犁應用於.....三〇海克塔爾耕地上
- 條播機刈割機打穀機應用於.....七〇海克塔爾耕地上
- 汽力打穀機應用於.....二五〇海克塔爾耕地上
- 汽犁應用於.....一〇〇〇海克塔爾耕地上

電力也祇有在大經營內纔能順利地應用。此刻還不能認為電力底應用是提高一切農業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底收益的手段。甚至就在一〇〇〇莫爾根（註一）這樣大的耕地上的成功（指應用電力而言）還是可疑的。祇有在最大的經營內纔表現出最有利的條件。』(註二) 蘇特金 (Kettgen) —— "Zur die Elektrotechnik" in Thiels Landw. Jahrb. XXVI. S. 672) 如果回憶一下，在德國一八八五年時五、五五八、三一七農業企業中祇有三〇六、八二八個企業佔二〇海克塔爾以上，祇有二五、〇六一佔一〇〇海克塔爾以上，這些數字就得到正確的說明了。大多數農村經濟小得連馬犁都不能使用，遑論使用機器。

美國政府在一八八四年要求他的領事報告美國農業機器在國外銷售的情形。從小土地所有佔優勢的一切國家內都提出了一致的意見書，認為凡經營太小即不足以採用機器或改良的工具。從威登堡（Wittenberg）黑森（Hessen）比利時、法國及其他國家都得到了這樣的報告。吉費爾領事從斯德丁（Stettin）寄來的報告說，用類似印第安人的戰斧的斧頭來砍柴，這在美國人看起來是何等的可笑。謨哲爾領事從約罕涅斯堡（Johannesburg）寄來的報告說：「在條羅吉亞地方農業用具完全是原始的。我最近考究古代的彫刻，她描畫十五世紀時這個地方農事的情景，而且令人喫驚的是那裏所描畫的用具和現代所用的相似。新式工具差不多只在模範的經營內纔可看到。」駐尼西亞（Nicea）的領事威爾遜關於法國南部也有同樣的報告：「國內羅馬時代的古犁，只能耙土，不能挖溝，牠雖不是經常使用的東西，但也是時常使用的。」（美國駐外領事關於農業機器的報告“Reports from the consu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五一〇五，二四，六二一頁。）

每百個農業企業——就牠們的範圍而言是屬於同一類的——在德國於一八九五年所採用的機器如下：

金	業	一般的 機器	汽 車	條播機	刈割機	打穀機	
						汽力的	其他的
少於二海克塔爾		二〇三	〇〇〇	〇・四六	〇・一	一〇八	〇・四九

從二五五海克塔爾	一三·八一	〇·〇〇	一·二九	〇·六〇	五·二〇	六·五六
從五至二〇海克塔爾	四五·八〇	〇·〇一	四·八八	〇·六八	一〇·九五	三一·八九
從二〇至一〇〇海克塔爾	七八·七九	〇·一一	一七·六九	六·九三	一六·六〇	六四·六九
一〇〇海克塔爾以上	九四·一六	五·二九	五七·三二	三一·七五	六一·二二	六〇·五三

大生產在應用機器方面到處都前進得很遠。在小生產中機器之應用，除打穀機外，並不顯著。

駕駛工具、器械、機器的人力、獸力和其他力的情形亦是如同各種工具、器械、機器的情形一樣。

爲了要獲得一種同一的結果，小經營就必須比大經營大量地應用這些勞力；除此以外，他們就不能完全地利用和加強他們的生產力。在我們所舉的例子內小農的五十把犁和五十輛車需要五十個牲畜五十個駕駛的人，而大生產中五把犁和五輛車就只需要五個牲畜和五個駕駛的人。無疑的，這五十個小農每一把犁和每一輛車要用一頭牛來拖，而這時在大經營內一把犁可用四匹馬來拖，但問題並不因此而起變化。兩個犁頭的犁用一個個耕作者及三匹馬所完成的工作像兩把簡單的犁每把犁用兩匹馬所完成的一樣多。三個犁頭的犁用一個工人和四匹馬就可完成像三把簡單的犁用兩個工人和六匹馬所完成的同樣的工作。

根據雷林格的話（引自羅賽爾 "Nationalökonomie des Ackerbaus" 164頁）1860年薩克森王國每一〇〇亞爾農民的土地上有三、三匹馬，而在一〇〇海克塔爾地主土地上只有一、五匹馬。

像上面所引的例子很明顯地證明，大生產除節省獸力之外還節省人力，且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需要較少的牲畜，較少的工具，採用較多省力的機器，給予宜於耕作的土地以最合理的形式及範圍等等。

但如果各個大經營在同樣的耕種方法之下相對地（就面積的大小而言）需要較少的活的和死的用具以及較少的勞動力，那他們比各個小經營絕對地常常大量地應用牠們。這就是說，他們比後者（小經營）更會大規模地利用分工的優點。祇有他們纔有可能完全進行那種專門化及使工具和器具適合各個機能，這就是現代的經營所以勝過資本主義前期經營的地方。對於獸類情形也是如此。小農將自己的牝牛用來榨乳，耕田及繁殖。關於自然選擇與乎物種和飼養之適合於特殊的條件是談不到的。同樣小農也很少能夠將自己的經營底各種機能分配在各個人之間。但在另一方面，這種情形在大生產是完全做得到的，並且牠還能由此得到各種利益。牠（大生產）把工作分為需要特別熟練和精密的工作及只需要機械力的工作。牠把前者（即需要特別熟練和特別精密的工作——譯者）分配於牠的有特殊心得和勤勉的勞動者之間，勞動者的熟練及經驗由於他們專門從事於某種工作的原故而增加了。因為分工及大規模的生產，每個人都長期地做自己的工作，並不常常變換牠（工作）因此又可減少由於每次變換工作的種類和位置而造成的時間及力量的浪費。最後，為達到某種結果許多人有計劃的通力合作的利益也歸牠（大生產）所得。

還在一七七三年時，有一個英國的農業經營者就注意到了這種優點。他曾指出，一個農人在三百英畝土地

上使用像十個農人每人經營三十英畝土地時所使用的同一數量的工人——在利用雇工的勞力中就可獲得祇有實際家纔能領會的那種利益。如果一與四之比等於三與十二之比是很明顯的話，那末實際告訴我們的是另一回事；因為在收割及需要同樣速度的其他工作之下，在同時使用許多人的條件之下，工作就完成得更好和更快。例如，在收割的時候兩個駕車者，兩個卸貨者，兩個裝貨者，兩個拾集穀物的人以及別的在禾堆旁邊和放置稻草處工作的人，一道工作，他們的成就，要比分散在許多經營內的同一數量的工人多兩倍」（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三三四頁。）

經營的擴大同樣給專門人材以可能很好很迅速的完成各部工作，這些工作農民自己完成得不好而且很慢，並且爲要完成這些工作他往往在長時期遲延以後在極迫切的情況下纔去求援於住得很遠的專門人材；可是大經營就有自己的鐵工場，馬具和馬車工廠以修理和製造簡單的器具，工具及補助工具。

但是最重要的優點，（大生產使用大量的勞動者所獲得的最重要的優點，）便是體力和智力的分工。我們已經看見，科學的指導對於農村經濟是何等的重要，我們已經看見，祇有科學的指導纔使有計劃的經營成爲可能，在有計劃的經營之下就可免掉各種損失，土地的分割，並得到良好的結果，祇有受過科學教育的農業經營者在合理的，正確的簿記之下纔會常常記起在某個時候適合於科學與市場之不斷變化的需要的播種法，肥料機器牲畜的種類，各種飼料。但是在現社會內體力勞動與科學教育彼此是嚴格地分開來的。祇有充分龐大的經

營纔能利用具有充分科學教育的農業家來效勞使他的勞動力專門從事於管理和監督經營。

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地產的大小是早就規定好的。牠的變化是與生產方法相適合。在深耕制度之下，例如，釀酒業，牠可以被減至三海克塔爾，在廣耕制度之下，例如牧畜業，則被增至五百海克塔爾。在中歐，平均計算，在最深的經營之下八〇——一〇〇海克塔爾的地產，而在最廣耕的經營之下二〇〇——一二五海克塔爾的地產纔能有專門人材，專做他的管理工作。

祇有從這些範圍開始，一般講來，我們纔能有在科學基礎上進行和管理的經營。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國五、五五八、三一七農業經營中只有二五、〇六一個農業經營有一〇〇多海克塔爾農業經營之合理的管理還這樣少見，這是不足奇怪的。郭爾慈說：平均的收成一和從劣等土地中（要在最努力耕作的條件之下）所能獲得的且實際獲得的收成比較，並不很大。如果我說，優良的耕作可以使一海克塔爾平均多增四——八生特勒收成，我想，我不致遇到有豐富經驗的實際家——農業經營者方面的反對。實際上，據我看來，收成增多底可能性還要更大，但我故意取那種為任何一個專門家所不能爭辨的數字來講】（“Die L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 一六五頁。）根據這段話，德國在較好的耕作之下，不消增加耕種的面積，就可生產出比現在多一萬萬生特勒穀物。

在底級的農業學校內竭力供給較小地產底管理者和所有者（他們並不專門從事於管理，他們自己也直

接參加各種工作）以高等教育，我們不像別人一樣偏於爭論這些學校之有用無用；但很顯然的，他們所傳授的智識就其性質而言與高級學校所授的知識沒有多大不同。據我們看來，農業學校是很快適應那種情形，要以低廉的低級職員供給大經營，這比較供給獨立的（就近代的意義而言）農業學家確能減少管理上的費用。中等農業學校就不然。有一個專門家抱怨說，在牠們（中等農業學校——譯者）裏面容易「染受這樣的生活習慣，這類生活習慣不接近中等的農業經營者尤其不接近小農業經營者；參觀這些學校的結果就是學生後來也感覺自己不適宜於小經營的條件或者不能與小經營相適應的生活，於是從參觀中得出的結論就是這些學校對於整個生活無益而有害」（見吉爾赫賴爾在 *Goins'chen Handbuch* 第一卷四二一頁上說的。）

在學生的習慣和道德在學校內加以培養的地方，吉爾赫賴爾很擔憂着這樣的結果，但是這些外來現象的同化是由於農業學校所引起的內部變革的結果。高等的教育和生活的滿足與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相容。許多受過教育的人，主要是從資產階級當中補充來的，她要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且，照環境影響的自然律而言，也使那些從下層提拔上來的，受過教育的階層被習染，在給農民、手工業者、工業勞動者以差堪溫飽的生活的收入之下，靠智識勞動謀生的人就會在體力和道德上（而往往是在體力和道德上）逐漸墮落下去。那些保守黨人的意見不是全無根據的，他們說高等教育使農民不宜於他的職業。但若把這種觀點誇大，說我國國民學校所提供的那些斷片的智識與農民的生活不相容，這種誇大，雖不致令人討厭，也是很可笑的。這是表示，一方

面，把農民降低到動物的水平線，另一方面剝奪農民建立自己的稍微合理的經營的最後可能性。

但是十分合理的經營所需要的那種高等教育，實際上，很難和近代農民的生存條件相結合。很顯然地，這不歸咎於高等教育而歸咎於農民的生活條件。由此祇能得出，農民經營之能對抗大經營，不是靠自己的高度的生產力，而是由於自己的極低的需要。首先，爲要獲得這樣多的收入（因爲不僅把供養農村的，而且供養城市的資產階級的勞動力的費用（貨幣及自然物）都算入他的用費預算中。）大經營一定要比小經營更多地生產。

中等的地產在這方面，情形更壞；在管理上他們的費用相當的高。牠們隨着經營的增大而迅速地降落。一百海克塔爾的地產需要一個受過教育的管理人，所有主或承租人；四百海克塔爾的地產，除此之外，還需要一個助手；牠的收入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多四倍，則管理上的費用就多一倍半。

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最大的農民經濟高於小的農民經濟；大的資本主義生產在某種限度內也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往後再說。反之，在農民的生產與大生產的分界上，照黑格兒的說法，發生數量變爲質量，因此，在這個分界上，農民經濟即使不是在技術方面，那末也會在經濟方面，能稍稍高於農學專家所管理的大經營。用科學的方法管理經營較小的地主的地產負擔超過他的收入以上的費用。管理經營的智識不是得之科學，而是簡單地得之貴族地主的地方，就會常常碰到這些事實。在後一場合內生產愈少，奢望愈大。

反之，大農優於小農，大地主的地產優於小地主的地產，這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是不言自明的。

除了大生產超過小生產的許多技術上的優點之外，還有一些在大的工程中表現出來的優點，這些工程只有在牠們包括廣大的面積的時候纔能順利地運用，這就是灌溉和排水的工程。灌溉較小的地面往往完全不能而且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平常也祇有極大的地面纔需要排水。據邁岑所說的，在普魯士於一八五五年時在一七八、〇一二個最大的地產內都作過排水的工程，而在最小的地產內作過排水工作的總計二〇、八七七個地產。輕便鐵道也祇用於綿延不斷的廣大地面上。

除了大經營在生產領域內的這些優點之外，在信用和商業領域內牠還有許多優點。

大生產之優越於小生產，無論在那一個領域內都沒有像在商業範圍內那麼大。「大數的計算並不比小數的計算多佔時間。十個買主各買英幣一百磅，比一個買主買英幣一千磅所需時間多十倍。一個同一的機能，無論牠在較小的或較大的範圍內執行，在商業中往往比在工業中更需要勞動時間之同樣的耗費」（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二七九頁。）

運費，尤其是鐵路的運費，對於大批商品，也要少些。誰要躉批購買，他就可以比在零買時得到更價廉物美的商品；誰要躉批出賣，他就可以在同樣有利的甚至更有利的條件之下廉價出賣，以維持競爭。但是大商人的用費不僅比小商人（和自己的流通範圍比較而言）更少，而且他能操縱市場，有極遠大的商業眼光且善於左右市場的條件。這種情形首先關係於商人，但同樣也關係於工業企業家和農業經營者，因為他們像商品的買者和賣者

一樣要執行商人的作用。上述的在市場上很小的支配及其很小的意義對於不能維持一個做生意的人，可是以商人資格出現的小手工業者比對於小商人更有意義些；但牠（即對市場極小的支配及其極小的意義）對於處在農村的孤立狀態中的農民更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在商品市場上在一切買者與賣者之間，他的地位最不利，他的商業智識最貧乏；他不能迅速利用有利的條件，或預見及預防不利的情況。而且他的經營比城市手工業者更複雜地包括着很多的生產部門并因此迫着他去做各種各樣的買賣。鞋匠，除了工具之外，只要買皮、線、釘子；他要賣的也只是鞋子。農民，除了工具之外，要買牲畜、種子、飼料、人造肥料，而出賣牲畜、麵包、牛乳、牛油、雞蛋之類。沒有誰像他處於這樣的依賴商業仲介人的地位的。

當仲介人同時又是高利貸者的時候，當迫切的需要金錢用來繳納賦稅及債務強迫農民照便宜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商品，或者在他們準備為市場而出賣以前就出賣了自己的商品的時候，此種依賴是最殘酷而且最不幸的。

這裏我們還要提到一點，就在這一點上大經營也是優於小經營的；這就是信用。

在前一章內我們已經看見新興的農村經濟沒有資本就不能經營。我們同樣看見了，在租佃制不佔統治的地方，抵押在農業經營者看來是獲得貨幣的主要泉源。除此以外，他還可以利用私人擔保的信用，或者出賣一部分自己的地產，以便獲得貨幣來管理其餘一部分的經營。但是後一種方法（出賣一部分土地）不是常常辦得

到的而且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因為所有者的地產一減少，就要失掉大經營的優點。除此以外他又無法使下剩的那一部分的價格提高（價格的提高是因為地租的增高及利息率的降低。）因此，私人擔保的信用及抵押在他看來仍舊是獲得貨幣的主要泉源。

要獲得固定資本（農業中之各種改良，建築物——這裏我們不把所有者的改變當作抵押債務的原因），人們就求助於抵押的借貸，要獲得流通資本、肥料、種子、工資等等，就求助於私人擔保的信用。

從前，急需就是土地所有者借債的原因，但此種借債是例外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在地主和農業經營者代表一個法定的人的地方，此種借債就成為從生產過程本身產生的必然現象。這裏土地所有權底債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同時牠成為農業生產底重要因素。

這種情形對於小經營與對於大經營都是一樣。但是在利用信用借款的時候後者（大經營）就有各種優先權。成就二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抵押借款并不比成就二、〇〇〇馬克的抵押借款需要更多的麻煩和費用。付出二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〇〇個地方比付出一個地方要麻煩一〇〇倍。

拉發爾格在其著名的論文論法國小的土地所有權中（*Neue Zeit* 第一卷三四八頁）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例：「在抵押借款之下借款愈少，他所定的時期愈短，則費用比較亦愈多；例如，稅款及通常的費用在抵押借款為三〇〇法郎時，就有如下的情形：

公證稅	五法郎——生丁（法幣名）
備置兩本合同的用費	三法郎——生丁
簽字費	三法郎——生丁
印花稅	一法郎九五生丁
每百法郎抽取一法郎一〇生丁的稅	三法郎三〇生丁
押款局中簽字費	三法郎——生丁
最小限度的利息（按 $\frac{5}{100}$ 計）	一五法郎——生丁
借款歸還時的用費	一四法郎二五生丁
總計	四八法郎五〇生丁

這樣看來，借款人在抵押借貸之下名義上是得三〇〇法郎，實際上祇得二五一法郎五〇生丁。

在德國情形也是如此。在一八九四年普魯士中央土地信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報（公佈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中，我們讀到：「最近幾年來我們特別努力使小的和中等的所有者容易獲得借款。如果後者（中等所有者）此刻在私人機關以及儲蓄銀行方面還負擔高利息的抵押，那末其原因是在於土地信用的機關大部分在付出貨款時對於較小的地產不能不加以估價，而借款者方面找補的估價的費用甚至在小數借款之下都與貸

款的數量不符合。爲了取消此種惡習起見，我們在兩年以前就實行了一種特稅。按照這種特稅，獲得貸款（實際
上照估價的費用就不算高）的人，在一千借款上付百分之二的特稅，可是不能少於三十馬克，也不能多於三百
馬克。在借款由一、五〇〇馬克（此爲照我們的規定所許可的最少數的貸款）到一五、〇〇〇馬克時，應繳
估價費及手續費爲數不過三十馬克。此種「社會改良」就是在貸款爲一、五〇〇馬克時所出的估價費與
借款爲一五、〇〇〇馬克時一樣少。於一、五〇〇馬克的貸款大都不出借。抵押信用對於很小的土地所有者
一般講來都是沒有份的。因此，他們是如此幸運，他們得免於債務的拖累！

在普魯士，根據邁岑在一八八四年的研究，大的地產所負擔的抵押多於小的地產。債務對於地價的百分比
如地產之繳納稅款的純收入達：

五〇〇及五〇〇以上塔勒（德銀幣）者爲……	五三·八%
一〇〇——五〇〇塔勒者爲……	二七·九%
三〇——一〇〇塔勒者爲……	二四·一%

這證明完全不是什麼大的地產有很大的需要，而是抵押信用對於農民有很大的困難。因而農民更加需要
私人擔保的信用。

可是私人擔保的借貸，情形比抵押借貸還壞。大的農業經營者直接在廣大市場上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他和

市場有經常的聯繫，因此他在經濟的中心（在這經濟的中心堆放着找尋投資地的大量借貸資本）像商人或工業家一樣容易找到信用，只要他是一個正直的經營者。

大市場對於孤立的祇有少數生產品出賣的農民并不接近。農民只有和住在城市附近或來尋訪他的仲介人成交他的買賣。在城市中沒有銀行業者（農民可以把自己的存款存放給他并為農民舉辦借貸的銀行業者）的農民，他的調節完全不為城市的大的借貸資本所明瞭。農民需要的是貨幣——他不得不求助於附近的農村的資本家而且在這裏農民沒有多的選擇，因為在農村中這類資本家為數不多。這些資本家本身往往就是仲介人，農業經營者或農村的富農，——他們很熟悉農民的情形而且不懼用小數目的借款，竭力吸取較多的利益，因為資本的需要遠勝於供給，農民的需要往往很迫切，資本家在經濟上佔很大的優勢。如對於大地主（最底限度，他如果是聰明而有才幹的農業經營者），高利貸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採取了近代的生產信用的形式，在此種信用形式之下，利息就適合於現存的利息率，但是農民則聽任中世紀掠奪式的高利貸形式儘量榨取，牠所取的利息完全不是拿利息率來計算。并且牠不是鼓勵生產而是完全危害債務者的生存。資本主義的發展驅使農民和大地主到負債的境地，但因為小的經營，致使前者（農民）像後者（大地主）一樣，不能避免和大生產的需要不相容的中世紀的高利貸的形式。

如果較量一下農村經濟中所有這些大生產的優點：在耕種面積上較少的損失，活的和死的用具上的節省，

更完全的利用這些農具，採用小經營所辦不到的機器的可能性，分工，科學的指導經營，商業的優越，獲得貨幣的簡便方法，——那時我們就很難理解下述的柴林格教授底確定的論斷：「用不着有絲毫的懷疑，農業的每一部門在中小生產內就如在大生產內一樣一定可以同樣合理，地經營，而且甚至和工業的發展相反，農業中深耕的增強使小經營大大地超越大經營」（見“Die Innere Kolonisation in Oestlichen Deutschland”九一頁。）

看到這種「很大的優越」也許可以期待着，柴林格教授要求大地產的分割。可是他離這個思想太遠。他直接在上面所引的論斷之後就說：「從這個事實，——大地主是經濟進步的領導者——出發，我們應當說，如果大生產在東部完全絕跡，那我國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失。絕對的平均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得到利益，差別總是一切發展的前提；我國東部土地貴族之不備政治的而且經濟的功績，使差別之保全成爲國家的必需。」

因此在合理的管理經營這一問題上小經營在一切領域內都大大的超越大經營，甚至經營愈強，則此種優越亦愈大；可是雖然如此，而東厄爾巴大地產之經濟的功績卻使牠的保全成爲國家的必需。

我們往後便可看到，應當怎樣去了解同時對於大小經營的這樣的熱情，這裏祇敘述，甚至小經營底熱烈的擁護者，像柴林格這樣的人也並不堅決地繼續發展自己的觀點和要求廢除大生產因爲他怕這將破壞農村經濟的發展。

可是，公正的裁判者，對於小經營，就很少有這樣熱情的崇拜。克雷邁爾，絕不是農民的反對者，他正確地把握

着 (R. Golts, Handbuch, 第一卷, 一九六頁) 大生產的優點: 「很明顯地, 小生產負擔了不相稱的較高的費用於建築物、耕牛、死的用具上面, 有些日常的需要, 如熱和光所費的都比在大生產內貴得多。有些經營工作的性質其特徵就是, 這些工作祇有在廣大的地面上纔能順利地大規模地完成。這裏所說的就是牲畜的飼養, 技術的生產, 機器的採用, 各種改良的生產等等。在這樣的領域內, 大生產總是享受很多便宜。在銷售生產品及利用借貸的時候, 大生產也得到同樣的利益。但是大生產最重要的優點是在於在企業的基礎上可以製定一定的計劃, 容易考察經營并有計劃的指導經營; 以適應大生產的地位及任務, 應用重要的和適當的集中和分工的原則, 從各方面加以管理, 就能使經濟力發展到高度的生產力。無疑的, 近代農村經濟發展恰恰是供給了大生產以最豐富的科學和技術手段, 這些手段使大生產能夠在受過專門教育的經營者底幫助之下, 保證自己在各方面的優勢。」

此種說法較之柴林格教授的論斷, 就多少有些不同。

二 小經營之過度的勞動與不足的消费

小經營拿什麼來對抗大經營的優越呢? 那就是勞動者最大的勤勞和努力 (他和僱工不同, 他是爲自己而勞作) 和小農業經營者之極低的需要 (比僱工的需要還更低)。

總之, 他是一個小耕作之熱烈的擁護者, 他指出小耕作勞動者不倦的勤勞是小耕作最重要的特點。在其

「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他引用一個英國作者關於普法爾次（Pfalz）農民所說的話：「他們從早到晚很熱心地勞作，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爲自己而勞作。他們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憔悴，但他們比駭重的動物更能耐，更勤勞不倦，更安靜。英國的平民如果他看見德國人採集柴薪是怎樣的困難，那他一定會驚愕不置。」他又說到小農的「超人的勤勞」，這種勤勞使所有的觀察者得到強有力的印象。從對「一切駭重動物中最忍耐和勤勞不倦的人」的觀察中所得的印象是否增大，在這一點上是很可懷疑的。

但是小農不僅催促自己工作，而且催促自己的家庭工作。在農業生產中家庭經濟與生產緊相連繫，而一切勞動者中最無保障的兒童也得經常供人驅使！像在家庭工業內一樣在小農經濟內，兒童在家內的勞作比作外人的僱傭勞動還要有害些。有一個記者從威斯特發里尼寄來的訊通說：「婦女和兒童的僱傭勞動極少見而且也不會受到絲毫的害處，甚至還有良好的影響。」有時父母使自己的兒童疲憊到即記者指出在招募新兵時所表現的那些有害的結果。別一個記者則鎮靜地寫道：「常常看到在可怕的範圍上應用兒童勞動，應用兒童勞動者，大都是父母和祇出衣食的代價僱用兒童的人。（Verhältnisse der Landerbeiter in Nordwestdeutschland. Erhebung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第1卷, 八三—一三二頁。）

真是，很鎮靜！

祇有小農經濟的最熱烈的崇拜者纔認爲此種強制勞動有優點小的土地所有把強制勞動加在自己的

勞動者身上，使他們變為馱重的牲畜，牠的全部生活，除睡覺吃飯的時間以外，都在勞動。

勞動的熱狂并不是自古以來農民的天性所固有的性質。在某些天主教國家內一直保存到現在的中世紀的許多節日就已經否定了這種說法（即勞動的熱狂是農民的天性）。羅賽爾引下巴瓦尼亞的一個地方為例，在那裏每年共有二百零四個節日（其中聖餐節及聖餐節後四十日，習射十二日），並且那裏的工作在節期前夕午後四時就停止了！一年三百個勞動日一日八小時勞動的要求和這些比較起來那是何等的謙遜啊！

祇有在為市場而勞動代替了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勞動的那個限度以內，勞動力之過度的緊張纔發展起來。競爭的影響也造成勞動力的過度緊張。但是以增加勞動時間為手段的競爭往往和生產底技術的落後性攜手並進，後者使前者失敗，反之亦然。凡不能拿技術的改良來對抗競爭的生產，就不得不以勞動力之極度的緊張為手段來爭鬪。另一方面，勞動力的緊張可以達到極度的那種生產，就不大需要技術的改良而勞動者在其中限制自己的疲勞的那種生產就需要技術的改良。

延長勞動時間，此種可能性，是技術進步的主要障礙。

兒童勞動之更完全的利用，也能阻礙技術的進步。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農村經濟之合理的管理若無相當的科學準備是不行的。中等農業學校及農業補習學校，自然不能代替自然科學及經濟學方面最高的基本教育，但牠們總能給在牠們裏面學習的農民以指導經營的可能，這雖不無可非難之處，但總比無知無識的農民要合

理得多。但在經營中儘可能更早和更完全剝削家庭成員，這種需要必然與更多智識的需要相衝突。在巴瓦尼亞及奧大利有些區域農民覺得義務學校教育到十四歲似乎太多，因此他們堅持義務教育的年齡到十二歲或多到十三歲爲止，並且他們極力這樣主張。

由於農村經濟成爲一門科學以及在合理的農村經濟與舊式的農村經濟之間競爭的加強，於是後者（舊式的農村經濟）需要強度剝削兒童勞動而對於和兒童教育的限制亦隨之發展。

這樣看來，不僅從倫理的觀點說，就是從純粹經濟的觀點說我們都不能把小的獨立的農業經營者及其家庭的勞動之過度緊張當作是小生產的優點。

小農雖有低度的需要，但情形並不見得比他們的更大的勤勞好些。

我們已經看見，大生產比較小生產處於不利的地位是在於大生產除付出筋肉勞動力的報酬之外還要付出智力勞動的報酬，此種智力勞動比前者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對於筋肉勞動，大生產也得與以較好的（比小農降到最低的生活條件較好的）生活條件。使農民疲憊得比一無所有的僱工更甚的私有財產，同樣迫使他使自己的生活要求降低到僱工要求的水平線以下，把生活要求減小到最低限度。

但是此種現象同前者一樣不能說是在一切條件之下農民經濟的結果。就在中世紀，我們知道有那麼多的節日，我們看見了農民的豐富而愉快的生活，他們像現時一樣並不放棄自己的吃喝。在中世紀的條件成最低限

度，中世紀的傳統還保存到現在的地方，那裏的農民在現在還不是一個吝嗇者。

但如果他的經濟受競爭的壓迫而衰落下去，他就會變成這樣的人（即變成慳吝的人。）

法國的農民（他是自由的私有者，他比別國的農民更長期地遭受着自由競爭的影響）就是這種情形的例證。

有一個英國的研究者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說，我們很難想像有比法國農民的生活更可憐的。他們的住宅就像豬圈一樣。他描寫法國的一間小農舍：「窗子完全沒有，祇有兩個通氣的小窗，打開兩個通氣小窗，就擋住了門，門關起來的時候既沒有光，又沒有空氣。長椅，棹子，櫥櫃全都看不見；在地板上放着弓，污穢的衣服，麵包，以及難以想像的一大堆廢物……」

「婦女，男子，小孩和牲畜差不多都是睡在一起。此種衣食住的安適之缺乏并不常常是貧窮的結果。這些人大都沒有什麼禮儀的觀念，他們除了想到節省燃料之外，什麼都想不到。」

作者在別處又說：「他們的吝嗇變為卑賤，他們好像無力享樂，他們祇要能夠節省一文錢，他們就放棄自己的滿足而愉快的生活。書籍或報紙，牆上掛的畫片或雕刻，一片磁器，一點裝飾，一些好的家具，掛鐘，英國農民的驕傲，在他們那裏全都看不到。我們真不能想像這樣喪失了一切前進的和各種快樂的生活。對於最必需的用品每次花費一文錢總要痛罵一頓。結果慳吝的，可憐的，令人厭惡的生活除了努力把許多錢藏在舊襪統裏以外就不

懂得別的思想。」

在英國小的農業經營內情形也不見得好。牠們（小農業經營）的所有者及租佃者怎樣勞作和生活，最近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一八九七年）的報告已告訴了我們。這個報告說：「在整個區域內（昆布蘭 Cumberland land）農民的子女都無代價地勞作。我知道沒有一個地方父親會給他的兒女酬報。他們祇給兒子一兩先令買煙。」有一個林肯縣（Lincoln）的小農說：「我養活了家庭，但後來卻失掉了家庭。我的兒女說：『父親，我們不願在此停留以至疲累到死，』於是他們就到工廠去了，剩下我和妻子聽憑命運的擺布。」另一個小農說：「我們和兒女有時一天工作十八小時，平均總在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我住在這裏有二十年。我們祇靠勞動過活。去年我們損失了金錢。我們吃很少一點鮮肉。」第三個說：「我們比僱工做得多，直然像奴隸一樣。唯一的優點就在於，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很枯燥地生活着」等等。

李德向委員會陳述農業區域內小農的狀況，說：「維持自己唯一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就是做兩個人所做的工作而耗費不及一個人所耗費的多。他們的兒女比僱工的兒女更加疲弱，營養更惡」（“Roy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final report”三四、三五七頁。）

祇有在果樹業，園藝業佔優勢的地方或者有可能獲得副業的那些地方，報告就說得不那麼慘。

在德國許多地方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一個研究者從黑森來的信（見“Neue Zeit”第十三卷一期四七一）

頁)說:「小農過着最可憐的生活。農村僱工的狀況要好得多,因為他們靠主人的資料生活。他們的收入已經不怎樣依靠天氣的變化了,如果把荒年時營養的惡化不算的話。」「爲要獲得優良的勞動者唯一的誘惑就是良好的營養。」這個條件就是日工有較好營養的原因。主要的營養資料就是馬鈴薯。「小農的住宅非常骯髒,房屋通常是用木或黏土,毫無體裁的建築術建築的並且在最近期間建造得更加馬糊。在這種情形之下住宅的佈置極其簡陋——棹子、椅子、幾個小檯子、有帳子的睡床、櫥櫃——這就是全部的財富。」

布亨貝爾格告訴我們在巴登(Baden)大公國的農民的凍餒又怎樣成爲小農在經濟上佔優勢的例子。他拿比梭芬金公社內最大的農民地產十一海克塔爾和五·五海克塔爾的地產作比較。前者,因爲特殊的情況,不得不單單使用僱傭勞動者,情形是很不利的,因爲爲了要使大經營的利益能夠補償僱傭勞動的不利,這個地產就太小了。較小的地產完全由所有者及其家庭(妻子及六個成年的孩子)來耕作。在最大的經營內虧空九三三馬克,在最小的經營內則贏餘一九一馬克。此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應當在那裏去找,即在使用僱傭勞動者的經營內有了良好的營養——一天一個人大約要一馬克的價值,而在有家庭成員勞作的經營內,食物每人一天祇費四十八普費林,即是說,比僱傭勞動者的費用少兩倍(“Bäuerliche Zustände in Deutschland” Berichte, veröffentlicht vom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第三卷, 176頁)。

如果小經營底農民家庭像最大經營的僱工一樣有良好的營養,那時他就不是有一九一馬克的盈餘,而是

有一、二五〇馬克的虧空他不是從充實的倉庫而是從空虛的肚皮取得他的盈餘！

這幅圖畫又爲威馬爾(Weimar)區來的報告所補充。這個報告說：「我們暫且不管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如果拍賣不常發生，那末這祇是因爲我國小農業經營者爲看自己的獨立而忍受一些或然的損失。有時整個的階級，他們所有的鮮肉(僱工在地產內所得的鮮肉至少一星期有兩次)只有在盛大的節日纔擺在棹上，至於新鮮的牛油則是最可口的美味了。當這些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於小經營方面，而是被僱爲日工，他們只要和全部力量供諸私有的經營而過着枯燥無味的生活一比較，就覺得不壞」(同書九二頁)這裏又明顯地看出，大經營底僱傭勞動者的狀況比獨立的小私有者的狀況好得多。

最後，還可以指出一些情況，這些情況是我們在古柏特阿烏哈金(Gubert Ayrhaden)論農村經濟中之大生產與小生產一書(Thiels Landwirtschaftliche Jahrbücher, 1八九六年)中看到的，阿烏哈金拿兩個經營作比較，一個爲四·六海克塔爾，另一個爲二六·五海克塔爾，這種比較是根據牠們的收入而不是根據投入到牠們裏面的勞動力底生產力。他替最小的經營計算出很大的收益。

但是這是怎樣得到的呢？小經營有兒童幫助，大經營要僱用兒童就得花錢。小農的兒童剛剛長成，他(小農)就得到他們的實際幫助。兒童的幫助往往是在他們能夠行走時即已開始。」

小農強迫自己的七歲兒童在學習時期就去勞作。他一年要花四馬克的學費。大農把他的子女送進學校。他

的十四歲的兒子在中學讀書，一年要花七百馬克，比小農全家所花的還多。小經營是怎樣的優越啊！

在小經營內，除了最年青的以外，老年人也有很大的幫助。「我常常看見在經營內有七十歲以上的勞動者，他們還能夠代替完全的勞動力，並且是在較高限度內幫助了經營的成功。」自然，年富力強的人更能勞動。「僱工，尤其在大經營內，對於自己的工作總想趕快休息吧！小農最低限度，在收割時期，總想讓日子多延長兩點鐘吧！……如果某個時間對於在許多工作之下應做的工作特別有利，那末在小經營內就可很早起身並不間斷的和強度的勞作來利用這個有利的時間，而在這時，大經營的勞動者則不願比平常更長時間勞作和更早起身。

但是此種過度的操勞總有相當的結果。農民以最可憐的生活為滿足。阿烏哈金很驚訝地向我們敘述德赤克羅勒區中的一個農民：「他住在一間九米突長七·五米突寬的小土房內。門當中，就是一間住屋。這間住屋同時，又為寢室，丈夫妻子和四個孩子都睡在牠裏面。從這裏開一道門進小廚房內，廚房靠近用人的住屋，這個用人是經營中唯一的外人。最後一間住屋是家中最好的一間。因為用人正當地希望有一間像他在別處都可得到的住屋。房屋的建築費為八百六十馬克。這個數額只用以支付木匠，製家具的木工及鍋竈匠；所有其餘的部分都由家庭和親戚來建造。女子十七歲出嫁，並且一生就穿一雙鞋子，夏天和冬天她都是赤着腳走路或者拖一雙木拖鞋。她替自己和自己的丈夫紡織。馬鈴薯、牛奶很少的青魚就是他們的食物。祇有到禮拜天，主人纔用煙斗抽烟。這些人並不覺得他們過着非常簡單（好簡單！著者）的生活，他們生活下去而且也不抱怨自己的境況。在他們極

簡單的生活下這些人差不多每年都從自己的經營中獲得些須的贏餘。當我問他們的經營的價值時，他們就回答我，他們願以八千馬克將牠（他們的經營）出賣。」

這是何等得意揚揚的讚美小經營（牠祇是由於在最簡單的條件之下生活，即是說在最骯髒和最卑賤的需要之下生活纔能生產出剩餘來）的勝利啊！僱傭勞動者覺得自己在農村中是一個人而不是獸重的牲畜，他比小農有更高的需要，他是最高文化的代表者。因此打倒僱傭勞動者，即是打倒大生產無限優越的小生產萬歲！「從我們的觀點說來，小農底非人的營養，正如他的超人的勤勞一樣，并不能證明小經營的優越。兩者馬上就證明小經營的落後，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障礙。正因為牠們，小土地私有纔成爲創造在社會以外的野蠻階級的手段，原始社會形式的粗野在社會內就與文明國家的一切苦痛和貧乏相交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編三四七頁德文版參照“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五〇—五一頁。）保守的政治家用盡一切方法保存這個野蠻階級當作資本主義文化底最後支柱這自然是很明顯的。

農民的努力奮發情形自然比他們的勤勞和低度的需要好些。她（努力奮發）在農業生產中一般講來比在工業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無疑的，她在爲自己而勞作的人方面比在僱傭勞動者方面容易實現。即使不就一切大經營而言，就是單就資本主義的經營而言努力奮發確是小經營的優點。但是我們不必給這一點以很多意義。小生產反對大生產的另一鬭爭工具，——過度勞働，營養不足以及愚昧都可使他的熱忱減弱。勞動者工作愈

多，營養愈壞以及對自己的教育所耗的金錢及時間愈少則他的熱忱亦愈小。當他沒有多餘時間來照顧牲畜和收拾廄舍，當他不能不像自己一樣使他的耕畜（往往以乳牛來代替牠）疲勞，而且一樣很壞地飼養牠的時候，那末最大的熱忱能够給他些什麼呢。

關於邁爾茲格地方（屬特里爾區（Trier）管轄的）的小農，沙爾布爾格農業學校校長巴爾台斯（Barthels）說：「這些小私有者差不多專吃馬鈴薯及裸麥麵包；肉和脂肪的消費為數很小。我可以大膽地斷言，他們的營養不足，意志力因之特別感到痛苦。他們的後輩很愚鈍，他們漠不關心而且也無能力去正確的認識他們自己的事業的原因和結果」（“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一卷二二二頁）。

在小經營一點也不能發活牠的所有者的地方，在後者（所有者）爲了要生存，不得不求助於副業的地方，小經營的生存就極可憐了。例如霍亨蓋姆的教授海慈（A. Heisz）關於司徒嘉德（Stuttgart）的斯瓦比亞區（Swabia）貝布里金（Beblingen）及海雷堡（Herenburg）等處的小農寫道：「造成大產業中較高收成的就是深耕，細心照料田地，增高土地生產物的質量，更好的營養及好好的照料家畜——所有這些祇是很慢很困難地被移植到農民方面，因爲農民就沒有這樣勇氣也沒有那麼多金錢。同樣，在別處早已採用的許多機器，農民差不多就不大知道……此外還有一個條件，牠是深埋於近代的條件之內的。我們，最低限度不是把真實的勤勞與生活的維持中所非難的許多缺點歸咎於民族的本性而是歸咎於小的土地所有權。我們承認，把完全不同的

職業結合是很難做到。如果小商人和小行商對緊張的農業勞動失掉適應的能力那末農民大部分都是不良的手工業者，就如手工業者是不良的農民一樣」（農民的境況「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三卷二二七頁。）

下述的數字指示出，此種情形對於德國的農村經濟究有何種意義。

根據一八九五年的戶口調查，五〇二、〇〇〇個（即是百分之二十）獨立的農業經營者都有副業，七、〇〇〇個農村經濟屬於農業經營者，七九一、〇〇〇個農村經濟屬於工業僱傭勞動者，七〇四、〇〇〇個農村經濟屬於獨立的工業者，大部分是屬於手工業者。

五、六〇〇、〇〇〇個農業經營者中只有二百萬，即是說，祇有百分之三十七的獨立的農業經營者沒有副業；三、二三六、〇〇〇個農業經營底所有者（其經營所佔面積不到二海克塔爾）中沒有副業的獨立的農業經營者祇有四一七、〇〇〇個，即佔百分之十三，而一四七、〇〇〇個小經營屬於有副業的獨立的農業經營者，六九〇、〇〇〇個屬於農業勞動者，七四三、〇〇〇個屬於工業勞動者，五三四、〇〇〇個屬於手工業者。

這樣看來，可憐的小經營為數是很大的。

如果大多數小農業經營所處的地位，決不助長特殊的熱忱底發展，那末，在另一方面，大經營倒能夠從僱傭勞動者獲得熱心的勞動。工資優厚，營養充足，待遇很好就已經有很大的意義。「營養不足報酬很低的勞動者會

自然的或故意的疏忽，使經營受到比節省工資更大的損失，而那些給工人以充足的工資的經營，經驗告訴我們，牠們反能使收入增多」（Kirchner, in Goltz'schen Handbuch, 第一卷四三五頁。）營養好報酬高而且又有智識的勞動者是合理的大經營底必要條件。無疑的，此種先決條件在現時大部份都還不存在，若要希望從大經營者的「開明專制」方面改善勞動者的狀況那是很愚蠢的；正如在工業中一樣，在農業中，此種先決條件應由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用來壓迫企業家，或直接或間接經過政府的干涉。工人運動的任務是要提高農村無產階級的道德的和物質的水平實行反對農村野蠻的鬭爭以創造合理的農村經濟之重要的先決條件，并消滅小經營底最後一個支柱。

但是除了優厚的工資以外，大生產還有另一種手段從勞動者得到更熱忱的勞動。例如，屠能提出了分紅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使地產底全體經常的勞動者都分得了某種最小限度以上的紅利。但是爲要得到勞動者底更大熱心和誠實，分工制到處普遍起來了。有大量勞動者勞作的大經營，像上面已經指出的，就有可能爲自己選擇特別熟練的，誠實的，有智識的勞動者，擔當以質爲主的工作，選擇粗工或細工、監工等。

最後，應當指出，在最重要的農村經濟部門內首先在農業內，機器不僅比手工業者，用簡單工具做得快，而且做得好；也祇有機器纔能得出這樣的結果，這些結果是手工業者即使費盡極大的熱心也不能得到的。我們已經看見，機器耕種、播種、刈割（除軟攤的穀物以外）、打穀、簸穀、分類，比農民用簡單工具或器具好得多。不管柴林格

教授怎樣說，我們還不會遇見一位專門家，他會堅持那種意見，認為小經營在農業中像大經營一樣能夠合理地經營。但是也有最簡單的生產部門，有些專門家認為在這些部門內小經營還能夠支持競爭。

克連邁爾教授說，對於這一類經營，大生產要好些，對於別一類經營則小生產要好些。後者（小生產）能夠存在，是在「需要各個勞動者特別注意的複雜而有價值的耕作的地方……正是在這些目的內發生着在小經營內很便利的利用自由的時間，同樣應用企業者家庭中最弱的力量（年青的小孩吧——著者）及廉價的完成工作的最適當的場合尤其園藝，葡萄種植及某些工藝植物的種植底成功更證明了這一點」（*Goiz, Handbuch*, 第一卷，一九七頁）。

下述的數字就表明，這些在現刻對小經營還有利的幾種種植和農業及牧畜業比較究有何種意義：在一八八九年德國種植工藝植物的面積為一六一、四〇八海克塔爾，種植葡萄為一二〇、九三五海克塔爾；反之，種植飼料及青草的面積為八、五三三、七九〇海克塔爾，種植穀物為一三、八九八、〇五八海克塔爾，種植馬鈴薯約三百萬海克塔爾。

其實，就在園藝及釀酒業內大經營也一樣順利地進行着。

可是用來種植許多工藝植物的面積已減少了。種植煙草的面積在一八八一年為二七、二四八海克塔爾，在一八九三年就減到一五、一九八海克塔爾。從那時候起，種植煙草的面積又稍稍增加了（一八九六年為二

二、〇七六海克塔爾，)但比起她在一八八一年的範圍還是相差很遠。亞麻及苧麻的種植面積在一八七八年爲一五五、一〇〇海克塔爾，一八八三年爲一二三、六〇〇海克塔爾，一八九三年則爲六八、九〇〇海克塔爾。

種植忽布的情形稍微好些，牠的種植面積從四〇、八〇〇海克塔爾增至四五、四〇〇海克塔爾，但後來又減至四二、一〇〇海克塔爾（一八九三年。）

寧願種植工藝植物，這對於農民，有時是異常重要的。德里爾博士寫道：「說到捷克(Czechy)，大家都知道，在忽布種植的區域內，農民差不多專門種植忽布，他們的整個命運就繫於這一種植物。但這直然是一種賭博，因爲忽布價格極其漲落不定。在捷克只要忽布有一兩次收成不好，整個農村就陷於貧困的境地」(Die Agrarfrage in Oesterreich, 114頁。)

根據克關佛特的生產論(八二頁)，忽布價格的漲落竟達百分之一、〇〇〇以上。

如果講到一般的農村經濟，那末我們無須特別注意到那幾種小生產在其中超越大生產的種植，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大經營決然地高於小經營。

「實際家」也是這樣承認。他們往往以爲與其管理小而負債的地產勿寧管理大而負債的地產。抵押債務大部份是發生於「實際家」所偏愛的大生產。

誰要想花費五〇、〇〇〇馬克購置地產，那他寧可以五〇、〇〇〇馬克的抵押，以五〇、〇〇〇馬克的現金去購買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地產。但是實際家所承認的大生產底優越還表現於另一方面：表現於他們所創立的合作社內。合作社的生產就是大生產。

三 合作社

我們不想否定合作社的意義。不過問題在於，在大生產勝於小生產的一切領域內，合作社的大經營底優點，農民是否能夠得到？此種優勢能擴張得怎樣遠？

首先我們就要注意，農業合作社的活動直到現在差不多專限於借貸及貿易方面。各個合作社底工業企業，如牛乳農莊、製糖工廠之類，我們在此且不去說牠。關於牠們對於小經營的意義我們將在下面考察農業的工業時再說。這裏所說的農村經濟是就這個字的本意而言。這裏祇能指出農業改良的合作社，是對生產有直接關係的一種組合。所有其他的農業合作社，像上面所說的，主要是以借貸及仲介的貿易為目的。

但是在這些領域內合作社不僅給小經營產生利益，而且也給大經營產生利益。

對於合作社組織有利的條件無論甚麼地方，都不像在農民當中發展得那麼微弱，因為生活和勞動底條件使農民孤立，限制着他的眼界，剝奪他對於合作社的自治所必要的閒暇時間。在警察制的國家內情形更壞，在

此種國家內官僚政治的保護和壓迫的統治幾世紀來完全戕害了民主的合作社組織的習慣。政治的壓迫和愚昧無知同是於農民幸福有害的鞭策。在家長制的傳統還未被撼動而且還堅固地豎立着「寺廟和祭壇」的基石的地方，要激起農民去組織合作社就更加困難。

設立合作社的條件，在大的土地所有者方面，更其便利，大的土地所有者為數很少，而且他們能充分地處理閑暇時間，廣泛的聯繫，私人的或僱員的商業經驗。

所以，我們看見，在這裏，就如在農村經濟領域內一切其他進步的現象之下一樣，大經營總是居先。合作社對於農民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數場合內牠不是為着共同勞動，把許多小的力量聯合起來，藉以對抗大地主的經營的一種手段，而是為了不讓大生產完全支配合作社的一切優點，自己也要乘間攫取一部分。

在抵押信用的範圍內大經營是第一個從合作社中取得了很多利益。普魯士的「Landschaften」在十八世紀就已經有了。起初僅是各省貴族地產為供給抵押信用的一些強制的合作社。在本世紀（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牠們逐漸開始也供應非貴族的地產。但是像那些為了利益而提供貸款的抵押機關一樣，牠們絕不願和較小的地產有來往，以免很多麻煩和費用。

對於牠們繳納地稅的純收入少於某一數量（在薩克森省，在什列斯威·好斯敦 Schleswig Holstein 在威斯特發里亞 Westphalia 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等地為一百五十馬克，在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爲二百四十馬克，)或牠們的估價低於某一數額(在坡茲蘭尼爲六、〇〇〇馬克)的地產，就不放款。

這裏，在協作社原則上的組織就是給予最大地產以許多利益的一種手段，這些利益是小地產所得不到的。

黑希特在其論德國國家及各省土地信用機關一書(我們在上而已引用過)的緒論中說：「除很少的例外以外，我們可以說：在協作社原則上的土地信用的組織，主要是給大地產產生利益。」

信用協作社，在小農看來，對於以私人擔保的信用，有很大意義。信用協作社可以向在近代資本主義條件上的城市的大的貨幣資本方面取得信用，此種信用是個別的農民所得不到的。如果各個農民的借款太小，爲使大資本有利可圖起見，那末整個協作社底借貸就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放款給他所完全不知道的農民在城市銀行看來是一件很冒險的事，那末協作社社員的連環保就會使此種危險減到最小限度。這樣看來，由於信用協作社農民便有可能出相當的利息以獲得貨幣，這些利息，只要他不破產，他有了貸款的幫助以改善他的經營就可支付的。無疑的，信用協作社對於農民有很大的意義，是經濟進步的一種手段，固然，此種進步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像人們所想像的)，而是走向資本主義，但牠們確是表現出很大的經濟價值。

顯而易見的，——也只有有在牠們被移植和繁榮的地方纔是如此。可是這種情形并不常常這樣發生。牠們的創立和管理對於普通農民不是這樣容易的事，於是就有問題發生，在廣大的農民羣衆當中，對經驗沒有付過很高的代價，這些協作社的推廣是否可能。何種組織最宜於農村經濟的特性，這一實際的爭論一直到现在還在進

行着，這一方面的擁護者往往非難他們的反對者，說他們不能對農村經濟提供一些東西。

雷費岑銀行成立在僧侶的保護之下，在蘇爾茲戴里其銀行內，手工業者佔優勢。但是組織最完善的貸款儲蓄銀行也只能對於一部分農民有利。並不是每一個農業經營者在他需要款項的時候都能得到此種貸款。要使協作社不受很大的損失，就得謹慎將事。那些沒有支付能力，而又是最感需要的農民，像從前一樣，跌在農村高利貸者的手掌裏。可是信用協作社（關於農業的工業協作社這裏不去講牠）對於農民表現出極大的重要性。而且這一類的協作社迅速地增長着。根據柴林格所說的（見 *Das Genossenschaftswesen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preussischen Zentralgenossenschaftskasse, 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Landes-Oekonomie-Kollegiums, Februar 1897*）德國於一八七一年時共計有一〇〇〇個農業放款銀行，一八九一年有二、一三四個，一八九六年有六、三九一個。在普魯士，根據中央銀行的統計受他的支配的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一日共計約有五、〇〇〇個協作銀行，一八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已經有七、六三六個協作銀行。著名的 *Pommgenossen-Schaften* 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大地主不需要這一類機關。因為他有支付能力，他就能用最簡單的方法找得貸款。

改良農業的協作社，像抵押信用的協作社一樣，對於小經營也不相宜；就是消費（買賣）協作社也是如此。貿易，排出競爭者於市場之外，吸引主顧及利用時機——這些活動形式，完全不宜於協作社。獨立的，和人計

較的，極熱中於利益的各個企業家在這裏的活動比合作社的店員順利得多。

在出賣個別的商品方面，供給與需要，及生產品的質量愈不平衡，則此種情形（指貿易，排斥競爭者等等而言）亦愈有意義。在合作社原則上很難做牲畜的買賣，這種情形主要應歸咎於此種不平衡性。德國在這一方面的一切企圖差不多都失敗了。生產品種類之繁多在由許多用不同的方法及在不同的條件之下生產的小農聯合成立的售物合作社內比在每個都合理地進行的幾個大經營所設立的合作社內更易感覺到。例如邁德爾斯太費爾斯（Steinfels）的通訊就是這樣說：「在合作社原則上銷售牛油，凡是在出賣同一質量的大量牛油，即是說，出賣乳酪合作社或大地主的商品的地方都被保存下來。但是在合作社一定要出賣許多小生產者的牛油的地方，合作社就往往會破產。」（*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第四卷九五〇頁）。

在上面已經說過：關於乳酪合作社對於小農的意義，我們要往後去研究。這裏我們祇想確定，平常祇有那些由大經營而非由小經營成立的售物合作社纔很興旺。這種情形不僅在出賣牛油方面為然，即在出賣牲畜，穀物及火酒方面亦是如此。最近在德國北部發達起來的發售火酒的合作社，只細考查的結果不是別的，而是釀酒廠為維持火酒最高價格的卡特爾。

如果每個社員都照一個計劃并用同樣的工具去生產，那末售物合作社這時纔會更有利於小經營。可是希望很小，而且似乎德國的農民就不打算在這一方面多作嘗試。要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在這方面農民的合作社迅

速的發展那是不行的。

這裏還祇是剛剛摸索形勢剛作原始的嘗試。

反之，共同購買人造肥料、飼料、種子、牲畜、機器等等的合作社情形就比較好些。此等合作社的數量迅速地增加着。購置原料的農業組合計有：一八七五年爲五六個，一八八〇年——六八個，一八八八年——八四三個，一八九四年——一、〇七一一個，一八九六年——一、〇八五個。

除這些合作社之外在一八九四年共計有二一四個購置農業工具及機器的農業合作社。

在購買原料及機器的範圍內，農業合作社能夠發揮着極有效的活動。這裏關係比較簡單。市場的情況容易明瞭，合作社社員自己去訂貨；而賣東西給合作社的不是零星的小生產，而是大的工業企業，或大的農業經營（例如從事於牧畜業的農業經營）。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合作社對於農業經營者的好處。牠們節省了仲介人的費用；誠然，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業經營者所省的，就是仲介人所失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沒有一個人像地主階級那樣兇惡的反對大商號及消費合作社（替勞動者減低消費資料的消費合作社）的，這些人（地主階級）同時竭力消滅仲介人的作用，因爲仲介人的作用引起商品價格的抬高使官吏、軍官和土地所有者蒙受不利。除了節省仲介人的費用以外，購貨的農村合作社還有一種好處，就是使農業經營者不致購到偽造品。但是這裏又有一個問題，在這裏大經營不是比小經營更節省得多嗎？

例如，如果柏林的主要協作社很有利地供給大地主的蒸汽機所需要的煤，那末煤的供給對於小經營就不會有特殊的意義。同樣將出賣或出租的機器供給其社員的協作社，其社員所需的機器愈多，經營愈大，則所得的利益亦愈多，這是很顯然的。從購置汽犁的協作社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顯然不是小農而是大農和大地主。

在薩克森省的大經營內差不多到處都用汽犁耕種。其中只有少數的經營有私有的汽犁，大部分汽犁都屬於協作社。

在耶爾福（Jery）國社大會上（一八九七年九月）海爾牧師在他關於協作社的報告中已顯慮到大生產把持農業協作社并使之專供自己之用。一八九六年在斯德丁（Stettin）農業協作社大會上，主席團（秘書處）完全在大地主手裏。四十一個演說者中只有四個小地主說了幾句很簡括的話。

一八九七年在德勒斯登（Dresden）舉行的協作社大會也完全在貴族地主的影響之下。在上面所引的報告中，柴林格曾經對於農村經濟委員會歌頌協作社為「利益與勞動之新的共同性」的創立者，這正與這一情形完全符合。

「我們在這裏看到農民與大地主，僧侶與學者，僱主與勞動者底共同活動及互相信賴。」

這已經很夠證明，協作社對於近代的農村經濟雖有很大的意義，但無論如何，牠們不是能夠消滅大經營超越小經營的許多優點的一種手段，甚至就是在協作社很順利進行的那些部門內也是如此。反之，牠們往往是加

強大經營的優越的一種手段。牠們替中等經營產生出最大的利益，替小經營產生最小的利益。

但是最重要的農業部門是個別的獨立經營底合作社所望塵莫及的。

我們已經看見，汽犁（還有別的機器，如條播機之類）不宜用於小的農業經營。同樣別的機器對於獨立的農業經營者之協同利用也不適宜。這就是指那些祇應用於某一短時期的機器。如果刈草期一到，大家都要忙着刈草，那末協作的刈草機有什麼用處呢？甚至打穀機的協同使用也可引起爭吵和招致損失。自己有力打穀機的大農業經營者就有一種優勢，他可以在田間打磨剛割下的穀物；他節省未打磨過的穀物的運費和保管費，他的穀物直接在收穫之後就可出賣，因此他能夠利用一切時機。這些利益對於合作社社員是不存在的，合作社社員一定要把自己的穀物（未曾打磨過的）運出去並且等待着輪到他打磨的時候到來。

此種合作社無論如何都不能給小農業經營者以許多優點——為廣大的耕種面積、分工、有科學教育的人的管理所提供的，——這些正是大經營底最重要的優點。因此若希望合作社給小生產以可能像在大生產內一樣進行其合理的經營，那就等於畫餅充饑。如果小農業經營者真正要想藉助於合作社得到大經營的優點，那末他們就不應當走迂迴的路，而應當直接向着目的急進，他們就不應當僅限於商業和高利貸方面，而應當注意到對於農業經營者最重要的農業生產方面。無疑地，大的協作經營可以利用大生產的一切利益，可是，許多單為獲得原料、機器、信用及買賣的協作社就完全不能提供這些利益，即使能提供也是不關重要的。

同時爲自己的利益而勞作之勝於僱傭勞動，這對於協作的經營也有益。像這樣的合作社不僅可與資本主義的經營抗衡，而且還超過資本主義的經營。但是很奇怪的是：正是這一類合作社得不到農業經營者的注意。我們可以把飼養牲畜的合作社（例如飼養小馬的合作社）視爲明顯的過渡到這類協作經營。農民往往沒有適當的地方安置他的馬仔，很早就使牠們馱重因此就傷害了牠們。除此以外，他不能給牠們以適當的照料，適當的廄舍，且往往給牠們以不良的飼料。一八九五年在依林瓦爾（Hienvorf）所創立的飼養馬仔的合作社就消除了此種不幸，社員把自己的馬仔放在那裏，在那裏給牠們合於衛生的廄，寬大的練馬場及仔細的照顧。但是這一類合作社，雖然是農業生產的合作社，可是只是農村經濟的附屬部門并且只是消除農民經濟之孤立性及限制性底個別影響的緩衝劑，但不能消滅這種孤立性及限制性的本質。

農民甚至不打算把協作社的原則應用於他的經濟底主要部門，其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他們只限於不能令人滿足的緩和劑呢？

有人企圖以農業勞動就性質而言不是社會的，因此不能推進社會經濟的進行來解釋此種情形。但這是把恰在這個時候需要說明的現象拿來作爲此種情形的唯一證明而已。

不易令人明瞭的就是，爲什麼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近代農村經濟卻不是同樣宜於協作社的生產。是不是因爲後者還未曾試驗過？這是不妥當的解釋，因爲已經有過許多試驗和良好的結果。

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內，當時偉大的思想家已認爲結束資本主義剝削的手段，不是小生產，而是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但是當時還沒有人能了解，社會主義的大生產爲要在最大範圍內發生與發展，需要許多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以及智識的前提條件，那時有不少的空想家，其中最偉大的一個空想家，羅伯特·歐文曾企圖創立社會主義實驗區和協作社來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並不是所有的企圖都成功，而那些已成功的，也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胚胎。但是有一點是無可非難地證明了：社會生產底可能性，以社會制度代替個人的資本家底可能性。

這些試驗大多數是在工業領域內自然而成就的。但有一點是在農村經濟領域內成就的。這就是在刺拉根（Palagien）的協作社，這個協作社很卓絕地成功了，後來祇是因爲不幸的偶然纔遭失敗。協作社底這種經驗十分有趣，可是不大爲人所知，關於這個協作社的故事，是完全從我們的著作中引來的。我們從查理士·布雷的書中“*Philosophy of Necessity*”第二卷五八一頁，借用這些見聞。勃萊塔諾也把牠們引用到他對威伯先生的英國協作社運動一書所作的附錄中（見該書二二九頁。）

「在愛爾蘭——布雷告訴我們——瓦達乃爾先生在其屬於克萊爾伯爵領地的刺拉根地產內曾獲得很豐富的經驗。他的農夫屬於最下層的愛爾蘭人；他們貧窮、不滿意，性情乖張而且易於忿怒，瓦達乃爾很想改善他們的性格和他們的地位；爲他私人的利益設想要有經常的和有用的勞動者；因此他在一八三〇年決心根據歐

文的原則嘗試一些適合於環境的改革。當時約有四十個農村勞動者同意他的計劃，於是他把他們組織成一個會社在他個人的領導與監督之下。他把他的刺拉根地產租給這個會社，刺拉根地產有六一八英畝（一英畝等於四〇·四九亞爾）其中約有二六七英畝為牧場，二八五英畝為耕地，六十三英畝半為沼澤，二英畝半為花園。地質平均是優良的，只有一些地方是沙地。此地有六間茅屋及一所舊的莊宅，作為住屋分給結婚的人居住，同樣還有別的經濟的建築物，豬圈倉庫等等，這些建築物一部分拿來作食堂、會議室、學校及兒童和未婚者的寢室之用。他把所有這些建築物租出去每年取租金七百金磅，這些建築物中還包括有鋸木廠、水力打穀機以及作為工廠和紡織工廠用的房屋，但是沒有機器。在收割前在購置活的和死的用具上，在供給飲食和衣服上，社員還要支付二百金磅。他們必須住在公共的適當的房屋內，並以公共的資本為公共的利益而共同勞作。剩餘物就是十七歲以上的全體社員的私有財產，并在男子與婦女、已婚者與未婚者之間平均分配。工具、器具及機器必須嚴格地保管，而損壞的就得加以修理；牲畜的數量及價值不得減低。租金必須用地產的出產物來支付；在第一年租金照里摩黎克（Limerick）地方的市價計算，在往後的年度中應得的自然物如裸麥、牛肉、豬肉、牛油等等其數量同第一年一樣；無論公社進行了何種改良地租都不能增高；他還允諾立一地租相同的長期租約，於是他們就可積聚足以購買農具的資本。

「直到現在瓦達乃爾仍舊是地產的所有者。租金已比他從前得到的高得多了。在一八三一年租金的登記

爲數九〇〇金磅，在一八三二年收益幾等於一、七〇〇金磅；購買食物、衣服、種子等等，公社在這一年耗費了五〇金磅。築建房屋的臨時貸款、備辦家具以及這一類的事就把剩餘花光了；但是幸福是增加了，而且奠定了成功與幸福的基礎。

「公社社員必須同樣長期地勞作，並從公共出納處獲得同樣工資，好像他們是簡單的僱傭勞動者，他們並不積聚私有的資本。公社的書記因此每天要把每個人做了多少工作，記入工作簿內，在一星期終了每個人在他的工作上都得到從前瓦達乃爾所付的那樣多的工資。分紅的希望是對工作的一種強有力的鼓勵，人們一天生產的比附近的僱工多兩倍，公共出納處付出的工資是一種勞動券，此種勞動券只是在他們自己的消費店內纔被收用。這就給土地所有者有可能經營，而無須現款，並抵制了酗酒，因爲在消費店內不許有酒精飲料，而在旅館內又不收用勞動券。

「消費店堆有上等的貨物，這些貨物都照批發價格出賣。按照愛爾蘭的風俗習慣，馬鈴薯和牛乳是主要的食品，由公共出納處所付出的總額比較小；但是公社社員從自己的組合中得到的便宜卻把他們的地位很高地提高，到他們那階級的生活水平線之上。男子每星期得四先令，他們的費用是：菜蔬，即馬鈴薯一先令，牛乳（十夸特）十辨士，洗滌等等二辨士，醫藥費二辨士，衣服一先令十辨士。婦女每星期得二先令六辨士；她們買菜蔬耗六辨士，牛乳八辨士，洗滌等等二辨士，醫藥費一又四分之一辨士，衣服一先令又四分之三辨士。已婚的社員，單獨居

住，每星期付給公社六辨士的宿費及約二辨士的取暖費。所有兒童從十四個月年齡起，就由公共出納處出費養育，不由父母負擔。到八九歲就送入兒童學校，以後就和未婚者在一起居住。剛成年的人並不從自己的工資中支付宿費、取暖費、講義費、學費及娛樂費。他們購買貨物要賤一半（百分之五十），而且在自己的消費店內得到比任何地方都好的貨物。每個社員都可常常計算工作及經常的工資，生活資料的價格在消費店中仍舊不變。病人及殘廢者從醫院的出納處得到全部工資。父親死後家庭也有保障。

一社員人數漸漸增多兩倍。住宅及設備都很清潔而舒適，食物精良而又簡單，並且還儘可能採用機器於每個生產部門。公社中凡年在十七歲左右的兩性青年都要輪流服務。勞動時間在夏天從早上六點繼續到晚上六點，中膳時有一小時休息。每天晚上召開管理委員會，以便規定次日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儘可能的個人的偏好和能力。要求年青人除學習農作之外還要學習一些有用的手工業，並且每個人，無論他在公社內的經常職務是怎樣，都應幫助田間的勞作，尤其在收穫時期。商店經理分配食物、衣服等等，園工則分配果品。瓦達乃爾出賣剩餘生產品而購買對於經營及消費商店所必需的生產品。一切爭端都由公斷解決，三年來的共同生活不曾有過一次求助於律師或公斷人。克賴格，他是瓦達乃爾的熱心而有能力的助手，他敘述刺拉根的訪問者們在能夠馴化處於貧困、鯁鯁地位的野蠻的愛爾蘭人需要清潔、健康和幸福的此種制度之前，表現出何等的驚異。

「他很痛心地敘述這個公社正當牠有了迅速成功的時候怎樣忽然地被破壞了，破壞的原因是怎樣令人

悲痛。瓦達乃爾是一個貴族，在他的全部品質中有一點貴族的缺點。賭博破壞了他，他的家庭，他的事業。他逃出他的故鄉，他的債權人登記他的全部財產，他們不調查刺拉根勞動者的權利，而竭力覓求賠償。公社未曾註冊，瓦達乃爾也未曾和他們訂過租約，因此法律不予這個公社以任何的保護。」

北美洲的共產公社，同刺拉根一樣有力地證明農村經濟中協作生產能夠達到何種優越的結果，勞爾德霍夫在其論這些公社的書中屢次指出，這些公社的經濟在強度工作及合理的利用現有的力量方面都勝過牠們的鄰居。優越的農學促進牠們（這些公社的經濟）的成功也不少。勞爾德霍夫關於亞馬公社說：「他們是特出的農業經營者，他們有良好的牲畜，他們像德國人那樣的精細來照管這些牲畜，在冬季他們就把牲畜飼養在廄內」（四〇頁）。賽凱爾「平常有莊麗的倉庫，和工作的一切設備都布置得最好而又最方便……對於農村經濟，他們不惜任何的勞苦；他們長期地，一年復一年地在土地上耕作，清除土地上的沙石，以便獲得良好的耕地。他們愛做需要仔細照顧的種植，如園藝種子的栽培。他們有肥壯的牲畜，他們的經濟的建築物一般都很能適宜於勞作的節省」（一四九頁）。

「美洲至善論者（Perfectionist 即「聖經共產主義者」）一八三一年在美國發生的一種教派，排斥聖禮，不承認教會的組織，牠認為一切的成員都是平等的并規定財產，妻子與兒女的公有；他們住在紐約；從一八七九年起結婚方式也為他們所取締——譯者註）的農場，管理得很好」（二七八頁）。「我不應對這個事實默而

不言，（在亞佛羅爾公社內）公園、葡萄園及花園都培植得很好而且很合理……我不懷疑，亞佛羅爾公社的經營，牠的果樹園和其他有價值的種植比一切私人的企業要便宜兩倍」（三一九、三二三頁）。

畢索吉爾拓殖區「在一八五九年佔有一〇、〇〇〇英畝土地，用籬笆圍起來以示區別，且處於最優良的地位，他的社員都有很好的牲畜」（三四六頁）。這種情形并不是例外。勞爾德霍夫在其緒論中說明農村經濟的優良狀況是共產主義拓殖區所有的特徵之一」（四一五頁見The Communistic socie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已經足夠證明農業勞動并不與經濟底協作形式立於矛盾的地位。雖然如此，可是農民并不真正企圖把協作經濟的形式應用於他的活動範圍，要找牠的原因，也并不困難。

誰都不會斷言，工業勞動不必在協同組合的原則上也能極順利地進行。可是我們卻看見，手工業者像農民一樣并未從孤立的生產轉變到協作的生產。祇是在商品流通及信用的範圍內，他們纔企圖在協作社組織的幫助之下利用大生產的好處。在這裏也和在那裏一樣，協作社的大生產只能作為維持不合理的小生產底生存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用大生產來代替小生產。

這是十分明顯的，手工業者不能過渡到協作的生產，他不放棄生產工具的私有權。他們佔有的私有財產愈大，他們愈是能夠用自己的組合創立資本充足的大生產，能夠支持競爭，那他們就愈不願將自己的私有財產變

爲公衆的財產。在近代社會內各種同類的企業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突變，這是一種經驗，每個人在這種經驗中都不能只信賴自己的力量，像勇敢的商人信賴自己的投機事業一樣；他的成功全靠能力，休戚相關及大家嚴守紀律全繫質量，可是這些條件中最後兩個在孤立勞作的手工業者方面是最不發達的。

所有這些條件在農民方面比在手工業者方面更不發達。農民是私有財產的迷信者，這種意見，人們認爲是一種侮辱，但牠（這種意見）卻表現出一般的事實。農民留戀自己的土地比手工業者留戀自己的孤立的作坊還要厲害。由於土地的需要，與人口同時增加，農民對自己的小塊土地的留戀亦隨之增長。在美洲農民爲了要跑到西方去，因爲在那裏還有許多自由的土地，他就滿不在乎地放棄了——至少在不久以前，放棄了他的出息少的地產。在德國和法國農民爲了要保存他的土地，他樂意過困苦生活，爲了要使土地增加，他不惜出任何代價。我們應當想像，在這樣必要的和有利的行動——如將劃界的土地和別人的土地聯爲一連綿不斷的面積——的條件之下會發生怎樣的困難。

這裏我們只說到對於一切參加者都有利的土地交換，此種行動可以強使公社底少數反對者接受。過去一世紀在這一方面會出現「開明」專制，往往沒有絲毫苦痛。但是在現時德國離完全廢除田界還很遠。我們可以想像到，創立農民的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社員不應互相交換土地而應將自己的土地交給合作社，這種企圖是怎樣無望，不能強迫反對份子接受的這種行動是怎樣困難。

農民在本質上多疑，他對協作社也一樣不相信，因為目前生活和勞動條件使他比手工業者更加孤立，而協作的美德在農民當中比在手工業者當中更不發達。

祇有那些除了自己的鎖鍊以外，甚麼也沒有失掉的份子，那些在資本主義生產內，經過了共同社會勞動的學校，為社會的勞動有組織的和資本主義的剝削鬭爭，養成了協作的美德，同志間休戚與其對公共事業忠實極能服從紀律的份子，纔能將協作社的原則採行於生產之內。

不能跳過任何一個發展的階段。大量中等的人不能在正常的條件之下直接從手工業的或農民的經營過渡到協作的大生產。生產工具的私有在這裏就是一種障礙。祇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才替大的協作經營創造出先決條件，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僅創造出喪失了生產工具私有的工人階級，而且也使生產過程成為公共的（生產過程）牠引起了并加劇了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之間的衝突，牠使僱傭勞動者傾向於以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去代替資本家的私有。

不是私有者，而是無產者纔能促進這種轉變。但是這一論據不應理解為，似乎農民與手工業者若要走向協作的生產，其唯一道路便須經過無產階級存在的過渡階級，似乎他們必不可免地要受資本的剝削，似乎在農民與手工業者還存在的時候共同的生產就不可能。這是再錯誤沒有的了。上述論據只是確定，祇有唯一的勝利的無產階級能夠成為共同生產的開創者能夠替農民及手工業者創造出不是像現在所理想的，而是實際的過渡

到大的協作生產的條件。

當社會主義的協作社（那時已不再說是無產階級的協作社了）證實一切希望并消滅在現時還威脅着一切企業的危機，當土地的喪失不再脅迫農民無產階級化，那時農民就會懂得，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對於他只是障礙他過渡到較高的經濟形式。那時他就願意從這種障礙中解放出來。

反之希望農民在現代社會內轉向協作的經濟那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說，對於農民要想藉助於協作社以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大經營的一切優點并藉此鞏固其土地私有權（即鞏固此種正被動搖的現存制度的支柱）那是沒有可能的。農民，一旦懂得，只有在協作的農業生產幫助之下纔能生存，他也就會認識這樣的經濟（即協作經濟）對於他，只有在無產階級能够根據自己的利益組織社會關係的地方，纔能達到。

可是到那時候農民也就成爲社會民主黨人了。

（註一）「其爾根」爲德國古代的土地單位二十四畝，尙有個別地方保存這一制度，但其範圍則各處不同（頁二、五〇〇—九、七〇〇平方里止。）

第七章 資本主義農村經濟之界限

一 統計材料

前章所研究的結果是這樣：在農村經濟的一切重要部門內，大生產在技術上總是高於小生產（雖然不像在工業的主要部門內所達到的那樣程度。）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真理。差不多在十八世紀中葉，當時農村經濟中機器的應用剛剛開始，而農村經濟底自然科學的基礎尚未被人研究，重農學派的開山祖凱恩在其“*Maximes Généralis du Gouvernement économique d'un royaume agricole*”中，即已表示了他的希望：「要使預定為農業之用的土地儘可能聯合為能由財力富足的農業經營者來經營的大農場，因為在大的農業生產之下生活及修葺建築物的用費，與生產成本費比小生產更低，而純收入（*Profit net*）則比小生產更高。」

同樣在那時的英國，許多經濟學家大都是大生產的擁護者，例如楊格（*A. Young*）。亞丹斯密在其國富論一書中發表了一種意見，他認為大地主很少能進行重要的改良，於農村經濟方面，他并不反對資本主義的大生產。而是反對有無數小農場的封建大地產，這些小農場要擔負一切可能的勞役和義務，因此牠們完全依賴地主的

意志。他稱讚自由農民的所有權底優越而反對封建的地產。但是他補充說：「在小的土地所有者之後在每個國家內富足的大農是改良農村經濟的主要先導者」（第三卷二頁）。

大資本主義的（而非封建的）農村經濟產出最高的收益，已成為公認的事實。但是英國的經濟雖可作為歐洲的模範，英國的制度倒不常是模範的制度。剝削農民以利大生產對於君主及政治家尤為危險，因為農民已成了軍隊的核心。英國人并未養了大批軍隊，他們沒有農民也行。但是大陸的國家沒有農民就很難抵抗有強有力的農民的鄰人。此外還有一種說法：在英國農民已為無數既窮困而又暴躁的無產者所代替，牠找不出代表私有勞動者階級的任何對比。資產階級隊伍中的慈善家（他們沒有那末大膽像空想家一樣接近社會主義）正如資本主義剝削底擁護者一樣努力使人民成為生產工具私有制的可靠支柱，所以就成為了農業小生產的辯護者——西斯蒙德和穆勒，「純粹的自由貿易論」者及他們的反對者——地主階級。在一切場合之內他們通常都不承認小經營具有技術的優越，但是在同意了大生產能產出較多的利益之後，他們同時又指出牠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危險。西斯蒙德在其“*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一書中感嘆地說：「一方面，最新的經濟學家，另一方面，最有經驗的農業家都不停地稱讚財力充足且有智識的農人，進行大經營；他們對於這些農人底建築的範圍，工具及器械的改良，牲畜的肥美都很驚訝。他們只注意物，而忘記人，他們甚至忘記計算他們。英國一平方哩計有六四〇英畝；這就是英國最富的農莊底大概範圍。從前的經營，一家的成員就能勝任，沒有僱工，

沒有外人幫助而且也沒有假日，這些經營，保證家庭每個人在一年內每天都有工作，他們（經營）所佔地面每個至多六十四英畝。爲了要從這些經營中構成一個新的（經營），就需要十個這樣的經營。爲了要把位置給予新制度的一個農人，十個農民家庭就被驅逐。西斯蒙德反對大生產，是因爲牠（大生產）造出無產者，而不是因爲小生產能夠提供大量優良的生產品。

從那時候起新興的大的農村經濟更加發展了，但是有些經濟學家恰恰在這時纔出來承認農業小生產和大生產的權利平等，甚至還有些經濟學家，他們在七十年代自己預言了農業小生產無生存能力，現在卻預言大生產的毀滅，例如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就是這樣，或者他們承認，何種生產形式爲最合理，至少還是一個待爭論的問題。在本書緒論內我們曾引了宗巴特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這位研究家，他在這一問題上的公正態度是誰都不會否認的，如果他沒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便不致發揮他的意見。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這些事實不應在農業範圍內去找，牠們是取之於統計中。統計指示出，農業小生產在和大生產鬭爭中的迅速消滅，并未發生。大陸上許多人自從資本主義生產大規模發展時（約在五十年代）開始，即已像在英國一樣期待着與惱懼着農業小生產之迅速消滅。然而相反的，在某些地方小生產所佔的土地面積甚至有迅速擴大趨勢。例如德國的生產統計中所指示的就是這樣。

農業經營	經營數		增加或減少	農業生產的面積以海克塔爾為單位		增加或減少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少於二海克塔爾	六,〇六,八二二	四,三三六,六七七	(十) 一四,三三六	一,八五,八八八	一,八八,四四四	(一) 一七,四四四
二—五海克塔爾	九一,四〇七	一,〇二六,三三八	(十) 九一〇,九二一	四,二〇,三三三	三,二八八,九四四	(十) 九八八,六一一
五—二〇海克塔爾	九六,六〇五	九八,七〇〇	(十) 二,〇九五	九,二天,五五	九,五三,八七五	(十) 三二,三二〇
二〇—一〇〇海克塔爾	二天,五〇〇	二天,七七七	(十) 二七七	九,六八,二七	九,八六九,八七	(一) 一八七,六〇〇
一〇〇海克塔爾以上	四,九二	三,〇六一	(十) 一,九一五	七,六六,三五	七,八四一,八〇一	(十) 一七五,四五

法國并不完全在同一的方向之內發展。那裏的統計如下：

農業經營	經營數		增加或減少	農業生產的面積以海克塔爾為單位		增加或減少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少於一海克塔爾	三,一七,五七	二,三三,四五	(十) 八四,〇二	一,〇八,八三	一,四七,三五	(十) 三八,五二
一—五海克塔爾	二,八〇,八八	一,八元,三五	(一) 九八,五三	五,五七,三〇	五,四四,二〇〇	(一) 一三,一〇〇
五—一〇海克塔爾	九六,三五	九六,二九九	(十) 一〇,一〇	五,六八,六四〇	五,五五,六〇〇	(一) 一三,〇四〇
一〇—四〇海克塔爾	七五,三三	七二,二八	(一) 三,〇五	四,八四,六三〇	四,三三,四二七	(一) 五一二,二〇三
四〇海克塔爾以上	二四,〇八	三六,六一	(一) 一二,五三	三,三三,一〇五	三,〇九,九五	(十) 二三,一五

德國中等的（照牠們所佔的面積而言）經營在大多數場合之內都增加了，而在法國所增加的則是最大與最小經營底面積，中等經營就數量言及就面積言都減少了。但是此種減少并不大。自然這裏要把自耕農的經營（一〇——四〇海克塔爾）除外。在一切場合之內進化并不迅速。

在大不列顛我們看到：

農 業 經 營	經 營 數		增加或減少	農業生產的面積以海克塔爾為單位		增加或減少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五年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五年	
一—五 英畝 (〇.四—二 海克塔爾)	三、七、七	二、七、九	(一) 三、七、六	六、九、六七	五、六、七五	(一) 三、八、八
五—十 英畝 (一—二 海克塔爾)	一、八、八	一、九、八	(十) 一、〇、三	一、六、六、七	一、六、七、〇	(十) 一、〇、三
一〇—一五 英畝 (二—三 海克塔爾)	六、〇、二	六、六、六	(十) 一、五、四	三、八、四、〇	三、八、四、九	(十) 〇、九、九
一五—二〇 英畝 (三—四 海克塔爾)	四、七、五	五、〇、五	(十) 一、九、〇	四、七、八、〇	四、八、〇、〇	(十) 一、九、六
二〇—三〇 英畝 (四—六 海克塔爾)	九、五、五	八、三、〇	(十) 一、二、五	一、六、六、九	一、六、八、九	(十) 三、七、四
三〇—五十 英畝 (七—十 海克塔爾)	一、八、八	一、八、八	(一) 三、〇、七	三、四、一、六	三、二、九、八	(一) 三、七、三
五十 英畝以上 (十 海克塔爾以上)	五、九、九	五、三、九	(一) 三、七、〇	四、〇、九、八	三、八、〇、〇	(一) 三、八、七

同德國一樣，我們在英國也看到中等經營的增加。可是在德國就所佔的地面而言增加最多的是由二至二

○海克塔爾的經營，而在英國則是由四〇至一二〇海克塔爾的經營，自然誰都不能把牠們算作小經營。最小的經營被減少了，但和德國相反的，就是一二〇海克塔爾以上的最大經營也減少了。

各派經濟學家如賽弗爾邁耶爾博士及其他的人都想從美國農村經濟的材料中證明在美國農村經濟內大經營爲小經營所排擠。我們倒也願意順便觀察一下關於這個地方的統計數字。的確，中等農場從一八五〇年起已減少了。其情形如下表：

一八五〇年.....	二〇三英畝
一八六〇年.....	一九九
一八七〇年.....	一五三
一八八〇年.....	一三四

但是在一八九〇年牠又重新增加了，且等於一三七英畝。

中等經營底此種暫時的減少，主要，當然是由於南方大的種植場的分散所致，此種分散乃是黑奴解放的結果。例如從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這個時期，中等農場減少了：在佛羅里達 (Florida) —— 由四四五英畝減至一〇七英畝，在南卡羅林納 (South Carolina) —— 由四八八減至一一五，在阿拉巴瑪 (Alabama) —— 由三四七減至一二六，在密士失畢 (Mississippi) —— 由三七〇減至一二二，在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

由五三七減至一三八，在得克薩斯 (Texas) —— 由五九一減至二二五英畝。一般講來，中等農場在大西洋沿岸諸州內在同一時期內（即一八六〇至一八九〇——譯者）由三五三減至一三四英畝，而在中南部諸州內則由三二一減至一四四。沒有一個很懂事故的人會在這些數字中看出小生產的勝利超過近代大生產之上。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農場範圍顯著的減少在舊式耕作的地方——在北部沿大西洋岸的各州內。那裏，（大西洋沿岸北部諸州，）最近十年來中等農場不斷地減少下去。但是此種減少主要是由於農場所佔的荒地底減少所致，而不是由於經營範圍的縮小。下邊就是關於大西洋沿岸北部諸州的數字：

	農場一般的範圍	其中未耕作的土地
一八五〇年	一三三英畝	四三英畝等於三八·四四%
一八六〇年	一〇八英畝	三九英畝等於三六·一八%
一八七〇年	一〇四英畝	三六英畝等於三四·四七%
一八八〇年	九八英畝	三一英畝等於三一·七七%
一八九〇年	九五英畝	三一英畝等於三二·五二%

荒地百分數的增加在最近十年內和農村經濟的衰落相符，是在農場總面積減少中表現出來。農場總面積在上述的區域內由六七、九八五、六四〇英畝（一八八〇年）減至六〇、七四三、五二五英畝（一八九

（年）也，就是說減少了，比五百萬還多。

在中北部一帶的諸州內——即生產小麥的各州——情形則相反，中等農場在一八八〇與一八九〇年之間由一二二英畝增至一三三英畝。大經營數量的變動表示出在同一方向（中等農場的變動所指示的方向）內的進步。這個數量，自然，在整個聯邦內相對地減少了一些。可惜，一八七〇年的數字與最近的數字不能相比，因為當時農場是按照牠們中已耕作的土地面積分類，而在一八八〇及一八九〇年則是照牠們所佔有的全部面積分類。其情形如下：

增 加	農 場		其中從五〇〇—一〇〇〇英畝	一〇〇〇英畝以上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四、〇〇八、九〇七	四、五六四、六四一	七五、九七二	二八、五七八
			八四、三九五	三一、五四六
			一一・〇%	一〇・三%
			一三・八%	

大經營之增加很顯然是比一切其他的經營之增加落後，但是此種現象祇是以前使用奴隸的各州進化的結果那裏進行舊式的落後的種植經營已成爲不可能，同樣也是在貧瘠的東北一帶農村經濟衰落的結果。
靠近大西洋的北部諸州內，農場計有：

	總數	其中五〇〇—一〇〇〇英畝	一〇〇〇英畝以上
一八八〇年	六九六、一三九	四、一五六	九六四
一八九〇年	六五八、五六九	三、二八七	七三三
減少	五·四%	二〇·九%	二三·九%

這裏大經營的數量比小經營的數量減少得更快。後者很牢固地支持着他的絕望的地位。這是否為小經營的優點，是值得令人懷疑的。

靠近大西洋的南部諸州內，農場計有：

	總數	其中五〇〇—一〇〇〇英畝	一〇〇〇英畝以上
一八八〇年	六四四、四二九	二五、〇三七	九、七一八
一八九〇年	七四九、六〇〇	二一、七三六	八、〇三〇
增加	(+)	(-)	(-)
減少	(-)	一七·二%	一七·四%

在中南部諸州：

	總數	其中五〇〇—一〇〇〇英畝	一〇〇〇英畝以上
一八八〇年	八八六、六四八	二五、八七二	一一、六五九

增	一八九〇年	一、〇八六、七七二	二六、六六六	一一二、二九五
加		二二・五%	三・〇%	四・六%

另一方面，在西部則為：

增	一八八〇年	八三、七二三	五、二九九	三、二四七
加		一四・五、八七八	九、二六九	六、〇二〇
增	目	七四・二%	七四・九%	八五・三%

最後，在出產小麥的中北部諸州內，計有：

增	一八八〇年	一、六九七、九六八	一五、六〇八	二、九九〇
加		一九二三、八二二	二三、四三七	四、六六八
增	目	一三・三%	五〇・二%	四九・四%

這些最近的數字恰恰完全不是表示大生產的衰落。在美洲，近代農村經濟發達的地方，大經營的面積迅速地增加起來。祇有在農村經濟衰落，或在資本主義前期的大經營出來和農民的經營競爭的地方，小生產纔保持

着優勢。

總之，如果在美洲，農村經濟的發展直到現在，都比歐洲迅速，而且比平常人們所想的更有利於大生產，那麼這裏并不是說小產業爲大產業所排擠。

可是若從這些數字中或與牠們相類似的數字中做出結論，說在農村經濟中經濟的發展好像走着完全另一個方向，與工業中不同，那就太輕率了。

數字證明着！試問牠們證明着甚麼呢？首先牠們證明的祇是直接說到的東西，但是這種情形在統計學的推算之下是很少有的。舉例說，有些數字當然證明民衆的幸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是增加了。可是，這裏是根據儲蓄銀行存款總額的增加。這些數字是無可爭論的。但是牠們無可非難地證明着什麼呢？牠們證明儲蓄銀行中存款增加了，不多不少剛剛證明這一點。牠們使我們於完全不知不覺中丟開牠們增加的原因。

幸福的增高可以，但不一定必然隨着這種增加而來。各種的原因都能引起一個同一的結果。

例如，儲蓄銀行存款手續簡便也可以使儲蓄銀行的存款增加。從前印度人把自己的積蓄埋藏在地裏。現在在東印度設立了許多儲蓄銀行，印度人就寧可把自己的積蓄放進那裏。難道這證明，印度人現在有可能多多地儲蓄便是他的幸福增加了嗎？印度人長期的不能飽食暖衣并未證明這一點（即指幸福的增加。）

在歐洲儲蓄銀行發生最早。但是這裏存款於儲蓄銀行的有利條件繼續增加，不多費時間，這一方面，由於農

村儲蓄銀行數目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城市人口繁殖，在城市中對於和儲蓄銀行來往有着更好的條件。

僱傭勞動者，官吏及其他職員的人數增加的確也能促進儲蓄銀行的存款增加。小農用自己的積蓄來購買土地，獨立的手工業者則用來改善作坊。爲工資或薪俸而勞作的人，他不知道更好地使用他的少數積蓄，除了把牠們存放在儲蓄銀行內。

因此獨立小經營爲資本主義企業所排擠與儲蓄銀行存款的增加有關。這樣看來，銀行貯蓄增加是正在增長的無產階級化底結果；牠是和民衆幸福的降低攜手並進的。

最後，像這一類的增加可以從經濟行情的簡單變動中發生。在商品生產方式之下，對於每一種企業，對於每一個家庭經濟，都有一定的期間，在這一定期間內要用很多的費用來生產，因此對於這樣的場合所必需的金錢，應當很早就從經常收入中儲蓄起來。在銀行及儲蓄銀行制度未發展以前，這些貨幣的數額當然是當作死的存款放着。而現在在不需要牠們的時候，就可以拿牠們去放利。各個企業及家庭經濟爲着某些限期付款——勞動者爲支付房金維持失業期間的生活，——不得不儲蓄的數額愈大，積長每天消費所不需要的最小款項的習慣愈普遍，則儲蓄銀行的存款亦愈多，但幸福并不隨之增加。

所以，關於儲蓄銀行的統計材料其本身對於幸福的增加這一問題還沒有給以答覆；牠們不曾解決問題，而僅止將問題提出而已。

例如，所得稅的數字（牠們也一定明顯地無可爭辨地證明幸福的增加。）其情形也是如此。實際上牠們本身祇證明牠們所要證明的東西，即是在某些條件之下必須納稅的最小收入的數目及免稅的收入底數量增加得并不像最高收入的數量那樣迅速。不言而喻的這固然可以表示幸福的增高，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幸福增高的必然結果。如果生活資料的價格，房價等等比收入增加得更快，那末後者（收入）的增長會與幸福的降低同時並進。

別的條件也可以產生同樣的情形。我們且舉例來說，比方，小農有四百馬克收入。他完全不付房金而且自己生產生活資料的大部分。他可以十分優裕地過活。不幸的機會把他推進無產階級的隊伍中；那時他不得不移居城市他在城市內找到一個位置，一年可得八百馬克的收入。他的收入增加了兩倍，可是他的地位反而變壞。他必須支付房金，或者支付到達工作地的來往車費。牛乳、雞蛋、菜蔬、豬肉，這些東西在從前不值什麼錢，現在他卻必須付出很貴的價錢，兒女不能赤腳走路，衛生上不良的條件使他多花一些醫藥費。但是在收入底統計家看來，這樣的人所處的地位比從前好兩倍，他有現成地無可爭辨的證據，即是人民的幸福在不斷的增長。這裏所引的這個場合是值得注意的；自然經濟之轉變為貨幣經濟及城市人口的增加替代了農村人口的增加，都是不斷地完成着。這兩個過程就已經夠說明人民的收入增加而幸福并未有絲毫的提高。

內的消費增加也可作如此了解——這我們在上面另一章內已經說過。

統計材料無可爭辨地證明近代社會被捲入在不斷的及迅速的變革中，并使我們認識牠的一些表面的無數的表現，徵候及結果。牠們給我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藉以發見在整個過程基礎上所有的傾向，但牠們還沒有把這些傾向給我們解剖開來。

那些證明小的農業經營不是衰落，而是發展的數字，同樣還是沒有給我們以可能去判斷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而是激起我們去深刻地研究牠們。這些數字一看就祇證明給我們進化的過程完成得不像直到現在人們所常想的那麼單純，但是這個過程在農村經濟中，很明顯地，比在工業中更其複雜。

二 工業中小生產的衰落

近代工業進化的進程已經複雜到最高限度，雖然這個進程比在農村經濟內卻簡單得多；這裏各種不同的傾向在極不同的方向內相互影響，而且往往在這個漩渦中要費很多周折纔能分別出基本的傾向。

大生產不是同時出現於工業的一切領域之內。牠征服這一領域後再征服另一領域。在牠（大生產）成爲支配的生產的地方，牠就排擠最小的企業，但是從這裏還不能跟着就說，一切小的企業家都成爲工廠勞動者。他們投到別的生產領域（在那裏大生產還未佔統治地位），并且充滿這些領域。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競爭同樣破壞那些大工業在其中還未成爲統治的工業的生產部門。但是這一過程并未常常以小企業數量之普遍減少。

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過程在某些地方反而引起小企業數量的增加，因此，根據赤裸裸的統計數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小經營在這裏得到了特殊的發展。有無數貧困的小經營的領域內，近代資本主義剝削式的家庭工業的出現及迅速的發展，找到最好的條件。資本的出現在這些條件之下，可以引起小企業的總數不致減少，反而強有力的增加；但是誰若懂得在統計數字後而隱藏着的許多社會條件，那他就不看出在這些條件內和大資本競爭會有勝利的爭鬥。

但是同樣在機器佔統治地位的那些領域內，大工業的進攻也不是一定要引起小生產的消滅，機器破壞牠們，使牠們在經濟上成爲多餘的東西，但是這些陳舊的工業形態，在爲生存而鬥爭中所表現的倔強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饑餓與過度的勞動延長他們垂死的鬥爭到極點。西列細亞及薩克森手織工的窮困在一百年以前已成話柄，可是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死絕。如果他們已經沒有可能維持生產，那時他們就轉到對於大生產沒有多大價值的別種活動或者作大生產的代理人及仲介人藉此糊口。

近代國家底德謨克拉西形式，也可以說是，宜於保存漸歸消滅的小生產的一種機構。

國家政權，基於政治理由想去保護那些已喪失了經濟均勢的社會階層，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衰落時代的古代羅馬的宗教法院無論怎樣沒有用處，但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仍不得不去保護她（宗教法院）在現時我們也有同樣的例子，如「高貴而優秀的」貴族階級，牠從十七世紀起就成爲贅疣，更加無用，但是由於牠服從國王

的專制政權，於是貴族就替自己造成吮吸社會血汗的寄生蟲的地位，要廢除這些階層就需要革命。

但是此種寄生的生存之傳統在東歐還很厲害，我國貴族地主像兩千年前羅馬城市賤民一樣，也會顯露自己；但他們自己的要求卻沒有那些賤民的謙遜。他們不以乾麵包爲滿足，他們供人觀覽的東西，比國家爲羅馬宗教法院所置備的那些東西還值錢。由於特殊的階級尊榮，他們從自己當中提供一些角鬪士。

在他們向國家提出要求中，他們找到一批有用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徒。自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已經覺得自己是無產者，牠和僱傭勞動者聯合，以便爲自己，乃至爲自己的子女爭得較好的生活條件。另一部分則想得到較多的東西，替政府服務來保衛國家。統治階級需要這些份子，在普選權之下需要能夠抵抗無產階級進攻的廣大人民階級，他們準備收買可以收買的那部分小資產階級。這不是一些好的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誥誡政府：他們純然是一些保皇黨人，但如果他們得不到社會的特權，那他們就變成社會民主黨人了。在這樣恐嚇之下就真正表現出流氓的思想方式，但是誰需要這些護衛軍，那他在選舉中就難以取悅於人。如果在一八四八年統治階級慫恿浪人去打擊工人，那麼爲什麼現在就不會慫恿那部分情願幹這種下賤工作的小資產階級去打擊他們呢？實際上小生產的生存——如給商人以特權去剝奪消費者，給行會老板以特權去剝奪他們的學徒及師傅，給他們以便宜的信用，便宜的保險等等去剝奪納稅人——是靠勞動者來維持，而不是靠大生產來維持。

階級鬭爭愈尖銳，社會民主黨的威脅愈大，則政府亦愈偏於保證經濟上已成多餘的小生產靠整個社會的

寄生生活。小生產消滅的過程，因此，可以延緩下去，有些希望——牠們被政府的誓約和方法所激勵，並且牠們鼓動小生產繼續無望的鬭爭——也幫着延緩這個過程，假若沒有這種情形，那無望的鬭爭也許早已放棄了。可是任何一個深謀遠慮的人並不能在這裏看出馬克思「教義」（牠只涉及經濟的趨勢）的什麼矛盾。

如果國家幫助統治階級，還維持着某些時期在經濟上不能立足的形式，因而減輕小生產的沒落，那末這些階級的奢侈，在同一方向內所起的作用也不亞於政府的幫助。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即表示剩餘價值總額之增加，不僅是被積疊的資本之增加，而且也是資本家底收入之增加，同時也是資本家的浪費之增加。可是，這種情形又會引起在經濟上早已失敗的封建形式之復活。例如，財政貴族及大地產的所有者替自己備有狩獵區域，其範圍與中世紀的森林區相等。從馬克思資本論中明顯地看出，這個階級是何等粗暴而驕傲，牠不愛惜金錢，就是愛惜人也似乎是可笑的，爲了要起初用羊隨後用鹿來代替土地所有者，就把牠們從蘇格蘭（Scotland）的廣大區域中驅逐出去。現在在法國、德國及奧大利各部都發生同一的過程。在奧大利根據恩德賴斯（Endres）在政治學教科書中的材料，森林所佔的面積從本世紀（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差不多增加了七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爲全面積的七·五%，其中阿爾卑斯山及沿海區域就佔了六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從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開墾了三、六七一海克塔爾林地並且有五九、〇三一海克塔爾又作爲森林地之用。

在法國私人佔有的森林地，其所佔的面積在一七八一年總數爲六、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一八四四年減少到四、七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現在又增至六、二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然而這個數字還沒有把亞爾薩斯羅特靈根的喪失計算在內。

可惜，在德國一八九五年的戶口調查和一八八二年的戶口調查比較，就不可能，因爲在一八八二年所計算的森林地是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反之，在一八九五年的調查內則將全部森林業都計算在內。

我們在泰芬論奧大利社會貧困及統治階級一書中看到許多個別的例子，即在奧大利，不僅荒地，而且草地及耕地都包括爲森林地。有一種場合は值得注意的，即在薩爾斯堡 (Salzburg) 有角獸的數量自一八六九年至一八八〇年減少了一〇·六%，而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又減少了四·一%，這主要是「由於將阿爾卑斯賣給狩獵地的所有者」(Drill, Die Agrarfrage in Oesterreich)。

封建社會因資本主義收入的增加而產生的另一特點，就是他們有大批供私人使喚的無數女僕與男僕，他們的一種制服類似過去幾世紀并表示出此種現象與十九世紀的精神矛盾。供有錢人個人使用的生產品，寧可要手工勞動製造而不願要機器製造，這種偏好也適合這些封建傾向。供大眾消費的機器生產，爲大家製造出同樣的東西，牠不適用於個人的嗜好及需要，牠對於有錢的貴族是太平凡了。還有一個場合，就是手工勞動和機器比較，手工勞動——勞動力的過度浪費，使這種工作更有價值并可作爲一種最好的手段把牠的購買者提高到

一般平民之上。

這樣看來，手工業除了家庭工業及近代生產諸部門中最可憐的部門以外，還有一個最貴族的部門，即最貴物的物品的製造。但是手工業這一部門像家庭工業一樣，在大資本權力之下會沒落下去。品質優良的生產品之生產，無論是衣服或鞋子，紙或紡織品，菜蔬或水果，都需要特殊的工藝，費很多的勞動，優良的生產工具，而所有這些東西又需要金錢，很多的金錢。如果統計家把製造品質優良的生產品的作坊歸列到小生產的一類，那末經濟學家就把牠們歸列到需要花很多資本與用資本主義方法剝削最熟練的手工業勞動的那一類生產。在許多場合之內，他們是把工藝降到資本主義工業的階段的一種手段而不足以引起手工業之新的繁榮。

但是這種情形即使不是如此，可是假如希望從資本主義浪費的增加中去復活小生產，那也是愚蠢的。浪費的增加以大工業，大量的生產之經常的和迅速的增加為前提，因此也要以小生產之不斷的受排擠，無產者之不斷的增加為前提。在各個地方，在各個生產部門內，資本家的浪費可以引起小生產之某種繁榮，但是資本家的浪費，并不能對全世界都造成這種情形，因為此種浪費無論在其本國，或在其他國家內，其本身是人民羣衆之繼續不斷的無產階級化之產物。在過渡到品質優良的生產品之製造中替手工業找出一條安全的道路，道正如那像說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有使某些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已佔統治地位的民族回復到狩獵生活的傾向歸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樣。道不難用統計來證明。

所有這些並非證明「馬克思教義」之不足信，而是證明爲各種對立的傾向所交互錯綜的小生產消滅過程之極度複雜。可是這些傾向，只是延緩小生產的消滅，在某些地方好像變爲牠的相反的方面，但實際上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可能去阻礙這個（小生產消滅的）過程。

三 土地之缺乏

在工業中使過程暗昧的那些相反的潮流和傾向在農村經濟中也要加以觀察；但此兩者的相似是很明顯的，我們無須對她多說。可是農村經濟中還表現出爲工業中所沒有的這樣矛盾的傾向，而且整個過程還要更複雜。

這裏我們要來考察一下祇在農村經濟中而不在工業中表現的諸傾向。第一，我們看見的就是那種區別，即在工業中生產工具之增加不受限制，而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生產工具，土地則不然，在某種條件之下，土地的大小是經常的，不能任意加增的。

就資本方面而言，顯然有兩個大的潮流：積累與集中。積累——剩餘價值底結果。資本家並不耗費他的全部利潤，而祇耗費其一部分；在尋常條件下他留起一部份并使之流通，藉以增加他的資本。這個過程和許多小資本變爲一筆大資本的過程——和資本的集中化相交錯。

土地方面的情形便完全不同。在舊文明國家內還可以拿來耕作的土地數量是很少的，我們不能拿牠來和一年復一年爲資本家所積疊的數額相比。大地主祇有經過集中，即將許多經營聯合爲一，纔能增加自己的地產。

在工業中積疊底過程可以不依賴集中的過程，前者甚至常常在後者之先。大資本的構成，大工業企業的創立不一定隨着就排擠小資本，剝奪小生產的獨立性。後者（排擠小資本，剝奪小生產之獨立性）往往是大工業企業構成底結果，而不是牠的前提。要在某個地方創立製鞋工廠，沒有必要去剝削當地的鞋匠。祇有在製鞋廠存在而且興盛的時候，牠纔會引起小製鞋業的破壞，并爲大製鞋廠所剝削。積疊的過程，未被消費的利潤中新資本增加的過程，正是替製鞋工廠的創立造成大資本。

反之，在一切土地已變爲私有財產的地方，在小的土地所有權完全佔統治的地方，那裏對於農業經營者最重要的工具——土地——祇有經過許多小的土地所有權之集中，纔能轉變爲大的生產方法。許多小經營的消滅在此地是大經營出現的必要前提。但是，除此以外，要經過集中來組織大的經營，就必須把許多被剝削的小地產聯合爲一總而積。在抵押銀行內一年中可以積聚起幾百被拍賣的農民地產；可是他（抵押銀行）不能從這幾百個農民地產中造成一個大地產，因爲這些農民的地產分散在各地。銀行仍舊祇好個別地將牠們出賣。甚至如果對於小地產容易找到買主，就把牠們分碎，把牠們弄成更小的地產。

當其一切都依着地主的意志而行，他們就很容易把土地用來創立大經營。他們藉助於或多或少假藉的暴

力簡單地把那些阻礙他們道路的農民驅逐出去。

但是保護私有財產，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也是必要的。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經過了牠的革命時代并堅固地確立了牠的統治的時候起，牠就祇承認一種可以歿收財產的根據——無力付債。當其農民能夠將他的債務繳給資本家和國家，他的私有財產就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土地的私有權也就牢不可破。我們看見私有財產權給與農民的保障是怎麼不充分，但她（私有財產權）卻成了大的土地所有權之構成——此種構成乃是農業大生產之先決條件——的一種重要的障礙。

現在在小土地所有權特別佔統治的地方，小經營無論怎樣衰落，大經營無論怎樣勝過小經營，但要構成大的土地所有權就有很多困難。但是在大地產接近小地產的地方，前者也往往不易靠後者來增加，因為小經營的土地，牠們是因需要或別種原因而出賣的，并不常常是那些對於地產的「團團」或擴大所必要的土地。

農業經營者，他的地產在他看來已覺太小，他要設法獲得較大的地產，與其繼續靠偶然的機會去購買他的鄰人的土地，勿寧採取更簡單明瞭的辦法，——出賣自己的地產而購買更大的地產。各個農業企業者的經營的擴大主要是發生在這樣的形式內。在資本主義時代，土地所有權之強有力的動員，農村地產之大量買賣，其原因也就在此。願意購買的人，總是找到願意出賣的人，——我們往後還要說到的承繼權及債務也促成這種情形。

這裏我們祇想確定土地固有的特質在私有財產統治之下，在小土地所有權佔優勢的一切國家內，是農業

大生產（無論牠怎樣勝過小生產）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障礙，是工業所不知道的一種障礙。

四 大生產——并非絕對優良

此外在工業與農村經濟之間還有一種差異。在工業內在正規的條件之下大生產總是高於小生產。很顯然的，在工業內既定的條件之下有一些界限存在着，大生產不能越過牠們（指界限）在威脅之下成爲無益而有害。市場之大小，現有的資本之範圍，現有勞動力之數量，原料之運輸，技術之高度使每一種企業都有一定的界限。但是，那些不能越過此等界限的企業中，最大的企業總是高於最小的企業。至於在農村經濟方面，這種情形祇能到某種階段纔發生效力。差異由此發生。即在工業內生產範圍的每次增大即等於具有一切優點的——時間，費用，材料的節省，監督的便利等等——生產力之繼增的集中。反之，在農村經濟內生產範圍每次增大，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即是在同樣的耕種方法之下等於企業面積的擴大，也就是說，等於在勞動力及物料的搬移上物料的损失，勞動力，工具，時間的耗費之增加。這些條件在農村經濟內有更大的意義，這裏所說的是物料的運輸和牠們的重量及容積——如肥料、乾草、稻稈、裸麥、馬鈴薯等的重量及容積——比較價值很小而運輸的方法和工業比較在這裏又是很原始的。地產愈廣，則監督各個工人亦愈困難，這個情形在僱傭勞動制之下更應值得考慮。

這些損失和地產的增大一同增加，——屠能所製的圖表就說明這種情形，我們在這裏且引屠能的這個圖

表，用米達尺及整數來表示她。塔能計算了各塊土地的地租，這些土地（以一海克塔爾為單位）離家各有不同的距離：

土地離家之遠近 (以米達為單位)	馬				
	二五海克塔爾	二三海克塔爾	二〇海克塔爾	一八海克塔爾	一五海克塔爾
〇	二三	一九	一五	一一	七
一、〇〇〇	一七	一五	一一	七	四
二、〇〇〇	一四	一一	七	四	〇
三、〇〇〇	一〇	七	三	〇	
四、〇〇〇	五	二	〇		
四、五〇〇	〇·五	〇			
五、〇〇〇	〇				

從這裏自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地產愈小則農村經濟收入愈多。但這顯然不是這樣。大生產的利益有這樣大，牠們除彌補遠距離所受的損失之外還有很多贏餘，但這也祇對於有一定大小的面積纔是如此。在某種廣大的限度的生產內大生產的優點比因距離的遠近所受的損失增長得小些，因此，從這一點開始。地產面積繼續擴大

就會減少牠的收入。

一般的說，我們很難正確地規定在牠們以外發生這種情形（指收入減少）的那些界限。牠們對於技術及土地的不同條件以及對於不同的生產部門，各不相同。繼續進化就有拆散這些界限的趨勢；在這一方面內，例如，當動力用的，汽力及電力或輕便鐵道亦具影響；反之，其他的傾向則表現出趨向於地產的最大界限的確定。經營（和牠的面積的大小比較）需要人或勞動獸愈多，重量；肥料，土地的生產物，機器及笨重工具的移動愈瀕繁，則遠距離的影響亦愈易感覺到。我們可以說，經營愈強，投入同等地面的資本愈多，則地產之最大限度的擴張——超過這個限度牠的收入就被減少——亦愈小，但是這個規律時為技術的發展所破壞。

經營愈是強度地進行，則在投入經營內的資本底既定量之下經營所佔的面積亦愈小，這個規律在同樣的方向內也發生作用。深耕的小地產其本身是一種大企業，比廣耕的大地產還大。僅只提到為經營所佔的面積之大小，這種統計，仍舊使我們完全不知道，地產面積偶然減少是否為牠的實際變化所引起，抑為經營的強化所引起。森林業和牧場經營宜於最大的擴張，前者既不需要任何中心點又不需要任何使木材堆積其周圍的木廠，在森林業的廣泛形式之下，森林的砍伐及運輸乃是森林業所需要的唯一工作。木材並不感到氣候的變化，也無須把牠藏在倉庫內。把牠運到市場上去的有利的時間和情況尙未到來的时候，就把牠仍舊放在砍伐的地方。將木材沿河漂流的時候，牠自己會向前移動。

放牲畜於牧場之上，最低限度，在優良的氣候下，像森林中的木材一樣不大需要人們供給營養料，也不需要特殊的安頓；活的牲畜比木材且更便於運輸。

在市場充分發展的地方，森林業和牧場業，像我們已經看見的，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底最初形態，目的在開墾土地。牠們既不需要機器，也不需要學識的管理人，又不需要預先積蓄資本。牠們所需要的祇是各個土地所有者有可能為自己壟斷森林及牧場并強佔農民的私有財產。在許多場合對此有利的地方，就常常發生這種情形。同樣在勞動力少而土地多的殖民地內，森林的開發尤其是牧場業構成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大生產的最初形態；美國、阿根廷、烏拉爾、澳大利亞，情形就是如此。各個牧場的土地在這裏往往達到和德國侯爵領地一樣大的範圍。在澳大利亞曾經有過這樣的情形，即在一個經營內剪切羊毛的羊一年有二〇〇、〇〇〇頭。

農業經營，就其範圍而言，比森林業和牧場經營更受限制。

但是在這裏的最大限度的和中等的廣耕經營的範圍超過深耕中那些範圍底範圍。北美洲生產小麥的經營在前者（廣耕）之中已達到了最大限度；在這些經營內可以遇到廣耕經營之特殊結合及高度發展的技術之應用。

以前，未開墾的土地非常之多，又不歸何人所私有，農業者可以選擇最肥沃的土地，從其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收成隨後，使他的全部土地枯竭以後，就把他遺棄而轉到遠方去。供此種游牧式的耕種之用的有優良的工具

及高度發展的工業底機器，因為購買土地沒有任何必要，農業經營者就可以將自己的全部資本用來購買這些補助的技術工具。

像這一類的經營并不需要肥料。這裏并不飼養許多牲畜，而在氣候許可的地方，無需將牲畜飼養在廄內也行。換種制也沒有必要。年年耕種一種同一的生產品——大部份是小麥——這已是真正的小麥製造廠。在這樣條件之下，有些地產達到極大的範圍。達里姆勃格賴恩等人的巨大農莊已達到一〇、〇〇〇海克塔爾以上這是人所周知的。

反之，在英國，具有其需要飼養很多牲畜的強度耕作，具有其換種制及強度施肥，五〇〇海克塔爾以上的農莊就為數很少，而一、〇〇〇海克塔爾的地產則是最大限度的地產。

美洲的小農經營，像資本主義的大經營一樣，就面積的大小而言，也的確是超過歐洲小農的地產。

在德國佔地二〇——一〇〇海克塔爾的農民，一般講來可算是富農。在德意志帝國於一八九五年時，五、五〇〇、〇〇〇農業經營中就有：

範圍	數
二——五海克塔爾	一、〇一六、三二八
五——二〇海克塔爾	九九八、八〇四
二〇——一〇〇海克塔爾	二八一、七六七

在美國一八九〇年時四、五〇〇、〇〇〇農業經營中有：

經營數	範圍	範圍	範圍
九〇二、七七七	(八——二〇海克塔爾)	(二〇——四〇海克塔爾)	(四〇——二〇〇海克塔爾)
二、〇〇八、六九四	二、二二一、四八五	五〇——一〇〇英畝	一〇〇——五〇〇英畝

這樣看來，在美洲大多數農民的地產就其範圍而言，不亞於德國貴族的地產。

一旦全部土地開始變為私有財產，肥沃的土地底過剩已消失時，則這樣廣耕的經營其基礎也就消失了，農業經營者必須採取換種制來代替換位制，必須以肥料，需要飼養很多的牲畜，並將牲畜飼養在廄內來代替掠奪的耕種。對於像從前一樣的土地面積，農業經營者在現在，就得投下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如果農業經營者既沒有充分的勞動者，又沒有充分的貨幣手段，那他就必須縮小生產。許多大規模的大企業因之就被減少，而巨大的農莊也就完全不能提供利潤。美洲農村經濟之近代的發展其情況就是如此。這些傾向在這個方向內無疑地是有的，不過，牠不像最近幾年人們所斷定的那樣大。因此，我們還不能說美洲大的農村經濟已「將近完結」；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也明顯地指示出這一點。

不過，我們可以承認，美洲的農村經濟，如果牠最後過渡到歐洲的生產方法，那牠同樣採取歐洲一樣大的企業面積。如果技術的發展（例如農村經濟中電氣的採用）并未創造出新的條件——拆散在強度經營之下大地產的最大界限，則巨大的農場在那時就會完全消滅，大經營就不會超過一、〇〇〇海克塔爾以上，而農民的

地產就降到德國中等經營的水平線。總之面積的範圍縮小并不表示是小企業勝過大企業，而僅僅祇是生產更集中在較小的面積上——此種集中，牠是伴着有，而且一定伴着有投入企業以內的資本之增加，同樣從事於這一企業的人數之增加，也就是說，生產範圍之實際的增大。

像從單純掠奪的生產過渡到全靠土地肥沃之繼續保存的有計劃的耕種一樣，廣泛的牧畜經濟，為農業所排擠，在企業的保存或甚至增大的時候，發展着中等範圍的地產減少的趨勢。耕種為強度的牧畜業（此種牧畜業在舊文明國家內還會向前發展）所排擠，在這一方面內亦發生作用。

在英國一八八〇年時牧畜業之平均數擴大到五二·三英畝，農業擴大到七四·二英畝。各類就其大小而言，佔有如下的面積：

每一類經營的土地面積其百分數為：

	不到五〇英畝	五〇—一〇〇英畝	一〇〇—一五〇英畝	一五〇—二〇〇英畝	二〇〇—二五〇英畝	二五〇—三〇〇英畝	三〇〇英畝以上
牧畜業	一七·二	一八·九	四三·七	一三·八	七·二	一·〇	一·〇
耕種	九·九	一〇·二	三七·八	二一·四	一七·〇	三·七	三·七

很顯然地，如果像英國所發生的一樣，農業縮小，并代之而起的是強度的牧畜業，那末這種場合當然要引起農莊面積減少的趨勢。但如果根據這一點就得出大生產沒落的結論，那末這一類的推斷是很膚淺的。其實新近

的數字并未證明農莊面積的縮小。一英畝（這樣的面積也只是在一八九五年纔被登記的）以上的農業企業之平均數在大不列顛一八八五年時爲六一英畝，在一八九五年爲六二英畝，也就是說，這種平均數一般講來，已稍稍被增加了。

由厄爾巴到東部，過渡到最強度的經營，的確也引起大地產耕種面積的縮小。柴林格在其論德國東部之拓殖一書中說：「我國大地產，大多數都十分龐大，可以在全部耕種面積上完滿的管理經營。他們是在這樣的時期發生和發展起來的，當時一般的經濟條件對於每一塊土地還不需要資本與勞動力的集中，牠（資本與勞動力的集中）現在對於個人經濟或國民經濟就很必要。所以邊上的部份，往往佔全面積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現在差不多都廣泛地耕種着，在這些土地上種植扁苳，或者牠們（邊上的土地）好多年用作牧場。在波美拉尼亞強度耕種的地產內（并不是特別豐饒的土地），距離田宅在兩個基羅米突以上的耕地，據一般的意見，已經不能得到什麼利益……由於地產很大，生產資本的缺乏就成爲普通的現象。」

「所以，地產面積減少（將距離最遠的土地出賣或租給小農殖民者）可以在兩方面增高土地底生產力。因爲拓殖可以在同一的面積上增加着經濟中心的數目，可以將完善的耕種法應用於離地主田宅較遠，直到現在不能滿意耕種的那些土地上。在其餘的土地上，那時就可以投下多量的勞動力及資本。這樣看來，所有者，既減少他的負擔，又可得到同一的或甚至比以前他們耕種自己全部地產時更多的收入」（見該書九二、九三頁。）

其結果由厄爾巴到東部，大地產的數目就減少；小農經濟反而增加，但不能由此就說大生產爲小生產所排擠。由此只能說，從前地產的範圍是適合於廣泛經營的需要。

五 大地產

從上述的情形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土地面積的統計所指的一些數字還少有證明。第二，土地集中過程，在地產面積擴大之下（其本身比在資本的積聚與集中之下更其困難），除了已有的條件之外對於每一個個別的企業還有一定的界限。

只有在租佃制佔優勢的地方，大地主纔企圖無限的擴大其個別的地產。在那裏企業與地產并不一致。每一個擁有大地產的地主并不把牠完全讓給企業家，而是把牠分成小塊，使其對於自己更爲有利。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僅要與租地上經營之最合理的管理相適合，而且也要與承租者之資本主義的能力和相適合。在所有者自己藉助僱傭勞動者來耕種自己的地產的地方，在地產與企業相一致的地方，那裏集中的傾向——祇是地產的集合並保證有充分數量的土地，——是在不是傾向於地產的擴大，而是傾向於新地產的獲得之中表現出來。

此種傾向在某些條件之下很有力地表現出來。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在其很有趣味的論地租之降低一書中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解釋。他十分注意地去研究波美拉尼亞大地產的發展，并找出當地最富有的地主貴族

中六十二個地主在一八五五年時佔有二二九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時佔有四八五個地產，其範圍爲二六一、七九八海克塔爾。一個家族——這六十二個地主都屬於這個家族——在一八九一年共計有一二五人，在一八五五年佔有三三九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佔有六〇九個地產，其範圍爲三三四、七七一海克塔爾。此外，有六十二個小康的地主（貴族）在一八五五年佔有一一八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佔有二〇三個地產，其範圍爲一四七、一三九海克塔爾，最後，富裕的資產者中有三十五個地主，在一八五五年佔有二五個地產，而在一八九一年則佔有九四個地產，其範圍爲五四、〇〇〇海克塔爾，而他們家族的全體（有四十七個人）在一八八五年總共有三〇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有一一〇個地產。此外，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又引用佔有一八二個地產（其範圍爲一〇九、九五〇海克塔爾）的七十六個貴族地主，和佔有二九五個地產（其範圍爲一三一、一九八海克塔爾）的資產階級出身的一一九個地主的材料，可是對於他們從前資產的狀況並沒有指示。

這些數字指示出很強烈的集中的傾向，此種集中傾向在少數所有者方面卻出現得很奇突。我們在其中可看到：

地主的姓氏	地產數		海克塔爾	土地稅（以馬克爲單位）
	一八五五年	一八九一年		
貝諾夫·沙賴斯基	一	五	四、〇四七	三八、〇四六

杜赫拉斯伯爵	—	六	一、五九二	二二、八一五
克賴貝·戴伯呂·狄特道夫	三	八	五、六二九	二四、三六五
阿拉敏斯拉根特伯爵	—	八	三、六九二	二五、一〇一
畢斯馬克侯爵	一	九	九、〇四七	三一、六五八
普來赫斯徒霍夫	四	〇	六、二一四	五一、九三七
海琴約爾根卡特諾夫	六	—	四、六三五	一〇八、九六九
霍亨佐勒吉馬林根侯爵	—	—	一〇、九九八	四四、三五〇
島嶼	—	—	二四、五一三	二八、三九九
貝爾賴金達克伯爵	六	—	五、六九六	一〇四、三一八
拉金波爾德維赤	三	—	四、一八三	九五、三八二
貝爾巴戴里克	三	—	六、五七六	一一一、二八五
克拉梭夫狄維斯伯爵	五	—	四、六一三	一一二、六五二
拉金普魯根廷	六	—	二、六四八	六八、三五五
普拉丁奧司丁伯爵	八	—	一〇、五二〇	七九、八四五
佛來敏貝慈伯爵	一三	—	一四、二五八	一〇七、七九四
普特布斯侯爵	五三	—	一七、一一三	三〇二、八九二

柯蘭德 (I. Konrad) 教授在其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國民經濟

與統計年鑑) 中發表了幾篇有價值的論文, 題為農業統計之研究, 這幾篇論文論述普魯士大地產的範圍。他計算五、〇〇〇海克塔爾以上的地主的數量:

州	地產	屬於他們的合計如下 (以海克塔爾為單位)	耕地及牧場 (以海克塔爾為單位)
東普魯士	一一	六七、六一九	三四、〇〇〇
西普魯士	一三	一〇五、九九六	四八、〇〇〇
波茲南	三三	三〇〇、七一六	一四七、三一〇
波美拉尼亞	二四	一八二、七五二	一〇二、七二一
西列細亞	四六	六七一、六四九	一九二、四四三

一八八七年在西列細亞很著名的四十六個大地產之所有者, 他們所估的合計不下八四三三個地產。

	地產	總面積(海克塔爾)	土地稅
佛呂德里赫威廉太子(即後來佛呂德里希帝第三)	一九	八、八八九	一一八、九五九
佛里金塔爾(退職大臣)	二四	九、〇九〇	一〇六、七四〇
羅克森阿爾伯特親王	五〇	三一、〇七二	二七一、七三二

烏耶慈基大公	五二	三九、七四二	二三三、七〇一
勃乃斯侯爵	七五	五一、一一二	三二四、〇四二

所有這些材料無論如何都不是預示大土地所有權之一「將近完結。」

關於奧大利大地產的範圍，（每個大地產均由一些地產構成，）克爾佛特在其生產論一書中載有如下的

材料：

所有者之姓氏	地產之大小（以海克塔爾為單位）	組成部份
庫拉維亞區奧爾姆慈基大僧正的地產	五四、五〇〇	？
佛蘭慈約瑟夫大帝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及下奧大利等處的地產	七九、三〇〇	？
賽波布赫海姆大公在匈牙利的地產	一三四、〇一三	有四四個農莊及十個森林區的兩個地產
斯瓦岑貝爾侯爵在波希米亞的地產	一七七、九三〇	二〇個地產
里赫登斯太侯爵在摩拉維亞波希米亞及西列細亞的地產	一八〇、九〇〇	？
阿爾布賴赫特大公在匈牙利及西列細亞的地產	一九二、一八一	七十二個經濟區，七八〇個農莊，五八個森林地
愛斯特千侯爵在匈牙利的地產	四三一、七〇〇	三十五個地產

這樣的集中，（是少數地產轉移到一個人手裏的結果）正如經過抵押銀行的集中一樣，一點也沒有改變

各個企業的範圍，但是前一形式的集中所別於後一形式的集中的地方便是管理之集中與地產之集中有密切連繫，這樣就發生新的生產形式——大地產。此種大地產，不是各個經營之無限的擴大，牠是近代農村經濟大生產發展的形式。而且這種形式也像資本的集中一樣並沒有一定的界限。

要在近代農村經濟內纔能想像的高度生產力是用這樣的方法達到的。許多企業轉移到一個人手裏遲早總要把牠們變為一個共同的組織，採行有計劃的分工及各個企業的協作。

我們從克蘭佛特（他因專門研究奧大利的大地產而著名）的生產論中（一六七頁及其他各頁）摘引幾段就可以解釋上述的情形。

「大地產（即克蘭佛特所謂 *Latifundia*）是由幾個大的私有地或領地（不準確地稱為封主的土地）構成的。因為大地產採取極大的範圍，私有地也就被聯合為一集團或一區。」

管理機關建立在下述原則上。所有主為企業的首腦，他或者自己指揮全部事業，或者將全部管理委託（這是常有的事）中央管理局。「對於一集團地產或一區地產的監督則委託經濟顧問，或經濟監督人」（因為看到奧匈大地產高度的發展，克蘭佛特到處都使用地方性的名稱。）——經濟顧問的活動就在於監督由中央管理局提出的或為中央管理局所贊成的對於各個地產的有組織計劃之執行……他（經濟顧問）主持每年舉行的地產全體代表會議，以便調劑各個地產之間的相互關係，批准代表們關於去年盈利的報告，預先正確地審

查這些報告及對於下一年經營的改善及改變所需之費用的計劃以後，就把這些報告及計劃經過中央管理局交給所有主去審查。

「此外在同一集團的地產內將某些組織的機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裏也是有益的。即如，有人就往往將牲畜種類的改善及在動物飼養方面一般的指導委託專門家（如牧羊業等等之監督者。）由於這樣的組織，就可以比指導權分散在許多人之間（飼養牲畜的直接的重大的責任總是要委託他們）的時候達到更大的結果。

「爲個別集團的地產或全部大地產而創立的一個中央機關，也一樣可以爲已達到極大範圍的大地產的各個經濟部門而創立。例如，在大地產內要爲製糖工廠、釀酒廠及其他耕種技術的企業建立建築物，則對於全部地產在建築物的建築方面就可以有共同的管理。

「同樣有人往往設置森林視察局使全部地產在主要的森林視察者底管理之下；對於全部礦業則設置礦業視察局。

「地產管理的各部門之行動一致是大地產組織之下最確定的因素。一個目的就是儘可能取得更多的利潤……除地產的組織以外還可以用別的手段來增加企業底收入。必須將當地一切社會的，氣候的以及地質的差異溶合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必須組織一切大的土地所有權。這樣的組織目的在使生產低廉，更便利地使用所得的生產品，使管理趨於簡單而且又能很好地利用現有的補助工具。」

「由於生產工具的廉價，尤其是資本的廉價（這是因大企業家容易取得信用借款）由於採用縮小勞動的機器，（而機器的採用又只有在極大範圍的耕種面積之下纔可思議；這裏所說的是指農業用的汽犁，近代的運輸工具，爲農事及森林業等等之用的鐵道）由於完善的機器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生產內；由於各個地產之間各種植物之生產的分配足以提高牠們的生產力，等等，就可以達到生產品的廉價。由於聯合少數的地產目的在爲任何一種工藝的企業在澈底應用機器能力之下更有利的，大規模生產原料，同樣由於建設苗圃，種子培養所，車軸草及其他草木的培養所於那些地產和田莊之內，牠們能生產出優良的大的種子，就可達到生產品的廉價。這些種子須特別仔細種植，因爲牠們要被採用於其餘地產之內。在重壓機幫助之下，乾草、稻草甚至糞料也宜於運輸，這些生產物在某些地產內若過剩，可以把牠們輸出到對這些生產品感覺需要的地產內。」

要使生產廉價，牧畜業必須照一般計劃組織。馬匹飼養是在專門適合此種目的的各塊土地上爲私有的需要而飼養。有角獸的飼養是集中在少數地產內，牠們所飼養的有角獸足供其餘一切地產的需要；養肥牲畜在沿鐵路一帶離工廠企業不遠的中央畜養場上，很便當地進行。中央畜養場從各個地產供給未養肥的或甚至——善於利用現有的，但爲數不足的飼草而養得半肥的牲畜。要很好的經營牛乳業就在某幾處設立少數榨油所爲許多農莊之用。因此就可節省管理這樣大的應用離心力的機器的企業之費用。同時必須將動物的飼養和榨乳業分開。

在牧羊業之內同樣需要牧羊業各個不同的部門之劃分，以適合他們的不同的經濟目的。小羊缺乏就可以專門飼養一羣小羊來滿足。要現實某些地產內所得的生產品或者用自己的工具來製造或者賣到外邊——在私有的磨粉廠、榨油廠、製糖廠、釀酒廠、鋸木廠以及其他工廠內製造牠們，或者賣到市場上。爲要使生產品更有利的實現起見，就靠自己或在別的企业家援助之下組織各種運輸的供應，如輕便鐵道、馬車道（要和主要鐵道線聯結）、運河等等。

管理簡單化由於地產之一定範圍及各個地產彼此間的接近的情形之下，可能的分工，而達到。合理地使用補助力量以提高生產力，這當然是大地產組織下最重要的機構。誰要是對某一生產部門表現出特殊的能力，就必須把他召到那裏去，他在那裏就能表現出最大的生產力。由於管理機關定期更換，就可以使經營不致墮落在舊有的形式。

像這類管理的原則自然不能應用於無足輕重的（就牠們組成的人數而言）管理機關方面。

凡是在大地產的各個組成部份彼此間距離很遠的地方，在大地產的組織的路上就遇到像上面所說的那許多最大的困難。另一方面，這樣組織的成就要在彼此緊密聯結的地產內纔表現得特別有力。

總之，大地產的組織——人們很少或完全不注意農村經濟底道一方面——值得積極的幫助，因爲在其繼續發展中，由於農村經濟學不斷的發達，她（大地產的組織）被人當作左右大經營之高度繁榮的一個因素。

有一個近代農村經濟的權威作家——老「實際家」而同時又是精明的科學理論家——是在這樣巨大的企業內，而不是在農民的小經營內看出近代合理經濟之發展。

但是巨大的生產在牠的道路上遇到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對於大工業倒是少有的現象，這就是勞動者的缺乏。

六 勞動力之缺乏

廣大的市場，貨幣手段的充足必要技術條件的存在——所有這些條件對於資本主義大企業的發生還是不夠。即使這一切條件都具備，但如果沒有自由的僱傭勞動者被迫地把自己的勞動賣給資本家，那末資本主義的企業就不能存在。

在一切舊文明國家內，城市工業不感到勞動者的缺乏。無產者不斷增多，並以不竭的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的資本。

除此以外，城市的僱傭勞動，吸收那些已經不能成爲獨立的經營者的過多的小資產者和農民，同樣吸收大批以前已被投入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小資產者和農民。大工業使他們聚在牠的周圍，不管他們是從城市或從鄉村來的。

在農村經濟內完全不是這樣。城市的勞動條件使勞動者完全喪失農業勞動的能力。誰在城市中生長或從小在城市中居住，那他就喪失了農業經營。在近代的條件之下農事不能由城市工業的無產階級隊伍中補充勞動者的缺乏。

但是農業大生產在近代條件之下同樣不能創造並替自己鞏固僱傭勞動者之必要的增加。

我們在使農村經濟和近代工業有嚴格區別的特殊情況中發現此種現象底原因。在近代工業內，牠和中世紀的工業不同，生產本身完全和家庭經濟分離。在中世紀的手工業內——就是現在在牠的殘餘的形式內，生產和家庭經濟還是結合在一起。在行會時代手工業工人屬於老板的家庭經濟內，是他的家庭的一員。勞動者在未開始獨立的生產，未成爲老板以前，不能備置私有的家庭經濟，不能結婚。

反之，在近代工業內家庭經濟與生產是分開的。這裏勞動者可以自備私有的家庭經濟，但並不要成爲獨立的勞動者，我們知道，他廣泛地利用這樣的可能性，增加了僱傭的無產者，他（僱傭的無產者）現在成爲一個特殊階級。但是家庭經濟與生產分開最先就使無產者成爲勞動以外的自由人並給他以可能獲得這樣的性格，使他能夠奪取和維持國家政權。

僱傭勞動者從前就有了，但他們沒有任何可能養育自己的兒女，因爲他們沒有自己私有的家庭經濟，自己私有的家庭。他們是手工業老板或小農的兒女，而且祇有做老板才能養育自己的兒女。手工業者的師傅，像學徒

一樣，他們不受妻室兒女的累，是一個能夠同政府和老板鬭爭的階層；但是像學徒一樣他們不會想到要在國家內表現政治力量並建立一個和自己階級利益相適合的社會。祇有近代的僱傭無產者，他們有私有的家庭經濟，有兒女，而他們（兒女）命定地仍舊是要做無產者，纔能對於這一思想有所領悟。

但是在工業方面已經經過的事情，在農村經濟方面還很有力量。牠（農村經濟）和家庭經濟有緊密地聯繫。沒有一個農業經濟沒有私有的家庭經濟，同樣在農村中沒有一個結實而牢固的家庭經濟不和農業經濟聯繫的。

這種情形一部分為人口的稀少性所決定——和人口集中在城市相反。營造出租的農舍在農村中是不能的；小經營者並不出租房屋或把出租房屋當作一種副業。

首先我們看到，就在小生產內家庭經濟與農業生產之間有密切的經濟聯繫。後者大部份是為前者（家庭經濟）的直接需要而生產。另一方面，家庭經濟的廢料供作肥料及牲畜的飼料，而對於牲畜的照料，需要指定一些人經常的來照顧牲畜，使他們成為家庭經濟的附屬物等等。

僱傭勞動者底地位在這樣條件之下其性質在農村中與在城市中完全不同。完全喪失了私有財產的僱傭勞動者，若有自己私有的家庭經濟，這在農村中可說是例外的現象。僱傭勞動者的一部份在農業大經營內是大經營的家庭經濟的一分子——僱工和女僕；但是他們若有私有的家庭經濟，那他們一般講來就是獨立的農業

經營者，在私有的或租來的土地上進行經營；他們只是拿自己的勞動時間底一部分去從事僱傭勞動，而另一部分則在私有的經濟內勞動。

所謂「代理人」(Deputante)——獲得常年工資，此外還得到某些自然物的贈予和一塊土地，如經濟內的住宅等，他們佔有特殊的中間地位，而「長工」(Instehar)也是如此，他們在東厄爾巴大地產之內以勞動者的資格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們住在主人的莊宅內可是有自己私有的住屋，他們獲得自己勞動的報酬，此種報酬，一部分，像代理人所獲得的一樣，為一定量的自然物生產品及一塊他們自己必須耕種的土地，一部分是工資，但不是像代理人的常年工資，而是日工資或一次付給的工資（半年一次）。

「完全喪失了私有財產的任何一個勞動者都不能變為長工。首先指定給他的住宅通常都沒有家用器具；而長工都要供給必要的勞動工具，如鐮刀及打禾棒。但是要做一個長工正如雇工結婚一樣首先要有一頭牛或最低限度要有一頭或幾頭羊，如果主人不貸款給他們去購買牛羊的話。最後，長工對於分配給他的那塊土地的耕種也必須能夠供給必要數量的種子，至於糞料更不用講，他必須從他自己的牲畜取得這種糞料」（馬克司·威伯博士 (Max Weber) 著的“Enquete über die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 in Deutschland” 第三卷一三頁)。

長工乃是雇工與租個人之間的中間階段，但大部份都不及僱傭勞動者；這是封建時代的殘餘，當時土地所

有者除了將土地租出而換得某種義務之外就不能從土地中取得收入。他不能和近代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及高度的地租相調和。例如，在薩克森（省）甜菜的種植便引起長工階級的消滅。

德國西北部「雇工」(heiermann)的狀況，頗類似於東北部長工的狀況。「雇工」這是家庭的農業勞動者，他們以相當租金從雇主手裏租得一間住宅和一塊土地，此種租金往往比當地普通租金低一半，因此他也就不得不在某幾天內任隨主人去支配他的勞動力，至於多少天，這在各區各不相同，「甚至在不同的地產內，每日所付的租金往往比當地普通租金低一半」（見凱爾格爾博士(K. Kärger)著的“Die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第一卷第三頁。)但是此種封建時代的殘餘，也像長工階級一樣地歸於消滅。

除了勞動者的這些範疇以外，我們又看到「自由的」喪失了私有財產的日工，他們被僱於農民——他們是「幫工」(einliner)「自由人」(losmann)「佃農」(Peierling)——祇要在找到雇主的地方就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他們很像城市的僱傭無產階級，但本質上和城市僱傭無產者還有區別。他們是別人家內的附屬物，而「永遠在別人的屋簷下過活，同樣在農民當中，就是經濟破產的根源」（威伯，同書，三八頁。）

這樣條件不會助長一無所有的勞動者繫念着土地。雇工大部分一開始就沒有可能結婚和置備自己私有的家屋；在這樣條件之下兒女在他看來是既累贅而又不快意的負擔。自然性的要求並不因此減滅，但性的要求往往用不自然的方法來滿足以避免生育。但如果自然造化比一切人工預防的方法更有力，那末不幸的母親有

時竟不顧犯罪而去打胎。她知道，——以後，無論是她，無論她的嬰兒都以爲光明的前途未可樂觀。私生子都遭遇最不幸的條件；他們的大部分早就死亡，別的一部分，爲數不少的一部分後來都坐監牢。

在家長制自然經濟還佔統治的地方，例如在阿爾卑斯山許多大農家庭內，女工的兒子像她自己一樣都算作家庭經濟的一員。他和農民主人的兒女同輩長大，和他們在一棹吃飯，祇有在使喚他工作的時候，社會地位的差異才表現出來；祇有在那個時候他纔像他的母親一樣成爲僱傭勞動者。

但是在商品生產及純僱傭的關係已佔統治的地方，女工的兒童就成爲可厭的負擔，她們起初就想儘可能擺脫他。

土地所有權之集中如何影響於私生子的數量，費克(T. Fick)關於巴威農業人口當中私生子數量的研究曾指示出來(見他的“Die bayerische Erbfolge in rechtsrheinischen Bayern”一書)「如果我們按照私生子的人數——他在三〇七頁上說——區分那末我們就得到如下的結果，此種結果對於確定土地私有關係與婚外生育之間的聯繫不是沒有趣味的。

第一類	一〇〇個生育中私生的	一〇〇個居民中有土地財產的
第二類	三・四——五	二八・二
第三類	五・一——一〇	二〇・二

第 三 類	一〇・一——一五	一七・〇
第 四 類	一五・一——二〇	一五・五
第 五 類	二〇・一——二五	一三・三
第 六 類	二五・一——三〇	一四・九

自由的日工，——他們沒有私有的家庭經濟，——幫工 (einlinger) 對於後代的養育並沒有多少較好的條件。

只有在小地產的私有者（或承租人）當中（他們將獨立的家庭經濟和獨立的農業經濟結合起來，）對於養育多數能勞動的後代纔在農村中有最好的條件。這樣的私有者不僅有充分的勞動力以備自己的需要，而且還有多餘的勞動力。他們或者自己像雇工 (Heisler) 一樣，（他們的私有經濟並不耗盡他們的全部勞動力，）去做日工而被僱於大經營內，或者——這是在一切的農民方面，雇工方面可以觀察得到——他們的兒女（是多餘的勞動者，並不將自己的勞力供在家庭經濟內，）以僱傭勞動者或日工的資格，準備為大經營服役。

這些製造新勞動力的熔爐在大生產發展而小生產被排擠的地方，就更加消滅。大經營以排擠農民來擴大自己的土地面積，但牠卻減少了對於土地耕種所必需的人數。單就這一點，大經營即在其一切技術的優越之下，也永遠不能夠在國內達到特殊的統治。大的土地所有權能夠從土地上將一切自由農民趕出去，但他們的一部

分又會以小的租佃者的資格而重新死灰復燃。何況大的土地所有權的專制並不能引起大經營的專制。

甚至在大不列顛於一八九九年時五二〇、一〇六農莊中佔地不到五英畝的農莊不下一一七、九六八個，佔地五——二〇英畝的農莊有一四九、八一八以及佔地二〇——五〇英畝的農莊有一八五、六六三個；也就是說，小經營佔極大多數。

在小生產遭受極大壓迫的地方，大生產就成爲更少收入的生產並開始衰落下去。現時常常可以看到這一類的現象；此種現象激起許多著名的農村經濟理論家宣告「農業大生產將近完結。」但這等於把嬰兒和髒水從浴盆裏一道潑出去。實際上，在某些條件之下勞動力的缺乏引起大經濟的衰落，引起小經濟數量的增加；後者（小經濟）的增加或者因爲大地主或大農將自己地產的一部分分碎出賣，或以零塊土地租給小經營者，或者因爲一切大地產任意拍賣並分爲許多小地產。

但是無論小生產爲大生產所排擠，或相反的過程，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界限。即如小農業經營者的人數和大經營一同增加，於是受大生產支配的勞動力的數量亦隨之增加，同時大生產的活力及其優越於小生產亦隨之增加。在許多小經營和大經營一同發生的地方，大經營發展的傾向，又重新表現出來，不言而喻的，這必須破壞的因素，例如大工業之移置到農村，不致發生反作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我們不能期待大的農業經濟的完結，猶之不能期待小農業經濟的完結一樣。

這與「馬克思的教義」一點也不矛盾。馬克思早已承認了這一點。在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一八五〇年）第四期上他曾評論愛米爾·席拉金的“*Le Socialisme et l'impôt*”（社會主義與賦稅）一書，在這本書內曾假定資本稅，牠其實是一從收入少的土地中取出資本投入更有收入的工業方面，引起了地價底低落，土地私有權的集中，把英國的大經營同時將英國一切發展的工業移植到法國來。」馬克思反對這種說法，他說：「英國的集中，及英國的農業其發生不是由於從土地中取出資本，而是，剛剛相反，由於工業資本投到農業方面。」他並且繼續說：「土地私有權的集中在英國完全摧殘了當代的人民。同一集中過程（資本稅自然是促成了集中，）由於農民之迅速破產，在法國把大批農民趕到城市並因此必不可免地造成革命。最後，如果在法國已開始由細分轉變到集中，那末在英國大的土地所有權卻沿着從前的道路大踏步向細分的方向走，這證明了：當資產階級的關係一般地存在着的時候，農業一定不斷地在土地集中與分碎底這個圈子內週轉。」

這種輪迴，自然不像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時（當時他還計及革命迅速發展的能力及速度）所斷言的那樣迅速和狹隘；技術和科學的發明使經濟增大的趨勢在英國存在得比馬克思所期待的更甚；此種趨勢在不久以前才停止。另一方面，發展了一些相反的趨勢，我們以後還要提到，這些趨勢與已分碎的土地私有權的集中相反。

但是馬克思指示出來的這種趨勢，只要在集中與分碎經過了一定限度的地方，就存在着，和出現着。

大多數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以爲農業中大經營與小經營的混合是很有希望的。只有少數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及社會主義者纔公然指摘小經營完全排擠大經營。『佛呂德里赫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及他以後的席綽 (Shitz)、魯謨爾 (F. Rumor)、貝恩干爾 (Berngard)、漢生 (Hasen)、羅賽爾 (Roshel) 以及其他許多的人都表示了一種意見，以爲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在私有財產的統治及自由競爭制度之下——理想的私有財產分配便是大、中、小地產之正確的混合，在這種正確混合之下，大地產是金字塔的塔頂，而小地產則是她（金字塔）的基礎』（邁斯柯夫斯基 (A. Miskowski) 的 “Das Erbrecht und die Grundeigentumsverteilung im Deutschen Reich” 一〇八頁（不久以前布亨貝爾格在其新著 “Grundzüge der Agrarpolitik” 中也發表了這類的思想。所有這些經濟學家都說，大的土地所有權是必要的，牠是技術進步及合理耕種的擔負者。大農是很有希望的，主要就政治方面而言，——他（大農）而不是小農——是私有財產的調劑；他的經濟遠勝於小農的經濟。後者也是必要的，因爲牠是勞動力的最好供給者。凡是大經營過分壓迫小經營的地方，精明的保守的政治家及大地主現在甚至竭力用國家的和私人的手段重新增加小經營的數量。

柴林格在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I Supplementband) 中寫道：『在大地產極其發展的歐洲各國，不久以前，在工業革命過分排擠農業勞動者到工業區域，農業恐慌及債務等等的壓制之下發生一種強烈的運動，此種運動企圖以有計劃的建立新的並圈圍過小的舊式農民的地產來增多農村的中農

階層，而使農業勞動者固着在土地上，分配了他們的土地。德國、英國及俄國差不多同時頒布了一些法律，而在意大利及匈牙利這問題也已經提出來。」

這裏就說一說一八八六年普魯士所頒的獎勵德人移殖波森及東普魯士的法律和一八九〇及一八九一年藉國家信用貸款及政府的幫助組織納租的地產的法律。柴林格關於此種立法的成功，說道：「我們可以承認，由於納租的地產之構成，已經將農民在遺世紀期間因為土地的自由轉換（在東部六省總計有一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只有利於大地產，因而失去了的那麼多的地面歸還了農民階級。」

此種人爲的創造小經營並不是違反牠的意志去壓迫大地產。不，此種人爲的創造是政府及國會的事業，沒有什麼事像貴族地主的幸福那樣值得他們的關切。

「大地主，——郭爾慈說——只要在他的周圍有大量中小的土地所有者，他就獲得極大數量的純收入，他們（中小地主）供給他勞動力並且是他所生產的剩餘生產品之可靠的買主」（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 第一卷六四九頁。）

由此我們可以說，在近代社會中大地產要消滅小地產或完全排擠小地產是談不到的。我們已經看見在土地所有權集中進行得很遠的地方，就有碎分的趨勢，國家和大地主本身都幫助這個碎分的趨勢，如果這種趨勢遇到很大障礙的話。

但正是大地產底這些要求證明給我們，沒有再比那種意見——此種意見認為小經營的保存是牠比大經營更牢固的結果——更錯誤的了。小經營的保存是那種情形的結果，即牠（小經營）已不是大經營的競爭者，已不是大經營和牠們一同生產的那些農業生產品的出賣者。在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和牠們一同發展起來的地方，小經營已不能盡着農業生產品出賣者的作用。這裏小經營從生產品的賣者變為大經營「生產得過多的生產品的買者；小經營自己生產得過多的商品，正是大經營所特別需要的那種生產手段——勞動力。」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大的農業經營與小的農業經營，就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形成像資本家與無產者一樣，——但是小農業經營者也就更加具有後者（無產者）的性質。

第八章 農民之無產階級化

一 土地細分的趨勢

我們在第二章內已經指出專供自己消費的農村工業的破壞，迫使那些農民——他們不能生產出超過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剩餘——去找補助的工作。爲了這件事小農卻有一部分必要的時間，因爲他自己經營的農業祇是一時地需要他的全部勞動力。他對貨幣的需要不是以出賣剩餘生產品，而是以出賣剩餘勞動力來滿足。他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好像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不是爲市場而是爲自己的家庭經濟勞作的時候，他是一個土地所有者，是一個在自己土地上生活資料的生產者，我們已經看見，他的經濟活動和這種家庭經濟有着密切的聯繫。

但是競爭的規律不適用於家庭經濟。大的家庭經濟無論怎樣優於小的，小的家庭經濟無論怎樣浪費勞動力，我們卻從沒有見着有傾向於集中的痕跡，也沒有見着許多小的家庭經濟爲少數大的家庭經濟所代替。

自然，家庭經濟不會不被經濟的發展所牽動，但是這種情形的表現則祇限於個別功能之從家庭經濟中漸

次分離出來并成爲獨立的生產部門。這樣，顯然使家庭的勞動量減少，因此也必然減少了勞動者的人數。就家庭經濟的大小觀察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牠是完成於與商品生產之演進直接相反的方向中即從大經營演進到小經營的方向中。

大的農村的家庭公社我們曾見之於中世紀，就在現在我們還能見之於那些農村經濟還處於中世紀階段上的民族中，例如，在南斯拉夫和東斯拉夫人當中。

如果小農的農業經營是在商品生產的範圍以外，如果小農的農業經營祇是他的家庭經濟的一部分，那末它就停留在現代生產方法之集中傾向的勢力範圍以外。他的這種很小的經營無論怎樣不合理，無論怎樣無利益，他總是牢牢地握住牠，正如他的妻子對她可憐的家庭經濟不肯放手一樣。在這種家庭經濟內費了很大的勞力而所得的是無限貧窮的結果；但是這也就是使他們不用去服從別的人的意志和不受剝削的唯一領域。

但是經濟和政治，愈是往前發展，則農民對貨幣的需要亦愈增加，而國家和公社向農民徵取亦愈加緊。小農對於獲得貨幣愈感迫切，則他亦愈重視找求副業而忽視農業。小農的僱傭勞動或資本主義式剝削下的小農的家庭工業像工業中的婦女僱傭勞動一樣會使他的家庭經濟惡劣下去，但不完全消滅他的家庭經濟。他的農業經營成爲更不合理的經營，同時在他覺得過於繁重不得不將牠縮小。

他很容易找到購買他不需要的這小塊土地的人。

在農民層很佔優勢的地方，就由牠調節人口，這種性質再加上對軍隊的崇拜及保守的情緒就構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所贊美的最重要的理由。農民層對於無數後代的繁殖和教養是很適宜的；在需要勞動力和軍隊的地方，牠更具有無上的價值。然而牠亦能阻礙人口的增加，這一點倒很能中馬爾薩斯派的心意；在農民經濟佔統治而沒有其他副業可作的地方，土地的有限性就迫着去限制後代的數量。這種限制在均分遺產制度之下，是用所謂 *Zweikindersystem*（一家二孩制）來實現，而在一子承繼法之下則用以取消其餘後代獲得獨立性，處理私有的經濟及享有承繼權的合法的可能性來實現。

在私有的農業經營以外還有很多機會可以找到副業的地方，事情便完全不同了。在這些地方人口的增加隨着生活條件而更加變成無產化了；這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自立，每個小孩一生下地在這樣條件之下所帶來的極重要的遺產就是一隻手。人口迅速增加，同時對於土地的需要亦隨之增加，但不是把土地當作爲出賣而生產的生產手段，而是把牠當作自己家庭經濟的基礎。如果副業的出現使個別的農業經營的縮小成爲可能，甚至成爲必要，而且因此造成大多數小經營同時存在的可能，那末在另一方面牠也能引起人口迅速的增加，而人口增加又趨於小經營數目的增多。

這裏所需要的不是集中而是分碎。在這樣情形之下事情甚至會達到大經營的分碎。

我們在第五章中已經看見，充作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用的每塊土地的價格是由牠的地租的高低來決定。一

般講來，牠的買價等於資本化的地租。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不肯付出高過這個數量的價格，否則，他的利潤會被降低到普通水平線以下。競爭通常亦不能將價格提高到這個常率以上。有時亦有因了非經濟性質的原因，而將地產的價格提高到資本化的地租以上，可是這些不在我們研究的範圍以內。

農民則另是一回事，農民不是資本家，而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者，雖然他出賣他的農業生產品，但他并不需要，或在很小限度內需要僱傭勞動者。他自己就是勞動者，他不是靠自己的財產生活，而是靠自己的勞動的收入生活，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僱傭勞動者的生活方式。他之需要土地是當作以自己的勞動去生產食料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當作獲取利潤或地租的手段；即使生產品的贏利，除了一切費用償付之後祇剩給他工資，他都可以生活。他可以放棄利潤和地租。所以農民在簡單商品生產的階段上爲了某塊土地所支付的價格可以（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比在資本主義生產階段上所支付的要高些。這樣的情形，自然有時會使農民陷於十分窘迫的境地，尤其是在他還保留着簡單商品生產者的習慣——支付過多的地價——的時候；可是，簡單的商品生產的階段雖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實際上已經進到資本主義的階段，那當然，他就不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而是被資本剝削的勞動者了。在農民購買土地，但沒有付價，或沒有完全付價的地方，在土地上負了抵押債務的地方，他就得從自己的經營中不僅抽出工資而且要抽出地租；在那些地方過高的地價對於他就如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一樣便是很大的損失。很高的地價對於農業經營者有利祇有在他不想再做農業經營者的時候，即在出賣他的地

產的時候。在他開始和正從事經營的時候，這樣高的地價對於他是有害的，而且是增加了他的負擔。可是現代的大地主只知道以那些祇能夠提高地價的方法去挽救瀕於危殆的農業。這些好似宗法社會的主人們，他們不像農業經營者去打算，而是像土地投機家去打算。關於這一點我們還要說到。

事情在那些小農業經營者方面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農業經營完全是或主要是供家庭經濟之用，而對貨幣的需要則以替別個農業經營者勞動來滿足。這裏地價與商品生產，也就是說，與價值律之間的種種關係，至少在買主方面，是消失了的。資本化的地租對於買主就構成土地之最低限度的價格；買主祇以他自己的購買力而首先以他自己的需要為標準。人口增加愈迅速，向外移出愈感困難，作為滿足生活的需要或社會的獨立之基礎的小塊土地的需要愈迫切，則土地的購價（或是租價）亦愈高。在農業經營中的勞動和在家庭經營中的勞動一樣對於自己的消費不能算作是費用；因為牠并不值什麼。土地的耕作給與家庭經濟的一切就算作是純粹的盈利。要計算生產產品的貨幣價值並將牠劃分為工資、資本的利息及地租幾乎是不可能，無論如何都沒有那樣做，因為貨幣在這種經濟中不起多大作用。

小地產貴於大地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象。邁岑（Meitzen）氏在他關於普魯士的抵押債務的論文中（Thiels Landw. Jahrb. 1885）指出，大的地產價格超過作為徵收地稅標準的純收入五十二倍，農業經營者的價格超過六十五倍，小農的小塊土地的價格超過七十八倍。

有些小土地所有的辯護者會根據這種地價的增高而證明，農業中小經營優於大經營。但是甚至在小經營之最熱烈的崇拜者當中誰都不敢鄭重地說小土地所有優於中等的土地所有；假如較高的土地價格就是較高的土地生產力的結果，則這種優越就一定會存在。

小地產底地價比較高，就在城市中，亦可看到與此類似的情形，大家都知道，城市中的房屋容積愈小，房價愈貴。在依西特爾 (Taidor) 新格爾 (Singer) 等人指明了這一點以後，蒲希爾 (Bocher) 又用巴西兒城 (Basel) 的數字來證實這種現象。在這個城市中各種不同的體積的住宅可值：

住屋一間.....	四・〇四佛郎
住屋二間.....	三・九五佛郎
住屋三間.....	三・五六佛郎
住屋五間.....	三・三六佛郎
住屋六間.....	三・一六佛郎
住屋九間.....	三・二一佛郎
住屋十間.....	二・九三佛郎

兩種現象——過高的地價與過高的房價——一部分可歸結到一個同一的原因：需要小塊土地或容小住

屋的人們的極端窘迫，他們對於土地壟斷者祇能表示微弱的反抗；誰要把小塊土地的過高價格歸到牠們的較大的生產力，就應當將窄小住屋的過高價格歸到房屋住居者的最大的收入。

很顯然地，小塊土地的過高價格在那些很順利地具備着人口增加的條件及在自己的農業經營以外還能找到副業的地方都成爲大土地細分之強有力的動機。地產的分割與土地所有權之分碎在這些地方都能夠達到很大的限度。

土地財產愈小，則想獲得副業的動機亦愈大；副業愈佔重要地位，則地產亦愈加變小，但是這樣的土地隨後就愈加不能滿足家庭經濟的需要；還應當注意到的，就是這種過小的土地的經營將變成完全不合理的經營。牲畜和農具的缺乏使土地合理的耕作，尤其是使深耕成爲不可能；家庭經濟的需要，而不是保存土地的肥沃去決定選擇所耕種的植物；牲畜與貨幣的缺乏也就是表示自然肥料和人造肥料的缺乏。此外還要加上人類勞動力的缺乏。

爲貨幣而勞動愈佔首要的地位，而爲家庭經濟而勞動成爲次要的事業，則前者吸收家庭中好的勞動力亦愈多，尤其當家庭經營特別需要牠們的時候，例如在收穫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小塊土地的耕作則更加委之於婦女，小孩或殘廢的；老人；父親和長子們不得不去做「幫工」。極小的農業經營，就如無產者的家庭經濟一樣，牠成爲家庭經濟之簡單的附屬品，牠雖然經婦女費了極大的勞動而所得的卻是可憐不過的結果。

這種極小的農業經營愈加縮小和愈趨窮困，就使牠不能滿足家庭經濟的需要。於是幫工所得的收入現在不僅用以繳納國家及公社的賦稅和購買工業生產品或外地的農業生產品如咖啡、煙草等等；而且還用來購買本地的農產品，特別是穀物；自己的經營祇供給馬鈴薯、白菜、青菜、豬肉、羊肉，在順利的時候則供給牛乳、雞蛋，但穀物之出產則感不足。

這種經營的數目實在不少。根據一八九五年的統計，在德國有五、五五八、三一七個農業經營。其中可分爲：

少於 2 Hectare 的有 3,236,397 經營 = 53.22%

從 2 到 5 Hectare 的有 1,016,318 經營 = 18.29%

兩者合計有 4,252,715 經營 = 76.51%

如果計算，從二到五海克塔爾的農業經營其所生產的穀物恰夠自己消費，而較小的經營必須購買穀物，那末在德國祇有四分之一的農業經營樂於納穀物稅，而大半的農業經營即四分之三以上的小經營必須購買穀物，因而穀物稅使他們蒙到直接的損害。這就是反對穀物稅的重要證據，但是牠也證明大多數農民不是以生活資料出賣者的資格而是以勞動力的出賣者和生活資料的購買者的資格來到商品市場上。小經營已經不是大經營的競爭者；我們已經說過，牠們是推進和扶助大經營的，供給牠勞動力并購買牠的生產品。

我們已經看見，在一八九五年德國百分之五十八的農業經營有不上二海克塔爾的土地，換句話說，要養活牠的所有者那是太少了。有一樁事實和這些情形相符，就是根據一八九五年的職業統計在農業中（就農業一字的本義而言，即是除去園圃、牧畜、植林及捕魚——捕魚不知爲什麼也牽連到農業身上來）沒有副業的獨立的人數爲二、〇二六、三七四，而有副業的人數爲五〇四、一六四。除此以外，有二、一六〇、四六二人獨立地（即是說在自己的經營內勞動，而不是爲僱傭勞動者）經營農業當作副業。獨立地經營農業當作主業或副業的總人數達四、六九一、〇〇一人（在一八九五年從事農業經營的人數爲五、五五六、九〇〇人）還有把他職業作爲主業或副業的獨立的農民人數達二、六六四、六二六人，即佔百分之五十六，可以說是佔了全數的一大半。我們還須注意到，除了以農業爲主業之外還有其他事業的人的數目之迅速的增加，可是像在其他一切職業內有副業的人數卻減少了。

兼有副業的職業部門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絕對數	屬於主要職業的百分數	絕對數	屬於主要職業的百分數
農業	六七一、四〇四	八·一五	一、〇四九、五四二	一一·二六六
工業	一、六九三、三三一	二六·四七	一、四九一、八六五	一八·〇二
商業	三九七、九二七	二五·三四	三八四、一〇四	一六·四三

家庭僱工	五五、九六〇	一四、〇〇八	三一、三三三	七、二四
軍隊、國家服務、自由職業	一四三、二一八	一三、七九	一一五、二七七	八、〇〇八
無職業者	一七九、六七九	一三、二七	二〇一、三三五	九、四〇
總計	三、一四〇、五〇九	一六、五五四	三、二七三、四五六	一四、二八

在那些除了自己的農業經營以外很容易獲得副業的地方，土地之細分可以達到不可想像的高度，最低限度也可以暫時克制那種相反的集中的傾向。

比利時提供了這一類演進的例子；茲列其統計如下：

種 類	一八四六年		一八六六年		一八八〇年	
	絕對數	百分數	絕對數	百分數	絕對數	百分數
到二Hectare為止	四〇〇、五一七	* 六九、九	五二七、九一五	七一、一	七〇九、五六六	七八、〇
從二—五 Hectare	八三、三八四	一四、六	一一一、八五三	一五、一	一〇九、八七一	一二、一
從五—二〇Hectare	六九、三三二	一二、一	八二、六四六	一一、一	七四、三七三	八、二
從二〇—五〇Hectare	一四、九九八	二、六	一九、〇六六	二、〇	一二、一八六	一、三

在五〇 Hectare 以上	四、三三三	〇・八	五、五二七	〇・七	三、四〇三	〇・四
總計	五七二、五五四	一〇〇	七四三、〇〇七	一〇〇	九〇九、三九九	一〇〇

• 原文爲六六・九，實誤。

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六年各類經營之絕對數都增加了，但是最小的經營數比最大的經營數增加得更快。反之，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〇年各類經營的數目，除最小的經營外都減少了，而最小的經營還談不上是獨立的農業。就是在這一類的經營內經營的平均面積之減少很難將牠歸之於經營強度的提高，主要應歸之於土地私有權之不斷的分碎及副業之不斷增多。

比利時的農業經營差不多五分之四都是極小的經營，此種經營的所有者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或求助於補助的職業；他們已經不是市場上生活資料的生產者。他們的絕對數從一八四六年起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那個時期最大經營數目（指二〇海克塔爾以上）卻從那個時候起大大地減少了。農民的讚揚者有什麼理由特別高興這種演進呢？演進又并不是到處都向着這一方面完成。小經營之過分的細分要以在自己的農業經營以外能找得副業爲前提。在祇有大經營纔供給此種副業的地方，這種細分，當牠開始妨礙大經營時，就會停止的。除此以外，像我們已經看見的，小土地所有之細分是會幫助大經營的。這樣看來，我們可以看到最小的經營和最大的經營不僅在耕種的面積擴大的地方，就是在不能擴大的地方兩者也是同時發展着。在這些地方土地細分是虛

中等經營的分碎完成的。

在法國，一般講來，演進便是如此。在本書二一五頁上所引的統計證明大經營和小經營的數目同時增加了，中等的經營則減少了。在德國此種趨勢早已非常明顯。一八八二年時邁斯柯夫斯基（Miskowski）曾做出結論，他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流動資本之有力的增加，再加以其他的因素，一方面使土地所有增加和變大，另一方面則重新使牠細分和變小。「自然，這兩種同時發生的傾向初看似乎彼此相互排擠，但是仔細考察一下，這種類似矛盾是完全契合的，因為這些相反的傾向是指德國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部分而言的。在同時同地發生這些相反傾向的地方，牠們便使中等的土地所有趨於毀滅。

「在積聚的過程雖不是絕對地而是特別主要地在德國北部和東北部完成的時候，地產的細分便在南部和東南部受到了限制，雖然牠還散見於別的地方。

「兩種相反的和發生在不同地方的傾向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論土地所有的範圍在這裏是增大而在那裏是變小，主要是完成於中等土地所有之分碎。後者是受兩方面的排擠」（見邁斯柯夫斯基著“Das Erb-recht”，130—131頁。）

我們借用柴林格（Chering）著的“Die innere Kolonisation”一書中關於普魯士所引述的下述數字來證明，大土地所有與小土地所有是同時犧牲中等土地所有而發展的。這些數字是關於東部各省（如普魯士

(Pruzen) 波美尼亞 (Dachau) 布南金堡 (Frankenburt) 波森 (Posen) 及西列細亞 (Silesien) 等處以及關於威斯特凡尼 (Westfalen) 及薩克森 (Sachsen) 從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五九年有聯畜的農民的經營其統計有如下表：

	所減少的		按面積計自由交易所失的多於所得的				總計	
	絕對數	百分數	屬於小土地所有	莫爾根	百分數	屬於大土地所有	莫爾根	百分數
東部各省	六,八八〇	二·〇	一,一〇,三三三	四·三	四七,三三	一·六	一,五五,三三三	四·八
威斯特凡尼	八〇	二·五	五,七〇〇	三·六	三,三三	〇·六	一,五,三三	三·三
薩克森	三,六六	〇·三	八,四四	三·三	三〇,四三	〇·八	一七,八八	三·一
總計	九,八七	三·〇	一,三九,五二	三·七	四九,五〇	一·〇	一,六〇,四三	五·一

* 莫爾根 (Morgen) 一種量地的單位,在荷蘭、南非洲、及美國之一部則為二英畝有奇;在挪威、丹麥及普魯士則為一英畝的三分之二。——譯註

從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四年這一時期關於土地變動的記載是沒有的。
根據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的統計土地的得(+)失(-)情形如下：

	貴族的地產		有聯畜的土地所有		小土地所有	
	地塊	莫爾根	地塊	莫爾根	地塊	莫爾根
東部各省	(十) 四	(十) 八二	(一) 三三	(一) 二六、七六	(十) 六、三三	(十) 二五、二五
威斯特凡尼	〇	(十) 五、五〇	(一) 四四	(一) 二、三九	(十) 一、九〇	(十) 三、八九
薩克森	(一) 一	(十) 八、三六	(一) 三五	(一) 七、八九	(十) 三、八二	(十) 三、四七

除此以外，有幾千莫爾根的土地歸為城市所有，或作公共場所之用。在這裏也是由中農來承受損失。

最近期間在德國由於細分和增大而排擠中等的土地所有，的確已停止了。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像上面（二一五頁）所引的圖表指明的一樣，恰恰是中農的所有地（從二到五海克塔爾（Hectare））增加得最多（五六〇、〇〇〇）。但是如果從這裏就得出結論，說現在已開始了相反的過程，中農的經營排擠很小的經營和大經營，那是不正確的。如果把那一類顯然表示出一定變動的經營和別一類看不出有什麼大變動的經營分別開來，就會得到特殊的結果。各類經營有如下統計：

經營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增加或減少	
	絕對數	百分數	絕對數	百分數	絕對數	百分數
少於 1 Hectare	11,113,316	33.6	13,529,131	37.1	(+2,415,816)	(+7.8)

從一—五 Hectare	一、七一九、九二二	一、七二三、五五三	(十)	三、六三一	(十)	〇·二
從五—二〇 Hectare	九二六、六〇五	九九八、八〇四	(十)	七二、一九九	(十)	七·八
從二〇—一、〇〇〇 Hectare	三〇五、九八六	三〇六、二五六	(十)	二七〇	(十)	〇·〇
一、〇〇〇 Hectare 以上	五一五	五七二	(十)	五七	(十)	一·〇
總計	五、二七六、三四四	五、五五八、三一七	(十)	二八一、三一七	(十)	五·三

我們看見從五到二〇海克塔爾 (Hectare) 的經營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最大與最小的經營之增加，其百分數比牠還高。介於這些經營之間的中間的經營在數量上幾乎沒有增加；要是和經營之增高的總額比較，那些中間的經營卻等於減少。

最小的最大的和中等的經營在數量上能夠同時增加，一部分可用耕地面積的擴大，一部可用那些中間的經營的損失來說明。各種經營之耕地面積（以海克塔爾 (Hectare) 為單位）如下：

經營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增加或減少
少於一 Hectare	七七七、九五八	八一〇、六四一	(十) 三二、六八三
從一—五 Hectare	四、二三八、一八八	四、二八三、七八七	(十) 四五、六〇四
從五—二〇 Hectare	九、一五八、三九八	九、七二一、八七五	(十) 五六三、四七七

從二〇一、〇〇〇 Hectare	一六、九八六、一〇一	一六、八〇二、一一五	(一)	八六、八〇九
一、〇〇〇 Hectare 以上	七〇八、一〇一	八〇二、一一五	(十)	九四、〇一四
總計	三一、八六八、九七二	三二、五一七、九四一	(十)	六四八、九六九

* 原文所示數字顯係一六、九八六、三三二及一六、八九九、五二三之誤

從二〇到一、〇〇〇海克塔爾 (Hectare) 的經營面積的減少——此種減少其實比一、〇〇〇海克塔爾 (Hectare) 以上的經營面積的增加所補償的還大——並不是發生於強度化的降低。七十年代前大地主的口號是更多的土地而現在他們的口號卻是更多的資本。我們已經知道，如果這不是講大地產，那末也往往是表示土地面積的減少。我們在上而已經看到，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七年普魯士農業蒸汽機的數量增加了五倍。另一方面，在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這個時期在德國祇有大經營僱用的農業服務員（管理者、監督者、視查者、會計及其他的人）的數量有很大的增加，從四七、四六五人增至七六、九七八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我們順便還要指出從事於農村經濟的管理及簿記的女職員的數量之特別迅速的增加。在一八八二年時，女職員有五、八七二人，即佔職員全數百分之十二，而在一八九五年就有一八、〇五七人，佔全數百分之三三。四。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大的農業經營從八十年代開始如何地成爲更強度更資本主義的經營。

要解釋爲什麼中等經營能在那時得到這樣多的土地，我們留到下一章再說。

這裏我們要注意的事實，是德國農村人口之無產階級化，也正如其他國家一樣，在向前推進，雖然在德國中等地產分碎的傾向已不起作用。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全部農業經營的數量增加了二八一、〇〇〇；但是此種增加底大部分都是不到一海克塔爾（Hectare）的無產者的經營；其數量之增加為二〇六、〇〇〇。

讀者將會看出，農業的運動全然是特別的，牠與工業及商業資本的運動完全不同。在前幾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在農業方面經營集中的傾向並沒有達到完全消滅小經營的地步，而在集中的傾向發展到極端的地方，反會發生相反的傾向；集中的傾向和細分的傾向互相交替，現在我們又可看見這兩種傾向能夠並存而發生作用。小經營的數目雖然增加，而小經營的所有者在商品市場上是無產者，是商品——勞動力的賣主，他們的私有地只能在商品生產的範圍以外，在家庭經營的範圍以內纔有意義。這些小農業經營者以勞動力的出賣者的資格在商品市場上和工業無產階級有同一的利害關係，不致因為他們的私有地而與工業無產階級處於敵視的地位。土地私有多少使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擺脫了糧食商人的壓制，但是不能使他逃掉資本主義企業家——無論其為工業企業家或農業企業家——的剝削。

在達到了此種發展階段的地方，小農業經營的數量之增加只是成為無產者的家庭經濟增加的一種特殊形式，此種增加是與資本主義大經營的發展攜手並進的。

二 農民的副業之諸形式

最接近於小農業經營者的副業形式就是農業中的工資勞動。在封建時代我們就已經看到這種形式，在農村中的不平等當時已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一種所有地過於縮小而不夠養活牠的所有者，而另一種所有地則過分的擴大以致耕作土地時單靠農民家庭的勞動力已經不夠。

現代的小農在大地產內勞動和封建的勞役有些相似，這種勞役在從前是強迫農民在一年內必須替地主做相當日數的勞役。很顯然地，農民最希望在沒有農業工作的時候，即如在冬季，去作副業。他首先在附近的大森林地方去找尋這種副業，因為林場在冬季需要許多人去伐木和搬運。但是森林地帶並不是到處都有，而且這種副業又常常不能滿足小農對貨幣的需要；他必須去找尋那些所謂狹義的農業勞動。農業經營對勞動者的需要很不一；有些時候，即如在收穫時期，經常的狀況對於較大的經營是不夠的，所以就需要添加勞動者。但是正在小農易於替他自己找到補助的農業工作的時候，他自己的經營也特別需要勞動。對貨幣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忽視自己的經營，這種經營因其範圍的狹小和工具的缺乏必然經營得更不合理。他把自己的經營上所需的農業勞動交給妻子及年已長成而能勝任的子女去擔任，他自己至多在假日或星期日來擔任這種勞動。

我們不能說求助於這種副業的經營，完全是很小的經營。例如，凱爾格爾關於威斯特凡林省（察斯費爾德

(Coesfeld) 波爾根 (Borken) 萊克林斯霍生 (Recklinghausen) 及其他各區) 的通訊說：「自己的或租佃的土地(自由的日工的土地)大都在一至五海克塔爾(Hectare)上下，而大部分約在一至三海克塔爾(Hectare)上下。誰要是有五海克塔爾(Hectare)以上的土地——在個別的場合內祇要有三海克塔爾以上的土地——他往往就不再去做工，而專靠自己的經營生活。可是有一個報告說，日工的土地竟有六海克塔爾(Hectare)另一個報告又說有八海克塔爾(Hectare)」。這當然是要看土地的生產力如何而定。(見「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第一卷，一二六頁。)

凱爾格爾關於奧斯拉布魯克(Osnabrück)行政區的通訊說，那裏僱工(Huerling)的經濟通常包含着茅舍及經濟上的建築物附有可以養三頭牛及許多豬羊的厩舍，圍圃約有一〇——一五亞爾(are)，耕地約二海克塔爾(Hectare)，草地約〇·五或一·五海克塔爾(Hectare)，公共牧場約一海克塔爾(Hectare)以及享有砍伐柴薪的權利的森林面積約一·五至二海克塔爾(Hectare)。(見前書六四頁。)

有三頭牛和幾頭豬羊的經營已經算是很可觀的了。可是牠的所有者還是不能不去做傭傭勞動，但是并不是到處附近都有較大的經營。可以在牠們裏面找到副業。這類大經營往往不被認為是競爭者，反而當作是可觀近的。

從愛仁納赫高原(Eisenacher oberland)來的通訊說：「用最近購買的所需的地面來設立一個較大的

經營以及在維仁塔爾(Wiesental)附近設立一所已計劃好了的製糖廠對於當地農民階級一定會有良好的影響……許多日工和小土地所有者都可找到較好的工作」(見「Bäuerliche Zustände」, 第一卷四〇、五七頁。)從愛仁納赫平原來的通訊說,許多本地的土地所有者都祇有五海克塔爾(Hektare)以下的土地。他們的境況很惡劣。「要供給小土地所有者以充分的工作如日工或一般的工作則現有的較大的土地所有還是不夠(如騎士的地產,分封的和免稅的地產還祇佔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二·五)」(同書六六頁。)

又如在海森(Geesen)大公國內使小農貧窮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地產的缺乏。庫羅佛蘭克斯丁博士(Dr. Kuno Frankenstein)說:「在有承繼權的地方,因之,土地就按照兒女的人數分成幾小塊,這些小塊還可以再分爲小塊,就不會有勞動者的缺乏,因爲許多小私有者,祇有五至十「莫爾根」土地或者甚至還少些的土地,都要充當他自己的勞動者……可是在這些充滿着小農的土地所有,尤其是在沒有大地產存在的地方,對於勞動力的需要,非常有限;因而極小的僱農的土地之私有者就不能夠在自己的經營內或做僱傭勞動者去利用自己的勞動力。所以這些小經營的所有者的境況在大多數場合內是很悲慘的」(見「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 第二卷, 二二三—二二頁。)

在前一章內我們知道小經營是大經營的支柱,那末在這裏我們就看到大經營又成爲小經營的支柱。

海森地方的小農由於長期營養不足,以致疲弱到連工錢勞動的工作都不能去做。「人們因飲食惡劣,已完

全不能長久地做繁重的勞動了。有些地方，這種情形使大地產的所有者不能不從外面去僱用勞動者，雖然當地的勞動者還沒有找到工作的機會。

但是這般體質瘦弱的人們，雖不能擔任那種繁重的農業勞動，卻宜於做其他的副業，因此小農在找不到農業勞動的地方，就投到他所喜歡的副業——家庭工業或手工業。

家庭工業的萌芽在封建時代就已發生。我們在緒論中已經說過，起初農民是一個農業經營者同時又是一個工業者。後來城市工業逐漸發展纔使他幾乎完全經營農業。但是還有各種手工業在農民家庭內長期地被保存着；在農業已不能作為養生之唯一泉源時，手工業又重新為人所器重。但這不是為訂貨者而工作的手工業形式。各自孤立的農民不能和城市手工業競爭，因為城市手工業能利用廣大的市場及城市所特有的一切便利。農村工業成為商品生產祇有替資本家、商人、訂購者去生產纔能發達，因為祇有他們纔能把農村工業和處在邊僻的農民所不能直接達到的極遠的市場連結起來，農村工業只有在需要簡單的手藝和工具的部門內纔能發展。這種家庭工業首先是在附近有原料的地方發展起來——例如木器雕刻必臨近森林地帶，石板和石筆製造必臨近葉形石的石礦，籃筐的編製必臨近富於水源宜於種植柳樹的地方；小的鐵器工業必須臨近鐵礦等等。然而這許多閒暇無事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存在往往足以引起善於籌劃的資本家以家庭工業的形式去剝削他們；這般資本家往往供給他們原料，例如供給棉紗和棉線要他們紡織。

在土地很瘦瘠而技術條件又不利於大農經營的地方，尤其是在大的農業經營在從前或現在還碰到政治阻礙的地方，農村手工業最能順利地發展起來。我們在多山的地方看到農村手工業：如在波希米與西列細亞及薩克森的邊界，在通黎吉亞（Thuringen）、泰魯山（Tannus）以及什瓦慈瓦德（Schwarzwald）；但是家庭工業在瑞士更加發達——西部製造鐘表，中部紡織絲織品，東部刺繡。

這些家庭工業當其發生時往往受到極熱烈的歡迎。家庭工業的創辦者被認為是貧農的恩人，因為創辦者使貧苦農民在暇閒無事的時候，特別是在冬天有工可做。他們的增多的收入當然是使他們能夠更合理的經營，因而又增加了他們的收入。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相互交替使人們和城市勞動者相反，成為康健而強壯的人；這種交替又能使那些祇限於一種農業和空費許多寶貴光陰的農民成為更豐裕而有智識的人。森伯克（Schöberle）在其政治經濟學大綱（第二卷四二八頁）中極精彩地描寫那不受機器競爭威脅的家庭工業的利益。全家一塊兒勞作，「父親教育和管束自己的兒女，妻子可以操理家務和照顧兒童，姑娘們也可得到家庭的監督和保護。」勞動時間任隨勞動者自己的便，勞動者是自由的，「勞動者的一生很舒服。很快樂而且很豐富。工業的勞動與健全的農業勞動相交替，免得大批傭勞動者集中在一個地方，這對於工人及社會都有好處。最後，家庭工業能夠允許人們及時地利用家內有勞動能力的人的力量并因此促進——對於個人及一家的生活并無危險——一家的收入之增加。」

自然，和這些「無可爭辯的利益」一同存在的還有黑暗的一面，森伯克對於這一黑暗面也不能閉着眼睛不看。但是最後他還是做出這樣的結論：「所有這些弊害，無論怎樣大，總不能抹殺家庭工業對於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最有利的經濟形式之特點。」

祇有在牠——家庭工業與工廠工業競爭的地方，纔沒有牠的容身之地。

實際卻呈現給我們另外一幅圖畫，甚至就拿那些手工業來說，牠們也並沒有和大的機器工業相競爭，例如編製籃子，製造雪茄煙及製造玩具之類。

首先，就沒有一種副業能夠這樣厲害地使土地細分，因為沒有一種副業能夠迅速地擴大。大的農業經濟的數目和冶金工業的企業數目一樣是有限的；農村中工廠的數目也不能夠隨意增加。因此在大農經濟或農村工廠內工錢勞動就有牠的一定的限度。家庭工業則另是一回事。家庭工業祇有在現有的勞動力內自己纔受限制；牠可以在最小的經營內，用最原始的工具，不需多少資本的耗費，就可存在；資本家一點也不冒險，在順利的市場條件之下儘可能迅速地把牠（家庭工業）擴大；他無須供給不變資本——作坊和機器，這些東西既在生產上不能利用，便等於無謂地消耗；他無須支付地租和別的負擔，這一切要在一般的資本家，那就不管事業興盛與否都必須支付的。所有這些負擔是資本家最感危險的一部分，現在都由那些被剝削的家庭工業去擔負了。這種情形使一切恐懼對於他們的摧殘和蹂躪比對於大工業下的勞動者更加酷烈，因為資本家對於家庭工業很容易

決定去減縮他的企業；而在順利的時候也容易擴大牠。但是興旺的時候對於他們比不遠慮的時候更加窮蹙些。訂婚和組織家庭的數目增加了，同時對小經營的需要也就隨之增加，在農村中要是沒有這些小經營，則獨立的家庭經濟亦不可能。於是地價提高了，土地愈加細分了，零碎的田地更加變小，而這些田地的耕作亦愈加變壞。因為小土地不斷的變小，又因為正在興旺的家庭工業能夠產生出貨幣，農業經營就更加失去家庭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都被家庭工業吸收去了。如果這種情形延長相當的時期，則那種坐着做工的生活方式就消失，家庭的勞動者從事於農業勞動的體力。他們已經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耕種他們的田地，於其小範圍的經營現時對於他們就成爲體力上的必要了。

地產變成這樣小，小到已經不能在牠上面養幾頭牛了。棹上已經沒有牛乳，代替牛乳的是一種高荳汁。既沒有牛則糞料和拖犁的耕畜也就沒有；田地就愈加成爲貧瘠而且不宜於種植穀物。此外，穀物在沒有成爲食品以前還需要磨細和烘焙，因此人們寧願選擇那些不甚費力而又能在同一地面上出產，雖不是養分更多，而是收穫量較多的植物——蔬菜、蘿蔔，尤其是馬鈴薯，這些植物，可以直接在廚房內烹調。

這樣看來，家庭手工業者的飲食就是高荳汁和馬鈴薯，這些東西與其說牠們是供給身體的營養物，無寧說牠是欺騙肚子的東西。營養不足所給工業勞動的影響更加厲害，勞動者的體力降低到極點，僅能維持其手指的動作而已。

他們的農業經營的退化也不亞於食料。那些很小，耕作很壞而又未施肥料的一塊土地年復一年產出同樣的植物。農業回復到少數日耳曼人到移民末期所處的那種狀態。

史南培爾阿爾德 (Schnapper Arnds) 關於上套魯斯地方的五個農村公社說（見史氏書五〇頁）：「有人說，三田制的遺跡祇是在柴林堡還保存着，在其他的農村內，貧窮就顧不到什麼禁止而要求其土地年復一年出產馬鈴薯；稍須合理的換種制對於缺乏土地和其他工具的貧苦的所有者是不可能的。」

在這五個農村內總計有四六三頭牛屬於七五八個代表納稅單位的家庭經濟，四八六個經濟完全沒有牛，一一七個經濟每個祇有一頭牛。

隨着人力和地力的枯竭同時就發生經濟的衰落。在家庭工業內技術的進步其可能也祇有很小的限度。家庭手工業者彼此間發生競爭，像剝削他們的資本家一樣，祇有用加強勞動強度和減少工資來應付。因為各個家庭手工業者被隔離在他們自己的家庭中，他們的家庭又分散在很廣的區域內以致他們幾乎不能組織起來，在他們的區域內沒有別的工作并且又因為他們被束縛於小塊土地上——小塊土地使他們不能脫離高度的剝削而到這種剝削比較和緩的別個地方去換取土地，這種種原因就使競爭減弱了。這般家庭工業者完全受資本家支配。甚至長時期的失業也不能把他們驅逐出來。所以在資本主義剝削下的家庭工業我們可以看到最長期的，最浪費的勞動，最可憐的勞動報酬，最廣泛的使用女工和童工，最鄙陋的工作場所及住宅，一言以蔽之，就是現

時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最惡劣不堪的條件。這是最無恥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制度，這是最退化的農民無產階級化的形式。幫助那些單靠農業勞動不夠維持生活的小農人口的一切企圖，把他們引渡到家庭工業，其結果必然的在短時期的而且很成問題的高漲之後使他們沉入最深的和最無出路的貧窮。所以我們應當採用最堅決的手段來和牠鬭爭。

幸而家庭工業祇是走向大工業的一個過渡階段。各種家庭工業遲早會撞起喪鐘來的，那時機器使家庭工業在技術上變成沒有用的東西，家庭工業愈迅速發展，愈趨專門化，以及牠愈走上分工的途徑，則這個鐘撞得亦愈早。

但是這個鐘并不就是家庭手工業者的救命鐘，而是他在十字街頭最痛苦的那部份之迅速開始。於是家庭手工業者就更無限制的加強勞動力，更厲害地壓制生活的需要。更大量地加重他的家庭的苦工，為的是在與機器的競爭中不致過於落後。這種抗爭無論延長多麼久，最後這追趕很久的家庭手工業者終於力竭聲嘶的失敗。家庭手工業者能夠這樣長期地延長着毫無希望的鬭爭，這應當歸功於他的農業經營。

在農業不是作為商品生產而是作為滿足家庭經濟需要的地方，農業并不屈服於競爭動力，農業形成一種保守的成份，此種成份使過去的一切繼續存在。農業可以使家庭工業之拚命的掙扎苟延到無止境的地步，牠不讓那種在半世紀以前已經不能生存的手工紡織歸於消滅。

「爲什麼這個工業部門（波希米北部的手工紡織）雖然不斷的起着癱瘓的狀態，可是牠還能維持原有的範圍呢？這原因主要是在於大部份的紡織者都有一點土地；在較順利的時候，這點土地可作工業的工資勞動的補助，而在貧困的時候可以作爲排除恐慌中災害的一種手段」（見布拉夫（A. Braß）著的“Studien über Nordböhmische Arbeiter Verhältnisse” 111頁。）

雖然如此，可是凡是在大工業侵入農村，不是爲着要和家庭工業競爭，而是爲着要供給家庭工業以新的工作的地方，農村家庭工業最近期間已迅速衰落了。

大批一無所有的、有用的（熟練的而又能守紀律的）工人以及接近廣大的市場，這是大工業發展所必具的條件。這些條件首先是具備在大的商業中心。牠的發展本身又吸引了新的工人羣衆，并使商業在工業繁榮的地方內也隨着發展。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的趨勢就是使人口及經濟生活繼續不斷的集中在大城市。但是因爲種種原因使整個大工業發展的潮流並不完全傾向於城市，牠的一些支流卻在鄉村內形成。這些原因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份是社會的性質。

自然的因素首先就是指隨着大工業的擴大，而同時增加的原料與副料的需要而言，這些東西不能在城市而祇能在鄉村中生產出來而且因爲大批的消費一定要在大經濟內大批的生產。這首先就是指礦山工業而言。礦山工業的發生可以說是使農村關係革命化的最有力的手段。其次，那些笨重的原料，因爲牠們的重量比牠們

的價值高，所以不能運往遠處而祇能在牠們出產的附近製造。於是在農村內就發生鐵工廠、磚瓦廠、製糖工廠等等。

最後，爲了容易利用水力起見，有時將一些生產安置在離城市很遠的山谷內。

除這些自然的因素以外，還有社會的因素。城市的生活程度比鄉村高而且在同一的生活程度之下維持勞動力的費用也比較大，這是由於住屋的租金比較高，食料運輸的費用以及工人沒有自己的農業經營。因此城市中的貨幣工資，當然要比農村高。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勞動羣衆集中到一個狹小的地方。此種集中使他們容易接談和組織起來。牠使監督及懲戒他們更加困難。在工廠林立的地方，解僱者往往可以找到寄身處。在農村內就不是如此：在那裏的工人不會這樣反抗資本家，他們極其恭順而又極少要求。這是使大工業家把他自己的企業移到農村去的一個很大的引誘物，如果在農村內他找到了合適的勞動力，所可惜的，就是這種機會不是到處都能遇到，雖然有利於事業之進行的一切其他條件都存在着。城市工人運動愈猛烈，則大工業家亦愈願意把他們的企業移到農村去。

交通工具——運河、鐵道、電報之類愈發達，則大工業之移植農村亦愈早，因爲大工業和大市場容易保持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大企業在農村中出現其本身就構成使近代交通工具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動機。而這些交通工具的建設、維持以及使用，又給農村居民以許多獲得工資的工作。

這種遷移的直接結果對於小農業經營者及他們的土地財產不見得比家庭工業制度的結果更有利些。最大的經營，為市場而生產生活資料，至少由於銷售他們的商品的市場之非常擴大以及這市場直接接近他們而得到許多便宜。但是這種便宜由於工業所引起的勞動者之缺乏而愈趨於平衡。

小農業經營者和大農業經營者一樣都因地價的增高而蒙不利。大工業引起人口迅速的增加，這不僅，像家庭工業一樣，是因為容易訂婚和容易建立家庭經濟，而且也是因為吸收外來的勞動者所致。資本主義大企業單靠他的附近所供給的勞動力是不夠用的。對於住屋及小塊土地的需要增加了，於是住屋及小塊土地的價格亦隨之增加。地價愈高，如果其他的條件不變則購買土地者留作經營用的財力就愈少，他的農具亦愈簡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章還要說到。

此外還須講到的就是工業所要求於工人的和家庭工業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家庭工業大部份都是這樣進行，就是有時——如在收穫時期，全家停止其工業的活動而從事於農業勞動。自然，這種情形並不是永遠如此。有些家庭工業內，工作最多的那一季也正是農忙的時期。在收穫的時候，農作人的勞動時間往往延長到二十小時，而在晚上的休息祇有四小時；在這時候，製造玩具者也正要努力趕造，而沒有一刻閒工夫顧及必要的耕作。（見沙克士（E. Sax）著都林根區的家庭工業“Die Hausindustrie in Thüringen”第一卷四八頁。）

在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地方，家庭工業和農業是分開來的，因為兩者結合在一個人手裏是不可能的。但這絕

不是一般的情形。

在大工業內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大工業之大量的固定資本，如果擱置不用，就等於無益的消耗，所以使企業家不得不儘可能地避免生產過程之較大的間斷。祇有少數大工業在一年中拿一部分時間即在農事停頓的時候或不特別忙的時候去進行。例如製糖工廠，牠的「動作」開始於秋季，在收集甜菜之後，工作繼續到冬天為止，並且牠要儘可能在四個月之內趕完，因為一到春天甜菜容易腐爛。

這樣看來，製糖工廠中的工作并不妨礙農業勞動者及小農的農業經營所必要勞動時間。

煤礦中的工作有時也和農業勞動相容。冬季用煤較多，因而對煤的需要亦較高，而另一方面，夜工的採用可使一部分工人在白天「解放」；他們應當利用白天來休息，可是他們往往用這時間來做農業的勞作，這些工作的動機，是在於他們要想增加自己的工錢而且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解放他們在過於短促的煤礦工作時間中所未耗竭的勞動力。

凱爾格爾(Kärger)通訊說：「在雷克林格區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相互交替；那些有點土地的自由日工從收穫開始到十一月底都在農村裏勞作，其餘的時間則在礦山內工作」（見農村勞動者的境況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 第一卷一二四頁。）

在礦山工業的區域如海爾葆克爾赫(Gelsenkirchen)、波洪(Bochum)、烏特姆德(Dortmund)等地

方有土地的農村勞動者幾乎絕跡。雖然有時候也僱用那些沒有土地財產的日工；但是他們的大部分都是礦工，他們在礦山中短促的勞動時間底下，特別是在做夜工的時候，可以在白天勻出一些時間去做農業工作；他們向農民租借房屋而答應在收穫時期幫助屋主或者以同樣的義務而租借一小塊土地來種植馬鈴薯；最後也有那些工人，因為精疲力竭，而不宜於礦山的工作……我們很少聽到日工能從自己的經營中得到收入，當然，這是指以農業工作為副業的礦工而言。他們有時租得一間有圍圃的屋子，養一兩頭山羊，有時又可以得到地主允許在土地上種植馬鈴薯，只要能夠施以肥料」（見同書一三三頁）。

最後，還可以舉一個西列細亞東部煤礦區的例子：「在煤礦及工業區域內最常見的現象就是農村勞動者在煤礦中工作，而特別是在建築業或工廠中工作，可是一到收穫的時期，就回到農村中去了。這種情形特別是在小土地所有者中間最常見」（見同書第三卷五〇二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礦山工作是農民經營底有力的支柱。從威斯特凡林寄來的通信中說：「在所有者自己的土地生活的地方，土地的碎分對於農民的土所有上的影響到處都是很有害的。在農民——如在西根區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就是如此——還能在礦山及工廠中找到優裕的副業的地方，那裏的禍害，就不會發生出來」（見農民的境況“*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二卷八頁）。

即使在個別的部門內祇需要或祇允許季候的工作，可是一般的大工業卻需要勞動者一年到頭不停的工

作。

但是大工業不像家庭工業那樣需要家庭的全部勞動力。剝削十四歲以下的童工已為法律所禁止。主婦在大工業中工作比在家庭工業中更加困難；因為在家庭工業中她無須離開家庭而在前者則不然。即使她容易決定去參加家庭工業的勞動，但她卻不容易決定丟下自己的家庭和兒女；在農村中要她決定做這種勞動比在城中還困難，因為在農村中家庭經濟起着很大的作用，並且家庭經濟的機能也還沒有為公共食堂、育嬰院和幼稚園等的設備所減縮。

除了這些勞動力，即大工業制度保留在家庭經濟及與之相聯的農業上的勞動力外，還要加上殘弱的勞動。家庭工業可以給一切甚至最衰弱的人以工作，而大工業要求於工人的是那種只有在他壯年時纔能擔負的勞動強度并且很快地將牠消竭。在農村內極小的經營卻能夠給那些工業所創造出來的大批殘廢階級以適當的職業。

大工業像家庭工業一樣，不過是在另一種方式下使小農業所能支配的勞動力變為惡劣，同時又促使他的經營縮小，因之他的經營也更加惡劣。

另一方面，大工業資本像家庭工業資本一樣并且根據同樣的理由，差不多在農村內就碰不到勞動者方面嚴重的反抗而且剝削和壓制他們到極點。

例如，海爾克勒（Herker）在其論上愛爾薩斯棉織工業及其勞動者書中就提供出這一類農村大工業的典型的圖畫。在慕爾漢森（Mülhausen）地方條件無論怎樣惡劣總比不上那些建立在農村中的紡織工廠那樣的惡劣。「勞動時間一般講來都很長。格蘭德（Gra）本人也報告是十三或十四小時的勞動。夜工，甚至未成年的童工都做夜工這是常有的事。在那裏在道德方面所加於未成年的女工的侮辱也和慕爾漢森一樣。罰款和尅扣工資到處都同樣地盛行。這些制度往往因勞動者之更大的依賴性而更加厲害地施行。在大多數工業區域內當地的工廠就是工資勞動的唯一泉源……此外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勞動者往往還被束縛在由他的妻子或父母所經營的小經營中的那塊土地上。至於勞動者對於勞動條件的影響就完全談不到。

「工資平均比慕爾漢森地方低三倍，——工資的這種相差比較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間的相差還要大，因此實際上生活程度還更降低……馬鈴薯是主要的食料，肉至多在休假日纔有一次。白蘭地酒的消費比慕爾漢森地方多。聽說在佛克森（Vogesen）有一個工業的農村，其中八百居民一年要飲三百百利脫爾酒。」

勞動者的處境因物品工資制佔統治而更形惡劣（這種制度在德文爲 Trucksystem）。

體力愈加退化這與惡劣的生活條件相適應……縣醫（唐恩縣）的通訊說：「在有工廠的農村內，人們從小就在工廠內做工，所有應募的人幾乎沒有用處，我們可以想到，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那末招募委員在這些地方去將無事可做了……」雖然身體極不健康，可是人民還是歡喜勞作……那些已經不在廠內做工的老年

人，回來耕作他們的小塊土地，這種耕作因為土地高低不平是很費力氣的」（三四九——三五二頁。）

這一幅圖畫無論怎樣黑暗，但是總比家庭工業光明得多。兒童離開了工廠工作，生產過程雖不像農業一樣在新鮮的空氣中進行，但總是在室外，在寬闊的場所內進行，這種寬闊的場所，雖然有許多缺點，但在衛生方面比家庭工業者的茅棚好得多了。正因為工廠中的勞動者「不是自由的，」他不能隨自己的想像去開始工作或停止工作，各個人都要遵守一樣的秩序而且勞動的範圍比家庭勞動狹小，因而更加容易管理，更加容易用法律來壓制。工廠將分散的勞動力聯結起來，使他們彼此間容易調協，牠使有工廠的農村和外界密切地接觸，發展了交通工具并且把有智識的勞動力從城市吸引到農村方面來。這樣看來，牠便成了使農民衆的一部分接近城市無產階級的一種手段，成爲逐漸提醒農民的利益及參加改善自己的鬭爭的工具，而在順利的條件之下使他們極積的參加此種鬭爭。

農村工廠增加了無產階級的隊伍，但牠沒有侵犯了小農業經營者，也沒有使他們與土地分離。恰恰相反，牠給那些瀕於破產的小私有者以維持其私有財產的手段，牠還使人數極多的一無所有的階層能夠在購買來的或租佃來的土地上進行私有的小農經營。

上述三種小農的副業形態并不互相抵觸。牠們能夠而且往往同時存在。例如，有人這樣說：「把家庭工業作爲一種副業，這對於愛仁納赫高原的居民，特別是對於那些極貧窮的地方稍微有點土地的小農，卻具有特別的

意義……我們可以指出下列的家庭生產：製軟木塞子、織腰帶和絲絨、編製馬鞭、製靴、造刷子、割玻璃管這些副業能夠給每個家庭以一、二以至三個馬克的工資；甚至就是，有八、九海克塔爾土地的農民，也往往從事這些工作……除此以外，砍柴、伐木和製木筏以及開墾富於岩石的荒地都能給他們一種慣常的工作，特別是在農事閒暇的時候」（見農民的境況（*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一卷五〇至五一頁。）

海慈（A. Heisz）關於德國南部的司徒嘉德（Stuttgart）貝布里金（Böblingen）海雷堡（Herrenberg）等處的農民狀況有這樣的一段話：「如果說農業勞動能夠供給無數的農村人口以充分的食料，那就是錯誤的。各種副業，特別是對於西部的兩區有極重要的意義。這裏首先應指出森林事業，牠需要大批的人經常地或暫時地從事這種工作。研究家庭工業的狀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紡織和刺繡。除此以外又發生了大工業。在最近幾年來發生了一些大的企業，舊的企業擴大了，依靠賤價勞動的小企業家增多了……另外還有經營牛乳、雞蛋、飛禽及少數工業生產品的小商業。最後，除直接環繞司徒嘉德（Stuttgart）的農村以外，如梅林根（Möhligen），波南琴（Bonlanden），勃勞特金干爾特（Plattenhardt），費金根（Vaihingen），羅爾（Rohr），姆斯貝爾格（Musberg），畢爾卡（Birkach）等處都可以稱為日工的區域，當時有許多日工從魯易特（Reith），海滿金（Heimaden），凱姆南特（Kemnath），沙干仁（Scharnhäusen）甚至從勃里林金（Plieningen）地方來到愛斯林金（Esslingen）地方的紡織廠內。」

但是并非到處都有這樣多的副業，也不并是常常能夠滿足小農業經營者貨幣的需要。如果副業不來找到農民，那末農民就無法可想，農民要尋找副業，祇好拋棄了土地而單身去找。近代交通工具愈發展——鐵路便於運輸，郵政報紙傳送遠地的消息——則農民亦愈易決定離開——即令是暫時地——自己的農村而且他也敢冒險到更遠的地方去。很顯然地，小農家庭的一部分最能勞苦的一部分，爲了要養活自己和找些錢來養活全家就常常短時期地離開家鄉。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祇是這一類的外出，而不是長時期的外出；因爲我們現在所要考察的，不是那種在外表上容易知道的農民無產化的形式，而是那些最主要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農民實行了無產者的機能，而卻保持着自己的本來面目。

對於那些離鄉去境的農民最接近的自然就是農業工作。在本地的居民不能滿足僱傭的農業勞動的需要的地方，那裏就沒有什麼缺憾。在前一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大經營內，勞動者的缺乏，我們看到這種缺乏就在較大的農業經營內也是免不了的。在德國各區域內都需要外地的農業勞動者，一部分在整個夏天都僱用他們，一部分祇在收穫時期纔僱用他們；他們不僅在厄爾巴以東，而且在萊茵河流域，在巴伐利亞（Bavaria）瓦爾敦堡（Württemberg）斯勒斯威克（Schleswig）和荷爾斯丁（Holstein）等處都可找到工作。

我們且引一個外出到巴伐利亞的例：「在生產穀物的區域與生產蛇麻的區域之間，常常發生勞動力的交換，即如到了收穫時期勞動者從後一區域跑到前一區域，反之亦然。除此以外，我們根據一些報告對於農業勞

動者的外出可做出如下的結論：上巴伐利亞在夏季的幾個月內，主要是吸引從巴伐利亞森林地來的工人，而己卻把收穫早已完畢的區域內的外出工人遣送到斯瓦比亞（Schwaben）去。在斯瓦比亞區內又發生上斯瓦比亞與下斯瓦比亞間的交換；除此以外，基羅爾（Ehrl）地方遣送大批畜牧者到斯瓦比亞來。下巴伐利亞所需的勞動力是從巴伐利亞森林地和波希米供給的，在收穫時期又把他們從維爾斯郭芬區（Wilschhofen）送出到奧斯頓郭費爾（Ostenhofer）去做六個禮拜的工，到收割蛇麻的時候又把勞動者從斯特蘭賓格送到種植蛇麻的區域。上普凡里慈的民工在收穫時期從維金（Weiden）區去到上下巴伐利亞，女工在收割蛇麻的時候就去到產蛇麻的區域；去到這些產蛇麻的區域的，還有連斯塔特（Nenstadt）區的工人；尼馬爾克（Neumarkt）與斯塔特塔姆霍夫（Stadthof）區從上普凡里慈的東部，巴伐利亞利森林地及波希米地方特別吸引女工，有時也吸引童工來收穫蛇麻和馬鈴薯。上佛蘭科尼亞（Oberfrankonia）特別把巴耶魯特（Bayreuth）區的工人遣送到都林根（Thüringen）和薩克森，但是在收割時期就從多山的區域吸收婦女和兒童來收割，因為多山的區域穀物的成熟較晚。在佛蘭科尼亞中部，種植五穀的區域和種植蛇麻的區域之間盛行勞動力的交換；海爾斯堡（Hersberg）區在收割蛇麻的時候就從雷恩（Ren）斯萊沙爾特（Sersart）及奧金瓦爾德（Odenwald）區招來大批民工和女工；在種植甜菜的大田莊內一到春天就來了大批波蘭工人，他們一直停留到秋天。在萊茵普凡里慈的雪金蓋爾高原收穫馬鈴薯的時候就從漢堡區北部的所謂歌樂村裏招來大批女工，而在收

穫的時候又把工人遣送到瓦爾木斯 (Worms) 與奧斯特鄂芬 的區域去，到了秋天派他們到沙阿爾布魯根 公社內去做六個禮拜的打穀工作。還有些大田莊在不久以前，從四月到十月這一時期僱用東普魯士 的工人——（見農村勞動者的境況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 第二卷一五一—五二頁）

這種記錄就整個德意志來說，真是不勝枚舉。

意大利工人的外出採取了極大的範圍，他們夏天在歐洲工作，冬天——在南半球就是夏天——就到阿根廷去做田活。說到中國人的外出勞作更其驚人，當然，他們不是在一季而是在許多年的期間——雖然不是一帶子——去到合衆國、加拿大、墨西哥、東印度、澳大利亞、沙德羣島 (Seydel) 以至於南非洲等地勞作；這在我國的地主階級看來是德國外出工人的一種模範。

但是外出工人的工作不單是農業。除農業以外，大工業、城市、交通事業的發展，都能給他們更有利的職業。在這些職業中間一部分像在農業中一樣，他們可以找到季候工作，可是對於農業經營者最不幸的是夏天，在這一年中正進行着鐵道的建築、開鑿河道、採礦，以及城市中各種各樣的建築工作；一部分使他們得到經常的職業如僕役、苦工和搬夫等等。

有幾處地方發展着一種十分特殊的外出工作形態，例如庫羅·佛蘭克斯丁 (Kuno Frankenstein) 關於維斯巴金 (Weiskaden) 行政區有這樣一段話：吉爾克雷斯 (Dillkreis) 西部，威斯特瓦德 (Westerrald)

地方的全部以及與牠毗連的奧白蘭區的西北部有很多剩餘的勞動力；因此有許多工人都從這些地方去到萊茵工業區并且從春天一直繼續到冬天；其他的工人就去做小販。關於後一種外出（指小販）——牠所形成的範圍極大——烏特威斯特瓦爾德（Unteresterwald）的一個新聞記者有一段很有趣的記載：「到了春天在農村裏就來了許多賣雜貨的人並且在成年的青年男女中挑選小販。在二月間他們就帶着這些人到各國：荷蘭、瑞士、波蘭、薩克森及其他的國家去。那些被挑選的人在幾個主要的地方如連普齊（Lempitz）地方領到商品，這些商品要按照一定的價格出賣，而將賺得的利益交給他們的主人。他們除掉路費之外，還能得薪金三百至四百馬克，但這是要看他們買賣的手腕如何。到聖誕時他們往往帶着許多現款回到家鄉。」

「我們早已看到，在那些地方——這些小販，就是在這些地方招來的，經濟改善了一些，因為兒女們將做工所得的工資交給父母用於共同的消費。做工所得的用於經營的改善上，例如，購買牲畜，特別是購買牛，用於購置人造肥料以增高土地生產力，用於擴大土地的所有權以及存放在儲蓄銀行內。」

「有幾處地方被挑選者為數很大，家中所剩的祇是最必要的勞動力。就經濟方面說這種行商是能夠得到很多的利益，可是在道德上卻不能消失其黑暗的方面，尤其是對於外出的婦女」（見前書第二卷二七頁。）

「普凡慈地方的窮苦的山居的鄉村，願意把自己的剩餘勞動力送到外邊去做吹鼓手：「佛克斯（Vogeln）地方沙礫所構成的土壤，出息很少；甚至就是有三、四、海克塔爾（Hectare）土地的農業經營者，生活也很苦，往往

爲了要增添一點收入就不得不去找求一種補助的工作。在這些村社內「出給工作的人」(註二)不得不不在別的地方找工作。他跑到外地去或是做吹鼓手，或是做石匠，可是很少去做僕役。吹鼓手大都是很儉省的，他們把錢寄回家去，使他的家庭可以無憂無慮的過活，並且還可慢慢地購得一塊小小的田產地業。至於石匠的情形便沒有這樣順利，而剩餘最少的要算是那些在外地當僕役的人了」(同書第二卷一九三頁)。

季候工人經常地回到家鄉，他把自己勞動所得的利益投在自己的農業經營內。這裏城市的和鄉村的、工業的和農業的大經營給小經營以新的力量。長期在外作工的則給小經營以另一種力量。後者(長期外出工作的)大部分是單身外出的，并不全部轉回家鄉。有許多人就在自己新活動的地方定居，但是雖然這樣，他們也把自己積蓄得的錢寄回家去，因爲他們的家庭不能單靠自己的經營來養活。關於愛爾蘭，有人說那地方小農的租金是由愛爾蘭的女人在美洲作工所得的工資來支付的；在德國有些農民所交納的賦稅也差不多都是如此。雖然農村窮困，但還是有不少的人回到他們所生長的那小塊土地上，以備娶妻生子，承繼祖父的遺產，他們帶了自己的積蓄用以暫時補救行將破產的經營，也有用來幫助那過小的經營購置田地，畜養耕牛，修葺破爛的茅舍。

那些幫工對於他們所到的那些國家卻構成一種礙阻發展的因素。他們是來自經濟落後和較貧窮的國家，所以他們的慾望很小，而且大部分又是無智無識的，富於服從性的……他們之所以愈加缺少反抗的能力是由於他們在外國沒有出身的淵源，外國的人民總是敵視他們，並且他們又常常不懂語言。他們對於工資的減低是

心甘情願的，他們是工賊，他們極不容易被組織於職工會之內。但是這些份子在所到的國家中雖是阻礙進步，可是在他們的祖國卻成了進步上最有力的開關者。他們對於新環境無論顯得怎樣矛盾，他們卻不能完全消失新環境對他們的影響；他們摹仿新的要求新的理想這些新的要求和理想對於新的環境無論怎樣落後，可是對於舊環境卻是充分含有破壞性和革命性的。這些份子，他們在所到的國家內是剝削和壓迫的服役者，而在所由來的國家內則成爲不滿與階級鬭爭之促醒者和領導者。

凱爾格爾說：「那些遠行的工人在國外所得到的智力的水準之提高，更大的敏捷和活動力，往往會有這種結果，即堅決的減低對現存的威權的尊敬。這些人成爲很勇敢的、堅決的、目空一切的、很自信的人，並且到處以身作則去破壞那種還存在於西方大部分地產內主人與勞動者之間的、還存在於與當地經濟的和社會的條件完全契合的宗法關係（見論外來的農村季候工人“Die Sachsengänger”，一八〇頁。）」

這樣看來，外出作業所起的作用正和大工業移向鄉村所起的作用一樣；牠們加強了小土地所有，這固然是保守的成份，但同時牠們卻完全改變了小私有者生存的條件，並且引起了完全不是保守的要求和觀念。

誰要是以爲社會生活的極其複雜的內容可以用簡單的統計數字揭露出來，那他就會從這些統計數字中做出和平的結論；以爲，城市無論怎樣發展而在鄉村內一切依然是照舊不變並且也看不出牠一定向着那一方發展。

但是誰要看出在這些統計數字後面隱藏着什麼，誰要是不爲催眠術所迷而只觀察大經營與小經營之間的關係，那他就會得出另一種結論；他就會看到大經營在數量上並沒有變動，小經營也並沒有爲大經營所吞併，但是這兩者於工業的發達亦可在那一方內完全受到革命的洗禮，即小土地所有更加密切地接近那些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而使彼此間的利害關係愈趨接近。

但是這還沒有把經營發展的影響發揮無遺。

經營發展的影響還引起許多新的因素，根本改變了爲市場而生產商品的農業之本質，也就是改變了那種爲社會而生產剩餘的農業之本質。

(註一) 在考茨基所引的引句中“Arbeitsgeber”一字帶有問號。這一定是考茨基引用的報告原文的錯誤。——譯者

第九章 商品的農業所遇的困難之激增

一 地租

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由於近代的大生產，在技術方面把封建時代末期極度衰落的農業提到很高的高度。但是我們也看到，這同一的生產方法引起一些傾向，阻礙大生產的發展與推廣，在已有的社會組織之下，這些傾向劇烈地反對此種生產方法在農村經濟內之絕對的統治，恰當些說，這些傾向不讓農村經濟在已有的技術條件之下達到最高的程度。我們已經看見，這些阻礙的傾向，促進了土地的分碎以後，甚至能夠在某些地方引起農業方面技術的退化。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有害於農村經濟並不單單是牠對大生產所造成的那一種困難。地租的影響在這一方面，也一樣是有害的。我們已經屢次指出，土地的市價，實質上，不是別的，而是資本化的地租。我們在這裏所說的祇是土地的價格而不是地產的價格。建築物、活的及死的農具之價格，像一切其他的商品一樣，最後是由對於牠們的生產所需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

工業資本家同樣也要支付地租或購買土地。但是地價只是他（工業資本家）放在貨幣資本生產中的一小部份。

在農村經濟內就不是這樣。所謂土地資本（即資本化的地租）卻超過了農業經營者在地產的耕作上所耗費的貨幣資本，假如他是在他私有的土地上作經營。

在歐洲中部中等的和較大的經營內——那裏牲畜都飼養在廄內——經營所必需的資本往往只是土地資本的百分之二七——三三，可是這資本有時可降至百分之一五或增至百分之四〇，這要看經營的強度如何而定。這種生產資本在薩克森，一海克塔爾（Hectare）土地平均為四一〇馬克，這是在地產的平均買價為一、九三〇馬克的時候（見克蘭美爾（Krämer）在郭爾慈的“Handbuech”一卷二七七——二七九頁及克蘭佛特（Krafft）“Betriebslehre”五八——六〇頁）。

布亨貝爾格（Buhenberger）引巴金地方的一個大農為例，他的地產值四六、二三三馬克。這個總額中有六、八二〇馬克（百分之四一·七二）用在農具上，五、四八〇馬克（百分之二九·九）用在建築物上，而用在地地上為三三、九二三馬克（百分之七三·四）（見農民的境况“Bauerliche Zustände”第三卷二四九頁）。

所耗費的全部資本中只有四分之一真正地用在生產進程中。

這樣看來農業經營者在自己的經營內可以當作實際資本利用的只是他的資本的一小部分。他一定要將資本的極大部分——三分之一、二、至四分之一、三的資本，付給土地的原主，以使得他的許可去經營。因此他的經營一定要經常地有較小的範圍和較小的強度，比較他的資本在其他條件下所能有的範圍為小。

但是因為實際家（且不管理論家如何）在某些（上面已經指出的）限度以內，在資本之同等耗費之下，寧願擇取較大的（雖然是負債的）地產，而不願要較小的不負債的地產，所以農業經營者是很少，完全支付了地產價格的。他差不多把他所支配的全部資本視為生產資本，並且把他打算進行的經營範圍拿來適合牠（資本）。他並不支付地價或只支付地價的一小部分；地價構成他的債務，這種地價以抵押的形式加諸他的地產；換言之，購買者應有的義務是將地租付給他的債主——抵押品的所有者，這個所有者實質上就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

這樣看來，地產的所有者之每次更換就是債務的來源。如果說所有者的更換是使土地所有負擔抵押的唯
一泉源，對於改善生產的費用之需要在這裏可以勿庸注意，是言過其實的話，那末說此種更換是抵押債務的增長之主要原因則是完全可信的。

在租佃制佔統治的地方，農業企業家可以把自己的資本完全使用在經營上；在這種制度之下農村經濟更可以充分發展其資本主義的性質。這種農業企業家的經營就是資本主義農村經濟的典型形式。

除企業者的資本之完全利用外，租佃制還有一種好處，就是牠容許土地所有者從相互競爭的農業企業家中選擇最能幹的和具有大量資本的（企業家），而在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的時候，農業主的性格則是由他的出身偶然性即由承繼權來決定。

這種情形在小經營之下便沒有多大意義。農民的經營仍舊是很腐敗很簡陋。農民的兒女很早就參加經營的勞作因而得到必要的智識。在各個農業經營者之間能力上的差異在這裏是有的，但這些差異都不怎樣大而且也不會怎樣地影響到經營上面。

大經營則另是一回事。大經營是一個極複雜的有機體，管理大經營要有多方面的實際經驗，要有基本的科學和商業的教育。大地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更加變成帶有城市的需要和傾向的一個階級；他們去到城市，他們把城市的教育給予自己的兒童。農村經濟方面的教育對於大地主的兒子，決不像對於農民的兒童那樣的必要，他們在城市中所受的教育，並不是給他們一些基本的農業或商業的智識。大地主雖然帶了一些城市的習氣，但他們還是深深地沈溺在他們的封建的傳統內。宮廷和軍隊就是大地主的親屬的訓練學校。出身的偶然性往往使年青的人做了農業經營者，他們在跑馬場和上等酒館學習「功課」，並且成了酒和馬的知己。很顯然的，這樣的人並不是在事實上證明大經營優於小經營。但是他們的地產，特別是在地租增加的時候，還可以替他們長期延緩行將到來的破產。

佃戶則不然，他的地租不能彌補企業利潤的虧短，他又不能以地產作抵押取得借款來幫助自己；他每年必須按時交納租金。如果一方面可以選擇最適當的農業企業家，那末另一方面不適當的農業企業家就要很快地成爲破產者。競爭對於這種農業企業家的影響比對於同時是土地所有者的農業經營者更加厲害。

然而除此以外，因爲這種農業企業家在獲得土地及住屋上並不要花費什麼，因而他可以將他的全部資本用在經營上面；所以在資本的某種限度之下他能夠表現出以最大的強度去耕種較大的地產；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租佃制可使純收入達到較高的限度。

但是租佃制也有牠的黑暗面。這裏的農業企業家所最關切的是爲了要使土地能夠提供較高的收入，他就去創造最優良的條件；可是他並不關心於這種收入底長久，他的租約爲期愈短，則他愈不關心。他使土地枯竭愈速，則經營對於他亦愈有利。契約固然可以禁止他這樣的經營，使地肥惡化和貧瘠的經營；租約在這一點上雖有明文規定，但是頂多也只是做到使經營停止在已達到的程度而已。租佃制是不能怎樣促進經濟的進步。農業企業家全不關心於生產中的改善或新的耕種方法的採用。生產的改善和新耕種方法的採用一開始就需要很大的費用，可是要表現出牠們的良好結果——全部或一部分——祇能在租約滿期的時候；牠們是租金增高的原因，也就是說，牠們提高了地租而不是提高他的企業利潤。企業家若不相信有可能在他的租期以內把投下去的資本和利息收轉回來，他是不放心去改善生產的。

租約爲期愈長，則租佃制對於農村經濟的進步亦愈有利。但是在發生地租進加的過程的地方，地主就有許多藉口儘可能縮短租約的期限；這就是將所增加的地租完全放進自己荷包的一個最可靠的手段。

這樣看來，在租佃制之下就如在私有的土地上經營的情形之下一樣，地租是合理的農業經營之強有力的障礙。承繼權同樣也是有力的障礙。

二 承繼法

只有實行土地的完全私有制，取消階級特權取消出身的特權，纔能打斷壓迫農村經濟和工業的封建鎖練。並使農村經濟能夠繼續向前發展。有產者社會，不僅需要一切公民在法律之前平等，而且需要家庭內一切兒童的平等，也就是說，在兒童間平均分配父母的財產。但是這同一會引起農村經濟迅速繁榮的制度，又很快地變成農村經濟的新的鎖練。

父母的資產之分配有力的阻礙了大量資本之集於一人之手。但是資本的集合——不僅是舊資本集中的產物，而且也是新資本積壘的產物。這種積壘爲數極大所以遺產的分配雖然還在繼續，而資本的集合，卻仍是大步前進。

在土地所有權上，還說不上有適合新資本積壘的現象，至少，在舊文明國內，因爲在這些國家內每一小塊土

地都有牠的所有者。但是我們知道土地所有權之集中比較資本集中更加困難。這裏遺產的分配必然強有力地促進土地所有權之繼續分碎。

但是法律的關係無論怎樣深刻地影響到經濟生活，後者總是一種決定的力量。因此土地所有權的分碎只有在在前幾章內所敘述的那些經濟關係容許這種分碎的地方纔能實現。但是在有了這種土地細分的地方，遺產的分配，卻是加速發展的一個實際手段。

反之，在地產預定為商品經濟之用，而不是為家庭經濟之用，即是說地產為競爭所支配的地方，在最大的地產顯然優於最小的地產土地之細分將為一種直接與明顯的不利的地方（如在穀物生產佔優勢的地方）。在農業經營者不能找到副業的地方，情形就不同了，這些地方地產的分碎 *sub-division*，在遺產分散之下，就很難而且很少是經常的制度。在這些地方遺產的分配，往往實現於這樣的形式以內，即是一個承繼者握有全部地產而付給其餘共同承繼者以他們應得的部分。可是因為這個承繼者沒有必要的資本來付給其餘承繼者應得的部分因此要實現這種分配只有承繼者將地產抵押。這裏付給共同承繼者應得的部分就是上述購買地產而沒有充分資本的一種特殊形態。但是在承繼法之下，地產從這一人手裏轉移到另一人手裏是不能隨意所欲的。而且在承繼法之下自然而然地一代傳一代。這裏承繼權只是達到這樣一個地步，就是承繼者得到他的經營他早已負了債並且他一定要把從經營獲得的餘額用來償付抵押利息，因此他就不能集聚資本和改善經營。即使他能

償清債務，他的繼承者也是處於同樣的地位，甚至還要負更多的債，如果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地租增加或資本利息減低或兩者同時發生，則地產的價值便因這一個或這兩個因素而增加。

地產價值的增加對於不再作農業經營者，對於出賣自己的地產的人是有利的，但對於成爲農業經營者並購買地產或和其他共同繼承者一同繼承地產的人就不利。有一種意見，以爲地產價格的提高或人爲地保持較高的價格是促進農村經濟利益，這種意見是再錯誤沒有了。這只是表示現有的土地所有者，農業銀行及以地產做投機的商人的利益，絕不是農村經濟的利益，尤其不是代替舊的一代的新的農業經營者的利益，更不是農村經濟將來的利益。

地產的細分或債務負擔的增加這就是所要選擇的兩條路，有產者的繼承法把農業經營者放在這兩者前使之任擇其一。

在有些國家內，特別是在法國，農村居民企圖藉助 *Zweikindersystem*（二子承繼制）以避免此兩條路的選擇。無疑地，這種制度排除了上述的現存承繼法之不利，但是這種制度像企圖幫助農民的其他手段一樣，觸動着全社會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爲了本身的发展需要人口大大的增加。勞動力的增加極其緩慢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競爭中就要落伍。牠在互相競爭的國家間就會遭受喪失自己的政治權力的危險，在歷史的緊急關頭就不能有首先憑藉宜於武裝的人數的必要的軍事力量。在法國 *Zweikindersystem* 的統治不僅引起國

家軍事力量之相對的減少——法國人口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只增加了二、〇〇〇、〇〇〇，即從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三八、〇〇〇、〇〇〇，而從一八八六年起甚至毫無增加，當時德國在同一時期人口增加了九、〇〇〇、〇〇〇，即從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牠同樣引起國內人口不能供給必要的勞動力，資本家只好從外國去吸取這種勞動力。他們挑選比利時人、意大利人、德國人、瑞士人及其他國家的人。在一八五一年時外國人在法國的總計只有三八〇、〇〇〇人，佔人口百分之一到一八九一年時，就已經有一、一三〇、〇〇〇，佔人口百分之三。在德意志帝國內則相反，一八九〇年時住居德國的外國人只有五一八、五一〇人，佔人口百分之一。這樣看來，*Zweikindersstern* 頂多是犧牲軍事權力及國家工業生產力而走上土地佔有的緩和，這就是爲什麼法國的政府人員及經濟學家一點也不爲這些挽救農村經濟的方法所惑。

三 指定繼承制與承繼法

在法國，革命徹底地掃除了封建經濟及封建承繼法。反之，在英國及德國大的土地所有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還保存了極大的勢力；這勢力有時表現於承繼法的一種特殊形態，大的土地所有者爲了自己，或最低限度，爲了自己最有特權的人保存了這種承繼法——指定繼承制。照這種制度，土地所有權由個人的自由財產轉變而爲

家族的指定承繼人的財產。這一財產轉渡於這家族的某一個（普通是遺產人的長子）使用，但他無權將其全部或一部讓予別人。承繼者的兄弟和姊妹有同等的權利享受遺產者的動產但對於指定承繼人的地產則不得享受。普魯士從農業恐慌時期起指定繼承的財產的數量加增了。在普魯士東部七省內，根據柯蘭德（Konrad）所說，已有的指定繼承的財產如下：

十九世紀以前.....	一五三
一八〇〇——一八五〇.....	七二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	四六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	三六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八四
一八八一——一八八六.....	一三五

從一八七一年起最近十六年間已有的指定繼承財產比十九世紀的頭七十年多得多。新的指定承繼的財產之建立還繼續着。不久以前在出版物上有一個消息，說普魯士在一八九六年建立了十三個新的指定承繼的財產，在一八九七年建立了九個。很明顯的，這些創立並不是一「關心農村經濟」而是關心少數貴族家庭的結果。

農民的指定繼承的各種形態是繼承法的特殊形式，此種形式不是對於地產不作如此嚴格的限制而讓士

地所有者有較大的行動自由，但卻一樣地消滅遺產的分散。在德國和奧大利的某些地方，大農佔優勢，這種形式即令不是在法律上那就是在習慣上被保留下來的。在最近期間曾頒佈了各種法規，其目的在鞏固此種習慣，並給他以法律的根據，因為保守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把習慣看作保護農民階級——私有財產的支柱——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

此種承繼形式能夠消滅土地所有權的那些危險——至少在此種承繼形式堅決進行，毫不動搖的地方，從遺產的分配方面來威脅土地所有權的那些危險，這在我們看來是不會有絲毫懷疑的。但是在這樣的場合之內，這種承繼形式不是別的，而是使共同享受承繼權的人喪失其承繼權，犧牲大多數的農民來挽救農民經濟，刻存有這種權利的人的承繼權以挽救私有財產。一言以蔽之，這是以增加無產者的數量的手段來建築水閘以防止正在增長的無產者。

在指定承繼的大的土地所有權之下，取消年幼的兒女的承繼權，例如在英國所實施的，就沒有多大的意義。教會、軍隊、官廳都關心着給有才智的喪失承繼權的這一輩人以薪俸優渥的差事。農民則不然，他們對於國家和教會就沒有這樣勢力，利用牠們作為自己年幼的兒女的慈善機關。有限制的承繼權在這裏不是別的，而是所有的兒女，除一個人以外，都註定去做幫工。

但是此種承繼形式還以另一方法促進農民的貧困及無產階級化，此種承繼形式愈接近家族的指定承繼

制，即是說此種形式愈是反對土地的細分及因遺產的分配而負擔債務，則促進農民的貧困及無產階級化亦愈迅速。此種形式使土地細分的傾向失其平衡。這樣看來，這種承繼形式能夠擴大經營並將經營放置在合理的基礎上，但同時卻使許多小土地所有者離開他們依依不捨的故鄉的土地。

此種有限制的承繼權形式無論在習慣上，無論在法律上對於小農都沒有力量；她（此種形式）對於他們只是一種鎖鏈；他們的幸福建立在他們的貨幣工資上，與土地所有權不相干，而不是建立在此種土地所有權上，她的目的是在保護大農。在奧大利她只是對於「中等範圍的」土地，在邁克林堡對於至少耕種三七又二分之一德畝的農地，在布萊梅對於至少有五〇海克塔爾的地產，在威斯特凡林及布蘭金堡對於從土地中所得的純收入不下七十五馬克的地產等等纔有力量。

大農底有限制承繼權不僅使他的年幼的兄弟和姊妹，他的年幼的兒女成爲無產者，而且還有一種趨勢，使他的鄰人——小農也變成無產者。而這種有限制的承繼權又以此種方法促進從農村向城市的逃亡，促進農村人口的減少，也就是說牠反對合理的農村經濟的發展。

例如，在黑森「有限制的承繼權的地方」曾有一段記載：「在這裏幾年來對於勞動者的缺乏發出普遍的怨言。許多年富力強的人，他們沒有一點私有財產，他們都從這裏移居到工業區域；在這裏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農業經營者及大經濟的所有者只好從他們當中去挑選自己所需要的勞動者」（見農業勞動者之狀況，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 第二卷(111-113頁)。

這種情形在指定繼承制之下在極大的範圍以內還是有力的。後者(指定繼承制)對於大地產的構成和擴大是一個強有力的手段。總之，要是斷定，在土地所有權以內只是非集中化的傾向佔統治而且只有人爲地阻撓纔能反對此種傾向，這種斷定是不正確的。商品經濟在農村經濟中佔統治的地方這兩種集中和非集中的傾向往往一個跟一個出現或兩者同時出現。據柯蘭德所說，普魯士東部各省，在前一世紀(十八世紀)末葉私人佔有土地在一千海克塔爾(Hektare)以上的，有二、四九八人，所佔總面積爲四、六八四、二五四海克塔爾。這個數目中有三〇八人是指定繼承的財產的所有者，所佔的面積爲一、二四五、六一三海克塔爾，即是比超過一千海克塔爾的所有權的面積的四分之一還多。在法國沒有甚麼指定繼承制。雖然這樣，可是大經營的發展比德國有力得多，像一八七頁上所引的圖表就證明了。在德國五〇海克塔爾(Hektare)以上的經營在一八九五年時佔農村經濟耕種總面積的百分之三二·五六；法國在一八九二年時經營面積在四〇海克塔爾以上的佔總面積百分之四三·〇五。可惜在法國的分類統計中只指出有四〇海克塔爾之多的面積的經營數而沒有指出牠們的總面積。最有趣的，就是增加最多的是最大的經營數在四〇海克塔爾(Hektare)以上的經營在一八八二年時爲一四二、〇〇〇，在一八九二年時爲一三九、〇〇〇，減少——三、〇〇〇，其中：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二年	
四〇——一〇〇海克塔爾	一一三、〇〇〇	一〇六、〇〇〇	減七、〇〇〇
一〇〇海克塔爾以上	二九、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增四、〇〇〇

固然，這是經營的統計，而不是土地所有的統計，但牠總指出了一般的趨勢。土地所有的統計只會表現比所引的經營的統計還大的集中化，絕不會比牠還小。

但如果說只有保護指定繼承制纔能產生大的土地所有權是不對的，那末說此種保護很有利於牠的發生和發展，則是完全對的。此種保護也替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所達到的農村經濟發展的較高階段創造出必要的前提條件。

大地產之較大的範圍首先便能對於每個個別的經濟部門在最能適合這些部門的特殊性的範圍及形式以內去分配地面；牠能夠把不同的經濟部門結合在共同的有計劃的經濟組織之內，另一方面，限嗣相續財產可以減輕以加強經濟為目的的資本積累，因為限嗣相續財產使其免於因遺產的分配所招致的重累。根據一八八三年債務的數字看來在普魯士四十二個行政區內土地純收入一泰勒（德國幣名）的債務（包括抵押建築物方面的債務）為：

指定繼承的財產及根據遺囑的特殊條件的地產	從土地中獲得純收入之其他所有地
二〇・三〇馬克	五〇〇泰勒以上
	八四・四〇馬克
	從一〇〇至五〇〇
	五四・一〇馬克
	一從三〇至一〇〇
	五六・二〇馬克

指定繼承的財產所固有的土地所有權之保證便引起全靠長時期的改良，同樣促進了租佃關係的發展，此種租佃關係在佃戶相信他的權利不致因地產轉移到別人手裏或在土地所有者破產形情之下而被破壞的地方最容易發展起來。

所以因指定繼承制所保存的大地產之存在發生出兩種較高形式的資本主義農村經濟，如在英國為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在奧大利為連合許多農家成一巨大的經濟，這一事實我們不應把牠認為是偶然的。

但如果大地產的這種形式甚至表現出最完善的資本主義經營之進行，比土地所有權的其他各種形式有更大的可能性那麼也正是這種為指定繼承制所保存的大地產，比土地所有權的一切其他形式更能消滅在最合理的基礎上進行經營的必要性，此種必要性的消滅，首先是因為大地產的所有者沒有必要在競爭的爭鬥中保護自己的地產。我們不是這些人，把市場上的競爭與生存鬭爭視為同一東西并以自然的必需來解釋牠們。社會成員間某種相互的競賽及最適當的選擇當然是一切社會繼續進步及已經達到的發展的鞏固之不易的條件。可是有人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質既不和這種競賽相容，也不和這種選擇相容，這種說法是最錯誤的。階級差

別的消滅，各個社會階級的生活程度的平等絕不是說宜於提高各個個人能力的一切社會差異的消滅。現時在工人聯合會內部，在工會會員間並沒有任何階級的差別，任何生活程度（Standard of life）上的差別。我們看到在尊敬上、影響上、個人的表現能力上的差別以及和這些情形相適合的——在選舉代表和管理全工會事務的人時的競賽和選舉，很明顯地，這些差別在這樣複雜的整體內部，如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內還要更加發展。生活標準的不等一點也不厭制互相間的競賽而且也不會調換較高的而同時是最重要最困難的職務時使最適當的人的選擇成爲不可能；平等是此種競賽之必要的前提條件，馬的競走若是從跑馬場的不同位置開跑那是不可思議的；一開始就處於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競賽，同樣是不可思議的。最適當的人的選擇只有在處於同一條件的人們當中纔能實現。

此種競賽和選擇並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意義上的競爭。競賽和選擇現時在資本主義企業內部即已發生，在這種企業內佔着統治的不是像這些經濟學者所了解的那種競爭，而是有計劃的共同協作。當作經濟生活的調節器的此種競爭的統治是開始於有計劃的協作已中止的地方。各個獨立的企業之相互關係在商品生產之下是由競爭決定。在各個企業的內部生產有計劃地調劑，最高的經濟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會達到；在社會內部生產仍舊缺乏一般的計劃，生產如果不是完全混亂的，那只是因爲生產過剩的生產品沒有價值，而那些在牠們上面只耗了極少的社會勞動時間和牠們不能滿足需要的生產品卻要在牠們的價值以上支付，這是所能想像的。

一切中最浪費和最不合理的制度了。

各個企業的所有者及管理者的選舉法是與商品經濟內計劃的缺乏相符合。在生產工具私有制統治之下，此種選舉首先決定於出身的機緣，選舉由競爭來決定，那只是次要的；可是這種選舉不是提拔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把沒有能力的人捧上臺，不是選出沒有能力的指導者於他的企業之外，而是廢止他的全部企業——這種方法，就其殘酷及力量之無結果的浪費而言，牠總是和自然界中各個有機體之生存競爭相調和，姑無論牠們在其他關係內很少共同之點。

但是這種方法無論怎樣浪費，在商品生產及生產工具私有統治之下，牠是一個保證各個企業內生產的最經濟和最可能的合理的配置。雖說限嗣相續財產並不消滅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在這種私有制之下進步祇能由競爭的強制力來完成，但是這種力量（指強制力）對於牠們（限嗣相續財產）是不存在的。爲限嗣相續財產所保障的地產底所有者進行的事業無論怎樣不好，且因此減少他的收入，但是他的地產不會遭到任何的危險。

幻想着藉一種指定繼承制來保證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的完備那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資本極其變動不居，以致忍受着同樣的束縛。資本經常處於物件交換過程中；今天牠存在於貨幣形態內，明天則在生產工具形態內，後天又在商品形態內；牠遭受各種各樣的縮小和擴大，恐慌期及繁榮期的交替等等。反之，土地，無論怎樣常常拿

牠比擬資本。牠是完全受另一規律的支配。土地本身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并不放在流通過程以內。從物質方面說，土地與採取資本形態的生產工具完全不同。生產工具被消磨，土地卻不能毀滅。生產工具由於新的發明，往往變成廢物，土地則一成不變地仍舊爲一切生產的自然基礎。資本間的競爭隨着資本的積疊而增長，也就是說隨着工業和人口之發達而增長，土地則因這種發達而更加帶有壟斷的性質。

因此任何一家要想藉助於加諸工廠或銀行的指定繼承制的限制，以保證其佔有自己的資本是不可思議的，正如此種限制在土地所有權之下去適合全家的利益一樣是不可思議的，雖然指定繼承制比土地所有權底任何其他形式更不勉強進行更合理的經營。現時土地所有者在經營不良的時候，只是損害其自己，暫時減少其地租，但他不能掘壞其家庭收入的基礎。此種基礎能使幾代人生活下去。

在爲指定繼承制所束縛的土地所有權之下經營的不良是很明顯的，近代的限嗣相續財產推想，國家政府必極關切各個土地所有者家庭的幸福，因爲這個政府允許并維護指定繼承制。屬於宮廷貴族的這些家庭。於是便居於特權的地位，各種職業使他們拋棄了農村經濟而且使他們不宜於做農業經營者。雖然如此，但如果指定繼承的大地產不是屬於最劣的經營，而有時甚至還是模範的經營，那末牠們應歸功於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因爲這一類的地產對於這種租佃制是最優良的土地，或歸功於近代的農業學校，提供大批有能力的管理人材，這些人材，只要些須的薪資就去替大地產的所有者服務，而在他們的地產內找到最好的機會去應用自己的智識和

能力。

但是疏忽而無能的土地所有者在選擇其佃戶或管理人時頂容易犯嚴重的錯誤。總之在多數大地產內優良的經營，不是證明指定繼承制的優越，而是證明大經營的優越，大經營的優越甚至在最不利的環境中都能表現出來。

指定繼承制之反對最合理的經營不單是在於牠保證土地所有者的地產。指定繼承制或者一開始其本身就是大地產，或者，如像我們看見的，牠構成這樣的大地產，因為牠排除土地所有權非集中化的傾向，而只讓表現出集中化的傾向。但是地產愈大，則牠所產生的地租總額亦愈多土地所有者的生活亦愈奢侈。可是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指定繼承的財產的所有者，封建時代的傳統在他們還很有勢力，他們極重視那些與土地的佔有相連的享樂。地產愈大，地產的某一部分經營愈好，地租愈高，則將地產的其餘部分專用於享樂，建築華麗的莊宅，極其別緻的花園，及飼養禽鳥的園圃等等的要求亦愈甚，也就是說，用於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的那部分地產亦愈小。此外城市中資本主義剝削的發展在這一方向內也有影響。由於剝削的增長，由於剩餘價值量的增加，遂使資產階級的奢侈隨之增長，此種奢侈表現於別墅的購置和建築——從財政大王的巍然崇高的莊宅以至小商人及工廠主的別墅——這種別墅其主要目的即在享樂，在這種別墅內農業經濟反成一種副業。交通工具愈發達，城市與鄉村間的來往愈便利則這些別墅亦愈深入而農民亦愈大規模地被牠們逐出於自己的地位之外。

但是剩餘價值量的增加及城市與鄉村間往來的便利不僅表現在別墅的建築內，而且表現在游獵之擴大內，這種游獵雖不是封建的特權，但牠一樣成了資產階級的享樂。這一方面引起森林的增加是靠犧牲農民的地產，另一方面則引起野禽的加意保護和繁殖，並不擴大森林的面積。給野禽以食料的不單是一個林場，野禽在田間及草地上都可覓到很好的食物。鳥獸的繁殖正如森林的增加一樣，對於農民的經濟只有破壞的作用。雖然如此，但是游獵的擴大有時對於農民也是有益的。這種游獵甚至擴大到這樣的地步，有些農村公社將自己的田地出租作游獵之用，需要超過供給，於是租價因之增加。在這樣場合內每隻山兔的價值很貴，在農民看來，用自己土地的生產品來飼養山兔和鷓鴣比養牛和人要有利得多。有些農村公社因出租獵場而得到很大的收益。但是農村經濟之合理的經營往往從狩獵方面遇到許多障礙。

這樣看來，甚至城市中剩餘價值的增加也會發生於農村經濟有害的傾向。像地租的增加及承繼權所引起的一樣。至於說到承繼權那末牠的有害的影響，已為那些最接近農村經濟的經濟學家所指示出來了。但是他們以有產者社會利益的代表資格絕不願要求取消土地承繼權和將土地變為社會公有。在理論上土地公有自然不是和有產者的社會不相容，而是資產階級本能地覺得，有產者社會的各個範圍彼此都有緊密的聯系和相互影響，因此資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土地公有，雖然後者（土地公有）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相容的，雖然牠（土地公有）能將農村經濟從一些最困難的而且是隨着每一代增長的重荷之中解放出來。

資產階級經濟學常以學術的態度充滿着同情心，牠設想出特殊的借貸形式，爲的是稍稍減輕與承繼方面遺產的轉移有關的債務。資產階級經濟學大部分說明這兩種承繼制度——遺產的均分與一家中一人獨佔遺產——都一樣是有害無益的，並且從這裏做出結論……他們兩者都是必要的；這一個是用來反對另一個的解毒劑。如果在英國是通行着指定繼承制的各種形式，而在法國是通行着遺產均分制，那末在德國卻是一個極樂世界，在那裏這兩種制度並肩地起着作用。可是我們不能承認，德國的農村經濟所處的地位，由於此種情形，就會比英國的或法國的農村經濟好些。

上述的一切，還沒有把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而發生和加強的一切於農村經濟有害的因素概括無遺。

四 城市剝削農村

我們已經看見地租與農業經營者的債務怎樣地增長。地租及借款利息只有一部分留在農村內被消費或被積疊起來；大部分流入城市，而且這一部分還日益增長。當農村還保存牠的家長制的性質時，農民則不得不在鄰近的地方找到出借金錢給他的人。他的債主不僅是農村中的猶太人、穀物和牲畜商人、店主、旅店老板，而且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富農，他們善於打算盤不會不如別人。但是由於一切關係的發展，借貸已不是一種爲不良經營或特別不幸所引起的偶然行爲，不是一種盡可能祕密進行的行爲。因爲告貸的必要往往是由於借者處境

的貧困；由於利用信用事業已成爲生產進程底必要部分，由於城市與農村間商品流通的發展，原始的秘密的高利貸就爲特殊的機關所排擠，在這種機關內，公開地進行信用活動，借貸成爲平常的行爲，而不是在絕望中所實行的。一種最後手段。因此借貸不是用高利（拾奪式的利息）來償付，而是只用普通的利息來償付。這些機關或者一開始就是城市設立的，如銀行及信用協作社，或者向城市資本家借自己所必需的資本。此種信用事業的轉變乃是發展的必然結局。但是牠對於個別的農民無論怎樣有益，整個講來牠只是表示農村債務的增長，農村照這種債務納稅給城市；農村中創造出來的價值經常增加的那一部分都流入城市，而沒有任何其他的價值來抵償。

地租也發生同樣的情形。資本主義愈發展，則城市與農村在文化條件上的差異愈大，農村愈比城市落後，生活上的愉快及享樂的手段愈使城市與農村不同，同時城市與農村間往來的便利亦隨之發達。如果地租十分高，如果地產達到這樣的範圍，可以租給佃戶或委託雇員去經營，則地主自然而然地寧願把一年的大部分時間或小部分時間消磨在城市內，並且在城市內耗費他的租金。此種傾向之極端表現就是遠離家產——地主離開自己的地產，例如在愛爾蘭和西西里亞一向忽視家務把無限的大地產回復到這樣荒涼的境地，甚至地主在自己的地產中作短時間的勾留都不能滿足他的享樂，而享樂又是這般地主的生活之唯一的目的。愛爾蘭和西西里亞的經營指示我們爲限嗣相續財產所維護的大地產之不幸的結果，發生在現代資本主義大生產沒有發展的地

方，或者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不能消除這些不幸的結果的地方。但是除了極端的離開家產之外，大地主暫時離開自己的地產已成了普遍的現象，同時他的地租的大部分從農村流入城市也成了普遍的現象。地主在農村中之奢侈生活（打獵，華美的莊宅）同樣只是有害於農村經濟，促成耕種面積的減少，及農民勞動力的解放，而在城市中，這同一的生活方式，卻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引起各種職業的增加，引起勞動力的吸收及引起資本的積累。

正在日益增長且以極重的壓迫加諸農民身上的貨幣租稅在同一方向內也有影響。

在城市內生產一開始已經就是商品生產，商品生產的發展就產生貨幣租稅，在農村內尤其是在最小經營內，生產甚至到現在仍舊還是自給的生產，城市的發展把不是從農村經濟生產方法中發生的而原先甚至和農村經濟生活方法，立於矛盾地位的貨幣租稅加在農村身上，因此貨幣租稅制度就成爲生產方法中變革之強有力的因素。

貨幣租稅在農村中是自給生產發展到商品生產的主要動因之一。但是貨幣租稅及以貨幣機能滿足的農民的其他需要，通常都比農村商品生產及與之相適應的商業及借貸機關，增長得快。此種情形直到現在都常常是農民經常感到貨幣的困難及其依賴商業仲介人和高利貸者的原因。

但是這樣厲害地壓迫農民的貨幣租稅祇不是促進農村的發展，而是促進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發展。祇是國稅的極小一部分纔用到農村方面；城市中有兵營，城市中有兵工廠，內閣法庭，其次在城市中有律師，當農民涉

訟時，就得酬謝他（律師）；在城市中有中級和高級的國立學院、國立博物院、戲院等等。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要分擔文化設施的經費，但是農民卻完全享受不到。農民不懂文化，並且仇視文化，這是不足奇怪的，因為文化加之於農民的只是租稅；反動的政治，好像體念民艱，牠需要限制文化事業的費用，牠不去設法將文化普遍到農村方面，不去設法消除城市與鄉村間文化的對立。這將是未來社會的一個主要任務。全部政治生活集中在城市內道不能說是仇視農村經濟，而是由於比政府的希望更要有影響的經濟力量底統治。現代的政府很親切地關心農村經濟。甚至像大家所知道的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如糧食稅，各種的鼓勵及獎金來幫助牠。

但是在財產關係上，因這樣的方法所產生的變化無論怎樣尖銳，然而商品價值從農村流出，（沒有城市價值之相當的抵償）的過程不僅不停止，甚至也不受阻撓。所有這些補救方法畢竟只是有利於地產，這就是提高地租的一種手段。我們知道地租加重農村經濟的負擔；她（地租）的效力，在租佃制之下是明顯的，可是在抵押制之下就被隱蔽了。在租佃之下此種補救准許佃戶付最高的租金。在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同是一個人的地方，很顯然的，前者和後者一同得益；但是地租增加就引起他的地產的價格增高，此種情形甚至可以推動土地所有者去加增他的地產的債務，自然也引他的繼業者——不管是買主或承繼者——的債務負擔之增加。經過短時期後此種對農村經濟的幫助就變為幫助實際的地主，即在財產作抵押之下借出金錢的債主。

這些債主大部分都住在城市內；在那裏大地主消費其地租的一大部分；地租由於賦稅，獎勵等等而提高，并

不是徵取城市以利農村，或使價值從前者歸還後者。地租的提高乃是指：除農業以外，大量城市居民亦被征斂，以利少數的，大部分住在城市內的地主及其城市中的債主。

農業經營者爲支付租稅、借款利息及租金而出賣的生活資料如麵包、肉、牛乳等等之日益從農村流出，卽等於與牠們的等價物之歸還不相稱的而且不斷增加的價值流入城市。同時因爲農村人口用以自給的家庭工業不斷的衰落，因爲農民對城市工業品需要增加，於是這樣的價值（與流入農村的牠們的等價物相等）之從農村流入城市亦隨之增加。但是從價值律的觀點說這種流出雖然完全不是說農村爲城市所剝削，可是實際上牠像上述的諸因素一樣，引起農村的物質的榨取，引起土地缺乏營養料。農業技術的進步也不能補償此種損失，而只是引起從土地中吸取地汁的方法之逐漸改善每年從土地吸取的和流出到城市的食物的數量之增加而已。

反對此種意見的人曾提出一種見解，認爲近代的農學以農業的停滯爲問題的重心，並且要求將從土地中吸取的營養物以適當的肥料重新回復到土地去。可是此種見解絲毫不能動搖上述的意見。土地的貧瘠已是牢不可破的事實。在目前城市與農村的關係及現代土地耕作方法之下，此種貧瘠在短時期內如果不用補助肥料就會使農業趨於衰落。補助肥料能夠防止土地沃度的減少，但是要大規模應用補助肥料，這只是把添上許多其他不是自然必需的結果而是現存社會關係的結果的新負擔加諸農村經濟而已。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對立，或至少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與荒蕪的農村之間的對立消滅時，從土地中取出的東西纔能完全回復到土地中去，

補助肥料在這樣的場合內不僅是使土地飽含某些物質，同時還抵制土地的貧瘠，農業技術的每一成功在那時也就是土地中所含的易溶解的營養物底增加，即使不附加以人造肥料。

很顯然地，雖然農學十分進步，但在英國從六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麥的收成減少了，在這時期以前麥的收成是增加了的。一英畝年收平均為：

年代

一八五七——一八六二	二八·四普昔
一八六三——一八六八	三〇·八普昔
一八六九——一八七四	二七·二普昔
一八七五——一八八〇	二二·六普昔

此種收成的減低在八十年代就停止了，這不是由於地肥的增加而是由於海外的競爭把不適於種植穀物的土地變為牧場，因此種植穀物的只是最肥沃的土地。種植大麥的面積從六十年代起到現在由三、八〇〇、〇〇〇縮至一、九〇〇、〇〇〇，這就是說縮小了二分之一。

此外還應說一說家畜流行病及植物病，由於資本主義農作的繼續發展，益加繁劇的侵入農村經濟並將極重的負擔加在牠身上。有些災害在最近幾十年來已經達到這樣限度，使許多國家的農村經濟的活動完全麻木

了；由於爲害葡萄的蟲類及甲蟲、馬口病、丹毒以及豬瘋所招致損害都值得一提。

「葡萄蟲之爲害所受的損失，（法國）甚至引起稅收的減少，在一八八四年時估計有一二五、九〇〇、〇〇〇法郎在一八八五年爲一六五、六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六年爲一七五、三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七年爲一八五、二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八年爲六一、五〇〇、〇〇〇法郎……根據新近的材料看來，因葡萄蟲之爲害所招致的損害還繼續着。自第一次（一八八〇）出現時起，此種害蟲已遍及六十三區（一八九〇）而且使幾萬海克塔爾的葡萄園都變成一片荒土」（若累斯喬克 *Jurascher 'Uebersichten der Weltwirthschaft'* III: 18頁）。

在德國由於馬口病所受的損失其情形如下：

年	代	犧牲畜的戶數	其中所損失的頭數
一八八七年		一、二四二	三一、八六四
一八八八年		三、一八五	八二、八三四
一八八九年		二二、二一九	五五五、一七八
一八九〇年		三九、六九三	八一六、九一一
一八九一年		四四、五一九	八二四、一三〇
一八九二年		一〇五、九二九	四、一五三、五一九

一八九二年以後家畜流行病暫時減弱。但是到一八九六年時家畜流行病又延及六八、八七四戶，其中損失的，總計有一、五四八、四二九頭。

這是多麼的可怕的數字。

我們覺得，家畜流行病底危險之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於從前有用的動植物種類，已為「貴重的」種類，即為人工選擇的生產品所排擠。自然選擇引起個體——最宜於保存物種的小農的選擇和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工選擇，就把這一契機拋在一邊；人工選擇的任務就是個體的選擇和培養，這些個體是最宜變為價值，牠們需要最少費用，牠們成熟最快，牠們的有用機體最為發達，其不能變為價值的機體就會萎縮下去。這一類「貴重的」物種，產生的利益比自然的物種更大，但是牠們抵抗不良條件的堅實性及能力則異常之小。同時由於改良種之抵抗能力減少，牠們便得到更大的傳布。「貴重的」動植物，在極周到極熟練的照顧之下纔會繁榮，現時，由於竭力對牠們的經營加以保護和改良，纔會容留在這些經營之內。同時經營的性質也起了變化，這種變化在牲畜飼養的方法上尤為顯著。牲畜賴以恢復其壯健和能力的夏季牧場已不存在，可是永遠需要貨幣的農民，其放置牲畜的地方又沒有改良也沒有擴大。在這些農民的廄舍內，狹小而又污穢，中世紀粗壯的牲畜都很難在牠裏面過一冬，現時羸弱的牲畜卻一輩子關在牠裏面。甚至在英國就在高度發達的牲畜業內，廄舍大部分都很難令人滿意。

「威爾遜弗克司 (Wilson Fox) 在其自拉加西爾 (Lancaster) 寄來的報告中說，那些不衛生和建築不良的放置牲畜的地方因地方不寬闊和空氣不暢達，更促成牛羊間結核病的普遍。有時牛所需的空氣不是六百立方尺而只是二百六十立方尺，而隔離已病的牲畜的廄舍則全然沒有。有一個目睹者曾說，如果關於建築廄舍的法律在喬爾萊 (Chorley) 區真正實行起來，那末要有百分之〇·七的牲畜的廄舍應當加以取締」（一八九七年英國農村經濟調查的報告，三六三頁。）

助長荒蕪（爲有害於植物的昆蟲所造成的）的原因之一，就是食蟲鳥的絕跡，食蟲鳥的絕跡不僅是由於牠們的驅逐所致。而且是由於耕種的發達使牠們在築巢時遇到許多阻礙所致。在森林業方面，近代的大生產——建築用的木料爲薪柴所排擠和生長很慢的寬葉樹爲生長很快，迅速變爲價值的針葉樹所排擠——這都是因爲害蟲纒促成森林的荒蕪。

如果近代經營的選擇和方法減少植物及家畜動物的抵抗能力，使牠們不能抵抗威脅牠們的那些小生物，那末交通的發達便幫着這些有害的生物底迅速推廣，使整個區域變爲荒蕪。土地生產物的柔弱性之增大是和土地的貧瘠攜手并進的。除了肥料的費用外還有防止家畜流行病及害蟲的費用，而在害怕花錢或在無力花錢的地方，災荒就往往發生，而家畜流行病和植物的各種損害就會破壞農村經濟。

五 農村的荒蕪

大城市的發達和工業的繁榮像我們已經看見的，會引起土地的貧瘠並將新的，更重的負擔（因防止土地的貧瘠而經常在肥料上所耗費的費用）加在農村經濟身上；但是城市和工業的影響不限於此，牠們從農村經濟手裏奪去了牠的勞動力。

在第七章內我們已經看見農村經濟大生產的發達怎樣地把小農及農村勞動力的後備所從農村中擠出去。可是此種過程有牠的一定界限。另一方面我們在前一章內曾研究了定期的遷徙和暫時的外出是由於小農希望找到一種副業。此種現象也往往使農業的合理經營所必需的勞動力離開農業；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勞動力離開農業，資本從工業中從城市中流到農村經濟方面，也能促進農業措置在合理的基礎上。可是在城市及工業區域的吸引力影響之下，農村人口逃出鄉村所發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

在城市內僱傭勞動者得到職業的可能性較之在農村中更大，更容易備置自足的家庭經濟，更能享受自由和文化的幸福。城市愈大，這些優點亦愈多，牠們的吸引力亦愈強。

在農村中一個家庭只有獲得（購買或租佃）私有的農業經營纔能備置私有的家庭經濟。這種情形在大經營發達的地方就特別困難，因此在這些地方農村逃亡就特別厲害。但是在土地愈加分碎的地方備置家庭經

濟也遇到很多障礙。僕役僱工及女工不能創立這樣的經濟因爲他們缺乏充分的儲蓄。他們一生不僅命定的失去私有的經濟而且命定的做別人家的不自主的附屬物，結婚和家庭沒有他們的份。在這種情況之下，要達到獨立與自由。結婚與成家——這是家庭和結婚的維護人，信教的大農或貴族地主所不允許的——只有一條路。這條路就是逃到城市去做「無道德的」社會民主黨人，這些家庭與結婚的破壞者。

有一個農民（一生過着僕役生活且很澈悟的農民）的一本小的書中隨便一段都能表示出，這個動機在處於僕役地位的農村居民方面是如何強烈。我們在牠裏面看到如下的話：

「目前自由和人的尊嚴無論甚麼地方都不像在僕役或一無所有的農村勞動者當中那樣感到痛苦。大家都知道，農村勞動者要結婚是怎樣的困難，因此我們不再詳述這個問題，我們要直接說到從這裏所產生的結果。因爲，一方面，大多數體力發達的成年人不能完全拋棄性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現代的社會條件使此種正當的要求不能實現，於是爲保護現代秩序而規定的限制，自然就經常地被破壞了。不正當的性交無條件地是這些嚴重條件下必然的結果，並且這種不正當的性交在農村中的僱工及僕役間逐漸成爲一種普通現象，道德和宗教的宣傳者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把牠們排除於現社會之外。近代的婚姻在這些階級是辦不到的，爲什麼他們不會做出這種下賤的性交勾當……很顯然地，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僱工或勞動者的生活當然就充滿了卑污苟賤的生活，做着許多祕密的勾當、欺騙、無恥、強暴以及其他和人類的尊嚴不相容的這一類事實。鄉間一般的輿論在道

德的事件上還加以嚴厲的制裁，結果許多人都寧可逃避這種嚴格的制裁而到大都會的漩渦中。

「僅是未能滿足的愛情的需要或與愛情有關的各種限制，便把大部分從鄉村逃到城市的人驅到這墮落的舞臺上，以致在那裏除少數幸運者外，一代復一代陷於更大的貧困和完全墮落的境地。然而農村無產者的後代在他的家鄉期待些什麼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略述幾句。且不管對這樣的人有何迫切的需要，這些後代的生存頂多只是加重他們父母的負擔；他們很少得到父母的教養，因而他們也沒有一點真正天倫之樂的觀念。在大多數場合內最大的光榮，自然是期望他們不要過於把加諸公社的重負增大。他們的人生的行程開始於他們父母的貧困與恥辱；人生行程的持續就是沒有充分的教養，最後，奴隸傭工底苦命就是他們的佈滿了荆棘的路，往往不為愛情所紛飾的路。」(Johann M. Filzer, "Anschauung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Bauernstandes" 1861, 161頁)。

私有的家庭經濟不僅使他們能夠合法的結婚和成立家室而且使他們在自己職業之外能夠成為當地的公民能夠和意見相同的人聯合——在不大的區域內工人羣衆之集中也會促成城市大工業內的此種團結；組織的力量與參加合作社和政治的生活就開闢了一條道路去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這種情形當然也會把農村勞動者吸引到城市中來。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農村經濟愈強度化，則輻給予勞動者的工作亦愈不均衡。有些機器大大地減少了勞動者的人數，——例如打穀機使原先在冬季工作的勞動力的大部分成為多餘而

別的機器——如條播機——卻正需要更多的勞動，換種耕種也有必要種植需要掩覆的所謂地下莖植物（*Stroh*、*Grün*、*Grün*）馬鈴薯、甜蘿蔔之類牠們在生長時期三番五次地需要人手的勞作，清除雜草和掩覆等等。所以農村經濟之強度的經營一般地講來有減少在冬季牠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的傾向，而在夏季牠在同樣耕種面積上卻需要比較更多的勞動。此種情形，一方面引起僱工及在整年期間因特殊勞役而與經營有關的日工人數之極端減少，同時卻形成不為任何條件束縛於經營的日工底職業更不固定。生存沒有保障，這在農業為副業唯一泉源的地方，一定會把農村勞動者驅到城市，固然在城市中也一樣沒有固定的職業，可是總有很多機會，他在這一部門找不到工作，可以到另一部門內。

交通道路愈迅速發展，城市與鄉村間往來愈便利，農村勞動者愈熟識城市關係，愈易跑到城市去，則遷徙到工業區域和都會的過程其發生亦愈迅速。

城市與鄉村間生產地與市場間交通之便利也是農村經濟中強度商品生產繁榮底必要條件。農業經營者當然很願意鐵路及郵務的改善和擴大，但是同是一個郵政局，牠供給他們市場及播種情況的消息和商業信件，牠也把移居城市的親戚——他們之所以幸福，就是他們逃避了鄉村的奴隸地位——的信件帶給農村勞動者，甚至將報紙帶給他們，這固然是「好意的」，但不幸的是，牠們愈是好意的，便愈哄傳城市工人的幸福和過分的要求，因而使受凌虐的農村勞動者垂涎三尺。鐵路牠們把機器和人造肥料運給農業經營者而將他的麵包，他的

牲畜，他的牛油供給城市購買者牠們，從農業經營者那裏拐帶了替他製造一切生產品的人。

軍國主義在這一方面內也起着作用，牠把許多年青的人從農村吸引到城市，使他們認識城市的生活。誰要是去服軍役，那末對於農村經濟遺損失不僅是兩年（指服軍役期）而是永久的。大地主和富農——軍國主義國家之強有力的擁護者，因此最感痛苦這是不足為奇的。

對城市景慕最先祇是一無所有的勞動者，而牠們當中多半是未婚者。但是由於加在農村經濟上的賦稅負擔之增加，債務之增加，土地之貧瘠，由於農民的經濟和大生產（以及和海外生產，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邊還要說到）的競爭之加劇，由於要能夠支持這種競爭只有經過過度的勞動，不使自己滿足一切文化上的，有時甚至必要的生活上的要求，自願地退化到最野蠻的狀況——農民的土產就更加無力維繫其所有者，從農村向城市的逃亡更加深入到小農最多的區域內。此種逃亡就其範圍而言，在現時已經超過了人口之自然增加並引起農業人口之絕對減少。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在德意志帝國內，農業經營數從五、二七六、二三四增至五、五五八、三一七，農業的耕種面積從三一、八六八、九七二海克塔爾增至三二、五一七、九四一海克塔爾。但是靠農業為生的人口在同一時期卻從一九、二二五、四四五減至一八、五〇一、三〇七，即減少七二四、一四八人之多。此種減少在小農人口最多的地方也和大農人口最多和大地產佔優勢的地方一樣；此種減少在普魯士王國各省及整個聯邦國內都表現出來，只有布魯斯威克（Brunschwick）是例外，在那裏農村人口從一二〇、

○六二增至一二五、四一一。德國僱傭勞動者的人數如下：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減()或增(+)
在農村經濟內	五、八八一、八一九	五、六一九、七九四	(-)二六二、〇二五
在工業內	四、〇六九、二四三	五、九五五、六一三	(+)一、八八六、三七〇
在商業內	七二七、二六二	一、二三三、〇四五	(+)五〇五、七八三

在法國也有同樣的現象。法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其改變如下：

年代	農業人口	非農業人口	農業人口在全人口中之百分比%
一八七六年	一八、九六八、六〇五	一七、九三七、一八三	五二、四%
一八八一年	一八、二七九、二〇九	一九、四二二、八三九	四八、四%
一八八六年	一七、六九八、四三二	二〇、五二〇、四七一	四六、六%
一八九一年	一七、四三五、八八八	二〇、九〇七、三〇四	四五、五%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也一樣是農村人口之絕對減少並且此種減少也一樣是為勞動者人數之減少所形成。

在法國的農村經濟內參加生產的人數，可計之如下：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二年	增加(+)或減少(-)
自耕農	三、四六〇、〇〇〇	三、六〇四、七八九	(+)一四四、一八九
雇農	三、四五二、九〇四	三、〇五八、三四六	(-)三九四、五五八

在這裏雇農人數之減少較之德國尤為厲害。

英國——較大的農業經營及大城市最發達的國家，農業勞動者人數之減少尤為厲害。英國農業經營中僱傭勞動者的人數在一八六一年總計有一、一六三、二二七人，在一八七一年有九九六、六四二人，在一八八一年有八九〇、一七四人，在一八九一年有七九八、九一二人，他們的人數三十年來就減少了三六四、三一五人，即是說減少了三一·三%，或者說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但是這些數字尚未完全表示出農業經營所受的損失。我們已經指出最年青而又能自立的人逃亡的特別多。所剩的盡是兒童和老人，這種情形，無論就定期的遷徙而言，或就最終的遷徙而言，都是的確的。但是這祇是說，由於農村人口數量的減少同時牠的工作能力亦隨之減少。

最近職業的統計，給我們說明了這種現象。德意志帝國在一八九五年時總計有八、二九二、六九二人從事農業，八、二八一、二二〇人從事工業。在這兩個職業部內勞作的人數差不多彼此相等。但是就不同的成年集團說來他們的分配是怎樣的不同啊！

十四歲以上	四一〇〇	三六一〇	三〇一〇	四〇一五	五〇一六	六〇一七	七十歲以上
農							
業							
工							
業							
男、三〇	一、七三、九二	一、六八、〇〇	一、六四、一〇	一、三三、九六	一、四九、四四	七〇、三六	三五、六八
女、三〇	一、七〇、五八	一、三三、一五	一、二五、九三	一、三六、〇四	一、四九、四四	六六、三三	六、三三
在農務方面增加(+)或減少(-)							
(+) 男、八	(-) 男、四三	(-) 男、〇三	(-) 男、一七	(+) 男、一五	(+) 男、〇二	(+) 男、〇三	(+) 男、一〇
(-) 女、八	(-) 女、三六	(-) 女、一八	(-) 女、一七	(+) 女、一五	(+) 女、〇二	(+) 女、〇三	(+) 女、一〇

這樣看來，農村經濟讓給工業一百多萬的勞動力正是從十四歲到四十歲最有工作能力的成年集團。在不
宜於勞動的集團內，這樣的超額（將近一百萬）就留給農村經濟。

我們從巴洛德 (C. Ballod) 的文集 (Die Lebensfähigkeit der städtischen und ländlichen Bevölkerung) 六六頁) 中引用的圖表含有更可驚的數字。普魯士 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一日公佈的統計每千人就
有：

以年齡區分的人數	農村公社及采邑	二萬人口以上的城市	農村人口的多少
從〇到十五歲	三七九	三一三	(十)六六
從十五到二十歲	九四	一〇〇	(一)六
從二十歲到三十歲	一四三	二一〇	(一)六七
從三十歲到四十歲	一二二	一四九	(一)二七
從四十歲到五十歲	一〇〇	一〇五	(一)五
從五十歲到六十歲	七九	六六	(十)一三
從六十歲到七十歲	五四	三八	(十)一六
從七十歲到百歲	二九	一九	(十)一〇
總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

• 原文爲七七，必係誤排。

這裏還可以舉出一些數字，這些數字我們是在霍德斯丁論職業與財富的分配一書中看到的。霍德斯丁研究了英國各縣從十五歲到四十歲年齡中人口的百分比。無須十分詳細，我們只要引用八個較大的和八個較小的農業縣份的絕對數字。

郡 縣	一八九一年每千人人口中		郡 縣	一八九一年每千人人口中	
	在農業方面的	在全體成年的人員中 從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		在農業方面的	在全體成年的人員中 從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
根廷頓	二三二	四〇〇	倫敦	五	四九四
凱布里	一九九	四一九	洛加斯特	二〇	四七九
蓋黎佛遜	一八六	四〇七	德干	二一	四五五
雷特蘭	一八三	四一七	約克	三一	四七五
林柯里	一八一	四二一	斯塔弗	三四	四四六
賽弗克	一七七	四〇六	米里贊克	三九	四六四
勞弗克	一六七	四一〇	瓦爾維克	四〇	四五六
烏愛斯	一四九	四一六	鐸魯特	四九	四五九
	總計	421		總計	425

在以年齡區分的工業人口與農業人口的各層之間其差別是十分顯著的。農村人口生活的堅忍耐勞也自然而然地促進此種分化。但總之，這個圖表很明顯地指示出，在同一勞動人數之下工業據有大量最強健的份子。

但是農村逃亡者的極大部分不僅在體力方面是最強健的份子，而且也是最有能力最有智識的份子，因為正是他們才很快看到自己有逃亡的力量和勇氣而且早就比別人更強烈地感覺到城市的開通與鄉村的閉塞兩者之間的矛盾。大地主企圖降低農村人口的學校教育程度來阻撓這種矛盾的認識之刺激，都是徒勞的。城市與鄉村間，經濟關係非常密切，以致沒有絲毫可能來預防農民不受城市的「誘惑」。地主們努力用中國的長城來防守自己的工人無論怎樣厲害，可是他們所崇拜的軍國主義卻破壞了這個長城並且把年青的農民引誘到城市去。學校教育程度的降低，藉報紙書籍之助以獲取智識的一切可能性之喪失，只是使農村居民對城市的觀念往往不十分明顯而同樣使農村中有智識的人更銳敏地認識周圍環境的粗野，并更迅速地逃到城市中去。

在統計上自然不能確定與農村的逃亡有關的這個現象。但是大家知道，農業經營者所愁的并不是一般勞動力的減少，而是愁着有智識的勞動力的減少。

這種情形更增大城市與鄉村間智識的鴻溝，這個鴻溝是前者（城市）在教育方法上，在鼓勵智力活動的意義上佔很大優勢的結果。除農村人口減少和智力遲鈍之外往往還有體力的退化。體力的退化并不限於工廠的區域。不充分的營養建築完全不合乎衛生要求的住宅，過度的勞動污穢與愚昧，有害於健康的副業，（家庭工業）在許多場合內也同樣引起農村人口體力的衰弱。

在最近期間有些統計數字甚至被人用來證明工業人口在現時一般地已表現其最宜於軍事的服役，也就

是說，他的體力的發達比農業人口還好。但是因為這些數字的證明仍舊還待爭論，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去引用牠們。

但如果此刻一般地還不能說農村人口的體力已經退步，那末卻可以說牠在這一方面已經失去了牠的優越。甚至就在像瑞士這樣的農業國家內，牠的特點已經不是體力的康健。在一八八四——一八九一年期間被徵募服軍役的二四一、〇七六人中有一〇七、六〇七人是農村勞動者和農民。在這個數目中表現出（以百分數計）：

	得延期者	合格者	不合格者
農民	一八·九	六一·七	三八·三
總齡者總數	一九·八	六三·〇	三七·〇

實言之，農民合格者的百分數小於平均數。

不僅經濟的和文化的水準及農村人口的數額減低了，就是他的「體力健康的水準也降低了。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使農業的一切負擔增加，而且使「一切財富之源——土地和勞動者也枯竭了（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十三章第十節「大工業與農業」上述的思想在這一節內獲得了牠的極典型的表現）。

自然，農業生產并不是仍舊不接觸這些變化。首先勞工問題，使牠感到許多困難，這問題在這裏所具有的真

義和城市不同，問題并不在於替工人應計劃些什麼，而在於從什麼地方取得他們。在第七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大地產在牠已經排擠了小經營的地方，又努力人為地去創造牠們（小經營）。城市的引誘愈厲害，則大地產亦愈努力使牠所需的勞動力，依附在土地上。但是在工業有極大吸引力的地方，爲了要拘束勞動者并緊縛他使之作大地主的僱傭勞動，則單是創立小農地還是不夠，在那裏還得要法律的強制：新的小塊土地被創立時，地主就將牠們出租，承租者應盡的義務就是做一定量的工作。新的封建制度就發生，但是不會長久。工業繼續發展就結果牠的性命。這些應執行某幾項工作的新租約，只能保存於工業幾乎不發達的地方。在工業出現的地方，就是最有誘惑力的供給也不能激動勞動者約束自己。他們寧可保存着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以便能夠利用機會更有利地出賣她（指勞動者自己的勞動力）。

凱爾格爾（Kerger）陳述其研究德國西北部農村勞動者的狀況中「無可爭辯的」結論「最好的，對於勞動者與對於僱主同樣有利的勞動關係，就在農村經濟的勞作之大部分，除用經常的僱工以外，都由特種的佃農（*Peitlinge*）來完成的地方，佔着支配地位。這裏僱主爲了要很整齊地完成全部農村經濟的勞作，常常有充分數量的勞動力供其支配而勞動者在物質方面則處於很優良地位，使他們有很多機會去儲蓄并且在他們的意見和情緒上表現出十分的滿意」。

雖然這是過多的滿足，可是有許多區域的勞動者因爲對於這些關係不能滿足，他們還是十分頹廢。

兩種因素障礙了對勞役租佃制的普遍推廣。第一，人民底頑固的獨立的精神，害怕擔負長時期的義務，以爲這些義務是一種奴役，其結果在威斯特凡林區域、潘德堡布林瓦爾布及海克特等地方內這種租佃制的採用好多次都被認爲不可能。第二，礦山工業及煤炭工業之直接的接近，她（特別是在上連馬克區，隨後是在漢堡于布地方）消滅了舊的勞役租佃制而又不使新的能夠發展起來。

「這種情形其原因主要是在於礦業及工業方面有很高的工資。牠使訂立長期租約或勞動契約對於每個農村勞動者都有不利，因爲這種契約在對工業勞動者的需要增高時，就使自己失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獲得利益的機會。」

工業所關心的是要從凱爾格爾先生的封建思想取去未來的東西。

從別處吸引外來的勞動者——一部分是經常的，一部分是臨時的，外來的勞動者——更加普遍了。如果農民之繼續增大的無產化是助長這樣的勞動力（即外來的）的供給，那麼農業勞動者之去到工業區域，就引起對他們的需要迅速增加。在許多區域內要是沒有外來的勞動者，農業的經營就不能存在。但是外來勞動者底勞動無論怎樣重要，牠只能將農村經濟因勞動者的缺乏所感到的困難平均地分配於全國，或在吸引國外勞動者的場合內，分配於少數國家，但牠不能供給整個農村經濟以新的勞動力。從外邊吸引來的勞動供給這一個地方，那牠是剝奪了別個地方的勞動，這些外來勞動者的勞動是取之於東方的勞動力，以之供給西方；牠把勞動者的

缺乏推廣到還沒有直接受到工業影響的地方，並且藉暫時的遠離替經常的遷徙準備下一個基礎。外來的勞動者向來就不能代替那些去到城市的本地人。我們已經說過，從農村逃走的首先是最有能力最有智識的勞動者。反之，外來的勞動者是來自經濟落後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人民的教育以及農業都很低下；其結果不僅是整個農村工人階級工作能力的降低，而且往往是農業方法上的退化。

例如，凱爾格爾從冶金工業區——威斯特凡林寄的通訊說：「當地勞動條件的一般特徵就是差不多完全缺乏本地的農業勞動者；甚至全部勞動者的兒女，只要認可，就把自己專門供諸冶金業。因此從事農業的所有勞動者差不多全是從外地來的。從東部及西部普魯士漢薩哈諾威威爾德克以及荷蘭等處招來僱工，並且這些招募都經常地進行，因為他們在農業方面大部分頂多只留一兩年，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冶金業方面的勞動較為容易且有較高工資。到收穫時期，外來的勞動者，就是尤其是從米金（Mindoro）區來的，所謂的畢連費德的收穫人。有人能夠在一切場合之內避免僱用這些高價的外來勞動者，並努力進行一種經常的勞作。在瑞姆及漢根地方地產平均很小，因之在那裏收穫人也很少，而在小土地所有佔絕對優勢的瑞姆地方，這些收穫人更其少。

誠然，根據少數的報告看來農業勞動者的真正缺乏在這些地方尤其是在工業內事業不振的地方，並不為人所注目，但是經常的勞動者之極其缺乏和優良的農業勞動者之極其需要是被感覺到的。許多報告都說到找尋勞動者的困難而在某一個報告中則肯定說，勞動者的缺乏，尤其是優良的勞動者的缺乏為數很大，以致大

多數農業經營者都無意經營」。(見 *Verhältnisse d. Landarb* 第一卷 133 頁。)

在漢薩大公國 (上漢薩) 的報告中說：「從前有過年年都在作工的真正職業化的日工階級，這些日工由於他們的工作證明了，他們熟習於他們的職業，並且對這些職業很有經驗，他們能夠勝任這種職業。但是這個階級消滅了；許多打穀機奪去了冬季農業經營中的工作，在工業區域內纔能在整年期間找到工作，於是，在七十年代中葉，就開始向威斯特凡林、比利時、巴黎等地移居，隨後移居到美洲、澳大利亞、阿根廷，爲的要在那些地方「尋求幸福。」我們當然承認，他們當中有不少的人，的確在那些地方找到了幸福。現在他們從自己熟人中引誘較有希望的份子跟他們。他們中有所謂結婚的僱工——各國各民族如瑞士、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波斯、上西列細亞甚至瑞典等國的混合種；一部分是被誘拐來的，或從別處攜帶來的，一部分是自由來的，他們一般講來，都是些墮落的人，在和放蕩的女工之下層亂交中過活的，沉於酗酒的一羣流氓，雖然他們缺乏職業的技能，缺乏智識，缺乏忠實，往往找到較高工資的工作，如在農莊上當馬夫或所謂的「司關人」（牛乳業中的牧人和工人）。但是這些定居在此地的勞動力對於大規模種植甜菜的經營還是不夠；於是在春初就從萊茵 (Rhein)、愛赫斯費德 從巴瓦尼亞 (Bavaria)、什瓦慈瓦德 (Schwartzwald)、上西列細亞、波森 (Posen) 以及西普魯士等地招來大批新的外來男女工人，他們得到很高工資，一直到秋末爲止，這是因爲上漢薩地方本地居民不願被僱在農場上作長期的工作」(見 *"Zustände der Landarb"* 第二卷 133-134 頁。)

最後，爲了解釋工業的進步所引起的農業的衰落，讓我再舉出第三個例。

魯道爾夫邁耶爾 (Rydolph Meier) 博士在他的論文中 (Neue Zeit 新時代十一卷二期二八四頁)

引證波希米地方一個官地，有幾千海克塔爾面積，種植甜蘿蔔及穀物的地產的管理者的報告，在報告中這個管理者說：「在先我們屢次用馬耨來掩覆爲條播機所播種的穀物，但是現在我們不這樣做了，因爲不熟練的工人要管理牠們就損失許多穀物。我們差不多沒有十分熟練的工人，做經常駕馭耕畜的工作，而那些少數比較適宜的人都很快地改換了。青年人在軍役時期一旦熟識周圍的世界，他們已經不願作長期而繁重的勞動換取低微的工資，他們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因此本地居民中留到我們名下的是一些老人、小孩、婦女，我們只有從塔波爾 (Tabor) 這個偏僻的地方僱用日工。他們很羸弱，而且很粗笨，他們不能做機器工作，因而馬曳打穀機只好放在我們的茅棚裏讓牠生鏽。」

這些報告告訴我們，在近代農村經濟中利用那種工具，牠在蒸汽及電氣時代是最適當的工具——機器，來抵償勞動者的缺乏是怎樣地困難。農業經營者並不是到處都能找到宜於機器工作的勞動力，就是現有的勞動力也一天天地離開了農村經濟。我們且置這一點不談，機器現時在農村中已有很大的成功，雖然牠還不能達到足以抵償勞動者缺乏所必需的那個限度。我們找出了此事的唯一指示，就是農業經營者企圖採用機器來幫助自己。我們在這裏不是已經講過，農業機器就所生產的生產品數量而言，常常節省了勞動，但就耕種面積而言，并

不常常節省勞動。在一定的面積上農業機器比簡單的工具需要更多的勞動者。在有些地方因為採用一些改良的機器，人手的需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條播機對於一定面積的播種比簡單的播種機或單單用手播種需要較多的勞動」（見郭爾茲 Goltz “Die L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一六八頁）

末了，我們還要介紹反對勞動者缺乏的第四種手段：充分的增高工資較優的待遇，極經久的住宅，勞動者之較好的營養。這種手段當然是上述四種中最實際的，但是很顯然地，爲了要保證農村經濟所需要的勞動力，這種手段還是不夠。較高的工資，並不是吸引農業勞動者到城市的唯一因素；冬季找尋工作的較多的機會，較大的獨立性，較易備置家庭，以及城市文化之高於鄉村，這些因素，除非工資極度增高，總會減弱。

格羅斯曼 (Grosman) 在其著作中 (Zustände der Landarbeiter) 寫道：「說到僱工的缺乏，那是在沿厄爾巴一帶卑濕的地方主要是抱怨僱工們到城市去。報告的起草人看見這種現象非常驚奇；在鄰近小城市內被僱的僱工獲得的工資比他們在農村中獲得的工資稍多三分之一（僅僅如此）甚至在漢堡工資平均并不高，而用費卻很高。」較優的待遇也一樣無力長時期地束住工人：「我們知道有許多地方農業經營者不把僱工當人看待；僱工往往要受很平淡的，有時是很壞的現成的飲食，他們沒有一間舒適整潔溫暖的房屋，可以在裏面消磨閒空時間，更是常見的事；有時他們在拉圾堆上在房屋的盡頭處收拾一間特別的臥室，那裏沒有地板，沒有坐的椅凳至於棹子更說不上了。反之，有人也許以爲，安分守己的僱工當其在少數家族內把他們視爲家庭

的一員，當其和他們談及自己的經營事業談，及他們的私事，和他們同一棹吃飯的時候，他們就很滿意自己的命運，在那地方往往很不平常的，就是讓他們在宜於居住的房屋內消磨空閒的時間，或者分給他們別的舒適整潔而又很溫暖的屋子，同時作為他們的臥室，供給他們可讀的報紙等等可是在這些地方，僱工們就打算做一個郵務員、鐵路職員、裁縫、店員等等，或者在大城市內找一個位置，因為在那裏可以比僻靜而遼遠甚至常常沒有一家酒店的單調的鄉村過着較為優裕的生活。安分守己的僱工在目前工資高的時候——假定他們不太早結婚，可惜這種情形是很偶然的——可以很容易賺得一些工錢，以便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能夠（尤其在目前地價低落的時候）購置一小塊土地，在這小塊土地上養四條牛和幾頭羊」（見同書四二三四頁）。

無論是較高的工資無論是獨自佔有土地都不能維繫大批農村勞動者不逃出農村。農村勞動者事實上用什麼別的方法纔能達到較高的工資及較好的生活條件呢！沒有這樣一個企業家階級，牠會自願地同意工資的提高，除非強迫他這樣做以外。農村僱傭勞動者現在仍是很弱，還不能用自己的組織力量來達到工資的提高。農村中工資的提高——只是勞動者繼續缺乏的結果。較高的工資及勞動者之充分供給，這——至少直到現在，是農村中相互排拒的兩種現象。

所以，意見無論怎樣好聽，要希望工資這樣增高，以阻止勞動者不逃出農村，那是不行的。這種逃亡仍舊循着牠的道路進行任何障礙都不能阻止牠。

安德生格蘭茲 (Anderson Graham) 在其文集 "Rural Exodus" 中 (引自雷德斯—Goldshstein 的 "Berufsgliederung" 三九頁) 關於這一點說道：「如果他們得着較低的工資，如在威賽爾 (Wiltshire) 地方那麼他們就遷居別處；可是如果他們得到較高工資，那末——如在北安伯蘭德 (Northumberland) 地方——他們也一樣逃亡。如果農莊小，如在斯萊佛德 (Sleaford) (林肯縣 (Lincoln) 區，那末他們就離開這些農場；但是在農場很大的地方如勞爾弗克 (Northolt) 區農村的逃亡，還是繼續增加。深信只有失望的農村居民，覺得在農村中對於他已經不會有任何幸福的前途，他不加思索地把鏟子、鋤頭丟在一邊就跑開了。」

因為自助無力，於要解救這種不幸，就要有國家的強制。對於僕役採取最嚴厲的懲罰，對於破壞契約的懲罰，結婚的困難等等當然是保證農業經營者有經常的勞動者；用禁止遷徙的辦法使移居的自由中止或感困難，替移居城市的人造出許多障礙如火車票價的增高等等，——所有這些情形當然會使那些暫時或永遠離開的人滯留在家鄉。但是前一種方法只是使農村生活對於僱工及訂立契約的勞動者更加難以忍受而這種情形又必然加強他們的逃亡。取消移居的自由，甚至假如工業人口和他們調劑，假如這種調劑能夠實現，那自然是幫助了個別的農業經營者但不能幫助全體農業經營者。取消移居的自由，就等於從無數小農手裏剝奪了副業的唯一泉源，并使他們陷於極度的貧困。取消移居的自由同樣使工業區域內依靠僱傭勞動者經營的各種農村經濟成爲不可能，因爲那裏，像我們已經看到的，要是沒有外來的工人，農村經濟便不能進行。取消移居的自由在經濟落

後的地方延緩了農村經濟的破產，而在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則加速了牠的破產。

防止農村經濟中勞動者的窮困還是不會生長出資本主義社會內治病的藥草。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所處的地位，有如封建時代的農村經濟在十八世紀末期一樣：牠已陷入死巷，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從死巷中振拔出來，而置於社會的磐石之上。

讀了下述的一段，就可以想到過去一世紀的情形。「勞動者的缺乏，在進行大經營的地產內，同樣在大農方面即已存在而且是特別感得到的。因為勞動者的缺乏，極大的地產甚至農民的土地都分租出去；這種情形本身引起不幸的結果：農村經濟的改良無法實行，反而引起特種掠奪的經營，因為很少飼養大的牲畜，並且差不多專一使用廁所裏的肥料，這自然是有害於土地的肥沃。結果，多沙的地方，在以前耕種不是沒有利益，而現在卻放作開田，并且數年不復耕種，勞動者自己的田地往往任其荒蕪，勞動者自己工資高的時候作僱傭勞動所得的比耕種自己的田地所得的為多」(Zustände der Landarbeiter, 第二卷二〇六頁。)

這樣的消息是從海森 (Gessen) 地方得來的，而從巴瓦尼亞 (Bavaria) 得來的消息則是：「像一般報告中所說的，巴瓦尼亞有幾處地方勞動者的缺乏不僅引起正規進行的經濟不斷的破壞，而且引起經濟強度的降低」(見同書一九〇頁。)

上面所引的關於外來勞動者的影響那段文字也值得和這些作一比較。我們且置全部技術的進步不談，有

些地方，農村經濟的衰落無疑地已經開始。如果勞動者的缺乏不停止，那末農村經濟的衰落，會成爲普遍的現象。勞動力的數量減少，必然會有一種結局，就是可耕的而積逐年減少，而牧場的面積逐年增多。（見郭爾慈：Dio. *L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一七六頁。）

凡是利用僱傭勞動者的經營都經驗着勞動者缺乏的壓力。但是在小經營內這種壓力比在大經營內更易被感覺到。在他們（小經營）的處理內，即使不是爲要消除勞動者的缺乏而是爲減弱某些地方勞動者的缺乏，其辦法也很少。他們沒有可以租給僱傭勞動者的土地，他們只有以完成某種工作而得土地使用權爲交換條件來維繫僱傭勞動者。他們對於勞動者的需要并不大，只是要取回從遠方招來勞動者的特別費用。他們一定要給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以優先權；他們全然不能利用機器，而對於充分提高工資的事他們的辦法也比別人少。

可是這些最小的，靠僱傭勞動的經營正是利用那些勞動者，他們最容易從這個地方移居到別個地方。即未婚的勞動者，雇工及女工。

在供作商品生產的，而不是專門或幾乎專門供作家庭生產的經濟之間，那些——雇用少數僱傭勞動者，在農忙時候就使用自己家庭的勞動力，可是這已足夠維繫所有者於土地上的經營，也就很少爲農村的逃亡所牽動。一般講來，五——二〇海克塔爾的經營都是如此。逃出農村，這種傾向愈是包括農人口的大部分，則土地細分的傾向（大部分正是威脅這些經營的）亦迅速地減弱，這對於他們甚至是有益的。同時土地的需要減少了，并

且小塊土地的不相稱的最高價格降低了。土地的細分已不是有利的了；地產分碎為若干部分也中止了。這樣看來，在德國土地所有權的範圍內正是這些經營纔是唯一的，很能獲利的經營，這是毫不奇怪的。在農村經濟的土地使用權中總面積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增加了六四八、九六九海克塔爾（Hektare），而從五至二〇海克塔爾的經營之面積則增加了五六三、四七七海克塔爾，從一至二海克塔爾的經營之面積則減少了五〇、一七七海克塔爾，從二〇至五〇海克塔爾的經營面積減少了六二、八九八海克塔爾。

每一、〇〇〇海克塔爾中作為農業用的面積，有如下表：

年 代	少於一 <u>海克塔爾</u>	由一—二 <u>海克塔爾</u>	由二—五 <u>海克塔爾</u>	由五—二〇 <u>海克塔爾</u>	由二〇—一〇〇 <u>海克塔爾</u>	由一〇〇—一〇〇〇 <u>海克塔爾</u>	一〇〇〇以上
一八八二年	二四	三三	一〇〇	二八八	三一一	二二二	二二
一八九五年	二五	三一	一〇一	二九九	三〇三	二一六	二五
增(+) 減(-)	(+)-	(-)-	(+)-	(+)-	(-)-	(-)-	(+)-

顯著的增加只是在五——二〇海克塔爾以內的中農經濟，而減少最多的則是在二〇——一〇〇海克塔爾以內的大農經濟。

這些數字使國家底全體善良公民內心高興，他們看出農民是現存制度之最強固的藩籬。他們很興奮地叫

喊着，不，這種農村經濟牠不會被搖動；馬克思的教義對於牠們是無用的。在這些數字中非集中的和集中的傾向實際上互相抵消，這些傾向在我們這一時代在農村經濟內到處都表現出來直到八十年代。很顯然地，農民底新的繁榮來臨了，牠（指新的繁榮）一定會使工業的一切社會主義傾向受挫頓。

但是這朵鮮花卻開在泥沼裏面，牠不是生長在農民底幸福之地基上而是生長在整個農村經濟受壓迫的地基上，牠是那些原因的結果，那些原因就是：已經被採用和試驗過的機器又被拋棄，勞動契約的封建形式重新恢復，田地爲牧場所排擠，有些田地空閒着不去耕種。當其替農村經濟很完滿地解決其特殊的「勞工問題」并替牠開闢出新的繁榮的可能性時，就在這時，對於中等經營有利的諸傾向立即又變成了牠的相反的方面。農村經濟的興旺與農民經濟制度的繼續存在——這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是兩個互相排拒的概念。不僅是歐洲的經驗，就是北美合衆國東部各邦的經驗都說明了這種情形。

我們也不應希望，目前農村經濟的衰落，影響一個相當時期以後，會達到排擠大經營和小經營，會給農村經濟中的中農階級以絕大的優勢，（還在十九世紀初期西斯蒙德就很熱情地將這種優勢描述給我們了，）會使這一階級能夠以自己的「不要前進一步」來對抗整個社會的發展。

中農階級雖比其他生產商品的農民階級更少擔憂勞動者的缺乏，可是往後從近代農村經濟所產生的其他重負中比別人更感痛苦的卻正是他！中農是高利貸者和仲介人的剝削之主要對象；貨幣租稅及軍事服役很

繁重地加在他們身上；貧瘠的危險更加威脅他的土地。因為這種經營是商品生產的經濟當中最不合理的，因之牠更加要在非人的勞動和非人的生活方式幫助之下去進行競爭。我們想起一句俗話，就是說，小農在他們沒有自己的耕畜時，他們的生活還比較舒服，「一旦有了私有的耕牛，他們的可憐生活就開始了」。

這些農民的相當大的土地還可以把它們維繫在土地上。可是這也只能維繫他們自己，但已不能維繫他們的兒女。像僱傭勞動者和小農一樣，中農的子女亦有逃出農村的傾向——工業愈接近他們，則此種傾向愈有力。有一省（當地農民很康健而又強壯）即斯連茲維郭里斯廷（Schleswig-Golstein）來的報告說：「那些僱工，同樣農民的子弟，他們在未投入軍隊以前是在父兄的經營內做工，在退伍後就很少長期地回到農村；假如他們沒有學到一種職業的話，他們都跑到城市裏，因為農村生活已經不能使他們留戀。」（“Verhältnisse der Ländarbeiter” 第二卷四二六頁。）

中農的子弟愈是很快地覺到齷齪而知足的，大部分直接受敵刺的，僱傭勞動者的境況的困難，他們愈是設法離去農民的野蠻性，則中農的家庭更加減少，也就是說，他們進行自己的經營其可能性亦愈小，僱傭勞動者在這裏就開始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且勞工問題和其他的不幸，在這個階級更易感覺到。

在現時，中農不見得是真正保守的，滿意現存制度的份子。恰恰相反，他們渴望着現存制度的變革，正如最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樣，但是他們所走的方向，自然是和後者（社會民主黨）完全不同。雖然如此，可是他們并不

實行國家的變革，他們攻擊我們無論怎樣粗暴，可是他們已經不是現存制度的支柱。農業的危機伸其爪牙於一切商品生產的農民階級；牠并不憐惜中農。

第十章 海外食糧生產的競爭及農業工業化

一 輸出的工業

最後幾章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打斷了封建的鎖鏈并給農村經濟以很大的推動，因之在幾十年之內使農村經濟推進得比先前數百年還遠，這種生產方法造成更加壓迫農村經濟的傾向并更加加劇適應現代生產方法的佔有形式與合理的農業生產底需要兩者之間的矛盾。

這些壓迫的傾向早已顯著，但是牠們只在不甚重要的階段上壓制着農村經濟和土地所有者，那時後者（土地所有者）還能夠把這些傾向所造成的負擔推到別人身上，推到消費者身上。那時有過這樣的可能性，農村經濟，從封建國家沒落開始以後，經過了一個黃金時代，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

邁岑 (Meichen) 有一段記述是提到這個時代的 (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s, 第一卷, 四四〇頁)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農業部編纂促進普魯士農業耕種的國家法令之備忘錄的作家, 很正確地說: 被期待着的土地法的實行已不能再等待了; 農村居民已經從

睡夢中覺醒了。幸運的湊合已將一般的幸福普遍到所有者——無論農民地產的和貴族地產的所有者當中了，並且由於土地能夠無阻礙的耕種和購買者之無限制的競爭，遂使一切地產的買價極度增加了。」

普魯士的農業部長此刻卻用完全另一種話來說了！到七十年代後半期糧食價格已不斷地增加，和工業生產品的價格很尖銳的矛盾；牠們（糧食價格）比工資的增加快好幾倍，勞動者曾親眼看見自己的狀況愈趨愈劣，這不僅就他是生產者而言是如此，（因為剩餘價值率的增高，即是他們在他們所生產的價值中應得的部分的減低，）就是就他是消費者而言也往往是如此。農村經濟的幸福是建立在無產階級的貧困上面。一〇〇〇啓

羅麥根據柯蘭德 (Konrad) 的計算值：

年 代	英 國	法 國	普 魯 士
一八二一——三〇年	二六六・〇〇馬克	一九二・四〇馬克	一一一・四〇馬克
一八三一——四〇年	二五四・〇〇	一九九・二〇	一三八・四〇
一八四一——五〇年	二四〇・〇〇	二〇六・六〇	一六七・八〇
一八六一——六〇年	二五〇・〇〇	二三一・四〇	二一一・四〇
一八六一——七〇年	二四八・〇〇	二二四・六〇	二〇四・六〇
一八七一——七五年	二四六・四〇	二四八・八〇	二三五・二〇

土地問題

一 啓羅格蘭姆肉值：

年 代	柏 林	倫 敦
一八二一——三〇年	六一 舊實。	? 舊實
一八三一——四〇年	六三	?
一八四一——五〇年	七一	八七
一八五一——六〇年	八五	一〇一
一八六一——七〇年	一〇〇	一一三
一八七一——八〇年	一二五	一三一

舊實——德國小幣名等於百分之一馬克(譯註)

在七十年代纔完結了這種不斷的增加。一〇〇啓羅格蘭姆麥值：

年 代	英 國	法 國	普 魯 士
一八七六——八〇年	二〇六·八〇馬克	二二九·四〇馬克	二一一·二〇馬克
一八八一——八五年	一八〇·四〇	二〇五·六〇	一八九·〇〇
一八八九年	一三七·〇〇	一九八·三〇	一九二·〇〇

根據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最近的報告，一夸特麥的官定價格爲：

一八八九——九一年	三二先令	一辨士
一八九〇——九二	三三先令	一辨士
一八九一——九三	三一先令	二辨士
一八九二——九四	二六先令	六辨士
一八九四——九五	二四先令	一辨士

在柏林，一啓羅格蘭姆肉在一八八一——八五年值一一九普費，一八八六——九〇年值一一五普費，在倫敦，在一八八一——八五年值一二四普費，一八八六——九〇年值一〇一普費。

糧食價格之變動，從七十年代起，就和先前的背道而馳。

此種變動的原因，正如現代農村經濟內其他各種大變化一樣，應當在工業的發展中（工業的發展更加使農村經濟受自己的支配）去尋找。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構成生產之不斷的變革，這是由於新資本之繼續不斷的積疊和運用資本的科學之不斷的進步所產生的技術的變革。因此大量資本主義或生產的生產品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年年地增加；牠比人口的增加更快。

此種財富之不斷的增加，由於那種情形（即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剩餘價值的生產不是供給僱傭勞動

階級而是供給資本家階級的，而同時是範圍極大的生產，生產品之大量的生產，為大眾的消費而生產（反成為資本主義生產者之不斷增加的困難底泉源，這不是很奇怪的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與封建的或古代的生產方法之實質的差異就在此。封建主或奴隸主也榨取自己的勞動者的剩餘生產品，但是他自己和他的食客把這剩餘生產品消費了。反之資本主義式地佔有的剩餘價值，平常一開始就採取一種應為大多數人民所獲得的生產品的形態，然後纔獲得作為資本家消費的生產品的形態。資本家正如封建主和奴隸所有者一樣一定努力去限制大眾的消費以增加自己的私有；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要顧慮的——這封建主和奴隸所有者所不知道的——就是不斷地提高大眾的消費。這是一種最特殊的矛盾，也是一個最不愉快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已擺在現代資本家的面前。

樸實的社會政治家，同樣熱情的社會主義者早已企圖證明給資本家，勞動羣衆的消費愈多則大量的消費亦愈高，因此為要維持生產的進程及其不斷的擴大，他只有提高工資。但是這種見地頂多是能夠使個別的資本家很高興地看着別個生產部門中工資的增高，但無論如何總不願在自己方面使工資增高。

麥酒釀造者很高興因為別人的勞動者的工資增高而提高大眾的消費，但無論如何總不願提高他自己的勞動者的工資。誠然，工資愈高，則資本家能夠出賣的亦愈多。但是他不是為着出賣，纔生產，而是為着將利潤放進荷包裏。剩餘價值愈高，則利潤亦 *Oaeteris Paribus* 愈高，而在勞動者所供給的勞動的同一數量之下，工資愈低，

則剩餘價值亦愈高。

可是資本家早已知道除了增高勞動羣衆的消費以外，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提高資本主義式生產的生產品之大量消費。資本家不是在無產階級的勞動者當中，而是在還沒有無產階級化的羣衆當中，首先便是在農村人口當中去找尋自己的主要銷售市場。我們已經看見，他們怎樣破壞農村人口的家庭手工業并替自己的大量生產品的銷售創造出廣大的市場。

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愈是得到極大的發展，僱傭勞動者階級——就是創造大量生產品，但在物質方面祇能消費其生產品的一部分的階級，在人口當中愈是佔優勢，則此種市場亦愈益表現其不足。市場擴大到本國以外，爲世界市場，而生產及世界市場之不斷擴大，已成爲資本主義工業的生存問題。近代擴大市場的角逐，使黑種人有鞋穿有帽戴，以軍艦、大砲、鐵路惠給中國人，這就是現時代的特點。國內市場在現在差不多完全依賴國外市場。事業是否很好進行，無產者與資本家以及商人、手工業者、農業經營者是否能夠很多地消費，這主要是依靠國外市場。一旦世界市場已無法再迅速擴大，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也就走到牠的末路了。

二 鐵路

和不斷的企圖擴大工業生產品的銷售市場攜手并進的就是運輸事業的變革。

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開始就基於大量的生產之上。但是有了大量的生產，牠還需要大量的運輸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單是為輸出自己的生產品。資本主義的大工業消費大批原料，這些原料不是牠的鄰近的地方所能供給的；牠把這些地方不能養活的大批的人集中起來。但是原料和生活資料祇有很小的比價。在很大的重量和容量上，牠們只含有少數的勞動；只有特別廉價的運輸工具纔能運輸大量的原料和生活資料到遠地方去，不致將成本費提高到最大的限度。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原則上，只有水路纔是這樣廉價的大量的運輸工具。這種方法只有在沿海一帶或在特別便利的沿河一帶纔能發展起來。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需要的不止是廉價，而且需要大量運輸的迅速和安全。資本的周轉愈速，則在某項企業內用於一定範圍的資本的耗費亦愈少，在一定額的資本之下，企業的範圍亦愈大。如果我把我的商品從滿徹斯特 (Manchester) 運到香港 (Hongkong) 那末我在三個月之內或在一年之內得到商品的付價，這對於我不是沒有區別的。如果我的資本在一年之內周轉四次，那末我的利潤在其他條件相等情形之下，就要比一年周轉一次多四倍。

另一方面交通愈迅速，則我愈能在遼遠的地方找到自己的買主，我愈能迅速地擴大我的銷售市場而無須延長投入企業內的資本的周轉期，無須增加這種資本。

交通的速率愈大，則為要使我的企業完整地進行，我所需的原料的儲藏亦愈少。並且在這方面，運輸事業的

各種改善就可以做到以一定額的資本能夠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或在原有範圍內以少數的資本進行生產，最後，也能夠擴大自己的關係底範圍。

就在這一方向內，交通之較為安全也有影響。交通安全可以減少後備資本和原料的儲藏；這些是企業者爲了保證自己不受銷售和供給的不規則性所應有的。

但是用帆船、小划船這一類的水路運輸或用馬馱道在交通的迅速和安全底意義上就不見得有多大希望。運河及河流在冬季結凍，海有暴風亦有危險，而風平浪靜或逆風對於急性商人更壞。

祇有人類應用汽力纔能夠創造出那些大量的運輸形式，牠們解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對水路的依賴以後，同樣把牠（汽力）安置在大陸的內部，於是整個世界就變成巨大繁榮的大工業底銷售市場。

十九世紀初期就已經發明了機關車和鐵路，但是牠們的應用差不多只限於大工業佔優勢的那些區域內。祇有大戰——完結了舊歐洲與美洲底殘餘的大戰纔替大工業區域以外的鐵路之猛烈的發展開闢了一條道路。祇有從那時候起，鐵路纔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而是牠的前因。如果俄國在克里姆戰爭以後，與匈從一八五九年起，尤其從一八六六年起用盡一切方法獎勵鐵路的建築，那末這主要是因爲戰略上的緣故。這就羅馬尼亞、土耳其以及印度的鐵道而言也的確是如此。但是商業的立場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有牠的意義。政府需要金錢，爲的是要能夠支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而他們的人民能夠拿到市場上去的唯一的一生產品就是原料和糧

食。所以，他們需要創造大量的運輸工具。

美國資本家在內戰以後所建築的，使資本在合衆國內得到普遍統治的鐵路，首先就是爲了這個目的。這些道路之有利的結果，很迅速地引起一種摹仿并且現在歐洲財政界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在歐洲以外經濟全然落後的地方，甚至往往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建築鐵路。這一類的鐵路的建築不僅是資本過剩的一條排水渠，因爲資本底過剩反而桎梏歐洲的資本家階級，不僅發見甚至往往創造出使歐洲工業迅速發展的新市場，而且發見及創造出供給原料及糧食的新來源。不久以前基芬（Giffen）發表了下述的（到下述年代的末期）鐵路網的長度表（一英里等於一、六〇九米達）：

地名	一八五〇	一八六〇	一八七〇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八九五
歐洲	一四、五五一	三三、三五四	六四、六六七	一〇五、四二九	一四一、五五二	一五五、二八四
美洲	九、六〇四	三三、五四七	五八、八四八	一〇九、五二一	二二二、七二四	二二九、七二二
亞洲	—	八四四	五、一一八	九、九八四	二二、〇三二	二六、八九〇
澳洲	—	三五〇	一、〇四二	四、八八九	一三、三三二	一三、八八八
非洲	—	二七八	九五六	二、九〇四	六、五二二	八、一六九
總計	二四、一五五	六八、三七三	一三〇、六三一	二三二、六九一	三九六、四五三	四三三、九五三

在一八七〇年歐洲鐵路網的長度還佔全世界鐵路網二分之一，在一八九五年只佔三分之一。在這個時期

歐洲鐵路網的長度差不多增加了五倍，同時美洲鐵路的長度則增加了七倍，而其餘三洲的鐵路網則增加了三十倍之多。

蒸汽在航海方面也引起了同樣的變革，雖然沒有這樣厲害。根據詹南斯 (Janasch) 的計算，在世界上主要的航海國中，來往船支的排水量，其噸數為：

年 代	總 噸 數	其中汽船的噸數
一八七二(三十八國)	一三七,二二六,六〇〇	五二,九〇八,九〇〇
一八七六(四十五國)	一八九,七八五,三〇〇	一〇〇,七五四,七〇〇
一八八九(四十一國)	三六〇,九七〇,八〇〇	二八七,九六五,一〇〇
一八九二(四十一國)	三八二,四八〇,六〇〇	三一三,三九三,一〇〇

鐵路及海上運輸的價值不斷降低。根據柴林格 (Zearing) 的統計從支加哥運貨到紐約—布吉 (Bushel) 的平均稅則為：

年 代	水路運輸	鐵路運輸
一八六八年	二四·五四仙	四二·六仙
一八八四年	六·六〇仙	一三·〇仙

• 一仙 (Cent) 為美國金圓百分之一。

一布昔麥從紐約用輪船運到利物浦在一八六八年運費平均為一四·三六仙，而在一八八四年就已經祇要六·八七仙了。

從那時候起，運費更加減低了。根據一八九六年農業部出版的美國年鑑 (Yearbook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看來，一布昔麥從紐約運到利物浦的運費為：

年 代	一 月	六 月
一八八五年	九·三〇仙	五·〇〇仙
一八九〇年	一一·一三仙	三·七五仙
一八九六年	六·一二仙	四·〇〇仙

一百磅麥由鐵路從支加哥運到紐約在一八九三年運費為二五仙，而在一八九七年則為二〇仙。

此種運輸業的發展完全改變了歐洲農村經濟的狀況。農業生產品的特點，像我們已經講過的，就是牠的比價不大，即是說牠們在比重上含有比較不多的人的勞動，如馬鈴薯、乾草、牛奶、水菓之類，而麥和肉也是如此。有許多農業生產品不耐長期的運輸，例如肉，許多種水果和菜蔬。在運輸工具的原始狀態之下運輸強有力地提高了這些生產品的價格，並且牠們的運送超過相當的，很有限的距離以外就完全不可能。供給城市市場的糧食大半

都是地方的事業，且以鄰近的地方爲限。這些地方佔有了剝削城市消費者的壟斷權，而且很巧妙地利用牠。離城市最遠的地產——牠們也是要滿足城市的需要——之較高的運費，提高了城市附近的地產之級差地租。糧食的運輸推廣到某些區域以外，其困難的增加，也同樣很有力地提高了絕對地租。

鐵路的建築，當時她只限於有高度工業發展的地方，在這裏只發生了很少的變化。誠然，鐵路替城市市場開闢了糧食供給的新泉源，但是也只發生於與靠近城市的地方的條件相仿的條件之下。可是這些鐵路首先便引起了城市市場極大的擴張，因爲大城市數目的迅速發展和極大的增加只有由於這些鐵路纔有可能，這些大城市就是現時代的特徵。同樣牠們並沒有引起地租的降低；恰恰相反，從鐵路建築開始時起一直到七十年代，地租在歐洲各處都迅速地增加了。鐵路幫助了利用此種地租的提高的地主人數的迅速增加。牠們異常地增加了農村地主們所應得的地租的總額。

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內所建築的那些鐵路卻有另一種作用。但是這些鐵路很難引起糧食的生產過剩；牠們擴大了城市市場，增加了工業人口的數量，牠（工業人口的數量）在最近幾十年內要是沒有海外糧食的供給，就不能夠在歐洲增加得如是之快。威脅歐洲農村經濟的並不是輸入的糧食的數量，而是牠們的生產條件。生產在那裏並不擔負那種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加於農村經濟的負擔，由於這些生產品在市場上出現，就使歐洲的農村經濟不能在將來把由於土地私有制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所加於農村經濟的迅速增加的重負轉嫁於消費

者身上。生產的本身要擔負這種負擔，現時農村經濟的危機也正是在此。

三 生活資料生產中競爭的區域

壓迫歐洲農村經濟的國家可以分爲兩大集團：東方的專制主義的區域和自由的（現在的或以前的）殖民地，假定，現在這樣的國家，如俄國還可以歸到前一集團。這就農村人口的關係而言，這樣的分類，大體上可以說是正確的。

在前一集團內農村人口完全爲國家及統治階級的意志而犧牲。這裏資本主義還不曾建立起國家的政治生活，國家，至少在農村內在這裏只是農村公社之簡單的集合體，每個農村公社都過着自己的特殊生活，而且因牠的孤立性在國家底集中力量之前是全然無力的。但是當時這樣的國家還不會超過簡單商品生產的階級，農民的處境在這一類的國家內還不算十分壞。他個人不能和國家政府接近；保護農民和在國家面前他的利益的代表者就是他的德謨克拉西式的組織的公社，并且政府要過度的榨取公社的血汗就很少有辦法，就是牠要這樣做也沒有多少理由，因爲牠只能有限的應用以自然物形式繳納義務的那些自然生產物。東方專制政體的殘忍和血汗的榨取在城市中單就宮廷貴族、大官、富商方面說比在農村中更厲害。

可是在政府用這些或那些方法和歐洲資本主義接觸的時候，這一切情形就完全改變了。歐洲的文明以軍

國主義、官僚政治、國家債務等形態鑽進這些國家；她同樣驟然間提高政府對貨幣的需要，提高牠對待農村公社的力量。勞役現在變為貨幣租稅，而且已經部份地存在過的但不甚重要的貨幣租稅被提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並且無情地被勒索。農村經濟在這樣的國家內，是主要的生產部門；農村人口愈懦弱，則幾乎完全加在農民身上的租稅的負擔亦愈重。農民底愉快生活已去到無何有之鄉了。農民進行着掠奪式的經營，這在私有的勞動力方面與在土地方面一樣，為的是要從牠們中儘可能榨取一切。閒暇的時間做手藝的時間都沒有了，南俄農民的美麗的木頭雕刻和刺繡那是以往自給自足時代的事。大量的收穫都被聚積起來，土地沒有空閒的時候；對於貧窮生活的維持不是絕對必要的一切東西都拿到市場上去了。但是在差不多每個居民——農民，都準備出賣糧食而完全不需要購買的農村中什麼地方去找買主呢？糧食的輸出遂成爲生活問題，從內地到港口或到邊境去的鐵路的建築，在政府看來是必要的，如果政府要想能夠向農民徵取貨幣租稅的話。關於這些糧食的價格，就很難說是由生產成本費來決定。牠們的生產并非資本主義式的，並且是在國家政府和高利貸者（向着貨幣租稅的轉變就使他出現到舞臺上）的壓制之下出賣。

租稅和高利貸的利息愈高，農民的貧困及長期的奴役愈甚，則他愈加不能不按照各種價格出賣其生產品，他爲清償債務而應繳給債主，富農或地主的勞動量亦愈大，他拿到市場上去的生產品的數量亦愈多，他在這些生產品上所得的價格亦愈低，在他的債主的地產上所生產的生產品，亦愈廉價地出賣。農民因租稅及高利貸的

利息而日益加增的負擔，並沒有在這裏把生產品價格提高，反而把牠減低，這種負擔極度地降低小農的地租和工資，究竟降到甚麼限度這裏還不能說。

由這一類的競爭看來，凡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生產的且必須計及農村人口已有的生活程度，已有的工資以及在地價及抵押借款內已規定的地租的農業，凡是不採取掠奪式的經濟而是在靜止狀態內保存土地的肥沃以及供其支配的勞動力並不充分的農業，就不能穩固起來。

美洲殖民地和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競爭比起和歐洲資本主義接觸的東方專制政體的國家如俄國、土耳其、東印度這種的競爭就完全不同。在那裏我們看見站在世界政治外邊，不知道軍國主義為何物而且很少負擔租稅的自由農民之強有力的民主政治。一望無涯的肥沃的土地在這裏不為任何人所有，因為她（土地）的原有的主人——少數原始的居民不是被消滅，就是被排擠到小的地域去了。這裏還沒有個人壟斷土地的事，還沒有地租；土地還沒有價值。農業經營者無須像歐洲一樣把自己資本的大部分耗費在土地的購買上，他可以把資本完全用在經濟的設備上。所以在同樣的投資及同等大小的地面上，農業經營者在殖民地比在歐洲能夠達到農業經營之更高的階段。來自歐洲的移民遇到他必須與之適應的完全新的條件，在這種情形下，新的條件就很快地消滅過去歐洲農民的傳統和偏見。

還有一種情況在這裏促進着農耕的發展。土地尚未枯竭，還完全未開墾過。她不需要任何肥料和任何的換

種耕種，許多年能照常提供一種同一生產品的豐收。所以農民既不需要購買肥料，又無需自己製造肥料；他可以完全只限於耕種一種生產品，例如小麥；而且交換愈發達，他愈是只生產商品而無需為自己的消費生產，則他愈是只種植一種生產品。此種生產的單一性使他能夠異常節省勞動力和生產工具，而且同時使自己的生產工具完全適合於他們預定的那個目的。小麥的種植者除耕畜外既不需要牲畜的廄舍，又不需要飼料儲藏所。又不需要飼養牲畜的勞動者；他無需種植各種有根植物，而且他能節省勞動力和原料。因為地租不存在，這種單一性的生產就使殖民地的農業經營者在同樣的投資及勞動之下，以及同一的地面上能夠得到比歐洲更多的收入，或者能夠在同樣的投資及勞動之下耕種更大的地面，每一海克塔爾（Hectare）能獲得同樣的收入。人們通常指出勞動者的缺乏以及高度的工資引起向機器勞動的轉變，來解釋美國農村經濟中技術的高度發展。但是這個因素，若沒有其他剛才指出的兩個因素就不見得能在這樣的限度內表現其作用，像在實際中所表現的那樣。

「勞工問題」在那種——像牠在歐洲農村經濟中存在的意義內對於殖民地是不存在的。我們假定，他們的人口比歐洲文明國家的人口更少，勞動者的人數就勞動的供給範圍而言也很少。但是依賴勞動者之現有人數的并非農村經濟的繁榮而祇是農村經濟進行的方法。在勞動者很少的地方，那裏就廣泛的經營，那裏人的勞動就儘可能用機器及其他工具來代替。但是，在現有的耕種方法之下，在牠的支配中勞動者的人數是否減少或不減少，他們的工作能力是否被限制或不受限制對於農村經濟底繁榮無論如何不是沒有區別的。農村經濟的繁

榮其決定的因素并不是牠的勞動者之現有的數量和技巧，而是這些因素在牠裏面發生變化的趨向。可是在這一方面殖民地也勝過歐洲。

使歐洲農村成爲荒蕪的逃離土地這件事，不僅供給城市而且供給殖民地以新的大批體力壯健的農作人，并且是他們中最有智識和最有能力的農作人，他們在新的條件之下就成爲而且不能不成爲更有能力和更有智識。那些不能適應完全改變了的條件的人，就滅絕了。『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移民經過幾年後就變成很有才幹的人，他在這裏過着格外優裕的生活。他好像從乾燥的土地上移置到潤濕的土地上的植物一樣——這種比擬是對的，就是直到現在，當勞動在這裏比在歐洲得到更好的酬報的時候，這種比擬仍舊是對的』（見邁耶爾 R. Meyer, "Ursachen der amerikanischen Konkurrenz" 一六頁。）軍事服役，奪去農業的勞動者，在殖民地是不存在的。柴林格 ("Die landwirtschaftliche Konkurrenz Nordamerikas" 一七九頁) 明顯地說：「在佃農的區域內常常聽到有人抱怨高度的工資，但很少聽到有人抱怨勞動者的缺乏。」可是高度工資也并不是一個水平線上。在那個時候，即如在歐洲要得到充分數量的農村勞動者就十分困難，因而他們的工資一般地被提高了而在殖民地，因爲新的勞動力不斷流出，工資遂有下降的趨勢。根據柴林格的統計（見同書四六九頁）一年間農業勞動者的月薪以美金計等於：

州名	一八六六年	一八六九年	一八七五年	一八七九年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五年(五月)
加利弗尼亞	三五·七五	四六·三八	四四·五〇	四一·〇〇	三八·二五	三八·七五
東部諸州	三三·三〇	三二·〇八	二八·九六	二〇·二一	二六·六一	二五·五五
中部諸州	三〇·〇七	二八·〇二	二六·〇二	一九·六九	二二·二四	二二·五〇
西部諸州	二八·九一	二七·〇一	二三·六〇	二〇·三八	二三·六三	二二·二五
南部諸州	一六·〇〇	一七·二一	一六·二二	一三·三一	一五·三〇	一四·二五

普遍的向下變動是很顯然的。山上所引的全部事實看來，就容易看出，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給歐洲農業經營者的善意忠告：他們應當像美國人一樣成爲有智識的，美國的競爭就會失敗，這種忠告是何等可笑。但是很顯然地，在發展過程中美國人自己并未成爲更有智識的，反而成爲更沒有智識的，就是說他們開始學着歐洲人的樣子。

我們剛纔描畫的殖民地農村經濟的圖畫對於美國祇在相當的階段內是對的。這種農村經濟是建立在掠奪式的耕種上（關於此種經濟底方法可參看本書二一〇—二一二頁。）遲早牠就會使土地枯竭。

正因爲這種情形，農業經營者時常從貧瘠的土地轉移到新的土地成爲必要的了；爲此，他必須或者很早使他的地產具有這樣的範圍，即牠除保有耕種的部份外，還要有未耕種的部份，或者在他的土地枯竭的時候，他

就去到很遠的沒有耕種過的地方，就在那裏耕種新土地。就其游牧式的性質而言，殖民者的農業很像古代日耳曼人的農業。其間相差不過是殖民者的農業是用近代技術的全部補助工具來經營，并且不是爲着自己的消費而是爲着出賣而經營。但是正因爲這種情形，近代游牧式的農業其使土地枯竭比日耳曼人的農業當然更快。被拋棄的土地當她的肥沃未恢復時就放着不耕種，或者轉移到歐洲人的樣子以換種及肥料來耕種的農業經營者手裏。在一切場合內舊的土地遲早會不利於廣耕的掠奪的經營。接連四十年不斷地在牠上面種殖小麥而不施以肥料（見柴林格同書一八八頁）的土地，是很少有的。美國農村經濟之不固定性可以從下述的數字中看出；種植小麥的面積其畝數（以英畝計）爲：

年 代	西部諸州	中部諸州	東部諸州
一八八〇年	六、一〇〇、〇〇〇	二二、七〇〇、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一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七、六〇〇、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〇〇
增（十）或減（一）	（十）五、三〇〇、〇〇〇	（一）六、一〇〇、〇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〇〇

在同一時期在東北諸州內農業耕種的總面積大大地縮小了，耕地面積已從四六、三八五、六三二英畝減到四二、三三八、〇二四英畝，即是減縮了四百萬英畝以上。美洲殖民者的土地饑饉在土地如此迅速枯竭的情形之下一定比古代日耳曼人的土地饑饉更厲害，如果日耳曼變爲 *Vasina gentium*，變爲大多數人民

的永久生母，在人民遷徙時代一個跟一個到非洲去，那末美洲東部同樣也變爲 *Vagina gentium*，變爲移民者的出發地，在幾十年之內充滿了大陸以至太平洋沿岸。

從歐洲強有力的移居促進了西方的這種運動，因爲在肥沃的土地上進行農村經濟沒有地租，沒有軍國主義，沒有賦稅，這一遠景是太誘惑人了，她（遠景）使無數農作人拋棄——根據我國詩人和政治家的斷言，他們（農作人）因層層束縛而與之相聯繫的——祖遺的土地，并到海外去找新生活。

現在美國全部肥沃的土地都是私有財產的目的物。農場的數目增加得更其緩慢。從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農場數增加了一、三四八、九二二個，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而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祇增加了五五五、七三四個，即增加百分之十四。土地更不自由了，土地提供地租而且有了價格。同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受私有財產的負擔的壓迫亦已開始。美國的農作人現時必須購買地產，因買價付出的金額，遠減少他的生產資本，他必須依靠借款在比以前更小的地面上經營。或者他必須租佃地產。當他臨死的時候，他不能再告訴他的兒女在極西有自由的土地，他的兒女彼此分取他的財產，或者他們中的一個出錢從別手裏購買這份地產；這同樣不能不引起債務或經營資本的減少。於是土地變小，地產的債務以及他們的經濟設備的惡劣就會到來。但是同時卻因此增加對農業經營者的要求。土地已枯竭，新的土地又絕非無代價地可以得到。肥料、換種、牲畜的飼養就成爲必要的了，而這些都需要額外勞動力和金錢。美國從一八八〇年起把用在上一年的補助肥料的用

費都列入調查內。牠們（費用）在一八八〇年爲二八、六〇〇、〇〇〇圓，在一八九〇年爲三八、五〇〇、〇〇〇圓。債務和地產縮小的新的原因，也就和這些一同出現。

租佃制和債務開始根深蒂固且普遍起來。北美農村經濟中出租的地產在一八八〇年佔總數百分之二五·五六，而在一八九〇年則爲百分之二八·三七。農場的債務在一八九〇年時第一次在全合衆國內都被登記了。那些不是出租而是作爲私有者自己使用的農場，其中在一八九〇年有百分之二八·五六都負了債，在這個數目中，大部份都是在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各州內。八八六、九五七個負債的農業經營的地產，其中有一七七、五〇八個農業地產是在靠近大西洋北部的各州內（佔當地農場的三四·二二%）有六一八、四二九個（佔四二·五二%）是在北中部各州內，當時在西部諸州內僅有三一、七五一個地產（佔二三·〇九%），在大西洋的南部諸州有三一、〇八〇個（佔七·四三%），在南中部諸州有二八、一八九（佔四·五九%）。債務的總額計有一、〇八六、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爲農業地產價值的三五·五五%。百分之八十八負債的農場其負債的原因爲：買賣、農業中各種改良，機器和牲畜等等的購置。這些條件在由廣耕過渡到深耕的那個時期就阻止了外來的移居，而對勞動者的需要就增加。一八八二年移居美國的僑民有七八八、九九二人，這算是達到了牠的最高點。從那時起移民不斷地減少并且到一八九五年時移居的人數還不到二七九、九四八人。從德國遷居出境的在一八九一年爲二二〇、九〇二人，而在一八九七年就減至二四、六三一一人。

在此種情形之下工商業猛烈地發展起來，並且牽動了人口的大部分。生產者的人數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在工業內增加了四九·一%，在商業及運輸業內增加了七八·二%，在農業內（包括礦業）祇增加了一二·六%。

勞工問題的時期對於美洲農村經濟也迫近了。但是工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奪去農業的勞動者，除此以外，牠還促進軍國主義的發展。工業變為輸出的工業，努力佔取世界市場并和競爭的國家發生衝突。軍事有很大的需要，國債增加，賦稅也增加起來。工業的發展其本身引起震動全國的危機，失業工人達到可怕的限度，階級鬭爭更加殘酷，統治階級更需要強有力的手段以杜絕和預防不利的運動。這種情形也幫助軍國主義的發展。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本身更加成為用自己的壟斷權去剝削人民的上層財政界底所有物。這就表示美國農村經濟負擔的增加和牠在世界市場上競爭能力的評價。

歐俄及印度的競爭屆時也一樣失其尖銳性。掠奪式的農業必然引起佔統治的經濟方法的破產。在歐俄和印度比在美國還早，因為在這裏（歐俄及印度）後備的土地很少，舊的耕種過的土地已經更枯竭，并且耕種土地的工具又很惡劣，因此農民更加貧困，更加喪失其牲畜以滿足高利貸者和徵稅吏。結果就是慢性的、定期的特別劇烈的饑荒。在這種情形之下輸出有時還能增加，那是由於鐵路建築把所有新的尚未枯竭的土地都捲入循環交換底漩渦內，但是最後這種經濟或者會使國家完全解體，或者過渡到大地主或大農底資本主義的經濟，

後者（大地主或大農之資本主義經營）在俄國已經有許多端倪。

農村人口的無產階級化，投到市場上的大批賤價勞動和廣大土地的買賣以及這一過程的反面——積壓資本的農村高利貸者的許多階層的發生，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前提條件。正因為有了這些條件，俄國的生產條件纔更加和歐洲的相似，而俄國的競爭其對價格的壓制就更小。但是誰要是從這裏得出結論，說農業危機將要迅速地消滅，那你就犯很大的錯誤。引起危機的過程不停地向前進，並且替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殖民地內，在東方的專制國家內開闢出新的區域。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南美洲等地還可以找到無人移居的土地。魯道爾夫邁耶爾（Meyer）博士在一八九四年時寫道：

「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倫敦『經濟學者』雜誌上引了幾段駐阿根廷英國領事官的報告，其中說：在本年內用於耕種的地面祇有一二又二分之一百萬英畝（五、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Hectare））而宜於耕種的地面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或九六、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Hectare））但是除此以外，還要加上其他拉巴拉他州（La Plata）委內瑞拉（Venezuela）巴西（Brazil）的一部對於耕種有同樣條件的廣大地面，因此在南美洲全部宜於耕種的地面，即宜於種植小麥的地面總計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Hectare）其價值是很顯然的，如果注意到在最近幾年種植小麥、蕎麥、燕麥、大麥的地面，在美國約為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奧匈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為四、〇〇〇、〇〇〇

○海克塔爾，德國爲一四、〇〇〇、〇〇〇法國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總共爲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Hectare）（見 *Der Kapitalismus Fin de Siecle*, 四六九頁）。

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一八九七年）的結論也是這樣說。西比利亞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塔爾產麥地在鐵路幫助之下爲世界市場而被開發；鐵路很迅速地從東西南北直達非洲中部，而中國的開發在鐵路幫助之下也是最近將來的問題。雖然在後一個國家內急希望生活資料輸入的增加而不是生活資料輸出的增加，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和印度有許多共同點，所以我們不必在這裏從鐵路建築中期待着在那裏的那些結果：家庭工業的破壞農民加速的負債，資本主義工業緩慢的發生，可是除這些以外，貧困和饑饉亦同時增長——農業生產的輸出增加。饑荒永遠流行的印度往往輸出小麥和米——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擔麥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擔米。

俄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根據最近的材料看來，農民在這裏每年生產約一、三八七、〇〇〇、〇〇〇普特穀物（除種子不計）。俄國爲本國的食用需一、二八六、〇〇〇、〇〇〇普特，餘額爲一〇〇〇、〇〇〇普特。這就不足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如果農民自己及其牲畜要得充分的營養，則這個差數需得向外購買。大家都知道，農民不唯不這樣做，他還出賣麵包。他須不差分毫地繳納捐稅和價款，可是賣給他的卻什麼也沒有。

同樣的原因迫使中國農民出賣米和麥，不管他（中國農民）怎樣需要牠們。

自然，並不是一切國家都宜於小麥的生產。但也不是無條件地必須用麵粉來營養，過去已經有過若干次企圖用別的食用物：玉米、米、高粱之類來代替麥和燕麥。這些企圖，在小麥的運輸增加以及對代用物的需要不存在的時候，就沒有多大成功。但如果有時到了連種植小麥和燕麥的全部土地都不空，而麵包的價格又繼續不斷地增加，那末發明的志趣馬上就傾向於以熱帶生產物中的代用物來代替原先的穀物，那時不宜於種植小麥的熱帶地方如美洲中部、巴西北部、非洲的大部分、印度、佐德羣島也就加入歐洲穀物生產者的競爭者的隊伍中了。

自然，這種競爭有時一定會停止，而失其破壞的性質。地面是有限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直然以令人昏迷的速度在推廣着。因此農業危機有時一定會完結，因為這種危機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和進步的工業國家競爭中發生出來的。但如果這種競爭停止，那末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便失去更向前推廣的一切可能性。可是不斷的擴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生存的原則，因為技術的革命和資本的積累不停地前進，生產更加變為大量的生產，在那時大眾在其生產品中應得的部分就不斷地降低。因此農業危機只能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危機所完結。這個時機可以避開或接近，但無疑地，資本主義社會內農業的危機絕不會停止的，可以說農業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骨髓。如果直到現在加諸西歐農村經濟上的資本主義的重負現在開始壓榨牠的美國、俄國以及其他

國家的競爭者，那末這是證明并不是西歐的農業危機已臨近於牠的末路，而是農業危機的領域已推廣得更遠。

樂觀主義者，即自由派的經濟學者對我們預言農業危機快要完結，已經有二十年了，而農業危機在二十年來一年比一年加深和擴大。我們當然不是把牠們認為過渡的現象，而是把牠們認為經常的現象，是變革全部經濟的和政治的生活的現象。這裏我們當然不去研究農業危機在工業上表現出何種相反作用的問題。我們只指出工業的發展很厲害地為農業的危機所加速。過去有一個時期，曾有一句諺語：*Hat der Bauer Geld, Nat's die Ganze Welt*（意即農民富有，則全世界亦富有。）

我們的任務在這裏只在於推斷農村經濟中的那些改革，牠們一部分是為歐洲以外的生活資料的競爭所加速。

四 穀物生產的減縮

求得國家的幫助，聚眾搗亂以反對「無益的重商主義」這是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反對危機的最切近和最簡單的手段。這就是說：在歐洲的土地所有權對於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底重負轉嫁於民衆身上，失去其經濟的權力後，政治的權力當然就用穀物稅的規定，通貨制度（複本位制）的惡化，有獎貨幣（公債）的發行，

以及諸如此類的方法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轉嫁在民衆身上。再分析一次這些方法的理論根據是多餘的：理論的根據已被考慮過好多次，有些意見可說是爲大家所知道，牠們在這裏當然是值得注意的，並且我們也很難在這裏再提出一些新的。至於地主階級本身開始了解他們怎樣就便利用這些「小手段」，這種推斷更其是多餘的。在他們企圖人爲的使生活資料昂貴時，他們在一切文明國家內都遇到工人階級最堅決的反對，較之爲此種物價騰貴所激動的一切人的反對更甚。穀物稅直到現在對於農村經濟毫無幫助。可是如果有時發生一些條件，他們能夠在這些條件之下表現出極大的作用並且能夠提高穀物價格，那末他們就把極大多數的人口安排在這樣萬難忍受的條件之下，這些條件一定遭他（民衆）的怨憤。在法國一八九一年的歉收引起了穀物稅的立刻減低（自一八九一年七月至一八九二年七月）；在德國歉收也引起了——雖然沒有這樣迅速——穀物稅的減低，並且不僅是暫時的而且是經常的。在英國就沒有一個尊嚴的政治家敢於提出人爲的提高糧食價格。工人階級在那裏（英國）對於這事很有權威。要和自由貿易的英國競爭，就不容許落後的工業國家過於提高糧食稅。英國之固執糧食輸入的自由迫使大陸的資本家和工人一道反對穀物稅增高到足以減弱國外糧食競爭的影響的那個限度。如果在歐洲農業保護稅并不提得很高，那末我們首先應歸功於英國工人的權威。

但是強有力的農業保護稅的政策底諸結果——假定這政策是可行的——并不是有利於農業，而只是有利於土地所有權，即是說他們保存了較高的地價，維持了原先那樣高的地租，也就是說他們延長了困苦的境況。

(農村經濟，由於此種地租陷於這種困苦的境況)這種情形在我們在前幾章內分析以後就不需要特別的證明。企圖用徵稅和其他「小手段」來保護歐洲的農村經濟，使其不受國外競爭的影響，這在各方面都是無望的；牠們只能產生一個結果：即農業對於新條件的適應，為牠們所延緩。

可是此種適應顯然在向前推進。海外競爭底主要優點之一就在於土地異常豐富，容許其擇取優良的最宜於農業的土地來耕種。歐洲的情形就不同。當其每一種農業經濟，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牠一定生產牠所需要的，一切，牠不依賴於土地對這種生產是否相宜或不相宜。穀物被種植在貧瘠的、多砂石的、極傾斜的土地上面。商品生產代替自給的生產在第一個時期很少改變了這種關係；反之，由於人口迅速增加的結果，對於穀物的需要增加，迫使全部農業轉到不甚肥沃的土地上，迫使全部較大的地面都用來耕種。海外競爭一出現，這種情形就改變了。在不宜於耕種的土地上繼續種植穀物的必要已中止，在情形較為順利的地方，就把牠拋棄或用別種農業生產來代替牠。這種趨勢還為下述情況所加強：海外競爭一開始就很明顯地着重於穀物市場。穀物的種植極其簡單；較之強度的牲畜業，地下莖植物及菜蔬的種植以及果樹的栽培需要較少的準備和勞動力。穀物在食品當中是一種在重量和容積方面有特殊價值的商品。

柴特干斯特 (Seligsohn) 的統計表顯明地指示出，在運輸各種生產產品時，每一生特勒 (五〇基羅格蘭姆) 及一英里，合商品價值的百分率為：

商品的種類	一生特勒的市價 (以特勒為單位)	陸路運費一五哩	
		一生特勒及一英里(百分數)	鐵路運費二·五哩
新鮮飼料	五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
糖蘿蔔	一〇〇	一五·〇〇	二·五〇
稻稈	一〇〇	一五·〇〇	二·五〇
馬鈴薯	一五〇	一〇·〇〇	一·六六
乾草	二〇〇	七·五〇	一·二五
牛奶鮮果	四〇〇	三·七三	〇·六二
小麥	一、〇〇〇	一·五〇	〇·二五
活畜	二、〇〇〇	〇·二五	〇·二五

這樣看來，麥的價值最高。活畜底運費在鐵路方面並沒有減少。牠的運輸的速度自然是大大地增加了。活畜的運費和小麥的運費相等。但是後者毫無損害的能耐長期運輸、保存、搬動、以及海道運輸，而活畜就不宜長期的運輸和海道運輸。把牠關在儲藏室或堆棧內自然是不可能。穀物因其不覺運輸的長期性和有害的影響，故其價值較高於大多數其他大量的農業生產品，如肉、牛奶、水果、青菜、蛋之類。

這樣看來，國外競爭首先是表現於穀物種植的範圍之內，這是很顯然地，因此歐洲的農業經營者在他們的

土地并未註定他們去從事這種生產時，他們就在向其他如上面所指的生產品生產的過渡中去找尋自己的福利。但是這種轉變并不是他們願意的。他們只有在找到了這些生產品的市場的地方纔能完成這種轉變。經濟的發展往往和他們背道而馳。我們已經看見，由於許多歷史的和生理的原因，城市中肉的消費比農村更多。因為城市的人口比所有的人口增加得更快，肉的需要當然也增加得相當地快。另一方面，直到本世紀，牛奶、菜蔬、水果、雞蛋之類的生產以少數靠近城市的地方為限。在農村和較小城市內，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甚至還不是農民的家庭，都在這樣的範圍以內進行農業經營，以便獲得這些生產品作為自己的消費之用。反之，在大城市內，這種情形便不可能。所以一旦大城市開始包括極大部份的人口，就發生對這些生產品的強烈的需要，那時他們為市場而生產就會擴大起來，這雖於農民的錢袋有益，但并不有益於他的康健。以前他的一家消費了他的經濟所生產的牛奶、雞蛋，現在牠們徘徊在市場上并為咖啡、酒和馬鈴薯所代替。甚至肉食的增加在馬鈴薯的消費同時增加與牛奶及穀物的消費同時減少的情形之下就發生壞影響（參看威伯（Weber）在“Verhältnisse der Landwirtschaft”第三卷七七頁）。但是統計家卻從這些「奢侈品」的消費增加中，得出人民幸福增加的結論。運輸業的發展，牠使穀物的種植成為無益，在某些地方牠能使為賣而大規模生產肉、牛奶等等，替牠們開闢在此以前和他們隔絕的市場。在這些因素發生作用的地方，牠們大部分加強有利於小生產的傾向，并減弱有利於大生產的傾向。在穀物生產的區域內後者大部分高於小生產，但是正是牠纔極有力地和海外競爭接觸。有些區域——

從穀物市場的地位驅逐出來的農業經營者即以牠們爲避難所——正是屬於（肉的生產除外）小生產還能
在牠裏面很迅速地抵抗大生產的那些區域，但是不必誇大這些因素底影響。牠們不是到處都能表現。牛奶、菜蔬、
肉等等的市場不是到處都存在。此外，如飼養牲畜的數量增加，需要額外資本和額外勞動力，但這不是每個農業
經營者都具備。

有些因素——下面就要說到——在英國表現得最有力而且最早，英國的氣候對於牧畜經濟是很合宜，并
且英國城市人口早已很多。一八五一年在大不列顛人民在城市中居住和在農村中一樣多，在普魯士則相反，在
一八四九年在城市中居住的佔全人口四分之一強（即百分之二八）；祇是現在德國城市人口在數量上纔與農
村人口相等。此外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租佃制佔支配地位，她迫使農業經營者一年復一年照數付出租金，使其不
能以土地爲抵押獲得資金來繼續進行已不能產生收益的經營，於是就迫使農業經營者立刻去適應新的條件。
當海外糧食競爭已發展起來的時候，英國，由於她的地理條件及其強度的商業的流通，便成了海外糧食競
爭的第一個最創鉅痛深的犧牲者。小麥和麥粉輸入英國（超過出口）的人超平均數爲：在一八七三——七五
年爲一二、一九一、〇〇〇夸特（五〇·五〇%），在一八八三——八五年爲一七 九四四、〇〇〇夸特
（六四·二〇%），在一八九三——九五年爲二二·八九六·〇〇〇夸特，或爲拿市場上去的麥底總數之七
六·九二%。所以，在英國被消費的麥只有四分之一是在本國的土地上生產出來的。但是穀物稅的時代，早已過

去，這對於英國的農業經營者一開始就已經是很明顯的。英國是很民主的，她的農業人口很弱，她的工業人口很強，因而敢於人爲地使其穀物騰貴。農村經濟已站在歧路的前面：或者瀕於破產，或者迅速改變其生產條件。在大多數場合內牠找到了後一條出路，債主必須減低其地租——在愛爾蘭是在立法底強制之下，在英吉利則在佃農階級底全力強制之下。最近幾年租金在良好的地方，降低了百分之二〇——三〇，而在貧瘠的地方，則降低了百分之五〇，有時還要多些。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建築和農業中各種改良上的用費——即地主不能不進行的——就增加了。已經不止一次敘述過的英國土地委員會的報告，對於這種情形，引了不少的例證；我們在這裏引其中的一個，關於勞爾弗克（Norfolk）地產的例來做說明。這裏以金鎊計爲：

	一八七五年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四年
租金	四、一三九	二、七二五	一、七九六
地產方面的費用	一、一二二	一、一六六	一、二一六
所花費的租金之百分數	二七·一	四二·八	六七·七
純收入	三、〇一七	一、五五九	五八〇

所以，土地所有者的純收入從六〇、〇〇〇降至一一、六〇〇馬克。但是農業的這種緩和與地租的減少還是不夠的。於是從穀物的生產過渡到牧畜業就和這些情形一同完成了。在聯合王國內，一年內收割的麥，以吞

特計，平均爲（種子不計）

年代

一八五二——五九年	三、一六九、〇〇〇
一八六〇——六七年	二、二五四、〇〇〇
一八六八——七五年	一、六三二、〇〇〇
一八八九——九〇年	八、七七〇、〇〇〇

從那時候起生產平均降至七百萬夸特。

種植小麥的面積爲：

年代

一八六八——七〇年	三、八〇一、〇〇〇英畝
一八九〇……（註原文爲一八九九關係一八九〇之誤）	二、五四五、〇〇〇
一八九四	一、九八五、〇〇〇
一八九五	一、七一七、〇〇〇
一八九六	一、六九二、九七五

反之，草地增加了。草地在大不列顛在一八七五年時為一三、三一三、〇〇〇英畝，一八八五年為一五、三四二、〇〇〇英畝，一八九五年為一六、六一一、〇〇〇英畝。

在德國，發展的情形又不同。她的大陸的地位，她的穀物稅，農民的保守性，都延緩她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發展隨着從落後的經濟到最強度的經濟，隨着空地的消滅和從三田制過渡到換種制的經濟而來，隨着并不是到處都已完成的進步而來。這些契機（指從落後的經濟到最強度的經濟，空地的消滅，從三田制過渡到換種制等）自然促進穀物種植的擴大。後者（穀物種植）的減少，牠之為牲畜業、菜蔬及水果的種植所排擠，直到現在只限於德國個別的地方而不是表現為一般的現象。在德意志帝國內種植的面積（以海克塔爾（Hectare）計）為：

年 代	一八七八年	一八八三年	一八九三年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三—九六年
麥和小麥	二、二二二、五〇〇	二、三〇六、一〇〇	二、三九八、二〇〇	二、二四九、九〇〇	(一) 五六、二〇〇
燕麥	五、九五〇、〇〇〇	五、八一七、一〇〇	六、一〇六、九〇〇	五、九八二、一〇〇	(十) 一六五、〇〇〇
大麥	一、六二三、三〇〇	一、七五四、三〇〇	一、六二七、一〇〇	一、六七六、三〇〇	(一) 七八、〇〇〇
蕎麥	三、七五五、一〇〇	三、七七三、八〇〇	三、九〇五、八〇〇	三、九七九、六〇〇	(十) 二〇五、八〇〇

● 指德國小麥而言

這樣看來，主要穀物的種植面積，只有很小地改變。

種植穀物及豆類植物的面積，到一八八三年共有一五、七二四、〇〇〇海克塔爾，一八九三年，爲一五九、九二、〇〇〇海克塔爾，增加了二六八、〇〇〇海克塔爾。在這同一時期中間放置爲牧場和空地的耕地面積，從三、三三六、八三〇海克塔爾減至二、七六〇、三四七海克塔爾，即減少了五七六、四八三海克塔爾。

但是在那時，種植穀物的面積整個講來，仍舊沒有改變，牲畜底數量則大大地增加了。
牲畜的頭數計有：

年 代	有 角 獸	豬
一八七三年	一五、七七六、七〇〇	七、一二四、〇〇〇
一八八三年	一五、七八六、八〇〇	九、二〇六、二〇〇
一八九二年	一七、五五五、七〇〇	一二、一七四、三〇〇
一八九七年	一八、四九〇、八〇〇	一四、二七四、六〇〇

所以，在那時候，即從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三年，有角獸的數量增加得並不大，即只增加了一〇、〇〇〇頭，在往後的十年中，有角獸的數量差不多增加了二百萬頭，而在最近五年中又差不多增加了一百萬頭。豬的增殖從一八八三年起比一八八三年以前更迅速。

在法國穀物的生產其情形比德國更不如，且不說高度的穀物稅。在這裏耕種面積以海克塔爾為單位其分配如下：

	一八四〇年	一八六二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二年	在一八三二—一八六二年之間
種植穀物	三,五三三,〇〇〇	三,五〇三,〇〇〇	三,〇九六,〇〇〇	三,〇八七,〇〇〇	(一) 五九六,〇〇〇
人工培植的草地	一,五七〇,〇〇〇	三,七五〇,〇〇〇	三,五五八,〇〇〇	三,五五三,〇〇〇	(十) 五九〇,〇〇〇
天然的草地及牧場	四,一九〇,〇〇〇	五,〇三三,〇〇〇	五,五五七,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〇	(十) 八九〇,〇〇〇
空地	六,六六六,〇〇〇	五,一〇九,〇〇〇	三,六四四,〇〇〇	三,〇五八,〇〇〇	(一) 一,六〇〇,〇〇〇

這樣看來，穀物的種植從一八六二年起其面積已大大地減少。雖然一八七一年領土的喪失（一、四五二、〇〇〇海克塔爾）促成了這種情形，但是領土的喪失不及空地的縮小而穀物種植的減少，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都在繼續着，雖然領土喪失，可是草地和牧場卻被擴大。

有角獸的數目增加而馬的數目則減少。茲計之如下：

	一八六二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二年
馬	(包括八十九縣)		(包括八十六縣)
	二,〇一四,四二二	二,八三七,九五二	二,七九四,五二九
有角獸	(包括八十九縣)		(包括八十六縣)
	一一,〇一一,五〇九	一一,九九七,〇五四	一一,三,七〇八,九九七

但如果樂觀主義的經濟學者們以為，從穀物底生產過渡到肉、牛奶、水果等等的生產，可以拯救歐洲的農業於海外競爭之外，那他們就錯了。技術革命和資本的積蓄，不停地前進，而跟隨牠們之後的便是運輸工具的改善和廉價，運輸的迅速，保藏方法的改良。但這只是表示，海外競爭一步緊一步侵入到受壓制的歐洲農業以牠們為避難所的那些區域內。二十年前輸入英國的全部活畜，都是歐洲產。現在活畜幾乎完全不是從歐洲輸入，大部分是自北美洲輸入；但是活畜從南美由海道供給，已經更加便利。輸入英國的（以百分數計）活的有角獸總數是從以下幾個地方輸入的：

年 代	歐 洲	合衆國	加拿大	阿 根 廷
一八七六年	九九	—	—	—
一八八六	四三	三六	二二	—
一八九一	一六	六七	二二	—
一八九五	—	六七	二三	九

輸入的有角獸之頭數為：

年 代	輸 出 的 國 家				總 計
	加拿大	美 國	阿 根 廷	其他國家	
一八九五	九五、九九三	二七六、五三三	九三、四九四	三、五四五	四六九、五六五

一八九六	一〇一、五九一	三九三、一一九	六五、六九九	二、一四三	五六二、五五二
一八九七	一二六、四九五	四一五、二九九	七三、八六七	一、六七五	六一七、三三六

輸入活羊的頭數其分配如下（以百分數計）

年	代	比利時	丹麥	德意志	埃斯南島	荷蘭	美國	加拿大	阿根廷	其他國家
一八七七		二四	五	三〇	—	四〇	—	—	—	—
一八八六		—	九	三二	三	四五	—	九	—	—
一八九一		—	二二	—	七	六一	三	九	六	二
一八九三		—	—	—	六	—	四二	二一	二九	二

在供給活羊底事業內歐洲排出於英國市場之外為期較晚，但是發展得極其迅速。

二十年前，肉只有裝罐頭，只有醃肉纔能由海道運來。從那時候起，可供好幾個星期消費的鮮肉（用冰凍）的保存法已經改善了很多，海外鮮肉之輸入英國不斷地增加。在一八七六年只輸入了三四、六四〇英磅鮮牛肉，一八九五年就有二、一九一、〇三七英磅，一八九七年有三、〇一〇、三八七英磅。鮮牛肉最大的數量，是從合衆國輸入的。

鮮羊肉在不列顛的貿易統計內也只是從一八八二年起纔特別加以記載。當時輸入為一九〇、〇〇〇英

磅，到一八九五年便爲二、六一一、〇〇〇英磅，一八九七年爲三、一九三、二七六英磅。這個數量中從澳大利亞輸入的爲一、六七一、〇〇〇英磅，從阿根廷輸入的有七一五、〇〇〇英磅。

像小麥的生產一樣，肉的生產在合衆國在出口方面顯然已經達到了牠的最高點。廣泛的牧場經濟，牠只是對於海外的輸出使牲畜的飼養成爲有利的一種經濟，牠需要無限廣闊的土地，可是這些土地因爲人口的增加，而更加減少了。在合衆國方面有如下的統計：

年代	人口	母牛	公牛及其他有角獸	羊	豬
一八七〇	三八、五五八、〇〇〇	一〇、〇九六、〇〇〇	一五、三八九、〇〇〇	四〇、八五三、〇〇〇	二六、七五一、〇〇〇
一八八〇	五〇、一五六、〇〇〇	一二、〇二七、〇〇〇	二一、二三一、〇〇〇	四〇、七六六、〇〇〇	四三、〇三四、〇〇〇
一八九〇	六二、六二二、〇〇〇	一五、九五三、〇〇〇	三六、八四九、〇〇〇	四四、三三六、〇〇〇	五一、六〇三、〇〇〇
一八九五	六九、七九三、〇〇〇	一六、五〇五、〇〇〇	三四、三六四、〇〇〇	四二、二九四、〇〇〇	四四、一六六、〇〇〇

只有乳用的牲畜，在數目上增加，肉用的牲畜則減少。但是從這種牲畜的飼養中獲得利益的不是歐洲，而是阿根廷和澳大利亞，在那裏對於牧場經濟的擴大還有無限的地面。在供給英國羊和羊肉上，這兩個國家現在已經佔第一位；他們的有角獸和牛肉的輸出，也迅速地增加。到一八九〇年從阿根廷輸出的爲一五〇、〇〇〇頭有角獸，到一八九四年則輸出二二〇、五〇〇頭。

除肉的生產外，牛乳的生產，水果及菜蔬的培植以及家禽的飼養也能幫助主要的農業。但是海外的糧食競爭在這些區域內也多少感覺到。這種情形現在一部分，例如在水果的培植內，已經證實了。牠已遇到美國方面這樣的威脅即在德國必須宣告聖約瑟夫的膳脂蟲是牠的守護神，他拿自己的盾牌來保護德國的蘋果。

但是海外競爭底時期，對於新鮮菜蔬一定會來臨。在一八七六——七八年期間，輸入英國的洋蔥數量平均一年為一、八九三、〇〇〇布昔，一八九三——九五年為五、二三二、〇〇〇布昔。西班牙在前一個時期就輸入了四一、〇〇〇布昔，在第二個時期輸入了一、三〇〇、〇〇〇布昔。除西班牙外，還從荷蘭、法國、埃及等國輸入。其他新鮮菜蔬輸入到英國的在一八七六——七八年總額為二二七、〇〇〇金鎊，在一八九三——九五年則在一、一〇〇、〇〇〇金鎊以上。英國自己用的雞蛋是得自意大利、匈牙利、俄國。在最近幾年，新鮮牛乳從荷蘭和瑞典輸入底企圖，也已經成功。

這樣看來，替雞蛋、菜蔬、牛乳等等生產的海外競爭發明技術的前提條件，在現在已經具備，並且海外競爭將會更迅速戰勝農業輸出的舊國家，而在那些國家——即如在歐洲——由於新的輸出國家之出現，穀物的生產就更受排擠。直到現在，農村經濟副產物的輸運之改善只有害於英國的農業經營者，其餘歐洲的非工業區域的農業經營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反成為英國底供給者，但畢竟在此種區域內，歐洲底經濟停止其輸出，而海外競爭卻擴大起來，除掉對於海外農業經營者所從事的極不重要的那一類生產不計外。如果這一競爭直到現在主要

是戰勝了大生產的區域，那末以後她就會轉到農業小生產佔優勢的區域。農業的危機遂因此加劇，關於這一點，無需再鋪張下去。可是歐洲的農村經濟還有其他手段來抵禦海外的敵人。

五 工業與農業之結合

直到現在我們主要是專就英國而言。爲要解釋反對海外競爭的那種鬭爭手段（關於這手段我們等一會就要說到），我們就舉一些不是在運河方面——在英國這種反海外競爭的鬭爭手段並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而是在大陸方面的材料，在大陸上這種鬭爭手段有其存在的良好條件，首先很顯然就是存在於我們的德國。

租佃制能夠將海外競爭底負擔首先轉嫁於土地所有者身上。在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名義上是一個人的地方，用抵押借款來規定地價便阻礙着這一過程。那裏農業經營者在租佃制之下先就不得不找尋別的手段來減低生產成本費，他們找到的一種手段就是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比租佃制更爲有利；在前一種制度之下某一地方農業經營者的私人組合更是經常的，因而他們的共同動作很少遇到障礙。

我們已經知道農業生產品大部份只有較小的特殊價值，因此要能夠很有利地把牠們實現爲商品，往往只限於狹小的銷售市場。假如適當的生產品，不是以原料的形態，而是以製成品的形態，輸出去的話，則這種市場在不變的運費之下會大大地擴大起來。

已經屢次引證過的柴特干斯特 (Chittenden) 的表中有些數字很顯明地說明這一點。一生特勒 (50 基羅) 和一英里運費, 合商品價值的百分率為:

商 品 之 名 目	一生特勒的市價 (馬克)	運 費	
		陸路運輸為一五釐費	鐵路運輸為二·五釐費
甜蘿蔔	一·〇〇	一五·〇〇	二·五〇
糖	三五·〇〇	〇·四三	〇·〇七
馬鈴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一·六六
酒精	二〇·〇〇	〇·七五	〇·一二
活畜	二〇·〇〇	〇·二五	〇·二五
肉汁	六〇〇·〇〇	〇·〇三	〇·〇〇〇四

在食料的製造方面, 許多生產產品, 除有較大的特殊價值外, 還有別的優點: 牠們比未製品, 如牛油、乳酪、肉的、蔬菜的以及水果的罐頭等等易於保存。

在農業生產品的製造方面, 有些生產還有一種極為重要的優點: 製成品含有少許或甚至完全不含有對於土地肥沃的保存所必要的礦物的成份。製成品的輸出并不從土地方面奪去任何重要的元素。而且生產底廢料

含有許多物質，可直接作為牲畜的飼料供給特種肥料，這樣就使土地變為肥沃。這種情形在釀酒工廠和製糖工廠方面正是如此，釀酒廠和製糖廠把自己的廢料用作牲畜的飼料和肥料，在牠們根基鞏固的地方，更強有力地促進了穀物生產和牧畜業的發達，牠們成了強度的合理的經濟之必要的基礎。除這些以外，還應當注意到下述的情形：在農業生產品的製造方面，有些生產在冬季給人與勞動獸以工作，沒有牠，牠們就無事可做；大工廠的蒸汽機，正是減輕農業方面（打穀機、簸穀機、剉桿器、抽水機、鋸子等等方面）動力的生產；當其用電氣傳導力在農業中已固定的時候，後一情形當然就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工廠底汽力幫助之下，就可以轉動汽犁、打穀機、載肥料到田地上的荷車、刈草機。在某些地方，當地條件對於這種情形有利，就會引起農業經營者傾向於在自己地產內開設工廠來改製原料。這種傾向，在歐洲以外減低原料品價格和地租的糧食競爭影響之下得到了特別有力的推動。現在有了兩重的刺激，用工業企業家的利潤，去補償農業經營者或土地所有者的損失，用增加的工業利潤去補償地租的低落，廉價的原料品，變為高價的工業品。在這裏正如現時代各種經濟進步情形之下一樣，大生產前進了，並且從各種革新中吸取了最大的利益。小生產通常沒有充分資本，並且生產不出充分的原料，足以使自己創設工廠來改製自己的生產品。小農業經營者比起大農和資本家，更不活動，更保守，更不明瞭技術的成就和世界市場的需要。大地主，尤其大地產底所有者，第一個在自己的地產內，創立了大的工業企業；除他們以外，資本家創設了農業的工廠，並且購買對於原料的生產所必需的土地。這樣看來，從這兩方面替工業與農業的

結合開闢了一條道路。澱粉廠和啤酒廠，與釀酒廠和製糖廠一同在大地產內發生了，可是啤酒廠的範圍不大，因為啤酒的製造大部分在城市中經營較為有利；工廠（製啤酒的）的原料一部份佔有同樣的價值（大麥），一部份比生產品有較高的（蛇麻）特殊價值，而且比後者（生產品）容易運輸；此外，大麥（宜於製啤酒的）和蛇麻，只生長在某幾處地方。除上述的農業的工廠以外，還發生了牛乳農場、菜蔬、牛奶、水果等等的罐頭工廠。

大地產勝於小經營，其最大優點之一就在於能夠有利的和多方面的結合工業與農業。在大地產對於工業不僅供給原料，而且供給動力——水力，附近森林中的柴薪（在這種情形之下遠距離的運輸就成為多餘的），煤，——的地方，這種優點就更大。而且運費和仲介人的貿易費也能相當地節省……

在製造農業生產品的這些生產中所達到的良好結果誘惑了許多不很大的經營也企圖佔有牠們的利益。實現這種企圖的適當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已現成成了唯一的資本主義企業，這些企業很大，為的要使牠們私有的土地能供給牠們全部原料，因此牠們不得不和少數附近的農業經營者訂立供給未製品的契約。如果這樣的企業是由股份公司經理，那末供給者——農業經營者——只要得到股票，合作社就可成立。幾年之間，這些合作社很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德國。德國農業合作社（除貸款合作社購買和銷售的合作社不計外）計有：

年 代	一八九一年	一八九二年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七年
協作的牛乳農場	七二九	八六九	一、三九七	一、五七四
其餘的協作社	一三二	一五〇	二七三	四八四

釀酒廠、磨粉廠、麵包廠、酒窖以及諸如此類的協作社歸入後一項目（其餘的協作社）。我們一點也不懷疑，此種協作社的運動還剛開始，牠還會提供有價值的結果，并引起我國農村經濟諸關係大大的改造。

但是當其他們把這種運動視為農村經濟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過渡階段，把中世紀公有地和公共牧場的殘餘視為別的過渡階段，而其他的人則視為係保存農民的獨立的，完全的力量之一種手段，那我們就不能同意這些人，也不能同意那些人。近代社會主義底區別點，就是勞動者自身，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整個社會佔有生產工具。生產協作社，牠可作為向這一狀態進行的一個過渡階段，牠必須是生產者底組織，而生產者同時又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反對那種把近代勞動者的生產協作社視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意見——的一個最重要的反駁，就是指出那種事實：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有一個時機對於繁榮的生產協作社遲早總要到來，那時協作社社員開始使用僱傭勞動者、無產者；後者（僱傭勞動者）在生產工具底所有權上沒有他的份并且要受協作社社員的剝削。這樣看來，每個生產協作社，在現社會內，牠若一繁榮而且擴大起來，就有變為資本主義企業的趨勢。這在僱傭勞動者所創立的生產協作社內起初只是一種傾向，在農業經營者之生產協作社內

(關於農業經營者底生產協作社我們現在就要說到)早已是牠的先決條件。勞動者在協作社的製糖廠、釀酒廠、牛乳農場、罐頭工廠、磨粉廠之內，並不是協作社底社員，而是他們所僱用的和剝削的勞動者。協作社給予農業經營者的利益，除節省運費及貿易費以外，尚有資本利潤的佔有。此種農業生產協作社——而別種農業生產協作社現時還沒有——是走向資本主義的，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我們現在談到在協作社幫助之下，救濟小農的問題。這裏首先必須指出，協作社一開始就不讓最需要幫助的小農和農民無產者參加。工業的企業需要金錢，而他卻沒有金錢。他又不能供給企業以必要的原料。生產協作社，祇是對於中產階級纔有意義。但是這裏大生產較之小生產經常地有着許多很大的優點。大地主即使他只有必要的資金，他在進行有利的工業企業時，也不會遇到任何的阻礙；反之，組織協作社是何等的困難啊！在大地主看來，他的農業之適應工業生產的需要是自然而然的，反之，要規定各種不同的小農業經營者之生產品供給中的一致和正確，是何等的困難啊！

大生產在農業中很能適應農業大工業的需要。後者往往使這樣的大生產在還沒有牠的地方存在。糖的生產——這是農業大工業的一個典型的例——強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經濟中大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巴賽 (Paris) 指出，在德國南部、法國的某幾處地方及意大利北部阻礙大生產擴張底原因之一應當在那些地方土地所有權的細分中去找。依恩博士 (Inne) 在將來雜誌 (Zukunft) 第五卷三八二頁上發表的「美洲德人製糖廠」

一文中說到，東普魯士各部中，糖之合理的而又廉價的生產，當地大地產的所有者設立了製糖工廠，并供給製糖廠以他們自己的勞動者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所種植出來的蘿蔔，不受那些在自己田地上或菜園中耕種的農民（“Kasathe”）即沒有田地而只有田宅或靠近田宅的菜園的農民——原註）之動搖的而又常常很頑強的情緒之限制，如魯易查大的種植地的所有者，有自己的甘蔗製糖廠，就是這樣做的。

有一些農業的工業企業，供給大經營以特殊的利益。

如果在大地產內有釀酒工廠，那末工廠的廢料就可完全使用在大地產內，并且經濟又可不斷地改善。如果馬鈴薯是從各方面供給釀酒工廠，那末情形就不同了。酒精運輸很困難，因為牠裏面含有多量的水份，祇有在釀酒廠旁邊飼養牲畜，纔有利可圖。如果別的經營供給工廠馬鈴薯，那末釀酒工廠底土地的豐饒，是靠這些（別的經營供給的）馬鈴薯而發生，因為在所供給的馬鈴薯內含有的土地的糞料已不再回復到土地去（見克爾佛特（Krafft）著的“Beurtheilung” 101頁）。根據柴特干斯特（Setzgat）很有名的圖表看來，釀酒廠酒精的運輸，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每一生特勒及一英里在陸路上運費為酒精價值三〇%，而馬鈴薯的運費僅為其價值一〇%。在協作社的釀酒廠附近，最靠近釀酒廠的幾家，就增加自己土地的豐饒，距離最遠的幾家就貧瘠。製糖工廠情形也是一樣。除較大的農業以外，大資本在某些生產內能夠極容易，而且大部分極有利地利用農業與工業密切結合底優點。

在德賴斯登（Dresden）地方，德國農業協作社最近一次大會上，熱烈地鼓吹農業經營者創立協作的麵包廠，和磨粉廠。在目前往往很落後的小工廠地位上，應當有協作的大企業，此等大企業不僅供給牠的社員，並且供給大眾以極大的利益。提高農村經濟中的小生產，供給牠以大生產從麵包廠及磨粉廠所得的利潤，這種思想總是，至少對於農業經營者是很能誘惑的。對於小磨坊主和麵包廠主則誘惑較小。小生產是以剝削小生產者而得救，但這並不激動農業經營者，像他們自己宣告的。可是，如果磨粉廠、麵包廠及農業結合在一個人手裏，實際上能夠提供像人們斷定的這樣的利益，——我們對這一點，絲毫不懷疑，——那末不是動作緩慢的和資本缺乏的小農協作社，而是大的資本充足的麵粉廠最先能夠據有這些優點。在小農業經營者佔有大磨坊之前，這些大磨坊已成小農業經營者和製麵包者底命運之安排者了。在農民與大磨坊之間，何種關係在現在已佔統治地位，從上巴瓦尼亞肥沃的地方寄來，在一八九七年夏天刊載於德文報上的下述的信，就說到這一點：

「兩個麵粉磨，——那封信上說，——統治着車行七小時的整個地方。農民完全受牠們的支配。禮拜六是小縣城一個趕集的日子；但是市場上祇有許多燕麥；農民已經不敢把麥和小麥拿到市場上來，因為兩個磨坊主人是唯一的購買者，並且誰要是拿到市場上去賣而不賣給他們，他就要受到一種懲罰，就是一生特勒麥，要罰他十個普費（錢幣名）。穀物的自由買賣，完全停止了；農民不容分辯地拿出自己的商品，靜靜地等待着他們給價錢。如果他拒絕照這個價格出賣，那你就得到一個回答：好吧，你回家去吧，我剛纔買了一、〇〇〇生特勒匈牙利利。

小麥了」。

但如果在農業工業化的區域內，像在其他區域內一樣，大生產本身有許多勝過小生產的優點，那末這當然不是證明，後者（小生產）不能從他唯一能達到的農業大工業的形態內——農業生產合作社得到一些相當的利益。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實現的地方，牠就把農民變為資本家，並且讓他用他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果實去豐富其農業生產，更合理地建立這種生產並將其提高到相當的高度。

有人會問，使大踏步走向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一夜之間變為資本家，這種魔術的戲法，將繼續好久？

合作社組織的第一個結果，和使農民變為別人的工廠的供給者的結果一樣：他必須把自己的經營去適合牠的需要。

製糖工廠指定農業，用何種種子種植牠的土地和施何種肥料；牛乳農場則給牠規定飼料，榨乳的時期，有時甚至乳畜的種類。

從前怕用各種過強的氮氣肥料，因為這種肥料好像很有害於蘿蔔裏面所含的糖質。因此工廠大部份規定氮氣與亞磷酸的比例為一與二之比並且完全禁用智利硝石，於是蘿蔔的種植就和用新鮮糞料一樣。祇有禁用智利硝石和種植蘿蔔，在施用這樣的糞料（聖誕節後澆在田裏的糞料）時，纔從這些規定中保留下來。反之氮氣與亞磷酸的比例逐漸改良了前者，因此現在有少數工廠需要氮氣與亞磷酸的比例已經為二與三之比或三

與四之比，有時甚至爲一與一之比」（見凱爾格爾（Kierger）“Saachsen-Gängerel”，14頁）。

在農村經濟已經完全適合甜蘿蔔生產的地方，這些規定就成爲多餘的了。斯托凱爾（Stöckel）在其論協作的牛乳農場之創立組織及管理一書中提供協作社的牛乳貿易的章程第四條說：「在這一條內應當包括對於母牛的飼料的一切必要的規定。在出賣新鮮牛乳的時候，尤其是在供給所謂乳牛的乳的時候，關於飼料沒有一定的必要的規定是不行的。」

「關於飼料之一定的規定，即對那些足以影響牛油的味道與保存的飼料的限制，對於生產協作社也是必要的。」

「第五條 榨乳的時間亦應規定，以便牛奶直接從牛棚中和其他地方供給協作社。」

「第六條 在榨乳時候應當注重清潔。」

「第七條 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和管理員無須預先關照，隨時可以去視察屬於協作社社員的牛棚及保存牛奶的地方，在榨乳的時候，親自到場并且將已榨出的牛奶拿去化驗。這些委員們有權要求協作社社員或他們的代理人正確地說明乳畜的飼養，乳畜的照料以及諸如此類的情形（見一〇二——一〇四頁）。」

「在丹麥牛乳協作社關於牝牛的飼料和飼養有一些規定，以便保證質量的一致，保證沒有臭味并保證在冬季牛乳生產的均衡」（見一八九七年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報告，一二六頁）。這樣看來，農民已不是自己農

業生產的主人，牠成了工業企業底附屬品，牠必須受牠（工業企業）的需要的指導。農民成爲工廠底零工。他甚至往往陷於技術的依賴工業企業，因爲後者（工業企業），像我們已經指出的，供給他以牲畜的飼料和肥料。農民對協作社之純經濟的依賴，是和這種技術的依賴攜手並進的。協作社不僅供給改善農業生產和彌補其偶然的虧空；由於後者（農業生產）適合牠（協作社）的需要，於是牠就成了農民所生產的商品之唯一消費者。農業生產，要是沒有工業生產，就不能生存；工業生產，成了牠的支柱，工業生產一破壞農業生產亦隨之毀滅。而這樣的破壞是很容易到來的。

農業的工業所得的利潤愈高，則牠（農業的工業）所吸收的資本亦愈多。現時就資本的大小而言祇有在中等以上的企業纔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纔能在技術方面和商業方面抵抗一切的競爭。再則，較高的利潤要在那些由於牠的性質或由於特殊複雜的情況容許獨佔的生產內纔能得到，或者最後要在那些爲技術的及經濟的變革所重新創造的，或替資本主義的剝削重新開闢的生產內纔能得到，例如現在在電氣技術方面就是如此。但是後一種較高的利潤不能保持長久；新開闢的領域很快被充滿生產過剩就成爲慢性的。前者剝去乳脂，後者祇剩得些去皮的乳汁，——有時甚至連這點乳汁都沒有。在農業的工業內大地主在這一方面，——尤其其他若是資本家的話，——就有勝過小的土地所有和協作社的優點；他比小地主或協作社更活動、更大膽、更有先見之明、更易行動，他能夠更迅速在必要的條件具備的地方去創立在當時還是有利的農業生產。對於一切的農業工業，正

如對於其他的工業一樣，有一個時機遲早總要到來，那時牠會陷於困難的境地，那時價格會低落，那時競爭就驟驟和毀滅最弱的和無經驗的，那時最後一部分是一般的，與經濟之繁榮和壓迫的一般循環一致的，一部分是部分的爲特殊的技術、經濟、立法等的變革所引起的危機就時時動搖工業的這一適當的領域。政府愈是保護這種工業，在農村經濟底利益上她（政府）給予這種工業以優勢愈是取償於全體人民，則這個時機到來亦愈迅速。歐洲的酒精和糖的製造明顯地證明這一點。這兩種東西的製造（酒精和糖的製造）在德意志和奧大利、俄國和法國強有力地爲各種特權、輸出的獎勵（以免稅的形式）所鼓勵。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一年在德帝國徵稅區域內，改造澱粉質的或蜜糖的釀酒廠數祇從七、〇一一增至七、二八〇，而付出一五、〇〇〇馬克以上的火酒稅的釀酒廠數，則從七八九增至一、四九二；牠幾乎增加了兩倍。從一八八〇——一八一年至一八八五——一八六年在釀酒廠內，改製的馬鈴薯數量從一、九八二、〇〇〇噸增至三、〇八七、〇〇〇噸。在一八八四年爆發的危機就是此種燦爛繁榮底結果。在一切場合之內此種危機引起俾斯麥政府急切救濟必要的工業。最後，他算是施行了一八八七年的徵稅法，保證釀酒廠出相當的「貢禮」(Liebersteu.)，其數爲每年四千萬馬克并且竭力遏制生產過剩；在一八九五年他又補充了新的法律，更有力地限制酒精的生產過剩，并且還提高國內的酒價，目的是從所徵的稅作爲輸出的獎勵，一百利脫爲六馬克。雖然這樣，可是酒精的不景氣並沒有退出舞臺。

糖因政府較大的關心，比酒精，更可有恃無恐——何況牠的製造都操在大人物手裏。結果就是製糖工廠整

人的增長。在德意志帝國內計有：

年 代	改製蘿蔔的工廠數	改製的蘿蔔之數量 以噸計	工廠所得的數量 以噸計	糖之原製品的數量 以噸計
一八七一——七二	三一	二、二五一、〇〇〇	一、五〇四、〇〇〇	一八六、〇〇〇
一八八一——八二	三四三	六、二七二、〇〇〇	三、四三二、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一——九二	四〇三	九、四八八、〇〇〇	四、六四四、二一四	一、一四四、〇〇〇
一八九六——九七	三九九	一三、七二二、〇〇〇	五、七八二、〇五一	一、七三九、〇〇〇

同時在德意志帝國內以噸為單位計有：

年 代	糖 的 消 費	糖 的 輸 出
一八七一——七二	二二一、七九九	一四、二七六
一八八一——八二	二九一、〇四五	三一四、四一〇
一八九一——九二	四七六、二六五	六〇七、六一一
一八九六——九七	五〇五、〇七八	一、一四一、〇九七

糖的消費，尤其是輸出，無論增加得怎樣厲害，在最近期間牠們遠不及生產的增加。在一八九六——九七年糖的消費和輸出共計為整數一、六四〇、〇〇〇噸，而生產達到了一、七四〇、〇〇〇噸，實質之生產過剩

爲一〇〇、〇〇〇噸。在這種情形之下，糖工業的地位，在最近期間由於古巴戰爭，糖從古巴輸出殊爲不易遂成爲特別有利。在一八九四——九五年德國糖工業的生產過剩超過國內的消費和輸出，竟達三〇〇、〇〇〇噸之多。

希望改善目前糖工業的狀況是不行的，只有等待牠很快的衰落。海外競爭的壓迫，引起農業的工業的發展，并用不斷增加獎金的辦法人爲的鼓勵這種發展，這在別個國家也有這種情形。甜蘿蔔的生產，以粗糖的噸數表示，其整數（根據西倍爾（M. ShippeI）著的「糖的危機」輸出的獎勵及糖業卡特爾，見新時代雜誌（Neue Zeit）第十五卷，第一期，六二二頁）可列表如下：

年 代	德 國	奧 國	法 國	俄 國	比利時與荷蘭	歐洲其他國家	總 計
一八五二—五三	1,100,000	400,000	250,000	500,000	700,000	60,000	3,250,000
一八五三—五四	1,150,000	400,000	250,000	500,000	710,000	110,000	3,650,000
一八五五—五六	1,200,000	400,000	250,000	500,000	720,000	150,000	4,120,000

有：
除英國以外，北美合衆國是我國糖業較好的消費者。從德意志帝國輸出的粗糖、精製糖等等，以噸爲單位，計

年 代	總 額	輸 入 大 不 列 顛	輸 入 美 國
一八九一	七八四、〇〇〇	四五四、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一八九六	九七四、〇〇〇	五一三、〇〇〇	四一六、〇〇〇
一八九七	一、二二〇、〇〇〇	五六四、〇〇〇	三七六、〇〇〇

美洲人在當時曾竭力去創設本國羅葡糖的生產。前而已經提及的支加哥工學會會長依恩 (F. W. Ihne) 他在柏林的將來雜誌 (Zukunft) (三八〇頁) 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請求德國的機械工程師利用現成的可能性，在美洲創立製羅葡糖的工廠。這是何等的愛國啊！種麥的出息愈少，則美洲人的努力亦愈強烈。但是糖工業，像上面所引的材料指明的，宜於極迅速的繁榮，而美洲人——是能夠把糖工業迅速提高的人。可是在歐洲各國由於製糖工廠的發展，輸出的獎金倒被提高而不是被降低。在德國輸出的獎金到一八九六年增加了兩倍（從一又四分之一增至二又二分之一馬克。）用獎勵的方法和用保護稅及軍國主義是一樣的情形；事情一經開始做了，那時要想停止已經來不及了。大家都知道，獎勵制度引起生產過剩，引起可怕的危機——但是個個人都怕國家一旦停止支付獎金，危機對於他的國家還更可怕，個個人都希望比別的國家更長期地維持下去。這樣看來，人民之被剝削繼續增加，而同時甜菜種植場更被擴大，極其廣大的農業區把自己的命運和糖工廠的命運聯繫一起。作甜菜種植之用的面積以海克塔爾為單位計，有：

年代	德國	奧國	法國	俄國	比利時與荷蘭
一八九一	三三六,〇〇〇	三二八,〇〇〇	二二三,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二	四四一,四〇〇	三六九,〇〇〇	二七二,〇〇〇	三三一,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可是製糖工業的破產更加不可避免，並且被害的景況，牠們終於一定會發生製糖工業的破壞，就表現得更加可怕。

在德國鼓勵牛乳業，就不及鼓勵蘆萄糖的生產。可是像上面引證的關於協作的牛乳農場的材料指示出，牛乳業迅速發展，主要是受國外競爭的影響，牠使穀物的種植很少有利。可惜，在德國還沒有牛乳業的發展之精密的統計。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牛乳業迅速繁榮，只是部份地與牛乳生產的增加有關。牝牛數的增加比牛油及乳餅的生產更慢。牛乳業之迅速推廣大半是靠別的條件。牛乳，在離城市很遠的地方生產，因為運輸的困難，直到現在還不能拿到市場上并變為商品。牛乳在生產者自己的經營中，如果他有這樣多的牛乳，即為他的家庭和僱傭勞動者所消費。過渡到牛乳業就能夠製成乳餅和牛油，牠們宜於遠距離的運輸并且可以當作商品拿到市場上，不僅拿到國內市場上而且可以拿到世界市場上。但這就要使農業經營者從今以後失去。直到現在他自己及其家庭消費的牛乳，農村中牛乳消費的減少與農村中牛乳業的發達是在同一限度之內。如果農村的人口，雖然過度勞動與可憐的住宅條件，雖然肉的消費不足，直到現在在能力和耐勞方面都超過城市的居民，那末這除

了在露天中勞作之外，當然是因有大量的牛乳供他們消費。但是在家庭工業替自己築起堅固的巢的地方，在露天中的勞作就停止了，而在牛乳業從農業經營者手裏剝奪他們的牛乳的地方，牛乳的消費就停止了。專為在經濟上拯救小農的這兩種手段就是小農體力退化之最實際的手段。

這種情形在煉乳廠製造乳餅的那些地方尤甚。可是，我們覺得在一八九七年威敦堡（Wettenburg）的農業經營者在霍根蓋姆舉行的第四十二次大會上，拉達烏爾海拉布諾（I. Tandauer = Gerabronn）所說的意見，未免有點樂觀，他說，如果像在威敦堡地方所有的情形那樣，牛乳業只限於牛油的製造并將去皮的牛乳歸還農業經營者，則牛乳業對於農業人口之有害的影響，就會消滅。「自然，此種利用牛乳的方法一定比以前在乾酪製造所中，用盡全部牛乳，而農業經營者得不到一點去皮的牛乳的時候，更迅速地和牛乳業調和，這就是為什麼醫生們不是無根據的從衛生學的觀點發出嚴重的懷疑以激動世人，而有一個軍醫，在當時甚至把他對於某些募兵區域內所募的新兵的一些傷感的觀察公開出來。」

去皮的牛乳，無論如何不能代替完整的牛乳；牠（去皮的牛乳）幾乎失去了在牠裏面所含的全部脂肪。完整的牛乳含有二·八——四·五%的脂肪，去皮的牛乳只含〇·二——〇·五%的脂肪。這幾行的作者又回憶醫生底報告，他們不能贊同去皮的牛乳，并且還看出異常有害的情形，就是在牛乳業發達的區域內，去皮牛乳用來喂養襁褓中的嬰兒。很顯然地，在農業經營者并不自己消費牠（去皮的牛乳）而是「利用」來養豬——這是

常見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之下，豬仔養得很肥并且獲得很大的價值，——的地方，歸還經營的去皮牛乳不能改善農村居民的衛生狀況。小農的生產品愈是變為商品，小農愈是把生產品變為貨幣，則他的飲食亦愈惡劣。

但如果牛乳業對於經營者的體力的康健有有害的影響，是無須懷疑的話，那末他們的經濟的提高，若不是因為極片刻的利益起見要想靠這種手段的幫助，是很可疑的。

在那個時候，德國牛油的製造迅速地發展，牛油的輸出，在輸入增加的時候不斷地降低。牛油的輸入與輸出，以基羅格蘭姆計，為：

年 代	輸 出	輸 入
一八八六	一一、三〇九、〇〇〇	五、一一九、〇〇〇
一八九一	七、六四九、〇〇〇	七、九五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六、八五七、〇〇〇	六、八九〇、〇〇〇
一八九六	七、一〇一、〇〇〇	七、八五七、〇〇〇
一八九七	三、七一一、〇〇〇	一〇、三二六、〇〇〇

關於乾酪，我們有以下的材料，以基羅格蘭姆計，為：

年 代	輸 出	輸 入
一八八六	三、四〇九、〇〇〇	五、二一六、〇〇〇

一八九一	一、八八三、〇〇〇	八、三九二、〇〇〇
一八九五	二、二一二、〇〇〇	九、三四八、〇〇〇
一八九六	一、八四〇、〇〇〇	一〇、一九六、〇〇〇
一八九七	一、三七三、〇〇〇	一一、九三七、〇〇〇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輸出的降低與輸入的絕對增高。

在世界市場上銷售牛乳業生產品的競爭不斷增長。差不多在整個歐洲的國家內穀物生產的危機可為牛乳業發展的刺戟物，在法國及荷蘭是如此，在奧大利、俄國、瑞典及挪威亦是如此。尤其是在丹麥榨油業得到驚人的發展。在這裏出超從一八八一年的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基羅格蘭姆增至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基羅格蘭姆（至一八九六年止。）牝牛的數目和人口比較也增加了。其數為：

年 代	一千人右	絕對數
一八七一	四四八	八〇七、〇〇〇
一八九一	四五二	八九九、〇〇〇
一八九三	四四九	一、〇一一、〇〇〇

但是在歐洲以外牛乳業也迅速發展起來。這裏我們特別提出以製造乳酪著稱的加拿大和以製造牛油著

稱的澳洲乳酪從加拿大輸出達到了：

一八九一年.....一〇六、二〇〇、〇〇〇(英磅)
一八九五年.....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英磅)

在澳洲牛乳業，除麥價低落之外，還用輸出的獎金（一磅牛油二辨士，一磅乾酪一辨士）來鼓勵，在維克托利亞獎至一八九三年，在南澳洲獎至一八九五年，克維斯蘭德則獎至一八九八年。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關於澳大利亞牛油製造業的報告說：「在維克托利亞（Victoria）牛乳業的進步其特徵就是工廠制度的發展。根據最近官廳的材料看來，到一八九五年維克托利亞有一五五個榨油工廠和乾酪製造廠，而在一八九二年祇有七十四個廠，並且全部生產品三五、五八〇、〇〇〇磅牛油中在第一年內製乳廠（Dairy factories）的出品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磅。從維克托利亞輸出的牛油的增长在下述的數字中就表現出來：

一八八九——九〇年.....八二九、〇〇〇磅
一八九〇——九一年.....一、七〇〇、〇〇〇磅
一八九一——九二年.....四、七九四、〇〇〇磅
一八九二——九三年.....八、〇九四、〇〇〇磅
一八九三——九四年.....一七、一四一、〇〇〇磅

一八九四——九五年……………五五、九四八、〇〇〇磅
 一八九五——九六年……………二一、〇二四、〇〇〇磅

從克維斯蘭德 (Queensland) 和新南瓦尼斯 (Victoria) 關於牛乳業之迅速增長也有同樣的報告。在後一殖民地 (新南瓦尼斯) 牛油的製造從一五、五〇〇、〇〇〇磅 (在一八八九年) 增至二七、三五九、〇〇〇磅 (在一八九五年) 在報告中關於新南瓦尼斯有如下的敘述：

「很顯然的，牛乳業已經不僅像先前一樣在農民 (Peasants) 方面發展起來，因為許多大的牧畜者 (Producers in a large way of business) 特別是靠近海岸的，在最近期間都注意到這種工業。

「在工廠制度初次採用的時候，大多數工廠都是協作組合的，並且乳脂的分隔與牛油的凝結過程是結合在一道的。這樣的結構一天天消滅，並且在原有地位上發生中央煉油廠，從許多分隔乳脂的工廠中獲得自己的原料。此種改變的益處可說很大。在每一個中心製造同一質量的牛油，並且生產成本費，由於高度的生產和優良的機器及器具如冰箱之類的採用，而大大地減少，可是這些機器和器具只有為大企業所採用纔有利。」

像德國輸出的糖一樣，德國輸出的牛油大部份均為英國所消費。德國輸出的牛油七、一〇一、〇〇〇基羅格蘭姆 (一八九六年) 中英國就消費了五、五七〇、〇〇〇基羅格蘭姆；到一八九七年，三、七一六、〇〇〇基羅格蘭姆中，英國消費了二、七六六、〇〇〇基羅格蘭姆。但是這些數字已經證明德國的牛油在英國

市場上很快被排擠。在英國牛油輸入中參加的（以百分數計）有：

年	代	丹	麥	挪威與瑞典	法	國	荷	蘭	德	國	澳洲與亞細亞	其他各國
一八八七		三二·三	一一·三	二七·五	一〇·七	一〇·三	〇·四	七·五				
一八九〇		四〇·七	一一·三	二五·九	七·七	五·一	二·〇	七·三				
一八九三		四〇·二	一二·四	二〇·一	六·一	七·一	七·三	六·八				
一八九四		四二·八	一一·〇	一六·五	六·四	五·四	一一·三	六·六				
一八九五		四一·一	一一·五	一六·一	六·八	四·〇	一一·一	九·四				

澳大利亞迅速增加的作用，在這裏特別明顯。丹麥的牛乳農場也已經有力地為澳大利亞的競爭所壓迫，牠使價格降低并使銷售困難。

但是德國協作運動家很熱心地努力儘可能迅速增加牛乳農場的數目；他們很熱烈地指出牛乳農場在最近幾年來的迅速發展；他們這樣行動，一若競爭者的人數愈多則企業收益亦愈大。自然，以農民的拯救者自居的他們，當然要這樣行動。協同組合的牛乳農場的數目，無論怎樣大，但和農民的人數比較他還是太小，雖然這種手段（協同組合的牛乳農場）對於農民是主要的救濟。但是在農民的大部份藉助於協同組合的牛乳經營回復到幸福時代的很久以前，乾酪和牛油的製造也一定遭受生產過剩和危機。丹麥——協同組合的牛乳農場之幸福

的國家，其中有許多現在已處於窘迫的境地。在德國，在制定精製牛脂的法律時，牛油製造者的處境，是最不幸的；可是，這并不妨害，如在德連茲金農業協作社最後一次大會上曾勝利地宣告過的，在一八九五年組織一七五個新的牛乳農場，在一八九六年，組織一七七個。很顯然地，創業者的狂熱病，在一八九七年還在流行。從聰明的協作運動家方面，現在已經發生警告的呼聲。例如前面已經提及的拉達烏爾·海拉布諾（Landauer - Gerabronn）在威敦堡農業經營者所舉行的第四十二次大會上，在其關於牛乳業的報告中曾說：「最顯著的，在現時，尤其是在最近一年來，創立新的牛乳農場，這一異常有力的運動，在農村中已表現出來。如果這個運動繼續下去，在兩年之內就可以比現有的牛乳農場數多兩倍，在良好的條件之下，甚至多三倍。例如，在海拉布洛區，從設立第一個牛乳農場的時候起，即是說十六年來不曾創立一個新的牛乳農場，後來卻在最後六個月之內發生了不下十個新的牛乳農場；此外，在最近的將來當然還希望設立新的牛乳農場。上述的運動如是劇烈，甚至協作社之熱烈崇拜者都很迷惑地停在這一運動之前，他們搖搖頭，並且擔憂着，這樣多牛乳農場的建立怎能不間接地對於農村經濟表現出極嚴重的危險。」

像酒精和糖業的恐慌一樣，牛乳業的恐慌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種工業生產的極大範圍之下，這種恐慌在現在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柴林格在其一八九七年二月普魯士皇家農業經濟學院內所宣讀的關於協作社的報告中，已痛責公

其牛乳農場彼此間進行的殘酷的競爭。他平心靜氣地想：「可是我們希望用協作思想之繼續發展，或者進一步用現在形成我國大工業的那種方法——卡特爾，來克服這些困難。我們即藉此鼓吹各個牛乳農場須比以前更加與出賣牛油的大公司聯合并且約定要出賣其生產品的某一部份祇能經過牠們去賣。在那時出賣牛油的興旺而鞏固的組合就在彼此之間分配了銷售的市場并因此消滅了從前混亂的，對價格有着壞影響的競爭；過剩的生產物，雖然是一種犧牲品，就被輸出到國外，輸出到英國。」但是柴林格教授在那篇演說中已介紹了這種高明的手段，在演說中他多少帶點忿慨地說：「在繼續組織卡特爾的時代在工業中就談不到這些購物組合的消滅，因為要反對經濟力的浪費——這是工廠主的聯合必然引起的——除了消費者的聯合以外，沒有別的保障」(Thiels Landw. Jahrbuch. 一八九七年，二二三，二二五頁。)

這樣看來，農業的卡特爾乃是「協作思想的發展」，工業的卡特爾乃是「經濟力的浪費」，祇有協作思想的發展纔能維持工業的卡特爾。起初稱讚協作運動為與卡特爾競爭的手段，隨後卻頌揚卡特爾為躲避協作社之不可避免的破產的手段。教授底邏輯和他的道德的忿慨一樣的高，但是他的結論之主要意味并不在此。結論值得注意的是指明牛乳農場的需要和稱贊卡特爾為唯一的出路，可是卡特爾在農場數不斷增加的時候是不會實現的。於是在這裏農業科學的光輝在其對於協作社之神祕不可思議的影響的讚辭內就被承認了！

大工業的其他農業部門也和上述的部門一樣，直到現在對於協同組合只有很小的意義。自然，行將到來的

危機澈底破壞了牠所接觸到的那一工業部門，絕不是必然的。危機祇在很少的場合內做了這種破壞工作。危機平常祇引起在資本主義的精神內，現存的私有財產關係的改造，也就是說只引起協同組合在反對危機時，一定成爲有用的屏障。缺乏資本的小企業，在危機中消滅。但是在農村經濟的工業中，企業的消滅就不限於缺乏資本的小企業；小企業的沒落引起靠牠生存的許多農業的毀滅，至少引起牠們的動搖。工業的工廠對農業經營者的幫助愈大，他們的農業愈是依靠工業，則破產的結果亦愈使之傾家蕩產。

極大的，設備完備的企業在這樣的危機下面，還能夠支持下去，但是牠們也過着嚴重的時期，這時利潤消失了，這時祇有再投下新的資本，纔能維持生產的繼續。不能重投新資本的協作社的社員，就要喪失其協作社的權利。如果支付能力的喪失是一般的，則除了將企業賣給資本家以外，便沒有別的辦法；如果支付能力的喪失不是一般的，那末危機就會把企業變爲幾個少數有錢的社員的私有財產，這幾個有錢的社員便以純粹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經營這個企業。

這一過程不一定引起以前協作社社員的無產階級化；他們幸好還能保存其農民的私有財產。但是在事情真有這樣幸運的地方，他們對協作的經營之經濟的依賴性仍被保持着；依賴協同組合，牠使農業經營者成爲平等的及有同等利益的社員，就變爲依賴具有相反利益的一個（或少數）強有力的資本家。

參加協作社工廠的勞動者成爲資本家工廠的僱傭勞動者。事情并不因此有所改善，僱傭勞動在此地正如

在家庭工業內一樣帶有隱秘的形態。這就是農業生產協作社的不可避免的結局。

像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各處一樣，在這裏畢竟，工業還是操縱農村經濟，資本操縱各個生產協作社。農村經濟的生產協作社，由於牠們能給予農業經營者以微末的利益，遂成爲鼓勵農村經濟工業化的強有力的手段，但農業的生產協作社同時也是替投資開闢一條到統治農業之路的強有力的手段；沒有這種生產協作社，投資就遇到極大的阻礙。我們一點也不抹煞此等協作社的價值。牠們對於農村經濟的變革是重要的，但這不是拯救農民的手段。

但是協作社亦有其一定的界限。對於其他各種工業適用的法則，對於農業的工業亦適用。生產的集中，牠們在農村經濟中和相反的傾向鬪爭在這裏也得到迅速的成功；在農業的工業內和在其他各種工業內一樣，大生產的傾向佔支配地位。製糖工業極其明顯地證明這一點，牠雖然人爲地爲國家的法令所鼓勵。在德意志帝國內製糖工業的情形如下：

年 代	製 糖 工 廠	改製甜菜的數量(以噸計)	在製糖工廠中平均數(以噸計)
一八七一—一七二	三一	二,二五〇,九一八	七,二三七
一八八一—一八二	三四三	六,二七一,九四八	一八,二四六
一八九一—一九二	四〇三	九,四八八,〇〇二	二三,五四三

一八九六——九七

三九九

一三、七二一、六〇一

三四、三八九

因此，在二十五年間，平均一個工廠所加工製造的甜菜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五倍。

在新稅則（其目的在限制生產的擴大）頒布前，在馬鈴薯釀造廠內表現出同樣的傾向，誠然，這種傾向不是在極狹隘的形式之內。根據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底材料，加工製造馬鈴薯、穀物或黑糖，在適用同一稅則範圍內，釀造廠數在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一——八二年期間從七、〇一一增至七、二八〇。但是繳納酒稅不到一五、〇〇〇馬克的釀造廠數則從六、二二二減到五、七八八，反之，繳納酒稅在一五、〇〇〇馬克以上的釀造廠數則從七八九增至一、四九二。

另一方面，計有：

年	代	加工製造的釀造廠數	加工製造的馬鈴薯之數量（以噸計）	每一釀造廠的平均量（以噸計）
一八八二——八三		四、一八〇	二、三九三、〇〇〇	五七二
一八八六——八七		四、〇六九	二、七一九、〇〇〇	六六八

從一八八七——八八年起在徵收國稅的區域內馬鈴薯釀酒廠的生產在一個工廠內的平均量仍舊沒有改變；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小的釀酒廠有很大的減少。其生產情形如下：

	一八九〇—一九一一年	一八九四—一九五年	減()或增()
五〇(立特)	一、三〇〇	五一三	(一)七八七
五〇—五〇〇	七三一	七二〇	(二)一一
五〇〇—五〇〇〇	六三二	六五七	(七)二五
五〇〇〇—五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	一、九八三	(十)五二
五〇〇〇〇以上	一、七九三	一、七五八	(一)三五

不言而喻的，牛乳農場同樣要服從近代大工業發展的規律；技術的進步對於牠們亦已前進；手工勞動在牠們方面為蒸汽所排擠，機器增加了，每種機器所加工製造的生產品數量增加了，對於生產和倉庫的設置增多了，銷售市場同時求助於受過商業教育的店員——只有大企業纔能給以充分的職業——的服務之必要性也增大了。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在新南瓦尼斯，牛乳農場都成極大的經營。從比利時來的通訊也這樣說：柯蘭德·波佛 (Colard Boyv) 在其對國際農業大會（一八九五年舉行的）的報告中陳述：設備不良與管理不當的小協作社，在和大的協作社競爭就會更加消滅，「大協作社照最低價格加工製造大量的牛乳，並能經常供給同一質量的生產品。如果有幹練的職員，指導生產，那末這些優點就會達到牠的最高點」（瓦德維爾德 (Wanderer

Velde) 在其論文比利時的農業社會主義中所引的, 見 "Neue Zeit" 第十五期, 第一卷七五頁。

德意志帝國食料工業的發展, 在下述的材料——由一八八二年及一八九五年的職業統計中引來的——中表現出來。根據這些數字看來, 每百個管理企業的人 (所有者及僱員) 中, 僱傭勞動者和職員其數為:

年 代	磨粉廠	糖 糖 的 生 產	其他植物的 食品製造 (註一)	動物的食品 的製造(肉 除外)(註二)	麥芽和麥 酒釀造	釀酒廠香酒 及酒精製造 廠	荷蘭水及果 子露的製造 廠	醋的製造
一八八二	一〇一	二,八三一	六八八	一四一	三六四	二九九	二五六	一六二
一八九五	二三七	五,七六四	一,二五一	三一五	七五九	四一三	三一五	二三七
增大	一三六	二,九三三	五四三	一七四	三九五	一一四	五九	七五

註一: 罐頭, 榨菜, 代用物, 咖啡, 可可, 小粉, 麵粉。

註二: 鱈魚類, 冰凍牛乳, 牛油及乾酪的製造。

我們到處都可看到企業繼續擴大, 在農業的工業之一切部門內僱傭勞動者的人數比企業家和企業指導者的人數增加得更迅速; 在蘆萄糖的製造內, 牛乳業內以及在釀酒廠內相對的增加也在百分之一百以上, 在植物的罐頭製造內, 約為百分之一百。例如連斯特爾商號的企業就指示出, 某些農業的工業企業到得了如何的發展。連斯特爾商號在瑞士有兩個大的工廠製造代乳粉。後一個工廠每天製出一〇〇、〇〇〇立特牛乳, 即在一

八〇個農村中聚集來的一二、〇〇〇頭牝牛的生產品；這一百八十個農村，已喪失其經濟的獨立性，並成爲羅斯爾一家的隸屬者。這些村落的居民外表上還是自己土地底所有者，但他們已經不是自由的農民了。

此種發展愈迅速往前推進，爲創立能夠支持競爭的企業所必需的資本數額愈迅速地增大，要想創立生產合作社的農業經營者愈減少則新的企業在這些地方一開始亦愈迅速地成爲資本主義的企業，這種情形在目前已經很明顯地在羅葡萄酒製造及馬鈴薯釀造內表現出來。若在這些工業部門內還有合作社的工廠，那問題也只限於富農和貴族地產的所有者的合作社而已。

如果在各種危機之下轉移到資本家手裏，這件事威脅着所有農業的生產合作社，那末在農業的工業之任何部門內，有一個時機早遲就要到來，起初合作社阻止小農業經營者作牠的社員，隨後就變爲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壟斷。此種發展同樣往往引起大的農業經營排擠小的農業經營。在這種場合內製糖業就給我們很好的證明。在爲機器所需的動力不必特別向別處引取而是由地產內的工廠所供給的地方，機器生產在農村經濟中的優點就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來。在此種情形并未引起小生產衰落的地方，小經營的工業化，就在小農業經營者身上烙一個依靠工廠——他的生產品之唯一消費者——的印，完全把他變爲工業資本的奴隸，他必須使自己的經營適合工業資本的需要。這就是農村經濟的工業給予農民的救濟。

六 工業排擠農業

如果農村經濟的工業之發展給農業經營者——頂多是一時的——以新的支柱，那末技術的進步就促成（壓迫農業經營者并破壞其經濟的各部門）諸傾向之出現。這種情形第一是爲原料之較好的利用所引起，即爲由同一數量的原料中產出較多的生產品；後一情形在生產品的消費不變的時候，自然，就促成對原料的需要減低，或者在消費增高的時候，又會阻礙對原料需要的增加。再則工業的進步引起用廉價的東西——由於廢料的利用和代用物的製造——來代替高價的原料。最後工業開始自己製造爲從前農業所供給的生產品，或者用別的方法來代替牠們，於是農業生產品就成爲多餘的了。

我們且舉幾個例來解釋。大家都知道因爲磨穀方法的不完善，食物就有很大的損失。製粉業的進步便大大地減少這些損失，「據波巴說，在十七世紀一個人一年的消費約爲七一二半特麥，這個數量現在幾乎是夠兩個人的消費，并且現在由於我國磨穀機的改良，替人類得出大量的食料，價值每年總在好幾百萬；這些食料在先只用於獸類，現在對於獸類極容易用其他完全不宜於人類消費的食料來代替。小麥含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不易消化的細胞質，并且完善的（就這字的廣義而言）磨穀機也不一定會提出比這一數量更多的糠粃，但是我國優良的磨穀機，還提出百分之一二——二〇的糠，普通的磨穀機則提出百分之二十五的糠，其中含有百分之六〇

——七〇的營養素【見黎比林 (T. v. Liebig) 的「化學書簡」三三四頁】。一八七七年熱練的磨穀者吉爾 (V. Till) 曾說，他發現了製粉的方法，可以提出九二·六%的麵粉及僅七·四%的糠和廢物（見吉爾 "Die Lösung der Brodfrage"）。關於糠糝繼續減少的記載我們還不曾見過。不過現在有人企圖用化學的方法，使糠糝的營養素，即蛋白質，成爲可以消化的東西。

很顯然地，在麵粉消費不變的時候，在穀物的利用上，製粉業的各種進步一定會引起麵粉需要的減少。但是降低需要的功效，在麵粉消費增加的時候，一定會表現出來，如果拿到市場上的穀物量同時也迅速地增加，或者比麵粉的消費還更迅速地增加。照這樣看來，模範的磨穀機排擠原始的磨穀機必然加劇穀物市場上危機的勢力。

剛纔提過的那些企圖使糠糝的營養素轉換爲使牠們能適應人的胃口，已經就涉及廢物利用和代用物生產的領域。改進廢物的利用還是近代生產方法現存的特徵之一。她（廢物利用）是大生產的自然結果；後者（大生產）將廢物大量地堆集在各處，且有將牠們移去的必要，有人就企圖爲着工業的目的而利用牠們并將牠們從困難的及不生產的耗費底東西變爲收入的泉源。這些廢料對於農村經濟有很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大工業的廢料供給農村經濟作爲牲畜的飼料和肥料，例如，釀酒廠，製糖廠，製啤酒工廠，榨油廠的廢料，所謂渣滓，木屑之類變爲使農村經濟緊工業的強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工業利用農業生產品的廢料，以便經過牠們的加工

製造就可和農業競爭。從棉花子——牠以前被拋棄了頂多用作棉花種植地的肥料——中製造油，可作此種廢物利用的例。現在人們學會從棉花子中製造油，致使由歐洲油類植物製出的油遭到很強烈的并且逐日增加的競爭。

在德意志帝國內輸入爲：

年	代	棉花子油	亞麻油
一八八六		八、〇六七噸	三九、七四三噸
一八九一		二一、三六六噸	三七、三八五噸
一八九五		三四、四六〇噸	一九、八六三噸
一八九六		二七、〇四七噸	一九、六九三噸
一八九七		三〇、二二七噸	一五、五四八噸

棉花子油，在假冒橄欖油的時候，在製造人造乳酪——從牛脂牛乳及廉價的油，尤其是從棉油中製造——的時候，特別適用；就味道和生理的效用而言很難將牠（棉花子油）和天然油區別。到一八七二年在德國已設立了第一個人造油工廠；現在人造油工廠約有六十個之多。

此種競爭并未改善了牛油市場的危急狀況，這是顯而易見的。地主階級的破傷的怨憤，他們於一八九六年

會以此怨憤表明他們要求對人造乳酪工業加以新限制的必要，自然是言過其實的，但是相反的斷言，說農業經營者完全沒有受到人造牛油方面的損失，也一樣是言過其實的。至於人造油的生產處於艱難境地的指示，對於農業經營者殆無慰藉之可言。關於這點從國家（人造乳酪和牛油在她裏面能夠更自由地使其競爭在競爭場上進行到底）的統計中比根據各個工廠的虧累較能推斷出在方興的管理不善組織不良設備不全的工業部門中會發生些什麼。在大不列顛輸入達到了：

年 代	油（由澳大利亞輸入的）		人 造 乳 酪
	以一〇〇磅為單位	百 分 數	
一八八六	一、四五二、〇〇〇		八七〇、〇〇〇
一八九二	二、一〇七、〇〇〇	四	一、二九三、〇〇〇
一八九五	二、七五〇、〇〇〇	一一	九二二、〇〇〇

澳大利亞廉價的油不僅排擠天然油的生產，而且排擠人造油的生產。但是這種情形自然引不起牠的生產方法的改善。天然油的生產者從這種情形中就沾不到什麼便宜。

但是如果我們不去爭辯牛乳農場由人造乳酪的製造中受到損失，那末我們無論如何也不願拿這些去稱道這種努力——為前者（牛乳農場）的利益而去限制後者的生產。我們倒願承認，協作的牛乳農場的破產使

成百成千的勤苦的農民降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是可悲的，但是更可悲的是，新機器消失勤苦的無產者底麵包，在近代社會內，技術的進步，只有經過這樣的道路，纔能實現。誰要想排除這個進步的道路，他就非排除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不可。反之若希望無論如何要保存這種制度而同時又要消滅這制度所產生的後果，那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愚蠢會造成一種暴動，如果要想在實際上以保護的特權在暫時的和等級的利益影響之下只給予生產者的各個階層，——使他們免除能減少他們利益的各種技術的進步，可是這種保護只有靠剝奪其餘的階層纔能實現——來實現這種愚蠢。這樣一種特權，在近代國家內，不能長時期地為民衆所忍受，因此就表現出用這樣方法拯救農村經濟於工業壓迫之下的烏托邦的思想。我國地主階級，在這一方向內一時的努力祇證明，食料品和嗜好品之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危險，對於他們是何等的巨大，後者和農村經濟比較得到了何等的意義。

人造油，及人製乾酪，直到現在，都是那些大生產所製造的代用物，這些代用物更銳敏地反映到農村經濟上。但是牠們并不是唯一的，在同一的方向內起作用的。

在麥酒釀造中，最近十年來，差不多在各國都有很大的增加。麥酒的製造供給了：

德意志		大不列顛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small>單位</small>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small>單位</small>
一八七二——	三二、九四五、〇〇〇	一八七三	三五、七〇〇、〇〇〇

奧		大		比		利		時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單位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單位	年	代
一八八二—一八八三		三九、二五〇、〇〇〇		一八八一		四四、七七四、〇〇〇			
一八九〇—一九一		五二、七三〇、〇〇〇		一八九一		五二、六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五—一九六		六〇、五六三、〇〇〇							

奧		大		比		利		時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單位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單位	年	代
一八七〇		九、三〇三、四〇〇		一八七〇		七、七九四、〇〇〇			
一八八〇		一〇、五三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		九、二三八、〇〇〇			
一八九〇		一三、五七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		一〇、七七〇、〇〇〇			

法		關		俄		羅		斯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單位	年	代	海克托利特耳	單位	年	代
一八七二		七、一三一、〇〇〇		一八六六		二、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五		八、〇一〇、〇〇〇		一八八四		四、二一二、〇〇〇			
一八九〇		八、四九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		八、四九〇、〇〇〇			

在丹麥啤酒的製造從一、二〇〇、〇〇〇海克托利特耳（一八七六年）增至二、一八五、〇〇〇（一八九一年）；在瑞典從四一九、八一五（一八八〇年）增至一、二四〇、八一—海克托利特耳（一八九〇年）；在瑞士從二八〇、〇〇〇（一八六七年）增至六五〇、〇〇〇（一八七六年）一、〇〇四、〇〇〇（一八八六年）及一、二四九、〇〇〇海克托利特耳（一八九一年）。

也許有人以為，忽布的生產也在同一比例增加。可是事實則不然。忽布的生產增加不大。到一八六七年前忽布的全收成在歐洲計有五〇、〇〇〇噸。一八九〇年的收成，亦復如是（其中德國有二四、七〇五噸，英國有一五、〇〇〇噸）；在一八九二年收成爲五七、五五〇噸（其中德國有二四、一五〇噸，英國有一九、〇〇〇噸）。

在英國一年生產出的啤酒量，從三千五百萬海克托利特耳（一八七三年）增至五千二百萬（一八九一年），即增加了一千七百萬，約增百分之五十。反之，種植忽布在一八七一年爲二四、〇〇〇海克塔爾，在一八九二年爲二三、〇〇〇海克塔爾。可是忽布的輸入，一八九七年國會土地委員會底報告說，「在最近二十年來實際上仍舊沒有改變。」在一八七六——七八年期間，忽布從各國輸入額平均一年爲一九五、〇〇〇百磅，而在一八九三——九五年期間則爲二〇三、〇〇〇百磅。

下列的表，表明在德國忽布種植的發展情形：

忽布的收成.....	一八八四年	一八九六年
忽布的輸入.....	二八、八七〇噸	二五、三二五噸
合 計.....	一、三四〇噸	三、〇四一噸
減去忽布的輸出額.....	三〇、二一〇噸	二八、三六六噸
忽布的餘額.....	一一、五一四噸	九、八六八噸
一八、六九六噸	一八、四九八噸	

啤酒的製造單位海克托利特耳.....	一八八四——八五年	一八九六——九七年
忽布一噸能製出的啤酒單位海克托利特耳.....	四二、二八七、〇〇〇	六一、四八六、〇〇〇
	二、二六〇	三、三二四

這樣看來，啤酒消費增加對於忽布種植者毫無幫助。牠祇促成忽布代用物的生產而已。

化學的發展對於葡萄種植者比對於忽布種植者還壞些。化學教人從馬鈴薯澱粉，細屑和木質纖維中製造葡萄糖，這是改良價值少的葡萄酒的著名的方法。此外，化學又教人從葡萄皮及乾葡萄中用砂糖及其他農業的工業之生產物的幫助來製造葡萄酒。

甚至所謂「天然酒」也必須施以種種調製，即需要自然科學的智識和應用貴重的器具，這樣的酒更加成爲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生產物，而葡萄種植者祇以原料供給牠（資本主義大工業，）酒窖就變成酒工廠。

邁凱爾教授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在普魯士皇家農村經濟學院內所宣讀的他的報告「論葡萄酒的製造及

製造技術的立法狀況」中曾作出這樣的結論：「葡萄酒——不完全是天然的生產品；在葡萄樹上，葡萄酒不會長成瓶中的葡萄酒，而是必須在製造的時候經過一段長的路程，否則名貴的葡萄酒就不會從甘甜的葡萄汁中製造出來……」

「此種葡萄酒的製造在最近幾年來引起了許多科學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在葡萄酒的製造領域內進步很速，逐漸學會從價值較少的葡萄中製造品質優良的天然葡萄酒。酵母菌的培植首先佔據了這一領域，」葡萄樹皮上有各種酵母菌，使葡萄液發酵。「大家都知道，有許多種酵母菌，生長在約干里斯堡，蓋仁蓋姆的酵母菌製出有一定質量的葡萄酒；於是就成就了用純粹某一種酵母菌的培植來獲得一定質量的葡萄酒。事實上在當時有了許多成功的經驗，熱心家以為純種的酵母菌的培植就沒有葡萄酒釀造也行；祇要人工地將酵母菌加到砂糖溶液內就可得到極名貴的約干里斯堡或斯丁堡的葡萄酒。」

也許有人以為這些前途能夠靈活地實行；不僅甜豌豆，就是約干里斯堡的葡萄酒對於每一個人——這難道不是地上天堂的基礎嗎？

社會主義者這樣想，但是地主階級則不然。對於社會的福利——食料品及嗜好品的豐富——是幸福的，對於地租就不幸。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從砂糖水中替自己製出約干里斯堡的葡萄酒，那時約干里斯堡葡萄園的地租就要完結。因此，邁凱爾教授很溫和地繼續說：「謝謝上帝，這是不成功的，祇有經過純種酵母菌的培植纔能製

出比沒有酵母菌更好的葡萄酒，同樣也纔能在我國生產品上獲得較好的價格。而且要利用這些純種的酵母菌於葡萄酒釀造內，要經過好幾年。」

這樣看來，這些酵母菌直到現在還奉命唯謹地停留在地租之前。但是這些極渺小的惡漢在天朗氣清的一天拋棄其忠貞的態度而變為革命者，這不是很可怕嗎？約干里斯堡葡萄酒從酸味的水果中製造開始以後，爲什麼不會完結了從砂糖水中製造葡萄酒呢？

但是禁止葡萄酒的改良是不可能的；邁凱爾教授在其報告中自己又繼續說明這一點。統計說，在十年間只有一年對於葡萄酒是特殊的一年，三年是上等的，三年是中等的，三年是下等的。這些酸葡萄（即下等的）沒有適當的加工製造就不被輸送到文明的國度去。禁止葡萄酒的改良——就很有害於葡萄種植者。

除了改良了的葡萄酒及從葡萄皮製的葡萄酒以外同時發生乾葡萄酒的製造。一從溶解在水中的，變得很小的和釀酵過的，特別是經過純種的酵母菌的乾葡萄酒中，可以製出醇美的葡萄酒。此種非常良好的完全宜於消費的葡萄酒，并不稍遜於普通的葡萄酒并且是德國本國出產的葡萄酒的嚴重的競爭者。從技術的立場說要反對牠是不行的，但是從經濟的立場說，牠遇到很大的反對，因爲牠對德國本地葡萄酒造成可怕的競爭。牠善於抵抗釀酵并且非常廉價：十二馬克就可製出一百立特耳。此種可怕的競爭，只有用立法的方法堅決地和牠競爭。」

在事實上，你們想一想，乾葡萄酒製的葡萄酒排擠馬鈴薯製的威士忌酒若是成功，則落到德國人民頭上來的

是何等的不幸啊！

用純培植的酵母菌就可以從麥芽中製出很像葡萄酒的飲料。在漢堡有一個極大的工廠就是製造這樣的麥芽酒。

關於這一報告的爭論，我們可以從其中引用政府顧問吉爾的意見書，他指出，小的葡萄酒種植者自己不能進行改良葡萄酒的釀造。此種改良只有大葡萄園的主人和葡萄酒商人纔能辦得到。在六十年代邁岑已經寫過類似的話：「只有最大的葡萄園主人和富裕的葡萄酒種植者纔自己榨出和濾清葡萄酒廠着并且待價而沽。沒有工具的貧窮的葡萄酒種植者的人數（在一八六六年前的舊普魯士內）約爲一二——一三、〇〇〇人。爲了要迅速地獲得現金，他們就直接在收穫後將葡萄出售，他們受定銀的拘束往往更早地將牠出賣。徵稅官計算在一八六四年秋季爲這些葡萄酒栽培者的階級，葡萄酒商人和葡萄酒製造者所賣的葡萄量爲六九、四〇五百磅」（見土地第二卷二七五頁。）

小的葡萄酒栽培者之依賴葡萄酒商人，爲葡萄收成的不安定，所加強。我們在上面已經引了邁凱爾的敘述，十年之間有三年不好的收成，只有一年有特殊的收成；但是除了數量外質量也發生動搖。邁岑在上述的著作（二七七頁）內引萊蘭省從一八二一至一八六四年這個期間所收穫的葡萄量。我們且從那裏引一些數字（以斗爲單位）

一八二一年	二四、八六八	一八五四年	九一、二九九
一八二二年	四六九、二一一	一八五五年	二一二、三五八
一八二八年	八一六、二二八	一八五六年	一七五、六六三
一八二九年	二七一、〇八八	一八五七年	五四六、五四五
一八三〇年	四一、九七〇	一八五八年	五七六、二〇五
一八三四年	八五〇、四六七	一八六四年	三二〇、四七一

在此種情況之下，葡萄栽培就成爲純粹的賭博，在這種賭博中，歸根到底是誰有最肥滿的荷包，誰能夠長年忍受損失，他一定就會得勝。一次收成不好就使小的，沒有資本的葡萄栽培者變爲破產者或者使他變爲失望的奴隸。

協作社在此處當然是一個救命圈。協同組合的批發所當然使小葡萄栽培者能夠將他們的葡萄的改良和仲介商人所得的利潤放到自己荷包裏。關於農業生產協作社所說的一切也適用於牠們，一方面，這些協作社不是很小的，沒有資本的葡萄種植者所能辦到，另一方面，像其他生產協作社一樣，牠們遲早會退化爲資本主義式的（協作社）或成爲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

在這個意義上，牠們祇會加速發展，其趨勢——使葡萄栽培者更加在經濟上依賴工廠，依賴酒店，使他（葡

葡栽培者)變為釀酒工業的零工。

那種技術的發展,牠不斷地加強葡栽培者對葡萄酒製造者的依賴同時就減弱後者(葡萄酒製造者)對本國葡栽培者的依賴。技術的發展供給他(葡萄酒製造者)大量的國外廉價的葡萄酒他就把這種廉價的葡萄酒變為上等的葡萄酒。技術的發展又供給他(葡萄酒製造者)別種廉價的製酒的原料。

葡萄酒製造的變革在法國最為明顯。因為葡樹的害蟲和別的病所造成的荒蕪,葡萄的收入就大大地減少;其年額為:

十年內的 平均數	葡栽培 面積 海克塔爾	一海克塔 爾的收 入		葡酒 特耳 托利 位的	生 產的增 (+)或 減(-) 海克 托利 特耳 單位	葡酒 特耳 托利 位的
		單位 海克 托利 特耳	總 收 入			
一八七—一九	三,三〇四,二六	三三.四	五,八六二,九六	八八,一〇〇,〇〇〇	(+)二四,八〇〇,〇〇〇	五,二〇二,四一九
一八〇—一九	三,〇三二,八九七	三六.三	五,四九六,九二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八六,一九
某年—一九〇	一,九九,八六	三〇.六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某年—一九二	一,〇三三,三三	二七.〇	三〇,一三九,〇〇〇	?	?	三,〇〇〇,〇〇〇

此係一八八〇——一八八四年數字

雖然從八十年代開始葡萄酒的消費超過牠的生產，可是輸出差不多沒有減少。這種情形一部份可用前幾年剩餘的貯積，一部份可用廉價的葡萄酒的輸入來說明，這種廉價的葡萄酒在法國自己加以改良，隨後自己消費或者當作上等的法國葡萄酒輸出。葡萄酒的輸入（單位一千海克托利脫耳）其額為：

	一八七八年	一八八九年	一八七八年	一八八九年
從西班牙	一、二四七	七、〇五二	從奧匈	九
從阿爾及爾	一	一、五八一	從土耳其	八
從葡萄牙	一六	〇、八七五	從希臘	〇
				一四六

同時人造葡萄酒的製造也因之增加了，甚至根據官廳的統計，葡萄酒的製造已為：

	從乾葡萄酒製的 (單位海克托利脫耳)	從葡萄酒皮製的 (單位海克托利脫耳)	合 海克托利脫耳
一八八〇年	二、三三〇、〇〇〇	二、一三〇、〇〇〇	四、四五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四、二九三、〇〇〇	一、九四七、〇〇〇	六、二四〇、〇〇〇

人造葡萄酒實際的製造一定不止此數。這一工業部門祇有一部份是公開地進行。

在德意志帝國內乾葡萄的輸入從二、九九四、〇〇〇基羅格蘭姆（一八八六年）增至三二、八四六、〇〇〇基羅格蘭姆（一八九五年）。此種增加的極大部份當然是把葡萄酒的製造也算在內。除此以外，新鮮葡萄的輸入從三、一八一、〇〇〇（一八八六年）增至一九、三七一、〇〇〇基羅格蘭姆（一八九五年）。

可是在這一方面還有海外競爭，一方面是合衆國、加利佛尼亞、智利、烏拉格、阿根廷、澳大利亞，另一方面是非洲（阿爾吉爾、屠尼斯、開普蘭）。在阿爾吉爾葡萄樹栽培的面積在一八七八年爲一七、六〇〇海克塔爾，在一八八九年爲九六、六二四，在一八九三年爲一一六、〇〇〇海克塔爾，收穫爲三、八〇〇、一〇〇海克托利脫耳。在合衆國葡萄酒的產量在一八八九年爲一、五〇〇、〇〇〇海克托利脫耳，在阿根廷也有同樣的數量，在智利則爲一、〇〇〇、〇〇〇海克托利脫耳。

直到現在還只說到農業所供給的價值較少的原料品的加工製造。但是在某些方面工業的發展最後甚至能夠直接製造以前爲農業所供給的生產品，而無須農業的協力。

在這一方面最爲顯著的是化學在黑油製造中所達到的成功。從黑油中得到許多完全新的東西，尤其在醫學上起着重大作用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的數量在逐日增加；除此以外，從黑油中也得到很廉價的直到現在專爲農業所供給的東西。

例如，茜艸到七十年代對於歐洲的少數地方，如荷蘭法國南部及德國南部是重要的工藝植物。一八六八年格連伯和黎貝爾曼發明了，從煤黑油中製出茜草色素的方法從一八七〇年起更加為製靛青的工廠所採用并且給茜草的種植以致命的打擊。

從其他黑油製的生產物中——糖精（其化學分子式為 $C_7H_5NO_2$ ）——牠發明於一八七九年，其大規模的製造則開始於一八八六年——對於甜菜的種植也有同樣的結果。但是事情並沒有到了這個地步。固然，糖精其甜五百倍於蔗糖，但是牠代替蔗糖祇能當作嗜好品，不能當作食料品。可是牠把蔗糖從直到現在用蔗糖的許多地方排擠出去，并且阻礙牠的消費的增加。

酒精也可以從黑油中製出，但是這種方法直到現在還不十分完善，在工業中這種方法之有利的採用還說不上。

電氣工程的勝利對於農村經濟的某些部門有極不愉快的意義。很顯然的電氣工程能做到而為蒸汽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差不多完全把馬匹排斥於經濟生活之外。

蒸汽力祇有應用於大量的運動中和生產不間斷的時候纔是**有利**。蒸汽力在運重於遠距離的時候就排擠了馬匹。但是鐵路——給大城市的發達以有力的推動，且使其首先成為可能——給當地的運輸提出了在不久以前祇要藉助馬力就能解決的許多更困難的任務。在農村經濟內蒸汽機同樣不能排擠馬，無論蒸汽機對於某

些勞作有若何的價值。

電力容易分割和傳導於遠距離，牠的活動可以隨意間斷和重新進行，電力發動機佔很小的地位并且容易管理；因此電力在運輸和農業內同樣地可以盡作爲動力的馬的機能，而且電氣在許多場合內已經做到了這地步。其他技術的成功也促成把匹馬排斥於運輸的領域之外。別種機械的車輛和電力的四輪車一同發生，而人力所運轉的自動車很迅速地普遍起來，不僅可供滑稽新聞紙和庸人的道德憤慨的材料之不竭的源泉，而且是自行車製造者和商人的肥碩的利潤之源泉。

其結果是明顯的：對於馬匹的需要當然減少，馬匹飼養當然無益。在合衆國內，電氣鐵道比在歐洲更排斥了馬車道，馬匹飼養已成爲無益的了。有一個很熟知美洲這種狀況的英國農業經營者根據他自己的觀察，關於這種狀況寫道：「在最近期間對於馬匹的買賣可以聽到許多怨言。在美洲馬匹飼養在我看來是最無出息的；養馬的人對我說，他們往往不能將他們所飼養的馬匹出賣，因爲缺乏買主；供給多於需要。這種情況并不使我奇怪，因爲在美洲每個小城市現時都有有軌的電車道代替了馬車道。重實際的美洲人早已發見了電氣比馬的高貴的飼養更便宜；我常常驚奇電氣甚至普遍到最小的農村之內」（見柯尼格（König）英國農業的狀況“Die Lage der englischen Landwirtschaft” 四〇八頁）。

的確，北美洲馬匹的數目減少了——雖然該處農業擴大，牠的人口增多，城市發展。馬匹的價格比馬匹的數

低落得還更厲害。在合衆國馬匹計有：

年	代	馬	匹	數	價值（以美元計）
一八九二		一五、四九八、一四〇			一、〇〇七、五九三、六三六
一八九三		一六、二〇六、八〇二			九九二、二二五、一八五
一八九四		一六、〇八一、一三九			七六九、二二四、七九九
一八九五		一五、八九三、三一八			五七六、七三〇、五八〇
一八九六		一五、一二四、〇五七			五〇〇、一四〇、一八六
一八九七		一四、三六四、六六七			四五二、六四九、三九二

合衆國馬匹現有數量的價值在目前還不到一八九二年牠們的價值的二分之一。
 在合衆國馬匹輸出的增加和對於馬匹的需要的減少同時並進。馬匹的輸出爲：

	一八九二年	一八九六年
總額	三、二二六頭	二五、一二六頭
輸出到英國	四五七頭	一二、〇二二頭
輸出到德國	二八頭	三、六九六頭

美國官廳的統計（合衆國年鑑，農務部“Yearbook of the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五七四頁，五八〇頁）就是這樣說的。根據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底材料看來，從合衆國輸入德國的馬匹在一八九〇年爲一九頭，一八九六年爲四、二八五頭，一八九七年爲五、九一八頭。從美洲輸入在最近幾年來超過了從英國輸入，從英國輸入的在一八九〇——一九七年這個期間從一、〇七〇頭增至二、七一九頭。

可是，交通道路之技術的進步，在歐洲境內初期一定要引起限制馬匹數的增加，隨後引起牠的減少首先受這種打擊的是馬匹飼養者，大部份是大的農業經營者；但是馬匹的飼養在某些地方對於大農直到現在還是收入的主要源泉。反之，小經營者的利益就直然不受馬匹過剩生產的影響並且在這裏小經營者之勝過大經營者，很顯明的，並不是因爲他們技術的優越。但是馬匹飼養的減少間接打擊他們的利益，因爲馬匹飼養的減少自然而然地會引起飼料生產的減少。自行車、電氣鐵道、機械的馬車、電犁既不消費燕麥，也不消費乾草。可是燕麥比起其他重要的穀物直到現在都不大受到國外競爭的苦痛。在大不列顛種植的面積（以英畝爲單位）爲：

	一八六七——一八七二年	一八七八——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小麥	三、五六三、〇〇〇	二、九六五、〇〇〇	一、四一七、〇〇〇
大麥	二、二八九、〇〇〇	二、四六〇、〇〇〇	二、一六六、〇〇〇
燕麥	二、七四六、〇〇〇	二、七七七、〇〇〇	三、二九六、〇〇〇

到一八九六年種植燕麥底面積稍稍縮減了。種植面積祇有三、〇九五、〇〇〇英畝。這種減少是不是暫時的現象抑或已經是燕麥種植繼續減少的開端，此刻還不能斷定。總之遲早我們一定會期待着同樣的結果。國外競爭加以憐惜，本國工業的發展則加以威脅。

農村經濟之變為工業的生產還剛剛開始。大膽的預言家，尤其是富於幻想的化學家已經夢想着那個時代，從石頭做成麵包，一切食料品都在化學工廠內製造出來。我們在這裏用不着算計到未來的這類音樂。但有一點是無疑的。農業的生產在許多領域內已變為工業的生產，其他許多變化亦已迫在眉睫；農業活動的任何一個領域都不能避免牠們。而且在這方向內每種進步必然引起農業經營者境況的惡劣，引起他們對工業的依賴性加強，引起他們生存的保證減少。我們還不能根據這點就說農業的崩壞。但是在近代生產方法立足穩固的地方，農業的保守性就無可挽回地被破壞了。對舊習的偏執會威脅農業經營者趨於殞落；他必須不斷地追蹤技術的發展，必須不斷地使自己的生產適應新的關係。對於他沒有一勞永逸的可能。當農業經營者覺得他已征服了一個敵人，在他面前又站起新的敵人。而且在農村中全部經濟生活——直到現在在一個同一的車軌中單獨地進行——陷入不斷革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特徵的狀態中。

這個永恆的漩渦把所有沒有遇着非常幸運的，不善擇手段的，沒有非常才智的或沒有異常的貨幣手段的人投到無底的深淵裏。

這樣看來，農村經濟的變革，可以說，開始（*inaugure*）他們的狩獵，她（狩獵）無情地使他們向前競逐，而
至力竭聲嘶而止，——除了少數粗鄙的命運的寵兒（*brutale Glückpflanze*）之外，凡能踏着死尸而躡入大寶
本家之列，他們就不會跌倒。

第十一章 前途的展望

一 發展的動力

有產階級的經濟學在其對農村經濟發展進程的研究中以爲就土地面積而劃分的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中心問題。因爲此種關係的變化比較緩慢。於是有產階級經濟學就認爲農業與工業相反，農業是具有保守性的。

反之，另一種見解，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很普遍的，則以高利貸及債務爲農村經濟中的革命成份，因爲高利貸及債務剝奪農民的私有財產驅逐農民於其家庭之外。

我們以爲前一種見解是不正確的，這我們已經充分地說過了，但是我們也不能無條件地同意第二種見解。大家都知道，農民的債務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徵。債務像商品生產一樣早，而且在希臘羅馬時代已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希臘羅馬的歷史是從傳說的時期過渡到歷史上有史可稽的時期。高利貸資本的本身只能使農民不滿和叛亂，牠不能構成向高度生產方法發展的動力。祇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生長出來的時候，在

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競爭的鬭爭發展起來的時候，在大量貨幣的所有者能夠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極有利地進行生產的時候——祇有在這個時候高利貸纔變爲信用，纔大大地提高資本的效力并加速經濟發展的過程。然而即令在這樣的場合之內這對於工業的影響大而對於農村經濟的影響小。在農村經濟內借貸還大大地保存着資本主義前期的性質。土地所有權的債務現在僅在很小限度內纔是爲生產的擴大與改善的需要所決定。在更大的限度內她是地產的需要與過渡——出賣與承繼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論，債務不僅不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反而阻礙了此種發展，剝奪了進步的手段；牠不僅沒有任何健全進化的成分，牠簡直是保守的，牠不能提高農民的經濟到較高的生產階段，牠祇能維持此種生產於原有的不完善的階段上。

土地的債務，就其對生產方法的關係乃至私有財產的關係而言，牠的保守的成份大於革命的成份。在一切場合之內，在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的條件對於正發生的新生產方法是一種障礙物的地方，債務可以成爲一種加速農民土地被剝奪的手段。這種情形在古羅馬時代就有過，在那裏大批戰爭俘虜來的奴隸促進了種植經濟的發展，這種情形在英國改革時代也曾有過，當時毛織物貿易的繁盛曾引起飼羊牧場的擴大。但是債務祇是剝奪農民土地的槓杆之一，而不是動力。例如德國南部在改革的前後農民對於債務的怨聲更勝於在英國，而在德國債務並沒有引起農民土地的被剝奪。各個農場及其建築物已數易其主，而農場及其建築物則依舊存在。高利貸在這裏引起了極度的剝削，但是沒有引起農民人數的減少。

在農業生產條件內的變革——跟着法國大革命及其在其他各國反映之後的變革——替高利貸資本開展了財產關係範圍內根本改變的極大可能性。這種變革同樣助長了大生產的傾向，和經營細分的傾向。農民債務幫助了大地主圈圍自己的地產并擴大自己的森林。另一方面，正增殖着的農村人口對於住宅和土地的極大需要引起了地產的分配，引起了負債的農場及其建築物的分割，這便是多數高利貸者在牠上面有系統地工作的一種過程。無論是這一過程或是那一過程都沒有完結，但是從海外競爭使農業成爲無出息的那時候起，從農村人口的增加已停頓，甚至常常趨於減少的那時候起，這些過程就更加延緩了。如果不說到牠們的特別優良的條件如接近城市或工廠，那末地租和地價更是沒有增加；地租和地價已是低落，并且有更加低落的危險。此種現象愈是繼續推進，則高利貸資本家對於剝削負債的農民愈不感興趣。公開拍賣不僅威脅他失去資本的利息，而且甚至要損失一部份資本。爲了要不迅速拍賣，他們就設法以延期支付利息或往往以付出新貸款等方法把牠移於他人，如像在英國甚至最貪婪的心腸狠毒的債主們因農業危機不得不延緩租金的尾數，在將來把牠（租金尾數）減少，自己花錢着手舉辦農業的各種改良。

例如，地主維凱爾曼從威斯特凡林寄來的社會政治學會關於農民狀況的調查中說：「此地農民保持其祖遺土地的意志，極爲堅強；許多高利貸者寧願強迫農業經營者勞作，並且剝奪其所製造出來的全部生產物，（除掉爲貧困的生活所必需的之外），而不願實行不可靠的拍賣負債土地。況且在我國許多貧瘠而多山的區域內

這樣的土地，早已沒有買主了。」（見調查錄第二卷第十一頁。）

農民的債務，雖已成為農村中生產條件變革的障礙，然而亦不足以抵抗私有財產關係的變革。目前農業的危機迫使私有財產關係變革的傾向退卻。然而農民債務將利用生產關係的每一新變化使私有財產關係更易適應生產條件。

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去找出使此種變化，在生產方法內成為必要的動力呢？在上述各節以後回答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在工業之內，隱藏着的不僅是她（工業）本身發展的，而且是農業發展的發條。

我們已經看見正是城市的工業破壞了農村中工業與農村經濟的一致，使農村居民變為單方面的農業經營者，變為依賴市場變化的商品生產者，正是城市工業替農村居民創造了無產階級化的條件。

我們更看出封建時代的農村經濟已陷於循環圈內，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跳出循環圈以外。城市工業創造了革命的力量，這些力量不得不，而且是能夠破壞封建制度，並且這些力量不僅對於工業，而且對於農業開闢了新的道路。後來工業又創造了新的合理的農村經濟之技術的和科學的條件，在機器、人造肥料、化學實驗室中的顯微鏡等幫助之下革命化了農村經濟，因此造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技術的優越超過農民的小生產。但是除了大生產與小生產間這些質量的差異以外，同一的經濟發展還創造了其他的差異；即在僅僅用以自給的經濟與主要地，或至少，大部份，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之間的差異。無論是自給的經濟，無論是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兩

者都一樣陷於依賴工業的地位，不過各循不同的道路罷了。對於前者——自足的經濟——就發生以出賣勞動力，以僱傭勞動或家庭工業而獲得貨幣的必要，正因為如此，小農就愈加依賴工業，愈加接近工業無產階級的地位。商品生產的經濟同樣很迫切地需要副業。自然，縮小生產成本費的傾向因技術的進步而實現，但是此種傾向在資本主義的農業內卻為相反的傾向所摧毀，此種相反的傾向將一切重負加在農業上；地租的增加，（在一處為租金，在別處為抵押債務）助長此種債務或土地細分的承繼權；城市剝削農村的增長（這是軍國主義，稅收，橫徵暴斂等等的結果）；土地的枯竭；有害的動植物的危害；最後，農村勞動者之不斷為工業所吸引——這一切的因素，不管技術如何進步，牠們以聯合的行動更加增高農業中的生產成本費。這些因素之最近的結果就是生活資料的價格普遍的和不斷的增高，而且也是城市與農村間，土地所有與多數消費者之間矛盾的加劇。

但是那種工業的發展，牠在農業中創造了這些關係又因世界流通的擴大而繼續改造這些關係并且發生了海外的糧食競爭。在土地所有權不十分強大的地方，工業的發展就把一切重負落到牠（土地所有）的身上，英國便是這樣；但是牠也正是用這些來減少土地所有與多數消費者之間的對立。在土地所有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地方，牠就企圖以人為提高的生活資料的價格重新將價格提高到舊時生產成本費那樣的高度，可是在近代世界的流通及國際競爭的情形之下這種辦法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成功，也不能充分成功，牠祇能引起土地佔有與多數消費者——無產者之間對抗的加劇，這種對抗早已達到很高的緊張程度了。但是農村經濟和土地

佔有一同感到痛苦，首先自然是在農業經營者是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地方；農村經濟具有各種不同的生產方法，爲的是要使其適應新的關係；牠在這裏回復到廣泛的牧場經濟，而在別處牠又過渡到強度的園圃經濟，但是到最後牠纔認識最合理的是工業與農業的結合。

於是近代的生產方法，至少，在其兩種形態內——小農之職業的僱傭勞動與大農之農業的工業企業——在其辯證過程之終點又重新回復到牠的起點：回復到消滅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但是如果原始的農民經濟內農業在經濟上是一個決定的和居於領導的契機，那末在現時這些關係都改變了。資本主義的大生產支配着，而農業必須聽從牠的命令，必須適合牠的需要。工業發展的方向成爲農業發展的標幟。如果前者（工業）是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走，那末後者也一定是照着那條道路走。但是在純農業的區域裏，由於牠們領土內的人口閉關性，牠們仍然阻礙了工業進步的進程，在那裏人口在數量上，能力上，智識上，幸福上都被減少，同時土地被枯竭，農業受破壞。資本主義社會內純粹的農業已不能成爲幸福的元素，同時農民也喪失恢復其幸福的希望。像封建時代的農業人口一樣這些份子陷入死巷，他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跳出這條死巷，他們在死巷中更受壓迫，他們十分恐懼而且全完絕望。這一次正如十八世紀末葉一樣，祇有城市革命的民衆纔能把他們從加在他們身上的很重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並爲他們開闢了一條向前發展的道路。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農村中強有力地阻礙這一革命階級發展的條件之構成，而在城市中卻促進此種發

展。牠將勞動羣衆集中到城市內，牠在城市內替他們（勞動羣衆）的團結，他們的智力的發展，他們的階級鬭爭，創造出有利的條件。牠分裂農村人口，使農村勞動者散居廣大的地方，使他們孤立，剝奪他們智力的發展和反抗剝削者的手段。在城市內牠把所有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內，並因此直接剝削被剝削者。在農村經濟內牠祇部分地引起生產的集中，另一方面，牠反而引起生產的分碎。在其繼續發展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一切國家內遲早總要把工業變爲輸出的工業，不以國內市場爲滿足，而是要爲世界市場而生產。在同一限度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把農業降低到甚至不能獲得國內市場的那種生產的階段上，牠的意義隨着世界的生產而更加降低。

所以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佔有的形態以及資本主義的利益愈是與農村經濟的需要相矛盾，牠們愈是將一切重擔加在農村經濟上或甚至壓潰牠，資本主義形式的破壞，從資本主義利益的羈絆中解放對於農村經濟愈是不可避免，——則牠（農業）愈益不能從本身中發展出必要的力量和組織的萌芽，牠愈加需要工業的革命力量方面的推動。

這種推動已表現出來了。工業無產階級如不和自己一起解放出農民，就不能解放自己。

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不是動物的有機體，也不是植物的有機體，而是特殊的有機體，但是這樣的有機體并不是個人之簡單的湊合。正因爲是一個有機體，牠一定是按着一個統一計劃組織起來的。愚蠢的想法，以爲社會內一部分可以在某一個方向內發展，而另一部分，同樣重要的部分可以在相反的方向內發展。社會祇能在一

個方向之內發展。但不一定要使有機體的每一部分從本身中發生出對於牠的發展所必要的動力；祇要有機體的某一部分對於整個有機體發生出必須的力量就夠了。如果大工業的發展是向着社會主義方向走，如果此種工業在現社會內是佔統治的力量，那末牠爲着社會主義而去征服那些不能從本身中發生出這種變革之前提條件的區域，并使之適合自己的需要。牠一定是爲着自己本有的利益，爲着一致的利益社會的和協而這樣做的。

我們不能做出比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還壞的對現社會的預測，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洋洋得意地宣告：「讓工業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走，農業向着『個人主義』的道路走。」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如果農村經濟表現出充分力量，足以排拒社會主義，同時「個人主義」又沒有力量壓迫工業，那末這種情形便表示出并不是拯救社會，而是破壞社會與不斷的內戰（*Bürgerkrieg in Permanenz*）；幸而資本主義剝削底這個最後的救護者是人類社會所不齒的。

二 社會主義的農村經濟之諸要素

我們是從現代工業的發展必不可免地要走向社會主義的這個論據出發。要證明這個論據需得整部的書；這個任務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中首先在資本論中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在這裏祇想儘可能更具體地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及其必然的結果——工業的社會化——一定會影響農村經濟。

我們故意說「社會化」，而不是說「國有」。我們且把社會主義社會能否保存國家的形式這一問題姑置不論；在其開始的階段內牠無疑地要保存這些形式；國家一定會成爲社會變革之強有力的槓杆。但是此種變革其本身祇需要一切生產及一切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斷不是「國有」；生產工具不應當是私有財產而應爲社會的財產。生產工具的社會作用決定佔有生產工具的社會組織。滿足當地需要的生產工具，如麵包廠，電燈廠，馬路等宜於社有而不宜於國有，那時許多生產工具（交通工具當然也包括在內）都具有國際的意義并成爲國際的財產，如蘇彝士運河或巴拿馬運河。

最重要的生產工具自然要轉變爲國家的財產，因爲祇有近代的國家能作爲社會主義社會的骨架，能創造出使公社或協作社企業轉變爲社會主義生產的鏈鎖所必要的條件。

如果在第一個時期生產社會化只限於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那末很顯然地，牠使那些不能單靠農業維持生活而必須靠副業以增加收入的農民變爲社會勞動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點也不牽涉到他們的土地私有。例如礦山或製瓦工廠的社會化使成千成萬爲了要彌補自己農業經濟中的不足而須在礦山或製瓦工廠中找工作的小農從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者變爲社會的勞動者。

另一方面，種植甜菜的農民。由於製糖工廠的社會化可以不喪失其地產便從資本主義企業的零工變為社會企業的零工。牛乳業與現在更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牛油工廠及乳酪工廠等等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是一樣。但大的工業企業之社會化由於牠們結合在一個人手裏，一定會使那些在現代自由競爭之下獨立地出現於市場上的農業經營者變為社會的勞動者。

一旦所有釀酒工廠轉到一個人手裏，則忽布栽植者與麥芽生產者對於釀酒工廠的關係就如甜菜種植者於對製糖工廠的關係一樣。穀物生產者的農民與社會的磨粉廠之間，葡萄種植者與社會公有的酒店之間的關係其組合也是如此。

現在農業生產者已經依賴此等大企業，因此把他們從資本家手裏轉移為社會公有就等於解放農業經營者，尤其是解放了小農業經營者，如礦山業及其他事業的社會化對於以自己的僱傭勞動供給這些事業的小農，就是如此。

地租與資本利潤的分離，土地私有與農村經濟的分離——一方面是在租佃制的形式內，另一方面是在抵押的形式內——是和方興的農村經濟的工業化攜手并進的。無產階級的統治無條件地要使這兩種形式中的土地私有變為社會公有，使租佃和抵押的土地變為社會公有。大的土地佔有愈厲害（在佃農制發達的國家）和抵押的債務愈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則農業經營者亦愈迅速地承認并歡迎這個過程——農業的工業企業之社

會化的過程，解放的過程。

最後，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定引起站在剝削僱傭勞動上的大工業的農業企業之社會化。誠然，在農業中大生產沒有像在工業內一樣有統治的趨勢。但是要期待農民的經濟排擠大生產，那簡直是謬妄之至。在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內大生產與小生產是互相牽連着的。

獨立的農民的經濟已經不可救藥；牠只有依靠大經濟纔能穩固。在附近有大工業企業，能供給農民以職業使農民成爲僱傭勞動者或成爲表面上獨立的爲資本家勞作的經營者的地方，這種大工業企業就使他們成爲奴隸。在沒有這樣情形的地方，他需要大的農業經營，爲的是他不致降到極度的貧困。自然，大的農業經營比小經營更感到農村逃亡的痛苦，但是農民的家庭也從此開始衰落下去，即令增加機器的應用稍稍補助勞動者的不足，然亦無濟於事。如果農業的危機剝削那些沒有充分資本的大地主比剝削農民更快，那末資本之迅速的積累就產生出善於從農業剝削與工業剝削的結合中取得收入的資本家，對於他們亦祇有在大的範圍內——而不是在農民的經濟內——纔有可能，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們無論怎樣不能預料大經營在農村經濟內迅速吞併小經營，可是我們也沒有根據希待着相反的過程（即小經營排擠大經營——譯者。）實際上，統計僅指示給我們在大小不同的各個範疇間之關係的微小變動，往往爲生產方法的應用所說明的變動乃是生產之較大的強度，而不是經濟的退化。如果在德國五十海克

塔爾以上的經營，在全部被墾殖的農業的面積中在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期間從百分之三三降至百分之三二·五六即減少百分之〇·四四，那末在法國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八年四〇海克塔爾以上的經營在全部耕種面積中是從百分之四四·九六增至四五·五六，即增加〇·六〇。

這是極細微的差異。但是在德國和在法國一樣，大經營佔土地極大一部分，在德國幾佔三分之一，在法國幾佔二分之一。但是法國在一八八二年時在這些經營中從五、六七二、〇〇〇農業經營者中出來的有一四二、〇〇〇人，即佔百分之二·五一，在一八九二年時甚至從五、七〇三、〇〇〇人中祇有一三九、〇〇〇人，佔百分之二·四二；在德國一八八二年時從五、二七六、三四四農業經營者中有六六、六一四人，即佔百分之一·二〇，在一八九三年為六七、一八五人（總數為五、五五八、三一七人，即佔百分之一·二一）這些經營在僱傭制度的繼續存在成爲不可能的時候便轉變爲社會公有的財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即此一端，社會就獲得了農地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

大的農業經營所佔的極大的土地面積，牠的極其發展的資本主義性質，租佃制與抵押制的發達，農業工業化，這就是替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準備下基礎的因素。這種情形同工業生產社會化一樣，必不可免地從無產階級未來的統治中發生出來，牠和工業生產社會化更結合爲一個和諧的整體。

與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的諸社會因素同時發展的是牠的技術的因素。我們曾看到近代科學及近代技術侵

入農村經濟領域內并在其中完成一種變革，近代大的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內已達到牠的最高點，這些我們在第七章內就已經詳細地分析過了。但是像英國農業的完善的技術在過去一世紀內祇能在少數從封建主私有財產之極度壓迫中解放出來的產業內發達起來一樣，近代的技術也祇能在個別的產業內發展起來。要使技術普遍的推廣成爲可能并且肅清那些發展的障礙（牠們使農村經濟在短期繁榮之後又趨於衰落）就需要再來一次社會革命。

無產階級的勝利就等於軍國主義及大城市集中的消滅。大地產的社會化使大地產從承繼權及遠離家產的鎖鏈中解放出來。以自由的公社社員的勞動代替僱傭的奴隸就可給農業大生產以繁榮的元素（此種元素對於農業極爲重要并且此種元素若缺乏便更加阻礙農業的發展）即供給有智識的、自動的、努力的、充分數量的勞動力。農村逃亡就會停止，祇要勞動者能夠在農村中找到充分的工作，此種工作又能夠供給同樣的幸運，同樣的文化條件像城市工作一樣。工業與農業結合愈有力，商品生產及以經濟集中於大城市爲前提條件的商業的地位愈迅速地爲社會所生產與爲社會而生產（按照全國平均分配生產并完結大城市中人口之有害的廢棄）所代替，則農村逃亡亦愈迅速地停止。我們已經在小農和手工業者的職業的僱傭勞動內，看到農村經濟與工業結合的第一個可憐的形式；在更完備的形式內此種結合便是製造自己原料的農民的工業副業；在近代大地產內這種結合已達到牠發展的最高階段；但祇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內牠纔成爲整個社會生產的一般法則。

獨立的小生產在農業中喪失了最後的避難所。我們認識了，小農生產所賴以維持其生存的三種形式：靠職業的副業，靠大農業中的僱傭勞動，而在既沒有副業又沒有工資勞動的地方，在小農仍舊為純粹農業經營者的地方，在他對大農的關係不是僱傭勞動者而是競爭者的地方則靠過度的勞動與不足的消費，照馬克思的術語，就是靠野蠻為生。由於資本主義的企業轉變為社會的財產，小的農業企業無論前者，無論後者都一樣陷於依賴社會的生產，將為社會生產所吸引或者變為社會生產的簡單附屬品。但是那時純粹農業的獨立的小經營對於牠們的所有主就失去一切吸引力。現在城市無產者的生活高於小農的野蠻生活，農民的青年逃出農村不亞於農村的僱傭勞動者。但是當社會主義的大農場四面八方的包圍他們，此等大農場已經不是由可憐的僱傭奴隸來耕作，而是由協作社的富裕的社員，自由的，活潑的一輩來耕作的時候，——那時就不是從小塊農地逃入城市而是開始從小塊農地極猛烈的逃入協作社的大經營，並且野蠻狀態亦將會從牠那為文明世界所不及的最後逃避所中被驅逐出去。

社會主義的大生產給予小經營者的不是剝削，而是將他從地獄——即現時小農受自己私有財產束縛的地獄中解放出來。

社會的發展在農業中所走的方向和工業中一樣。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條件在社會的大生產，在其最高的形式內農業與工業被銜合為堅固的一體。



都走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徐

中山文庫 土地問題 卷上一册

(34472-1A)

Die Agrarfrage

每册定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原著者

Paul Kaestle

譯述者

岑紀

編輯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1954年
十月十日

